

董元梓回憶錄

董元梓·著

上

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文革

『五

大領袖』

——

董元梓

回憶錄

董元梓·著

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九思實錄書系

文革「五大領袖」

聶元梓回憶錄（上）

聶元梓著



上圖：二〇〇一年在深圳



中圖：二〇〇一年在中英街

下圖：俄羅斯聖彼得堡——彼得夏宮碼頭



作者近影



上圖：一九九九年
夏在昌運宮



中國：北京大學東
操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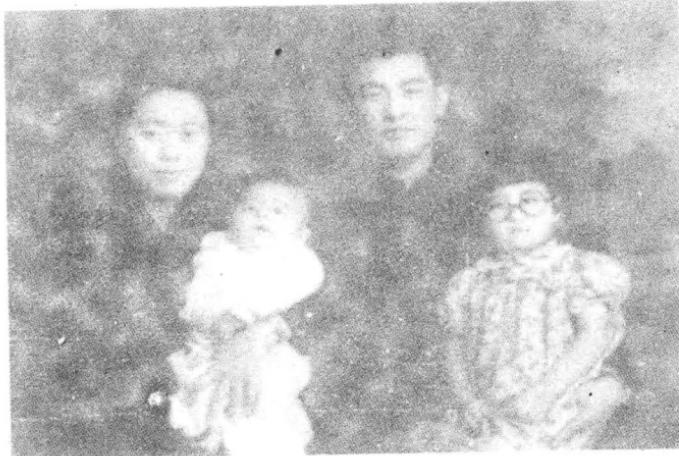
作者近影



上圖（左）：一九三八年在太
山上

圖（右）：一九四八年在哈
市

一九五〇年在哈爾濱市



作者各時期照片



左圖：一九六〇年在北京大學經濟系

下圖：一九八五年出獄後



作者各時期照片

序言

王若水

“文化大革命”是中共歷史也是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然而，有關“文革”的許許多研究仍是一個禁區。中共領導層意識到，十年動亂對黨來說並不是件光彩的事，他們要淡化這一段歷史，希望人們忘掉它。儘管這樣，近年來，無論是在海外還是國內，還是發表了一些有關“文革”的文章，出版了一些有關“文革”的書籍。這些出版物提供了不少有價值的史料，但也不乏著眼於市場，輾轉傳抄，或著意“演義”的作品。對關心歷史真實的讀者來說，最好是看有檔案或文獻根據的著作，或當事人的第一手材料。由於相當多的當事人已經相繼亡故，這些史料越來越珍貴了。

本書作者聶元梓的身份有些特殊。她是一九三七年參加革命的老幹部，從延安出來的，“文革”開始時任北京大學哲學系黨總支書記。憑她的這個資歷和地位，一般逃不脫被戴上“走資派”一類帽子的命運。然而，錯綜複雜的政治鬥爭卻把她推上了歷史的舞臺，使她一夜之間成為全國知名的人物。她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牽頭者，是風雲一時的紅衛兵領袖，“響噠噠的造反派”代表。幾經周折之後，她又成了階下囚，受盡折磨、現在雖已出獄，卻仍然是受到一致的譴責，“臭名昭著”。她的名字成了“文革”時期造反派運動的象徵，她的“罪行”好像已經成了定論。

由於中國沒有司法獨立和新聞自由，她的辯護為法庭所漠視，更不為公眾所知。在法庭上，她試圖為自己辯護，但她的發言權被強行剝奪；在法庭下，她多次辯護，但沒有任何結果。現在，她把自己的經歷原原本本的寫出來并出版了，我們不應當聽聽她的陳述嗎？

我一直認為，“文革”的罪魁禍首是毛澤東、林彪、江青集團

是幫兇。我之所以要這樣強調，因為按官方的說法，毛澤東應該承擔的主要罪責往往輕描淡寫，“爲尊者諱”，而祇是譴責和懲罰那些次要人物。在審判“四人幫”的法庭上，江青說“我是毛澤東的一條狗”。這是實話。當然，狗也有狗的罪惡，江青是一條咬人的惡狗。但是，是誰把這條惡狗放出來咬人的呢？像反對周恩來這樣的事，是江青做得了主的嗎？

從這本書中也可以看出，毛澤東是“文革”中一幕幕話劇的總導演，儘管沒有明確這樣說。聶元梓在“文革”期間採取了抵制和反對江青、康生、謝富治等人的立場。她作為一個有政治經驗的老幹部對當時許多問題有自己的考慮，而這種考慮問題的方式，是和那些單純的、狂熱的紅衛兵不同的。儘管如此，她卻不能擺脫當時流行的對毛澤東的盲目的個人崇拜，不能不追隨毛澤東參加“造反”。這是很自然的，不過到了後期，她也陷入困惑之中，想要擺脫卻身不由己了。

“文革”結束以後，那些受打擊的老幹部紛紛復職，重新掌權，給“文革”作結論的正是這些人。他們要全盤否定“文革”，但又要保護毛澤東。他們不但要懲治林、江集團，也要懲罰所有那些反對過自己的“造反派”（至於“工宣隊”和“軍宣隊”，因爲是毛澤東派出對付學生的，所以儘管也整死了人，卻沒有事）。他們在推翻那些加在他們頭上的“走資派”、“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叛徒”一類的誣陷不實之詞時，連羣衆的大字報揭露的他們的



聶元梓同王若水在一起

官僚主義作風，特殊化等等確實存在的缺點，也一概不認帳。他們也忘了，那種冤枉無辜的事情，他們自己也做過，甚至還在繼續做。

在回顧“文革”時，最容易犯的一個錯誤，就是脫離了當時的具體的歷史大環境，當時的特殊的政治氣氛，而以現在的眼光去要求那時的人物的言行。其實，許多現在看起來荒唐透頂的事，在那時卻被相當普遍地看作是理所當然的革命行動。在初期，許多熱烈擁護“文革”的人，包括許多紅衛兵，確實是有道理的，他們確實受到了一個崇高目標的鼓舞。誰知道毛澤東到底要幹什麼？頭腦清醒的有幾個？我們要區別的是，在那種條件下，什麼錯誤是不可避免的，什麼錯誤是可以避免的，什麼錯誤是上當受騙，什麼錯誤是出於自己的不純的動機。例如，要學生不響應毛澤東的號召，不起來“造反”，這是不現實的。但同樣是“造反派”，同樣是“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有些人強調的是“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革命是暴動”，要把階級敵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另一些人則強調“大多數幹部是好的或比較好的”，“要文鬥，不要武鬥”。在紅衛兵組織“打語錄仗”時，就可以看到這種場面，這就是各人自己的選擇了。錯誤人人皆有，但性質卻有不同。

在這本書中，有聶元梓對一些事情的辯護和澄清，也有她對自己給別人造成的不幸和痛苦所做的懺悔，此外還有她對自己所受苦難的傾訴。她的辯護是否有理，她對自己的錯誤的承認是否坦誠，對她的懲罰是否公正，這些當然有待讀者做出自己的判斷。但我相信，聽取被控訴者的申述乃是做出全面公正的評價的必要條件。更何況這本書還提供了不少鮮為人知的第一手史料，讀者一定會感興趣的。

二〇〇二年一月

補記：本書“序言”為王若水先生生前所作。王若水先生已於二〇〇二年二月逝世，本書因各種原因延至今日才能正式出版（二〇〇四年十二月）。

代序

劉貫一給胡耀邦的信

下面這封信是我的老上級劉貫一同志給當時的黨中央書記胡耀邦同志寫的，原稿我還保存著，原信較長，現在節選取其前章。為尊重原作個別改動的字用〔 〕標誌。

胡耀邦總書記：

關於聶元梓同志在“文革”初犯的錯誤和對她的處理，我有些不同的看法和意見，向黨提出來，請予考慮。

(一)

我認為對她的判刑是錯誤的。判有期徒刑十七年，剝奪四年政治權力更加錯誤。

她也不是所謂“五大領袖”之一。她是老幹部，不是羣衆組織的頭頭，更沒有拉幫結派，搞打砸搶等行動。她是北大校文化革命委員會的負責人，這是毛主席指示成立（當然是錯誤的），並由王任重同志親自具體領導組織成立的。這個組織與當時派往北京大學的工作組及以後派遣的軍、工宣傳是一樣的領導運動的組織機構。所傳她是“五大領袖”，與蒯大富等人並列是不應該的，也是錯誤的。

我瞭解她沒有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參與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的陰謀活動。她的錯誤是執行毛主席的錯誤指示和黨中央錯誤決定（對北大當時社教運動試點的決定和在“文革”中的決定）問題，性質是執行黨內的錯誤路線的問題，沒有觸犯刑律，不應以法律來解決，即對她犯黨內性質的錯誤，也應該全面地、客觀地、歷史地看待。

據我所知，她較早地有了覺悟，認為：文化大革命“搞錯了”，要求不幹了，還建議解散北大校文化革命委員會，並且反了林彪、江青一夥，保周恩來總理，因而受到林彪、江青等殘酷的打擊迫害。我們應該允許幹部犯錯誤和自己糾正錯誤，不應該揪住錯誤不放，甚至加以擴大歪曲和提高。因此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和六中全會決議的精神，同樣適用於解決她的問題而不應該違背。

（二）

我所瞭解她的主要錯誤和情況是：她根據一九六四年底，黨中央對北大進行社教運動試點的決定和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黨中央關於進行“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與其他幾位教師、幹部寫了一張響應黨中央號召的大字報，受到了毛主席錯誤的讚譽，在全國廣播後，影響很大，對文化大革命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這個問題不能由她個人負責，而她是不可能知道文化大革命的上層情況。

因為發動“文化大革命”是根本錯誤的，所以她還有其他的錯誤，如去上海串連，雖是毛主席指示她去的，但反了曹荻秋同志執行所謂“資反”路線的錯誤，被林彪、江青所利用。

其次，在北京體育場召開批判陸平同志的大會以及6月1日廣播大

“字報後接管被工作組集中勞動的一批校系幹部、講師、教授，讓他們繼續勞動（這是王任重的指示），這也是錯誤的。羣衆對他們進行批鬥和人身摧殘的行為，沒有及時發現，有力地制止（當然那時也很難制止），也是錯誤的。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聶曾經經李訥請示毛主席對陸平同志及校系這批幹部、教授、講師怎麼辦？毛沒有指示，聶不敢擅自處理。陸平同志因是中央管轄的幹部，聶沒有接管和插手，一直是工作組時期組織的人在管理勞動等。

在這裏我特別需要提到的是關於鄧樸方同志（即鄧小平同志的兒子，當時是北京大學技術物理系學生）被抓，摔殘的問題與聶無關。當時抓鄧她不知道，她也沒有指示任何人去迫害他，也沒有說過他一句壞話。說她開除鄧樸方的黨籍，根本無此事。

鄧樸方同志被抓、摔殘是一九六八年夏，在謝富治挑起北大武鬥的後期，聶已不能控制學校的形勢下發生的。而且在聶制止武鬥，一再宣佈不准隨便抓人、打人、打死人，宣佈這是嚴重地違反了政策、法律的行為之後。這本是林、江指示謝富治挑起北大武鬥的目的，這本是謝富治的罪行，是林、江一夥的罪行，怎麼能安在聶的頭上呢？

我還聽說，鄧小平同志曾對某人說過：“我什麼時候看見我兒子，就想起了聶元梓！”不知這話是否確切，我認為這個誤會應該解開了。

事實的真相是：當時聶的處境十分困難。面對這樣“大後台”的武鬥，誰能制止？怎樣制止？聶明知不能制止，但也不能不去制止，因為打死打傷人的罪責都要安在她頭上。她怎麼可能再去抓鄧樸方呢？這時，聶雖然沒有完全認識清楚鄧小平同志有沒有錯誤的問題，可實際上她鬥爭的矛頭已經指向林、江了。

關於北大發生武鬥和聶揭露謝富治挑起武鬥及[聶]制止武鬥的情況，北京市公安局已經查清，證明聶在此事件中是正確的，制止七校萬人來北大武鬥是有功的。

事實上抓鄧樸方同志她根本不知道，當學生告訴她摔壞已經送醫院時，她還叫醫生好好給他治療，快把他妹妹鄧楠找來照顧他！可是，這時鄧楠已被抓了，她還不知道。所以，這些事實都說明：鄧樸方同志被抓、摔殘與聶無關，鄧小平同志應該解除誤會，把仇恨記在林、江名下。

還有一個問題，在這裏我也須要向彭真同志說明，聶元梓沒有誣陷他和李倫同志（胡仁奎的夫人）。

康生曾在一九六七年四月給聶一公開的指示：“……北京舊市委內隱藏了許多叛徒。”讓北大組織羣衆“系統地調查彭真，劉仁黑幫”的材料。聶交校文革常委會執行了，但對調查材料做了絕對保密的規定，她認為現在叫羣衆調查，將來還是要由黨中央決定的，對這些被調查人要負責，因此材料不准內部議論和外傳，調查的結果。聶認為舊北京市委內沒有叛徒，以否定康生的指示上報結束。

後來，北大學生羣眾組織的“戰鬥隊”自己認為發現了彭真同志與胡仁奎、李倫同志來往密切，誤認為黨派到蔣介石身邊的高級情報員胡、李是特務。由此，認為彭真同志有“特嫌”。

聶在這個問題上持極其慎重的態度，幾次拒絕轉送“戰鬥隊”的上報材料（現在還有聶拒絕轉送上報材料的批示為證，此材料現在北大黨委）。她指示要實事求是，要核實材料，不能捕風捉影，還說嘴薄一波同志根本不在晉察冀邊區，怎麼能與之勾結？還指出“戰鬥隊”應找胡錫奎同志和找李倫本人談話，等等等。

最後，因“戰鬥隊”引用了李克農部長和王世英同志等人對胡仁奎、

李倫同志的材料，要求轉送調查報告，聶弄不清楚是怎麼回事，祇得同意轉送康生等。由領導決定。校文革其他副主任也都同意簽了字。

從這些事實情況看，我認為聶執行調查彭真同志等[人]是錯誤的，但在當時條件下，不能不執行，有黨中央對“彭、陸、羅、楊”反黨集團和撤掉北京市委的錯誤決定，她怎麼能拒絕呢？即使不是康生指示的，就是“王生”、“劉生”的指示，她也會執行。這不能說明她追隨的是康生，與康生的什麼“特殊”關係，祇能說明，在當時歷史條件下，上級指示調查彭真等人誰也不能不執行。相反，從實際情況中說明聶的政治品質是好的，是正派的。不論對誰，即使是整過她的人，也是要以黨的利益為重和被調查人負責的態度，實事求是地對待，絕不乘機報復，落井下石，並且做到了絕對保密。這在“文革”中是不容易辦到的事，竟做到了沒對彭真同志散佈一句壞話。

至于後來，“彭真專案組”使用該戰鬥隊的調查材料，上報黨中央作為判處彭真同志、李倫同志冤獄的根據，那是“彭真專案組”的問題，黨中央也有責，難道羣衆可以誤認，黨中央不知道胡、李是自己派遣的情報人員嗎？而且，一年前“戰鬥隊”已被“彭真專案組”接收，直接領導，專案組使用原材料與聶無關。

我講以上聶的錯誤和情況，並不是說聶在文革初就沒有錯誤了。她是有錯誤的，在這裏我也不一一列舉和說明我的意見了，我認為都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的一般性錯誤，當然，作為聶自己應該很好的檢討和總結教訓，以利今後。

(三)

根據以上聶所犯的錯誤和全體情況，完全說明是執行黨內錯誤路線的問題，沒有追隨林、江，不應以刑律來解決，但為什麼會判刑呢？據我瞭解原因有二：

一是王力寫了誣陷材料，王廣宇出庭作了偽證。否則，不能開庭，並且，在公安局預審中沒有與聶對證這些誣陷材料。

王力誣陷說聶去上海串連是江青、陳伯達、姚文元、王力、關鋒、戚本禹等人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召開會議密謀決定的。可是聶接受李訥轉告毛主席讓她去上海串連的指示，是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下午，並且在十四日下午，王力、關鋒找聶等六人談話時，聶已將毛主席的指示和執行情況當六人的面轉告了王力和關鋒，王力根據聶轉告的（毛主席）指示作了工作上的安排。這就證明王力、關鋒于十一月十六日前即知道了聶去上海串連的決定和執行毛主席批示的情況，為什麼十一月十六日江青、王力那幫人還開會再密謀決定派聶去上海呢？為什麼王力、關鋒不將毛主席的指示和聶的執行情況告訴江青等人呢？這顯然是王力捏造的謊言，是故意的誣陷。但中級法院卻根據王力的誣陷材料認定是聶“積極追隨林、江參與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的陰謀活動罪”的主要根據。這是判刑的主要原因之一。

原因之二，是彭真同志指示判刑的。現引用一記者與有關方面負責人的對話來證明。時間是對聶剛判刑不久。

記者問：“聶元梓的問題是怎麼回事？”（指怎麼判那麼多年？）

負責人說：“我們不主張判刑。”

記者說：“那怎麼判那麼多年？”

負責人說：“彭真同志講：‘這樣的人不判刑什麼樣的人判刑？’我說：‘那判十年吧。’但彭真同志說：‘不行，判十七年。’我表示不好執行，認為沒有什麼依據，對彭真同志說：‘林、江主犯判十七年，這總算是追隨吧。’但彭真同志不同意，說：‘那有什麼標準！’”

就這樣以政治局名義下達政法委員會執行的。

以上就是聶被戴上反革命份子的帽子，判處“積極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參與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的陰謀活動，誣陷、迫害罪”，處以十七年有期徒刑，剝奪四年政治權力的根據和由來。

抄寫一段彭真同志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對《刑法》草案的說明：

彭真同志講：“為了防止罪名的濫用，關於反革命罪《刑事法》草案明確規定限于，‘以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為目的的、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行為’。”這不就是標準嗎？為什麼對聶元梓同志卻例外呢？怎麼竟能說：“那有什麼標準呢？”

有什麼客觀事實的證據證明聶元梓同志以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為目的，參與林江反革命集團，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的陰謀活動的罪行呢？從逮捕關押在公安局看守所監獄到法庭審判和投入監獄，到底拿出了什麼客觀事實的證據呢？沒有，至今也沒有。

聶在法庭上的申訴沒有任何人駁斥，因為沒有駁斥，所以也沒有辯論，但硬是進行了宣判。法庭不准她講話，強行關閉了麥克風，連問被判犯兩罪並罰的刑期是多少年，怎麼得出合併執行十七年的都不允許，採取欺騙的手法，強令退庭。至今她也不知道刑期到底是多少年。

在法庭上訴期內，她上訴高級法院。高法受理後，聶又多次要求提審，[法院]藉故不提審。但一手指令寫上訴書的補充材料，一手委令中級

法院代發終審裁定書。聶認為這是變相地剝奪了她的上訴權，因此沒有領取終審裁定書。現在她手中沒有合法的有法律效力的判決書。

在這種情況下，以押票的形式強行送至延慶縣監獄，改名換姓混押在小偷、流氓、殺人犯之中。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改造條例》第三十六條的規定，延慶監獄收押的手續是不完備的，聶要求法院補充手續，並要求答覆“江青授意”去上海串聯的內容是什麼？經監獄勞改局轉送法院，多次催問至今沒有答覆，也沒有補充送押入獄的手續。所以，她手中也沒有關押監獄服刑的文件。

由此說明，不論從逮捕、開庭判處，還是送監獄關押，都是不符合法律規定的。因此，聶元梓同志這一案，是政治上的冤案，又是法律上的冤案，必須徹底查糾。我們黨和國家的法律、政策是既不允許放走一個壞人，但也不允許冤枉一個好人。

(四)

我為什麼要對聶元梓同志的錯誤和對她的處理提出自己不同的意見呢？這是由於我對她的品德有一定瞭解和對她在文革中的事實的瞭解，並且也是為了維護黨的利益和黨的威信。這樣的錯誤處理已經在羣衆中造成不良影響。並且[也應]使幹部、羣衆吸取應有的教訓，我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這樣做是應該的。當然，也因我與聶元梓同志在戰爭烽火年代曾一起為黨工作，而且我與她的家庭成員有深交，甚至瞭解他們兩三代人的情況。這是一個滿門革命的家庭，從他們的父母到七個兄弟姐妹都是為黨做過不少工作，以至犧牲，對黨是有貢獻的（這是紫陽總理深知的）。聶真被殺害的妻子——李岫雲同

志是我在一九三七年送赴延安學習的，梁寒冰及夫人聶元素同志，我們很早在北方局工作就相識了，元素同志與元梓同志與我曾在一起工作過，有共生死同患難之交。因此，我關心元梓同志的情況是自然的。從其家庭成員和親屬的來往中，常聽到她的情況也是自然的。所以，不論從對一個革命家庭的關心和與她個人工作的關係而關心，都是應該的，與黨的利益和黨的政策是一致的。

補記：這封信是一九八五年寫的，因為內容牽涉到鄧小平和彭真，考慮到貫一同志的安全，我和我的家人都勸阻他暫時不要上呈。不久貫一同志因病辭世，這封信就沒有發出，現在，我把它和我回憶錄放在一起發表，算是對他的紀念，也希望這會給他增添哀榮，而不是身後的麻煩，在他身上我看的不祇是老大哥的慈愛，戰友的關懷，也看到了一個真正革命者為真理奮鬥的精神，它將鼓舞著我，激勵我勇敢奮鬥。

自序

讓歷史告訴未來

我終於可以說話了！

我國政府加入了聯合國“公民政治權利公約”，黨中央領導對法制建設的重視，使我看到了希望，我希望領導一切的黨不再高踞於法律之上。感謝出版社，給我開口說話的機會，將這本回憶錄呈獻給廣大讀者。

從一九六八年工、軍宣傳隊進駐北京大學至今，我一直被剝奪了公開發表自己觀點、意願的自由和權利。甚至我出獄後被剝奪了生存權，至今還沒有徹底解決，我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但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卻無居住的立錐之地。

幾十年來，在形形色色的宣傳工具營造的社會輿論中，我被描繪成反革命的野心家和陰謀家，十惡不赦的狂人和災星。面對那些由重複了千遍的謊言和一面之辭構成的所謂“內幕”、“真相”、“大事記”等等，我對於衆口鑠金之強大，流言殺人之可畏，有切膚之痛。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直到今天，還有多家報紙，仍在以訛傳訛地重複著近十年前一位姓葉的名人製造的謠言：聶元梓已經結束了七十三歲的生命。如今，八十三歲的聶元梓在這裏告訴讀者：謝天謝地，我人還在，心更未死！早在一九六九年，中央文革開始公開整肅我時，我就下定了這樣的決心：為了等待有發言權的那一天，我一定要頑強地、健康地活下去！

在這本回憶錄裏，我不但要推翻種種強加於我的不實之詞和罪名，沖掉潑在我身上的污泥濁水，也要為那些受我的罪名株連的認識和不認識的朋友洗清不白之冤；同時，我還要向那些因為我在文革中犯錯誤而造成痛苦的人致以深切的歉意和懺悔。

由於年代久遠，記憶力衰退，某些事件的全過程和細枝末節，我

可能記不準確了，但那些主導性、決定性的情節和過程，我至今仍記憶猶新。我當時對這些事件的印象、感受和認識，也是難以忘懷的。書中提到的許多事件，在我被捕以後，都經過了公安局和監獄等有關部門的調查，並被確認為事實。對一些所謂“有爭議”的問題，我仍要堅持事實，絕不認可那些或主觀或惡意的推測、虛構、甚至憑空捏造。比如“第一張大字報”，本是幾個在國際飯店會議上挨整的所謂“社教運動的積極份子”，在《五·一六通知》的啓發和激勵下自己撰寫出來的，絕不是一些人信口所云：大字報是康生一手包辦炮製的。又如我去上海串聯，本是我自己提出，經毛澤東同意，由李訥親口向我轉達的，絕不是什麼“江青授意”的。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如此等等。

既然當年置身政治漩渦，那麼我的所見、所聞、所想，我的遭遇，我的命運，都不再是個人瑣事，而成為那段歷史的一部分。我有責任把我親身經歷的那一部分歷史如實地告訴今人和後人。歷史一定要以真實為基礎。認真地想想，從延安四二年整風前後好幾十年來，我們黨和人民因為說假話、信假話所遭受的苦難太慘重了！

活到今天這把年紀，在這樣的處境下，能否開脫同江青、林彪、康生之流的“黑關係”，對我個人還有什麼利害可言？我既不會再度坐牢，也不敢指望能得到平反或補償。說得堂皇一點，我祇希望說真話，讓歷史恢復它本來的面目。可是，禁止研究文革歷史，企圖掩蓋歷史，偽造歷史，導致今日的青年對昨天的事情茫然不知。說實在的，就是年長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內），對我們黨過去的好幾十年的真實歷史又能知道多少？確實要認真想想，僅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們的國家、社會、民族，付出了那麼慘重的代價，還不應該好好地總結一下嗎？有些人卻把這一段錯綜複雜、撲朔迷離的文革歷史，簡單化為幾個野心家策劃的陰謀活動，或祇懶辦些紅衛兵及

造反的羣衆，這是對歷史不負責任的。科學、準確、全面、深刻地總結歷史及其對現實和未來的意義，有待於開放檔案，特別是實現憲政民主，實現言論、出版自由和免於恐懼的自由，以使我們這些親歷文革的人，都能說出真話、實話，把自己的腳印留下，以供後人研究總結出深刻的經驗教訓。

我盼望所有真誠的讀者——今天的未來的，能夠透過我的回憶，接近歷史，反思歷史。若如此，我也就如願了。

在此，我要感謝那些在我十分困難的日子裏，對我伸出同情、理解和支持之手的人們。他們中有北大和清華的師生，有文革中支持我或反對我的以及當年的外地小紅衛兵（現已到中年），還有我在獄中遇到的正直善良的看守人員。在我出獄之後，他們常來看望和幫助我。還有一些相識或不相識的人們，也以自己的方式表示對我的理解和幫助。

最後，我要感謝劉淑君、劉蓓蓓兩位女士和寶善先生，他們在我的回憶錄寫作中做了大量工作。特別是長史先生，對我的回憶錄的材料核對整理付出了艱辛勞動，梳理材料、確定框架、劃分章節，作出了創造性的努力，余汝信先生對回憶錄作了大量編輯、整理、審核註釋的後期加工，才使這項艱鉅的工作得以完成。同時，也感謝文衡文化發展中心為回憶錄的修訂和出版所給予的支持和幫助。

我很喜歡“讓歷史告訴未來”這句話，請允許我借用它作為我這篇序言的標題。

個人簡歷

- 1921 年 4 月 4 日（陰曆 2 月 27 日），生於河南省滑縣。後在開封北倉女中讀書。
- 1935 年冬 在開封北倉女中參加學生革命運動。
- 1937 年 入伍，在山西太原蟻盟會辦的學兵隊 12 連受軍訓。8 月調中共北方局情報局工作。12 月入華北軍政幹部學校學習。
- 1938 年 1 月加入中國共產黨。5 月調太南遊擊隊司令部工作，並兼做地方群衆工作。10 月調晉冀魯豫區黨委黨校學習。12 月調晉豫地委婦委副書記，開拓晉城中心縣婦女工作。
- 1939 年 5 月調中條山地委任婦委副書記，晉南工、農、青、婦救國會黨組副書記。開拓晉南群衆工作。在新軍事變中，保護了黨組織。
- 1940 年 調延安中央黨校學習。
- 1945 年 10 月調東北任鄭家屯區委書記。
- 1946 年 5 月調齊齊哈爾市委任區委副書記。
- 1947 年底 調哈爾濱市委，任區委宣傳部長。
- 1948 年 調哈爾濱市委機關黨委副書記。
- 1949 年 先後在哈爾濱市委、松江省委任學習室主任、理論教育處長等職。1950 年全國第一次幹部評級時被評定為行政 12 級，之後未再提級。（至 1959 年）
- 1960 年 6 月調北京大學，先後任經濟系副主任、哲學系總支書記、校黨委委員，是北京市黨代表會代表。

- 1963年春 任北京大學哲學系黨總支書記，校黨委委員、北京市黨代會代表。
- 1966年 9月，在貼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後，任“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主任。
- 1967年
- 1968年 4月任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至1971年1月）。8月工、軍宣隊進入北大。9月解散北大校文革。10月進學習班隔離審查。
- 1969年 4月在隔離審查狀態中參加中共九大，並被當選為中共九大“代表”，參加“九大”，當選為中共第九屆中央候補委員。9月北大革委會成立，宣佈為副主任，實際沒有參加任何活動。11月在江西鯉魚洲農場“勞動改造”（至1972年4月）。
- 1970年 8月參加中共九屆二中全會。
- 1972年 4月從江西鯉魚洲押回北大批鬥、審查後，在北京新華印刷廠“勞動改造”（至1975年4月）。
- 1975年 4月在北大儀器廠“勞動改造”（至1978年4月1日）。
- 1978年 4月1日，押送回北大關押。4月19日，在北大全校大會上批鬥宣佈逮捕。關押在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監獄預審5年。
- 1983年 3月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判，被判處17年有期徒刑，剝奪繼承權利4年。
- 1984年 12月保外就醫。
- 1986年 10月始終不認罪，假釋。

第一章 中原大地上的革命之家

開明的鄉紳家庭

一九二一年四月四日，我出生於河南省滑縣南尖莊。父親聶廷俊，字芝軒，是當地的名醫，母親李玉蘭是家庭婦女。在七個兄弟姊妹中，我年齡最小，我有四個哥哥，兩個姐姐，我是老七。我原先叫聶元碧，也曾經叫聶元子。後來，好多人說“元子”像日本人的名字，甚至由此說我長得也像日本姑娘，我就改名為聶元梓。名字是在延安學習的時候改的，當時中國人民正在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1]

我的家鄉在平原上，遼闊的原野，鬱鬱蔥蔥，滿目生機。一片一片的莊稼地裏，棉花、小麥、玉米、芝麻都在盡情吮吸大地的乳汁，地頭路邊的野花蓬蓬勃勃地開放，天然一幅美麗的圖畫。站在平原上，看到的都是一片一片的綠蔭，有筆挺的白楊，茂密的槐樹、椿樹、棟樹，房前屋後還有桃樹、棗樹、杏子樹……一到春天，桃紅李白，椿樹開黃花，棟樹開紫花，花香撲鼻……也不知道家鄉現在是什麼樣子了，我都多少年沒有回去了！

我們家在當地是比較富裕的，幾代人都是讀書出身。我們家又是一個革命家庭。在大革命風起雲湧的年代，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火燃燒到中原大地的歲月，我們一家人，我的父親母親和兄弟姐妹（後來，父親還帶上了給他種地的夥計的兒子）全都參加了革命，走上了抗日救國、為人民大眾求解放的道路。我雖然讀書不多，但也在哥哥姐姐們的熏陶和影響下，在幼年就投身于革命隊伍，踏上風風雨雨的人生道路。

古人說，太上醫國，其次醫人，再次醫病。做人也是如此，最高境界

是能夠拯救國家危亡；解除民族苦難。我家世代行醫，我父親對中醫的造詣很高，在當地很有名氣，後來，在大時代的召喚下，才獻身於救國救民的偉大事業。

我祖父和曾祖父都是當地很有名的中醫，醫術高，醫德也好。曾祖父在當地最有名，人們給他起了個外號叫“聶二聰”，就是說他性格很讓人聰明，和常情常理聰著一股勁兒。為什麼呢？他早年喪母，繼母對他不太好，他就離家出走了。流浪在外，生活很困難，聽說還討過飯。後來有人將他找回來，與家人和好了。他回來後，三年不下樓，奮發讀醫書。書上到處留下他的圈圈點點和批註，後來，在行醫中結合實際，書上的批註就更多了（我祖父和父親後來繼承了他這批寶貴醫書）。聽說，他下樓行醫，一下子出了名，在我們家鄉那一帶，名氣很響，請他去看病的馬車經常在門口排隊。

救病如救火，為了討他的歡喜，能及早得到治療，不熟悉的人免不了恭維他，奉承他，給他戴高帽子。天底下誰不愛聽好話？他就不這樣。越是恭維他的人，他越要把人家排到後面。有些有錢有勢者想多花錢請他先看，他從不允許。先給誰看，後給誰看，他總是遵循自己的道理。他到一家去看病，其餘等他看病的人就排著隊跟著走。那時候村裏人都用馬車，人叫馬嘶的，很壯觀。因此，人們有病沒病，都要對他禮讓三分，捧著他，敬著他，可他總是聰著勁兒。大概他覺得自己是普通人，把他擡舉得過高，他反而不舒服。

我的祖父和父親也是很有名的中醫，他們的事業後來被我二哥聶元賞繼承。二哥從事血液學研究，後來到四川去支持三線建設，跟隨醫院搬到了大西南。他醫術高明，善於鑽研，在醫院裏很受尊重。

當時的醫生都是既行醫又開藥店。我父親在家裏開了一個中藥店，

自己坐堂行醫。我家的藥店，藥品相當齊全，其中有許多珍貴的中藥材，方圓數十里的鄉親們都來我家看病抓藥。小時候，我常到藥店去玩兒，店裏有各式各樣的小瓶子裝著五顏六色的藥丸，很好玩。不過，我那時真正感興趣的是可以當作小食品解饑的肉桂、桂元肉，常向大人們要著吃。

父親是一個師範學校的畢業生。在本世紀初的農村，這是較高的教育程度了。從哪裏畢業的，我不是很清楚。我祇記得看到過他上學時畫的畫兒。在我的印象裏，父親很注意國家大事。祖父就他一個兒子，生活條件很優越。家裏當時有三四個院子，有一大片林園和土地。我父親在行醫的同時，還經營自家的土地，也到縣城集鎮去賣自家生產的棉花、麥子等。



父親聶廷俊，字芝軒

我父親思想非常開明，他關心國家的前途命運，關心國共兩黨的鬥爭，很早就開始訂報紙。鄉村裏很閉塞，那一帶農村就他一個訂報紙，郵局不給他往村子裏送，我父親就買了一輛自行車，讓家裏的夥計騎到鎮上去取報紙。那時，自行車在鄉村可是稀罕物。年紀稍微大一點兒以後，我也學會了騎車。那個年代，農村裏女孩子會騎車的為數很少。

雖然我出生的時候已經是二十年代初期了，在北京和上海，新文化運動轟轟烈烈，中國共產黨就在這

一年成立，可是，在滑縣一帶，女孩子從小就都要纏腳。照老祖宗的法子，在哭哭啼啼中把腳纏成一個小糉子，不把腳裹得又小又尖，擔心長大了嫁不出去。當時，女孩子不但要纏腳，還得在家中做活紡綫，不准隨便上街，更不能同男孩子一樣上學，認為這是男女混雜，破壞了禮習。中原大地是封建文化積澱最深的地方，我們家是個大家族，自然也很封建。可是，我和我的姐姐、嫂嫂們算是幸運的，當時一聽到縣婦女協會宣傳男女平等，宣傳不讓裹腳，我父親就接受了這樣的新思想，讓我的姐姐和嫂嫂們不再纏腳。他還讓我們姐妹和我哥哥一樣都到城裏去上學，這在當時的農村是很少有的。

母親說：“路是彎的，理是直的”

我母親雖然生長在鄉村，但受家庭的影響，她胸懷寬廣，為人熱情。再有一點，她天賦很好，沉著、冷靜，遇到緊急事情，能夠從容應對。我父親呢，一到這種時候，就慌了神了，常常是我母親幫他支撐局面。我母親常說“路是彎的，理是直的”。這句話給我印象很深，總也忘不了——人總是要相信真理，堅持真理啊。

按說，我們家的經濟狀況是非常好的，可是，我母親仍很勤勞，除了管家裏的一攤子事，還下地參加農業勞動。我們家有幾百畝土地，都是我父親經營。到農忙的時候，我母親和



母親李玉蘭

嫂嫂們還下地去拾麥子。到了秋天，有時候嫂嫂們也下地去摘棉花。我從小就常常跟隨母親一塊兒下地幹活兒。我母親對我說，我下地勞動的收穫全都歸我自己，拾了麥子或者摘了棉花，要讓父親給我付工錢，母親就給我攢起來，家鄉話叫作“攢體己”，留著給我買花衣服。

備受寵愛的“聶四少爺”

我是家裏最小的孩子，又是女孩，哥哥姐姐們都比我年長得多，所以什麼事情都謙讓著我。父親母親也最喜歡我，總是寵著我，嬌慣著我，再加上父親接受新文化的影響，給我的成長提供了一個寬鬆的環境。這樣，在家裏我從小就是個“解放派”。父親出門辦事，做買賣，趕集，從村裏的家到城裏的家，經常帶我去，這使我從小就見了不少世面。本來，女孩子都要裹腳，不准隨便出門，人家看見我跟著父親到處走，剪著短髮（那時候，女孩子都留著大辮子），穿著小長袍，男孩女孩分不清，有的人就把我認成“聶四少爺”，說：“四少爺有沒有媳婦了？給他說一個吧。”

正像我姐姐經常說的那樣，我從小就沒有受到封建主義的束縛。小時候，我和男孩子們一塊兒玩耍，一塊兒爬牆頭，上樹，一塊兒到田野裏去鏟草餵牛，別的孩子是為了幫助家裏大人幹活，我是因為好玩兒。我們把草鏟回來，在村邊的水坑裏淘洗乾淨了，再揹回家，因為帶著土的草，牛不吃。大熱天，男孩子們洗完草，就跳下水坑游泳，我就呆在水邊上。他們叫我，我終於忍不住好奇心，就下水了。岸邊的女孩子們都不敢下水，因為她們還纏著腳呢，看我游水，她們也很羨慕。游泳這種事情，關鍵是

膽子大，敢撲騰，不怕喝水，三學兩學，加上男孩子們一點撥，就學會了。從水裏出來，衣服濕淋淋的，就站在打麥場上曬，曬乾了才回家。

我下水游水的次數多了，時間長了，家裏邊就知道了。我母親不讓我跟男孩子們一塊兒下水，她說，你一個女孩子家，不能像野小子一樣瘋跑瘋玩。我母親不讓我去，我就偷跑著去。我在前面跑，她就在後面追跑。她是小腳，跑得慢。等她到水邊。我已經“撲通”一聲下水了。母女二人對峙，一個在水裏，一個在水邊，我和她講條件說：“你要讓我游，我就在水淺的地方游，你要不讓我游，我就到水深的地方去游”，一邊說我就一邊往水裏縮身子，往水裏蹲，其實還是在水淺的地方，我是誠心嚇唬母親，“你看水深了水深了”，一邊說一邊蹲下去，好像水已經淹到脖子了。我母親一著急，祇能妥協：“好了好了，你就在水淺的地方游吧”，這樣一次兩次地，我的游泳就合法了。

總也不畢業的“大學生”

我大哥聶真被送到北京中法大學讀書，中法大學的畢業生都是準備到法國繼續留學的。我父親送大哥讀書是想讓他出國留洋，可是這個學生老不畢業，老是跟家裏要錢，後來才知道，他在學校裏接受了馬列主義思想，參加了共產黨。其實，他早就畢業了，畢業以後就留在北京做黨的地下工作，用父親的錢支持同志們搞革命。

大哥聶真投身革命，這就勢必影響到弟弟妹妹們的人生道路。他經常寫信回來，或者在放假回家的時候，給我們講革命道理，講蘇維埃社會主

義國家的奇蹟。不但我們兄弟姐妹受到他的開導，參加了革命，連我父親這樣的鄉紳也接受了我哥哥的影響。聶真說，到將來實現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你不要怕沒收你的土地，沒收你的房子，到那個時候，沒有窮人了，窮人都富裕了，人人都比你現在富裕，都比你現在的生活好，你還怕什麼？另一方面，我父親一向看報紙，關心國家命運，報紙上講，蔣介石國民黨對日本人的侵略不抵抗，反而一味地打內戰，這令他非常反感。國民黨的報紙上經常說在這裏消滅了多少紅軍，在那裏消滅了多少紅軍，這種宣傳太多了，就產生了反作用。我父親說，今天在江西消滅幾萬紅軍，明天在湖北消滅幾萬紅軍，加在一起，消滅的紅軍有多少。那比紅軍加在一起的總數都要多出許多，根本無法讓人相信嘛！對蔣介石失望以後，他就很容易傾向於共產黨了。加上我哥哥的宣傳，他對共產黨從同情到支持，從支持到直接參加革命工作。

從一九二七年起，大哥聶真就在滑縣從事革命工作。當時正是國共合作時期，我大哥是共產黨，但他又在國民黨滑縣黨部工作，是參加了國民黨的。他在縣城工作，經常回家。三哥聶元昂（聶季超），四哥聶元典（聶金聲），二姐聶元素都在城裏上中學，聶真就給他們帶一些革命書籍回來，教育引導他們接受革命道理。我那時已經不再同大嫂一道上識字班了，開始獨立到縣城的十五小學讀書。我雖然不是大哥的“工作對象”，但是耳濡目染地，似懂非懂地聽了不少有關共產黨鬧革命情況。聶真還把一些共產黨員帶到我們家裏，管吃管住管醫療，把我們家變成了黨的聯絡站。如果我父親用中醫藥方治不了的病，就送他們到西醫院治療。當時冷楚夫婦住在我們家（現在，冷楚的女兒還常到北京看望聶真），^[2]整天上醫院去看病，回來帶很多打針的藥水瓶子。我那時候小，看什麼都新鮮，那些針藥瓶裏的透明液體在陽光下映出七彩光環，非常好看，直到今天我都忘不

了。

在這樣的家庭中成長，我從5歲就開始讀書識字，就半懂不懂地知道了國民黨和共產黨。我大哥聶真結婚的時候，我還很小，他的媳婦是家裏給說的。我嫂子長得挺漂亮，就是識字不多，我父親就讓她上學。這也是考慮到，我哥哥在外面上過大學，要是媳婦沒有文化，他們的家庭怎麼能維持？當時沒有成人學校，就上縣裏的婦女協會辦的婦女識字班，我就和她作伴，跟著她去上學。我認了不少字，能看小人書（連環畫）。聶真帶回來的一本關於孫中山的小人書，書中講孫中山怎麼樣反封建，剪辮子，怎麼樣破除迷信，打廟裏的泥胎神像，反對崇拜鬼神。這本小人書給我的印象極深刻，直到現在，孫中山到廟宇裏打神像泥胎的畫面還歷歷在目。我小時候最怕鬼了，可我像許多小孩子一樣，偏偏最愛聽鬼故事。讀了孫中山破除迷信的故事以後，我非常敬佩他，他多勇敢啊，敢一個人到廟裏去，把那麼多泥胎都打倒，事後也確實沒有鬼神出來糾纏他報復他。從那以後，我就不再相信有鬼。不過，在相當長的時間裏，直到我參加革命前夕，心理上還是怕“鬼”，不敢一個人單獨地住在一間房子裏。

就這樣，我聽說了共產黨，聽說了唯物辯證法。我知道共產黨是為窮人謀福利的。我也常聽大哥講蘇聯的故事，講個人犧牲保護組織保護同志的故事。老聽他們在一起講唯物辯證法，而且是偷偷摸摸地講。聶真很有革命警惕性，他總是非常謹慎地把弟弟妹妹們召集起來，對他們進行革命教育，還一再強調要保密。看著他們那隱秘的神態，還以為他們在一起講鬼故事，但是總是說什麼“唯物辯證法”。鬼當然是可怕的，那麼，唯物辯證法也是可怕的了。因此，和小孩子們玩鬼遊戲的時候，我就大叫：“不行了不行了，唯物辯證法來了，快跑吧！”小夥伴們都嚇得四處亂逃。

以後形勢轉變了，蔣介石國民黨背叛了革命，向昔日的盟友共產黨人

舉起了屠刀。我大哥被通緝，他機警得很，跑掉了，剩下我三哥、二姐在家裏。經常有警察到家裏來。我上學回家，看到警察來了，就趕快跑回去，讓他們趕快把書藏起來，有時候來不及，就把書藏在院子的隔牆底下，藏在“貓道眼”裏（為了讓貓出入，在牆下面留個洞，就叫貓道眼）。國民黨反動派爲了逮捕聶真，爲了查出我們家保存的共產黨的書籍，或者其他共產黨人的線索，經常在夜半更深的時候派警察到家裏來查戶口，家裏每個人都必須起來站著讓他們搜查，祇有我年齡小，躺在床上睡覺，但警察還要掀掀被子看個究竟。敵人三番五次地在半夜裏突然闖到家裏，這讓我初次領受了白色恐怖的滋味。

我小時候印象深的事情，一個是孫中山，領導大家打北洋軍閥，一個是共產黨，共產黨是爲窮人的，國民黨是剝削窮人的。這些連農村裏的大人們也未必瞭解的事情，我很早就知道了。還有藍衣社，我們那裏叫“老法”，法西斯，比方說我上學回來了，看到警察查戶口，就喊“老法來了，快點兒藏東西”。我想著，上學長大，就是要像我哥哥姐姐那樣當共產黨。後來我到山西，參加了工作，就覺得自己生來就是黨的人，生也是爲黨生的，死也要爲黨死。我那時也不怕死，覺得死是很自然的，以後在戰爭前方，出生入死地工作也沒有害怕過。我們一家人都是不怕死的。參加革命，都沒有害怕的。

享受鋼絲床待遇的好學生

我小學畢業以後，本來是想繼續讀中學的，沒有想到，家裏出事了，影響到我的求學。

當時，我四哥到保定上育德中學，參加共青團，被捕了。他被捕時才十四五歲。四哥被捕時，正趕上我高小畢業。父親覺得孩子們外出上學，一個個都成了共產黨，成了社會的危險份子，甚至被捕，他很不安，就不許我到外邊讀書了。父親說，你現在高小畢業，已經是個女秀才了，不要再到外面上學了，要是還想讀書，就在家裏請個老先生教你吧。當時我十二歲，按照鄉下人的演算法，高小畢業就相當于秀才了。但是，當時的我已經知道外面的世界天高地闊，就不同意在家裏呆著，堅持要到外面去闖。

我大姐有一陣兒在豫北一帶做地下工作，當時，她回家住了一段時間。我就趁機跟她說，我不願意在家裏呆著。她也不同意我在家裏呆著。商量來商量去，我大姐就把我帶走了，也沒跟父母親打招呼，就領我走了，準備讓我到開封去上學。她給我介紹了兩個關係：一個是傅曉白，一個是殷馥亭。他們兩個都是地下黨員。殷馥亭在開封省立女中當老師，傅曉白也在開封某學校教書。我們來到新鄉村傅曉白家裏，大姐把我交給他，然後就走了，出去工作了。傅曉白把我帶到開封省立女中，交給殷馥亭。殷馥亭說省立女中黨組織不如北倉女中強，他讓我到北倉女中，找一個叫趙新華的高三學生，趙新華也是個地下黨員。他讓我就投考北倉女中。當時共產黨活動最厲害的就是北倉女中，學習成績最好的也是北倉女中，那裏的課比開封省立女中講得好。我先在預備班學習了一年，然後考上了北倉女中。

我從家中出走，一直都沒有給家裏去信，沒有向父親要過錢。父母親知道我在外邊上學，卻不知道我的具體情況，也沒有辦法找到我。當時，我經濟上十分困難。我每個月的生活、學習費用大約在五元錢以內。殷馥亭每月給我幾塊錢，做伙食費和零花錢。我常常到他那裏

要錢花，有時也找傅曉白去。他們看我年紀小，也不多給我錢，我就每個月都得去找他們。二姐在北京一家醫院當護士，工薪很低，她從家裏給四哥寄往監獄的錢中拿出來一兩塊錢，寄給我，但不是每個月都寄。趙新華看我什麼東西也沒有帶，她給我找了一套被褥，幾件換洗的衣服，讀的書是她從高年級同學那裏找來的舊書，祇買一點兒新添的學習課本。就這樣學習了一個學期。在這個學期裏，我學習很努力，因為知道自己出來上學不容易。過去是花父親的錢上學，不知道心疼錢，現在全靠別人接濟，就知道學習的機會來之不易。

在北倉女中，除了第一年上預備班，我的學習成績一直很好。北倉女中的師資力量很強，老師課講得好，教學得法，比如教數學的李炳之老師，講課生動有趣，學生們都特別願意聽，我的數學因此也學得比較好。學校當時規定，期末考試前五名的優秀學生可以受到優待，免交學費，我就受到了免費讀書的優待。還有一條規定，班裏前五名（也許是前十名，因為年代久遠，記不準確了）的學生可以睡鋼絲床。那時候學生都睡木板床，木板床臭蟲多，臭蟲鑽在床板縫裏，不容易清除。我的皮膚容易過敏，臭蟲一咬，就起一個疙瘩，好多天都下不去，紅藥水抹得渾身都是。所以我對睡鋼絲床最感興趣。鋼絲床容易清掃，拿開水一燙，下面吊個碗，裏面放著殺蟲藥，臭蟲就被毒死了。管理房子的傭工，我們管她叫女嫂，負責換藥碗。我在學校裏享受著鋼絲床的待遇，伙食也不差，我們二十到二十五個人一個小灶，也是女嫂做飯，學生自己輪流管帳，又好吃又省錢。

因為初中生住校人少，我就和那些上高中的學生住在一起，吃在一起。當時我有兩大難處，第一是沒有錢，第二就是生病。我在開封讀書，生了一次病。因為學校校長的姑娘和我同班，跟我一塊兒玩，她長疥瘡，傳染給我了。對於這種病，我一無所知。聽說長疥瘡能死人，

恐懼得很，我不知道該到哪裏去治療，也沒有錢治療。不過，我和校長的女兒很要好，她家裏給她治療，弄藥來抹，我也就跟著抹，抹來抹去好了。

在北倉女中，我還成了革命的“宣傳員”。我在家裏就被大哥聶真無意中灌輸了很多革命思想，還有我父親向家裏人講報紙上的事情，比如國民黨圍剿紅軍，紅軍怎樣英勇突圍等等，也被我聽到了。所以我就在同學中亂講一通，什麼蘇聯紅軍啦，列寧和十月革命啦，中國的工農紅軍和蔣介石打仗啦，憑著一知半解，向那些比我更無知的同學大講特講。有的同學還以為我就是共產黨員，其實我那時年齡太小，根本不可能參加共產黨。

才賦歸去來，又向晉陽行

後來，殷馥亭對我講，你年紀這麼小就離家出走，既沒有獨立生活的能力，還得靠別人接濟，不是長久之計。你家裏很有錢，完全有能力供養你讀書，你還是要和家裏搞好關係，得到家裏的支持。我是靠不住的，我為黨工作，聽黨調遣，說不定哪一天就得離開這裏。何況現在形勢很緊張，我隨時可能被國民黨通緝，那樣的話，你可就完全沒有人照料了。我就和在北京的姐姐哥哥商量。當時正趕上我二姐在一·二·九運動中受傷了，照片登在報紙和大眾雜誌上，身份暴露了，處境很艱難，後被捕入獄。看來，我繼續在開封讀書是很困難了，最後我決定先回家。

我去開封是在一九三年，在開封讀了差不多三年書。“一二·九運動”

爆發後的一九三六年寒假，我就回家去了。回家以後，我對父親說，我要繼續上學。父親不同意。當時父親的處境也不好。我大哥被國民黨政府通緝，東躲西藏，農村裏的人不知道真相，以訛傳訛，好像他犯了什麼彌天大罪，做了什麼十惡不赦的壞事。同時，大哥、大姐和二哥都在鬧離婚。二姐是說了婆家，又逃婚跑掉了，人家要結婚，找新娘子找不到。這在農村是破天荒的，是被人們戳脊梁骨說長道短的。還有，我四哥在保定被捕，年紀很小，卻是“罪證確鑿”，是在張貼共產黨的宣傳品時被抓獲的，送到北平，關進草嵐子監獄（或第一監獄）。我父親簡直是內外交困。我們那地方，女的都要纏腳，關在家裏不許出門。我們家的兄弟姐妹們鬧得滿城風雨，人家自然會責怪我父親對孩子管教無方。樹大招風，輿論對我們家非常不利。陷於困境的父親害怕我步哥哥姐姐的後塵，一是投身革命，二是婚姻自主，給他雪上加霜。他說，什麼條件都可答應，祇有一條，不許再出外上學，一出門，心就野了亂了，要讀書可以請老先生在家裏教你。這樣不得已，我就在家裏呆了些日子。

我給在北平的哥哥姐姐寫信，埋怨他們不管我：你們都在外面鬧騰，我現在是想上學也上不了。反正我是小妹妹，怎麼說都是有理的。我二姐的乾娘龍太太救她出獄，二姐出獄後給我回了信，勸我不要著急，沉住氣在家裏呆一些日子。她說她春天準備回家一趟，把我領出來，帶我到山西去上學，或者在北平給我聯繫香山中學。二姐還說她要到延安去，也許到延安以前先回家一趟帶走我，或者從延安回來以後再來接我。

就在這段時間裏，“七·七”盧溝橋事變前夕，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大規模侵華戰爭，全中國都掀起了抗日鬥爭高潮。這樣，我在家裏更是呆不下去了，我也要參加抗日鬥爭啊。我在家中心急火燎地等待。終於，二姐

從延安回來了，和我姐夫一塊兒回來的。我姐夫叫梁寒冰，^[3]也做黨的地下工作。這時已經是一九三七年夏天，八路軍東渡黃河，在山西設立了八路軍辦事處，彭雪楓是辦事處主任。姐姐和姐夫被派到山西太原工作，他們就帶我一起到山西去了。

好事多磨。我出來的時候正趕上下的很多天大雨，平原上漲水，成了一片汪洋無法行走，是坐船出來的。滿地莊稼在水面上祇露出穗頭，在風中搖蕩，我們坐的小船就在這一眼望不到邊的莊稼穗上行駛。從家鄉一直坐船到了道口（就是出“道口燒鷄”的那個道口），然後才坐上火車到了山西太原。

在監禁與殺戮面前

我和二姐走了，大哥大姐本來就在外邊為黨工作，家裏就剩下三哥和二哥。三哥在地方參加了共產黨，在區委工作，和趙紫陽在一起。我父母思想本來就很開明，有進步傾向，抗戰爆發，眼見山河破碎，家園難保，他們知道，蔣介石抗戰不力，八路軍才是打日本的，中國的希望都在共產黨八路軍身上。他們對八路軍特別熱情，特別關心，特別地對共產黨八路軍好，特別地對地下黨好。

其實，在“七·七事變”之前，我們家就成了共產黨的一個地下活動據點。好多同志都在我家裏吃，在我家裏住，生了病，我父親還出醫藥費。我哥哥姐姐不在家的時候，有同志來了，說是跟聶真在一塊兒的，跟聶元素在一塊兒的，也是照樣留下，該吃就吃，該住就住，有病，我父親給他們把脈問診，買藥煎藥。我母親也跟著忙碌，二哥

在家裏也幫忙。我們家變成了八路軍的醫院和招待所。我三哥在地方區委工作，後來又到縣委，滑縣第一屆縣委，就是在我家裏成立的。後來滑縣的歷屆縣委書記，都在我家裏辦過公，趙紫陽也在我家裏辦過公。^[4]八路軍從滑縣經過，多少人都在我家裏吃飯。有時候人太多，家裏一下子招待不過來，我父親就叫夥計拿上秤，到鄰里街坊家裏，你家有多少饅頭，有多少窩窩頭，都是現秤了，記上賬，先拿起，然後再還你糧食，總要讓八路軍吃上飯。這樣，部隊過來也吃，零散人員過來也吃。

當時，我們那個村子特別有意思。村裏一共有四條街，西街、東街、前街、後街，我們家在西街。後街住的是窮人，都是中農以下，大部分是貧農。後街的窮人都跟我們家也就是西街跑，傾向於革命，參加八路軍的較多。東街是國民黨的勢力，頭子叫閻希孟，前街裏住的人比較富裕，他們就跟著國民黨的勢力，跟著東街跑。這樣，就形成了西街和東街爭奪村裏羣衆的鬥爭，雙方都想削弱對手的影響。在東街的煽動下，有些人扒我們家的院牆，想把我們一家人趕走，讓南尖莊成為他們的一統天下。西街的後街窮人就幫我們壘院牆，你今天扒了，他明天就壘起來，雙方進行拉鋸戰，鬥得很激烈。

我們一家都投身革命，名聲越來越大，災難也接踵而至。當時，家鄉一帶出了一個叛徒，很出名的一個大叛徒，叫吳蘭田。他原先是共產黨的地委書記，當初和我三哥在一起工作過。吳蘭田叛變以後，出賣了很多黨的機密，很多人被捕或被殺害。吳蘭田的身份很複雜，他是國民黨、日本侵略者的走狗、叛徒三合一。有一天他帶著“皇協軍”（就是協助日本皇家的偽軍）到我家逮我三哥，正好我三哥沒在家，我父親也出門趕集去了，家裏祇有我母親和我三嫂。敵人沒有抓住我三

哥，就要把我三嫂帶走，我母親說，“你別拉她，你抓我吧！我跟你們去！”敵人要想威脅我三哥，可能認為帶我母親去更合適，母子親情，更重一層，他們就把我母親帶走，關進監獄裏。後來又把她關在豬圈裏，和豬關在一起。敵人叫我母親交待我三哥在哪裏，和我三哥一起搞工作的同志，像趙紫陽等等在哪裏。我母親堅決不交待，她說我這麼大年紀了，你們弄死我就算了，你們問的人和事我都不知道。剛強不屈的母親受了很多罪。

在這期間，我三哥和我二哥都被逮捕了，關押在別的地方。我的侄子，我二哥的孩子，叫聶孟燦，也被敵人抓住了。他們殘酷拷打二哥，拷打不出來，敵人就當著二哥的面殘殺他的兒子。他們給小孟燦渾身纏上幾層白布，澆上油，點火燒。可憐呀！一個十幾歲的孩子，被火燒得受不了，東一頭西一頭地到處亂跑，敵人圍成一個圈，把他圍在中間，他向哪裏跑，哪裏就用刺刀捅他，一個火團，東衝一下，西撞一下，撞在敵人的刺刀上又被迫退回來，轉向另一個方向，口中發出淒慘的叫聲。就這樣，連燒帶刺，把我的小侄子殺害了。慘無人道的敵人，還把他的頭割下來，掛到我們家大門口，威脅我們，威脅羣衆，不要跟共產黨跑。然而，敵人的殘忍祇能激起我們更大的仇恨，卻不能把我們嚇倒！我二哥和三哥都從敵人那裏想方設法逃出來，堅持與敵人鬥爭。

我侄子為革命獻出了幼小的生命，我母親在監獄裏寧死不屈。我三哥我二哥從敵人那裏逃出來以後，想辦法營救我母親，縣委的趙紫陽等人也幫忙。後來，組織上出了一部分錢，我們家賣了土地，花錢把我母親贖了出來。冀南區黨委王從吾書記和趙紫陽把我父親我母親，還有我二哥三哥等都接走了，送到根據地。後來，我父親就跟著部隊行醫。我家裏的土地、

房子都無償地捐獻給了公家，後來在那兒辦了一所中學。

我父母從那以後就離開家了，老兩口一直跟著部隊走，直到進了北京。我大哥聶真在人民大學任職，我父親就在人民大學當校醫。本來協和醫院慕名要請他去，他沒有去，因為他有糖尿病，家住在人民大學這邊，到協和醫院上班路太遠，不方便。我父親一九五八年去世，他活了七十二歲。我母親活的時間比較長，大概因為她心胸開闊，能夠包容很多事情吧。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和抗日戰爭時期，我們家的幾個人進過敵人的監獄。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們兄弟姐妹紛紛被當作“敵人”關押起來。我是被江青他們作為反對謝富治反對康生就是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罪人”關著，我大哥二姐和三哥被當作走資派關著。經歷了這麼多磨難，我母親那時仍然堅強地活著。

若不是一次醫療事故，她本來可以活得更長一些。當時，她祇是患了感冒，加上消化不良，本意是送她到醫院養一養，治一治，就回來。當時，我正被江青指示處在隔離審查中，我要求看一次母親，還有人監視著。給我的時間非常苛刻，從北大到月壇南街的華北局宿舍，這麼遠的距離，就准我連來帶走兩個鐘頭。祇給我兩個鐘頭！我看了看母親，連話也顧不上說，就走了。當時是我哥哥姐姐們一直把她送到人民醫院住院。醫院大夫全面檢查完了，說我母親沒有什麼大病，不會有事的。結果他們剛剛到家，醫院的電話就追來了，說我母親去世了。因為輸液太快，年齡大了，心臟和血管都受不了，突然猝死。母親終年九十七歲（一九七六年）。當時，我們幾個處在那樣一種狀況，母親又那麼大年齡了，所以對醫院這次明顯的事故也沒追究什麼，祇是給醫院提了一點意見，就過去了。



2002 年春節合照

前排左起：聶元梓、四哥聶金聲、大哥聶真、三哥聶季超、四嫂趙立功
後排左起：侄子聶孟光、侄媳爽爽、聶元梓女兒聶玲玉、侄子聶偉、侄女
聶貝貝、侄子聶丹

註釋：

[1] 聶元梓兄姐的人致情況：大哥聶真（1908～），又名聶元真，一九三〇年加入中共，一九三一年返鄉成立黨組織，曾任中共滑縣縣委書記，一九三七年後歷任晉豫區委書記、太嶽區委副書記、晉冀魯豫中央局民運部長、華北人民政府委員、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兼黨委第一副書記、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等職，文革中

受衝擊，一九七五年結束“審查”，一九七七年後任全國政協委員、常委，全國政協學習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副秘書長。受聶真影響，聶元梓的三哥聶元昂（聶季超）、四哥聶元典（聶金聲）、大姐聶元質（聶彬）、二姐聶元素于一九三三～三五年先後投身革命，成為共產黨人。二哥聶元賞雖一生從醫，亦為烈屬。

[2] 冷楚曾任中共北平市委組織部長。

[3] 梁寒冰（1909～1989），山西定襄人。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共。曾從事軍運、統戰和城工工作，並從事歷史研究和馬列主義宣傳工作。建國後歷任中共天津市委文教部長、河北省委文教部長兼河北大學校長、華北局宣傳部副部長、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分黨組書記、副所長、顧問。

[4] 中共中央前總書記趙紫陽原名趙修業，河南滑縣桑村鄉趙莊人。在聶真等人返鄉建立中共黨組織後參加革命，一九三八年九月任中共滑縣工委書記，一九三九年春，滑縣工委改稱縣委，趙改任縣委書記。見趙蔚：《趙紫陽傳》（北京：中國新聞出版社，1989）。

第二章 從犧盟會到“華幹校”

三個人的“臨時家庭”

從滑縣家裏出來，二姐帶我到了太原。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北平很快淪陷。日軍迅速南下，兵分兩路合擊山西，山西成為抗日戰爭的前線，八路軍的三個師，從陝北出發東渡黃河，都在山西境內作戰。當時，執掌山西軍政大權的閻錫山和共產黨結成了統一戰線，他想利用共產黨的力量保護他的地盤；共產黨則利用合法手段放手發動羣衆，準備進行長期抗戰。因此抗戰初期，山西的抗日氣氛非常高漲。

到了太原，我就沒有繼續上學了，國難當頭，時事危艱，我要參加抗日救亡工作。薄一波在那裏主持犧盟會工作，^[1]下面成立了一個學兵隊，正在招生，徵得二姐的同意，我就到學兵隊去，分在十二連。學兵隊裏都是平津流亡出來的高中生、大學生，他們都是滿懷報國熱忱到山西參加抗日戰爭的。學兵隊的生活非常緊張，但我仍然得到了很多關懷，一羣大姐大姐大哥哥中間忽然來了個小妹妹，他們都非常熱情地教我紮綁腿、打背包、扛槍桿。那時候，剛剛十六歲的我，也就比一支步槍高不了多少。

到學隊我才十幾天，槍還沒有摸熟，打綁腿還沒有學會，我就離開了。王世英^[2]把我調去，到中共中央華北情報局，搞情報工作。王世英是黨內老資格的情報專家，解放後當過山西省省長，他把另一個做情報工作的同志劉貫一^[3]、我二姐聶元素和我編成一個小組。劉貫一裝作我姐夫，用這個身份作掩護，同住在一個院子裏，讓別人以為我們是一家人，其實晚上都是我和二姐一起睡，劉貫一住在另一間房子裏。我們負責一個情報刊物，每期祇印五份，祇送中共黨內最高領導毛澤東、劉少奇、

周恩來、朱德和彭德懷五人。我終於能夠為黨工作了！我就對王世英講，我要入黨。王世英說，你現在所做的工作，很多黨員都未必能夠擔當呢，你的工作已經比他們都重要了，你已經在為黨工作，祇是現在沒有條件給你履行入黨手續，等到有條件了，一定給你解決。

當時，我們住在太原的一條名叫小五台的街上，一邊是國民黨的特務機關，一邊是日本人的特務機關，我們住的小院子夾在中間，那可真是置身虎口啊！到我們的院子裏來的，有裴麗生^[4]、杜潤生^[5]等同志。院子裏沒有電源，杜潤生爬到牆頭上，從牆外的電線上給我們偷電，接電燈。“一家人”居家過日子，我們自己做飯吃，可二姐和我從小讀書，都不會做飯，就會蕃茄炒鷄蛋下掛麵。劉貫一經常在外面跑，我二姐也經常出去工作，他們不讓我出去，怕我年紀太小，出門不安全。我就在家看攤子，刻臘紙，印文件，還在鋼板上畫過作戰地圖呢。

山西的抗日形勢很快就變得嚴酷起來。忻口會戰失敗，娘子關也失守了，日軍從東西兩路撲向太原，太原形勢危急，山西省政府被迫搬遷，閻錫山早已逃到山洞裏去了。敵機不斷來轟炸，每天都聽到淒厲的汽笛警報和炸彈的爆炸聲。警報一響，我們就往城牆底下的防空洞跑，要是跑不及，就鑽進土炕前面的爐灰坑裏。有時候連爐灰坑也來不及鑽，敵人的飛機就來了，敵機來得太快，太原又沒有什麼防空設施，等飛機到了頭頂，才拉響防空警報，“呼”一下子炸彈就扔下來了。跑防空警報，我二姐總落在我和劉貫一後面，我人小腿快，一下就跑出很遠，回頭一看，二姐落在後邊，又返回來拉我二姐跑。有時劉貫一和我一人拽著二姐一條胳膊，拽著她跑。那真是危險得很啊！

從這時起，我就懂得了黨紀律，懂得了做地下工作的要求，什麼樣的話應該說，什麼樣的話不能說，寧可爛在肚子裏也不能說，敵人

嚴刑拷打更不能說。王世英經常來，來了就給我講這些革命道理，我當時年紀小，非常單純，把他講的這些都記在心裏，非常愛聽。有時候他沒有來，我就要二姐講，二姐不如王世英講得好。或者一時講不出，我就生她的氣，姐妹二人還鬧起彆扭來了。年幼時，我就願意聽他們講革命的事情，講革命的道理，祇要是共產黨的事情革命的道理都行。對於戰爭，我沒有一點兒害怕，不害怕被敵人的飛機炸死，對死生都很坦然，我覺得我生來就是和哥哥姐姐們一樣，要為革命工作，為革命犧牲一切我也在所不惜。

我二姐聶元素比我大五歲，當時剛剛二十出頭，劉貫一大概覺得我們是包袱，晚上睡覺他都不讓我們脫鞋子，因為夜裏也有飛機轟炸。他說，王世英再來，你們兩個就和他講，你們先撤退吧。敵人要是來了，我有自行車，可以騎著跑，你們怎麼辦？我沒有辦法把你們也一起帶走。他還和我們講他從忻口前線退下來時親眼目睹的悲慘場面：被炸死的老鄉，被燒毀的村莊，到處流浪的小孩子，被日本兵姦淫的婦女……他本意是要我們認清當前的危險，我聽了之後沒有感到害怕。日軍的這些暴行更增添了我對他們的仇恨，更堅定了我為消滅他們拚死戰鬥的信念。

可到了後來，敵人要圍攻太原，情況更緊急了，組織上安排我們兩人先離開太原。正好這時我姐夫梁寒冰也從山東回來了，他們要調到開封去工作。於是，我們三人坐上從太原開出的最後一趟火車，沿著南同蒲鐵路，直奔風陵渡而去。

風陵渡是黃河古渡口，黃河在這裏轉了個大彎，水急浪高，遠遠地就聽見黃河的咆哮聲。從風陵渡過了黃河就可以到陝西了。這時候，擺在我面前的有三條路。第一是跟二姐他們到開封，繼續給黨做情報工作。第二條就是從風陵渡過黃河，經過西安到延安去。第三條路呢？我們走到運城

的時候，彭雪楓來了，他在運城辦了一個八路軍的學兵隊，我要是願意，就可以留在學兵隊學習。彭雪楓曾經是八路軍駐太原辦事處主任，在太原就認識我也很喜歡我。

我二姐和姐夫考慮到戰爭形勢變化很快，日軍正向運城方向進犯，在彭雪楓那裏不一定能呆長。若是到延安去，路也不好走，一路上國民黨有很多封鎖線，很危險，就我一個人小小年紀，怎麼去？（幾年以後，我從武陟到陝北去仍然頗費周折，這證明他們當時的判斷是對的。）於是就決定帶我一塊兒到開封去，再想辦法。

開封車站車不開

我二姐帶我到開封以後，組織上很快就給他們安排了工作。組織上說暫時還沒有我合適的工作，叫我稍微等一等。我們住在黨內同志王闡西家裏，^[6]這也是組織上安排的。時光白白流逝，每天不做事，幫不上忙，我心中非常著急。

王闡西的弟弟叫劉硯，這時也在開封，我就天天看他刻木刻——劉硯後來真的成為了美術家呢。劉硯說，你天天這麼看著，也沒什麼事情幹，我教你刻木刻吧。他不知道，那時我一個心眼等著黨給我安排工作，根本沒什麼心思學木刻。

這正是抗日戰爭初期，國共第二次合作，全國上下同仇敵愾，抗日救亡運動如火如荼。開封也處於熱烈的抗日氣氛之中：出版抗日報刊，舉行羣衆大會，學生和各界經常進行遊行示威，從北京、天津和河北逃亡出來的學生也一羣羣湧到開封，控訴敵寇暴行，呼籲積極抗戰。這一切都

激發了我的鬥爭渴望。我的心早已被這抗日救國的偉大運動深深地吸引住了。我在開封祇是等待分派工作，一天到晚無所事事，真是心急火燎，如坐針氈。後來，我一天也不願再等了。我決定要上前方。

上前方，到哪兒去呢？當時，朱瑞^[7]、劉子超^[8]在輝縣百泉辦了一個八路軍的華北軍政幹部學校，我就準備到輝縣去找他們兩人。在太原時，我就認識劉子超，也見過朱瑞，我決定獨自去找他們。我二姐問我：“你這樣一個人走，行不行啊？”我說：“你放心，不要緊，我自己能照顧自己了。”於是，她把我送到開封車站。

開封火車站上好多的學生啊，外來的，本地的，開封女師的，開封女中的，北倉女中的，都想去參加抗戰，離開開封，走向戰場，就是不知道應該上哪兒去，往哪兒走，該投身哪一支隊伍。抗戰初期，國共合作，攜手抗戰，民氣旺盛，人們認為國民黨也是抗日救國的，共產黨也是抗日救國的，一時間分辨不出二者的區別。他們到了車站，卻沒有目標和方向，都在車站上徘徊起來，有的學生急得竄來竄去，像熱鍋上的螞蟻，互相詢問，互相爭論，從白天到夜晚，就像一口沸騰不已的大鍋。看到他們的愛國熱情，我去前方的決心更大了。

火車站已經沒有人賣票了。這麼多人擁擠在車站上，要去打日本帝國主義，不管是客車還是貨車、悶罐車，學生們扒著就上，至於什麼時候開車，開到哪裏去，誰也不知道。祇要火車是朝著鄭州方向開的就行。到鄭州以後，或者向南方去武漢找國民黨，或者向北方去找八路軍共產黨。當時大家都沒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常常是碰上什麼隊伍就跟著走，很少有人像我一樣有一個準主意，一心一意地要去投奔共產黨的。

二姐幫我選了一列開往鄭州方向的客車，我登上火車，找了一個座位坐下，二姐從窗口把小行李捲塞給我。她站在車站的兩條鐵軌之間，望了

我很久，才轉身慢慢地離去了。

可是，這列火車上坐滿了人，卻總是不見開車。我在火車上呆了一天兩夜，火車仍然是一動不動。二姐不放心又回到車站來，她看到火車可能一時不會開了，就要我和她一道回去，但是我堅決不走，一定要等上一趟火車，上前方去。二姐勸說不動我，祇好怏怏地離去。

在車站上，我認識了兩個女學生——她們原先的名字叫什麼，我都記不清了，她們現在的名字都是我給起的，一個叫郭威，一個叫孫紅。我們都在火車上等著，火車老是不開，要下車買東西吃，找水喝，要上廁所，碰上了幾次，就認識了。她們問我準備到哪兒去。我告訴她們，要去找八路軍，要到輝縣百泉去；我認識一個共產黨的高級幹部劉子超，還有朱瑞，正在那兒辦軍政大學，專門招收參加抗戰的學生。她們一聽，高興地說，那我們跟你走吧，行不行？我說，行啊，那就一塊兒走吧。其實她們都比我年紀大，是老大姐。那一年我才十六歲，她們都是高中生，大概十八九歲了。我說行，祇要你們不怕死，就跟我走。我跟她們講革命故事，都是從我哥哥姐姐那兒聽來的，紅軍呀，長征呀，她們聽得高興極了。就這樣，她們一直跟著我，把我盯得緊緊的，生怕我把她們給丟了。結果，那趟火車根本不走了。我說，那就算了，你們就跟著我吧，看哪個火車走，我們就上哪個車。結果，我們在車站等了好幾天，好不容易來了一列路過開封到鄭州的敞篷車，車幫足有兩三尺高，就算是車廂吧。這是一列軍車，拉的是國民黨軍隊，有一些是傷兵。進入開封車站，這列軍車也沒停，不過是走得很慢。我說，咱們就上這個車吧，你們敢上不敢上？她們說行，結果我就跳上去了，那些傷兵幫了我一把，又把她們倆拉上來。車到鄭州，我們又轉車到新鄉，下了火車，我們三人直奔輝縣百泉。

百 泉 水 暖

我們一路走一路打聽，終於到了輝縣百泉，找到了劉子超，朱瑞沒在百泉，他到山東去了。劉子超捏一把我的鼻子——那時我年紀小，誰見了都捏一捏我的鼻子——他說，“你怎麼追來了？”我說，我姐姐夫說你在這兒，我就到這兒來了，我還給你帶來兩個高中學生呢。說了幾句話，劉子超就說，“華幹”（華北軍政幹部學校）現在第一期剛剛畢業，正在分配，你們等著上二期吧。第一期分配的學生眼下還沒有走，也沒有地方住，你們自己先就近找地方住下吧。他簡單跟我們說了幾句話，就算收我們了，然後他就自己上火車站“揀”學生去了。那時候大量的學生從北京、天津逃出來，要到後方去參加抗戰，學校要招生，就要從車站把那些準備上武漢或西安的學生截住，把那些不知道該上哪兒的學生“揀”回來，壯大自己。

眼下我們要自己找地方住，百泉肯定是都住滿了，到哪兒去找住處呢？看見山上有個小廟，我就說，咱們就住那個小廟吧，你們敢不敢去？她們說行，我們就上山了。那廟真是小，就孤零零地一間房，沒有院子。一進廟門，土台子上坐著一位泥菩薩，土台與大門之間也就五六尺寬的地方，我們順著土台子鋪下了被褥。記不清是自己帶的行李，還是找劉子超要的，反正我們都有被子蓋。我們三人每天就睡在泥菩薩面前，每天睡覺前，她倆都要我講紅軍、八路軍、共產黨的故事，我們一起憧憬未來的戰鬥生活。白天我們下山來，有時候到劉子超那裏吃飯，有時候就到外面去買著吃。

她們倆說自己的名字不好聽，花花草草的，和抗日啊打仗都不搭

界，讓我給取個名字。我那時候也不懂得客氣，就幫她們改了名字：一個叫郭威，一個叫孫紅，都是革命的名字，“紅”就是紅軍，“威”就是國威，正在和日本人打仗，要揚我國威嘛。她們兩人後來都成了中共的高級幹部，聽說孫紅後來在河南洛陽工作，郭威現在還在北京，“文革”前我還見到她。那時候，她們就像我當年纏著哥哥一樣，纏著我給她們講紅軍的故事，講革命道理，不想講也得講，講累了也得講。我把我聽來的故事都“轉賣”給她們了。

我們住在廟裏，每天下山來洗臉。我們是在十二月到百泉的，寒冬天氣，北方的黃土地一片荒蕪，祇有北風肆虐。可是在百泉，風光分外地迷人。百泉是北方少有的溫泉，而且是珍珠泉，數不清的泉眼，一股股珍珠一樣的水泡向水面湧來，非常漂亮，整個水面籠罩在蒸發出來的瀰漫的白霧裏，每天我們就從泉水邊的小道走進這白霧中間，在溫泉裏洗臉，洗起來非常舒服。更重要的是，我們幾個女孩子，經過了開封車站上的苦熬苦等和一路的艱難跋涉，心中牽掛重重，如今，終於找到了共產黨八路軍，終於到家了，以後，即使再艱苦再困難，我們都有了依靠，有了黨的領導，心情非常好，更覺得百泉是個好地方了。

這時候，“華幹”原先的畢業生都走了。劉子超說，你們也不要搬下來了，學校都要搬家了，要搬到山西晉城去。你們就在山上住著，過兩天直接往晉城搬家吧，省得來回折騰。我們發了華幹的學員服裝，黑色的。幾個年輕姑娘，正是青春年華，穿什麼都好看，英姿颯爽地穿上這身軍裝，人顯得特別有神氣。她們兩人是頭一次穿，自然很興奮；我呢，在山西犧盟會學兵隊的時候，就穿過統一發的灰色軍裝，後來去做情報工作，換了老百姓的衣服，現在又穿上了八路軍學員軍裝，回到革命隊伍裏，心裏也是特別高興。

“華幹”生活漫憶

我們稍加準備就出發了，從輝縣搬到晉城，全靠兩隻腳，翻越太行山。這是我第一次爬大山。登上山頂，我才知道，山是綿延無盡的，在山脚下看大山，以為山是一堵牆，過了這堵牆，就到了山那邊了。現在從腳踩的這座山頂上一看，茫茫一片，全都是山，一座連一座，像大海的波濤一樣浩瀚，沒有盡頭。從那以後，多少年裏，我就沒有出過大山，一直在山裏工作、戰鬥。

華北軍政幹部學校在晉城的一所回民中學裏安頓下來。這時候，朱瑞也從山東回來了。那時候我真沒有搞清楚，他和劉子超，誰是校長，誰是政委，反正是劉子超一直盯在學校裏，朱瑞是有時候來有時候走。“華幹”的課程包括遊擊戰爭、國際常識、民運工作、軍事訓練等等，總之，訓練怎麼打遊擊戰爭。

生活和學習條件很艱苦，但我們精神都很快樂，每天都在歌聲中度過，走路唱歌，上下課也唱歌。同志之間像親姐妹兄弟一樣團結友愛。那時候我年紀輕，身體好，抗折騰，身體弱一點的，就很容易生病。學校缺醫少藥，病人得不到及時有效的治療，吃的苦就更大。有一個小名叫“小狗”的女孩子，就因為得病沒有藥治，死了。那時候，一旦生病，一點辦法沒有，沒有醫生，沒有藥品，感冒了，就鑽進被子裏捂汗，生病了拿命頂，頂過去就活下來，頂不住就死了。

華幹的同學，我至今還能記得一些。有一個北平去的青年，叫榮蘭孚，二十六七歲，在我們看來，都是老大哥了。當時他身體不太好，黃瘦，頭髮也很稀少，外號“毛三爺”，後來，聽說他病死在太行山。還有小魯（現在天津），韓層巒（聽說在山西工作），夏柯（原名夏玉

華，現在在北京）。此外，還有楊惠文，白介夫的愛人^[9]。我和楊惠文在華幹認識之後，就成為終身的好朋友。

我們上軍事訓練課，上課下課都不讓走門，要求跳窗戶，從宿舍到教室，成天跳進跳出，這本身就是一種實際鍛鍊。還有野外作業，早晨起來指定一個山頭，看誰先跑到那裏再返回來。出發的時候不讓走大門，要翻牆頭。牆很高，我個子小，上不去。不過，這也難不住我。我小時候爬樹能力特強，捉迷藏爬到樹上，在樹上可以捂起眼睛，雙手都不用扶著樹，用兩條腿攀著樹榦，一點兒事都沒有。華幹的牆頭太高，爬不上去，正好牆邊就有一棵大槐樹，樹枝延伸到牆頭上，每次早晨起來訓練，我就先爬樹，再從樹上爬到牆頭，然後再跳到院子外面。回來的時候，也是同樣。不能沿著山路走，因為山路都是順著山勢蜿蜒曲折，要走很多彎路，路面又比較平坦。要鍛鍊，就要走艱難的路，由老師、軍事教官劃定最直接的路線，跳山溝，跳梯田，一個高坎一個高坎地跳下來。我一般總是跑在頭裏，不跑第一也跑在前幾名，反正不落後。那些大同學都說，這個小丫頭，真不簡單，比我們這些年齡大的人都強。那段時間，大家過得特別愉快，朝氣蓬勃，充滿熱情，學了很多革命道理，又懂得了工作方法。

華幹的學員都是青年學生，根據當時的戰鬥需要，三個月一期，是短期培訓的。別看才三個月，可鍛鍊人了，培養出了一大批幹部，派往各地做黨政軍工作，包括國民黨的軍隊。也有在抗日戰爭中堅強不屈，慘遭殺害的英雄人物，如陳若克等。建國以後，好多的高級幹部，如湖南省委副書記萬達（原名萬子叔），還有省市級領導幹部傅太辛、劉剛等，都是華幹的畢業生。朱瑞和劉子超富有個人魅力，他們給青年人的影響也很大。他們兩個都是文化修養很高，知識份子氣很濃，很有風度，胸襟開闊，

待人熱情，相互團結得很好，像一個人一樣。

在華幹，讓我最高興的是，我終於實現了自己的追求，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我的入黨介紹人就是劉子超和張玉潔（張玉潔後來改名路凱，是最高人民檢察院院長張鼎丞的夫人）。在我入黨以前，華幹有一些因為戰爭跑丟了關係的老黨員，常找我談話，要我幫助他們接上組織關係。他們看我在政治上很活躍，以為我一定是在組織裏活動的黨員了，其實，我自己也是在華幹學習期間入的黨。我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去的，一九三八年一月就入黨了。入黨後有候補期，但是黨內工作繁忙，我實際就做了支部的工作了。



朱瑞和他的孩子（于犧牲前一九四七年攝）

註釋：

[1]犧盟會，“山西省犧牲救國同盟會”的簡稱。一九三六年九月在太原建立，是全省範圍的羣衆性抗日團體。薄一波等共產黨人在其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2]王世英（1905~1968），山西洪洞人，一九二五年入黃埔軍校第四期學習，同年加入中共。一九三三年在中共上海中央局軍委情報部工作，一九三五年任北方局情報部長，一九三七年任八路軍駐晉辦事處負責人。一九四五年後歷任八路軍總部副參謀長兼軍委敵工部部長，晉冀魯豫軍區、華北軍區副參謀長，天津軍管會參謀長，天津市委常委，建國後任山西省委第一副書記、書記處書記，山西省副省長、省長。

一九五八年因身體狀況主動辭去省長職務，一九六二年任中監委專職委員。

[3] 劉貫一（1908～1991），北京通縣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共，一九三一年後在山東、陝西、甘肅等地作抗日救亡工作，一九三八年後任中共長江局豫魯聯絡局副書記、書記，河南省委統戰部部長、新四軍政治部敵工部長、華東局國軍工作部副部長兼華東軍區政治部聯絡部部長。建國後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中共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長。文革中參與山西省奪權，任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組成員、秘書長，山西省革委會副主任，中共山西省委秘書長，一九七二年免職。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恢復原級別待遇，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在京逝世時新華社發佈的電訊稿稱其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

[4] 裴麗生（1906～2000），山西垣曲人。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共。畢業於清華大學，曾任山西犧盟會宣傳部長、太嶽行署副主任。建國後歷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二書記、山西省政府主席、省長，中國科學院秘書長、副院長、黨組副書記，中國科協副主席、黨組書記等職。

[5] 杜潤生（1913～），山西太谷人。一九三六年加入中共，曾任太行區黨委宣傳科長，太行區專署專員，太行區黨委城委書記，太行行署副主任，中原局、華中局秘書長。建國後歷任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秘書長，國務院農村辦公室副主任，中國科學院秘書長、黨組副書記，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會主任等職。

[6] 王闡西（1912～1996），河南蘭考人。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共。一九三七年從日本回國後積極開展抗日救亡活動，曾任新華社西滿總分社社長、四野政治部秘書長。建國後歷任文化部部長助理兼電影局局長、廣州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廣東省委常委、副省長、國務院文化部副部長、對外文委副主任等職。

[7] 朱瑞（1905～1948），江蘇宿遷人。一九二六年赴蘇聯學習，一九二八年加入蘇共。一九三〇年回國後歷任長江局軍委秘書長兼參謀長、中央軍事政治學

校政治部主任，紅二方面軍政治部主任兼紅二軍團政治部主任，北方局軍委書記，山東軍政委員會書記，山東分局書記，延安炮兵學校代理校長，東北民主聯軍炮兵學校校長、炮兵司令員兼炮兵學校校長，一九四八年十月在遼寧義縣觸地雷不幸犧牲。

[8]劉子超（1906～1941），廣東梅縣人。抗戰期間曾任華北軍政幹部訓練所主任，華北軍政幹部學校校長、八路軍第一縱隊宣傳部長等職，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路軍山東縱隊領導機關被日軍包圍，在突圍時不幸犧牲。

[9]白介夫（1921～），陝西綏德人。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共。建國後歷任中共通化市委書記、營口市委書記，中科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副所長、化學研究所副所長，北京市科委主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市副市長、市政府顧問。一九八七年後任北京市第六、第七屆政協主席。

第三章 戰鬥在太行山上

太南遊擊隊的誕生

一九三八年五月，劉子超調了一批華幹的學生骨幹，又在武陟縣等地聯繫了一些當地的同志，組成了太南遊擊隊，全稱“山西抗日新軍太行南區遊擊隊”。劉子超擔任遊擊隊司令員，下面配備了各個部門的幹部。我在華幹學習結束，因為工作需要，在遊擊隊司令部裏做青年科長，還擔任少先隊隊長，動員青年參軍，做羣衆工作，給參加部隊的青年上課，講革命道理，講青年人要做抗日救國的先鋒，提高他們的覺悟。遊擊隊剛剛成立，駐紮在陵川縣的奪火鎮。奪火鎮是在太行山南端的最高處，到鎮上去，要經過一段很難走的山路。那段路叫“十八盤磨”，它盤來盤去，像推磨一樣地圍著大山繞圈子。因為地處深山，這裏的消息很閉塞，山裏人什麼也不知道，不知道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更沒有見過日本人。給他們講抗日道理，動員他們參軍，很不容易。好在過去我在北倉女中的時候，就在同學中間講過很多革命故事，無形中鍛鍊了我的講話能力，經過華幹的學習，我的思想水平也提高了許多。經過艱辛的努力，深入的動員，很多人參加了遊擊隊。我們的隊伍不斷在壯大。

在奪火鎮，生活很艱苦。地處深山，吃水成了大問題，要用毛驥到很遠的地方去馳。一盆水要用好幾遍，洗了米的水洗臉，洗了臉的水洗腳，其實祇有我們洗腳，當地人根本不洗澡、不洗腳，說洗腳會肚子疼。山高，還盡是石頭，特別費鞋，當地老鄉做的布鞋，納了多少道，鞋幫硬梆梆的，彈起來噠噠響。新鞋底要釘上很多大釘子，根本沒辦法打彎，三十六

碼的腳要穿三十九碼的鞋，走起來就像穿了呱噠板，呱噠呱噠地響。山裏老鄉窮，一雙鞋要穿一年。我年紀最小，老鄉喜歡我。我在奪火鎮還認了個乾娘。我生病，乾娘問我想吃什麼，我說想吃海米鷄蛋湯，乾娘不知道海米是什麼，她還以為海米就是青蛙呢。

奪火鎮一帶，山高皇帝遠，多年來鬧土匪，人們不能安定生活。我們當然不能坐視不管，就在當地幫助羣衆打土匪。當地的老百姓說，打仗的時候，女的不能出來，女的一出來，必定打敗仗。羣衆很落後，但又不能不遷就他們，因此部隊出動的時候，我們女同志都關在屋子裏，要尊重當地羣衆的風俗。仗打勝了，土匪被消滅了，老百姓感謝我們，就打開義倉給我們糧食，從義倉裏拿出來的小米都是灰色的，存放得太多了。當地人說是光緒三年存放進去的，大老遠就聞到陳腐的氣味。吃了小米飯，大家都拉肚子了。

太南遊擊隊組建不久，我們就從太行山南麓下來，向河南境內進軍。想到豫西北擴展隊伍，在平原上打遊擊。因此，組織了太南遊擊隊第五支隊。這支遊擊隊還有一個任務，就是為主力部隊輸送兵員。

下山的那一天，情況很緊張，我們選擇了一個陰雨天氣，目的地是武陟縣城。在濛濛的小雨中，行軍到太行山南端的一個村莊，再往前走一點兒就出山了。這時，隊伍停下來，等待天黑。天黑以後，雨也下大了，但隊伍必須前進。這時隊伍已經進入河南，要穿過敵人的一個據點。走在路上不許說話，身上帶的東西也不能發出響動。雨越下越大，我們還趟過一條河，水都齊腰深。過了河，又過鐵路。我當時是新兵，沒有經驗，過鐵路的時候，走得很快，突然有了情況，遇到敵人了，命令馬上趴下。別人都毫不猶豫地就地趴下了，我看到滿地都是泥水，怎麼趴？我還沒有趴下，前面就打死了一個人，我不知道是什麼人。我什麼都顧不得了，

就趴在爛泥裏，隊長就下命令叫我們不要動，我們就一邊等待一邊在泥水裏趴著，敵人走掉了，他又命令我們站起來往前跑。我的腳陷在泥裏，站都站不起來，鞋子陷進泥裏，我從泥裏拔出鞋子，來不及穿上，乾脆就用手提著鞋子，赤著腳跟隨隊伍，一口氣跑了十幾里路，總算是通過了敵人封鎖的交通要道。隊伍這時才停下來，稍微喘了口氣。

遊擊隊的生活非常艱苦，尤其是女同志。好在我們都是經過了革命教育的，不把困難放在眼中。趟河水，跳山溝，都是不當回事的。女同志來了例假，也照樣跟著隊伍行軍打仗，褲子貼在身上，濕了乾，乾了又濕，誰都不叫一聲苦。

到了武陟縣，我生了一場重病，高燒不退，查不出是什麼原因，後來才知道是急性肋膜炎。遊擊隊自己沒有醫生，全靠羣衆幫助我們。我就住在當地一個醫生家裏治療。那個醫生家很富有，騰了三間大房子給我們作病房。五支隊教軍事技術的梁毓忠教官，因為槍走火了，打傷了腿，也住在那裏。我們就住在一間大房子裏，他睡那一頭，我睡這一頭，我當時發高燒燒得昏迷了，什麼也不知道。部隊雇了兩個老太太照顧我們，白天一個，晚上一個，輪流值班。等到燒退了，我身上揭了一層皮。真所謂“不死也得扒層皮”。我的頭髮也因為高燒掉光了，就乾脆剃了個光頭。給我治病的醫生很負責，他自己診斷不了我的病，就到他父親那裏去，說了我的病情，他父親告訴他這是肋膜炎，告訴他怎麼治療。醫生的父親醫術非常好，當時在日本佔領的焦作行醫。

高燒退了，身體開始恢復，不知道為什麼，就是一個勁地要吃蒜。吃包子，把裏面的餡都掏出來，塞進去幾瓣蒜。別人來看我，什麼也別帶，就給我一大包蒜。我們住的那個小鎮，別看規模不大，卻很繁華，跟奪火鎮截然不同，這裏山珍海味的，什麼都有。我們在這兒“住醫院”，沒有

食堂，就在鎮上的小飯館包飯，什麼好吃的都能吃到。梁教官是外傷，不影響吃飯，胃口很好，大享口福，我是什麼都不能吃，就是吃大蒜。

治療和休養了一個多月，身體恢復以後，我就回部隊了。我們不是作戰部隊，趕上敵人掃蕩，我們就撤退。一邊是太行山，一邊是黃河。我們就跑到黃河邊上，不敢進村，也不敢生火做飯，怕敵人發現。萬一驚動了敵人，那就祇能跳黃河了。河邊沙地多，種的都是花生。沒有飯吃。部隊就向老鄉們買花生。花生還生長在地裏，老鄉規定個範圍，出個價錢，部隊掏錢買下來，一天到晚，夜裏也在地裏呆著，就從地裏挖花生吃，也沒有水喝，有個小水溝，溝水太淺，收不起來，就在地上用手挖。在河邊上躲了幾天，隱蔽得好，敵人沒有發現。後來朱瑞批評劉子超，說不該選這個地方躲，打起來沒有退路，沒有周旋餘地。可是當時確實沒有別的路可走。以後，我在那裏繼續工作，一是做青年工作，給部隊的青年上課，二是做羣衆工作，宣傳黨的抗日政策，發動羣衆抗日，動員羣衆參軍。

在武陟縣，我做了一項比較重要的事情。當地有家姓孫的大地主，弟兄三人，還有一個妹妹。我的任務是動員他們家自覺出錢出人，支持抗日鬥爭。孫家的老大就像《家》中的大少爺，為人怯懦，撐不起事來，我們就發動他的弟弟妹妹參加抗戰。老二孫永宇經過我們動員，參加了革命，後來當了太南遊擊隊五支隊的隊長。老三叫孫永宙，當時還是中學生，在我們的發動下，也參加了革命，表現很好，入了黨。後來，兄弟兩人都在作戰中犧牲了。他們的妹妹也參加了革命，後來在北京公安部工作。一九六六年我牽頭寫了那一張大字報，她從新聞裏聽到了，她認為一下子轟動全國的“聶元梓”一定就是我，儘管我當年在武陟縣做工作的時候是叫“聶元子”，她還是斷定那帶頭寫大字報的就是我。這樣我們就聯繫上了，

她回顧當年，說非常佩服我，穿上軍裝，腰裏別著手槍，騎著馬，英姿颯爽；還說，要參加革命，就要像董元梓那樣勇敢。可見當時我的動員工作之影響。

17 歲的地委婦委副書記

一九三八年秋天，黨組織調我到屯留的中共北方局黨校學習了三個月，學習期滿，正是十二月底，就分配我到中共晉豫地委婦女工作委員會當副書記，同時還兼任晉城中心縣委婦女科長（當時縣委書記是賴若愚），^{〔1〕}在晉城開展建立婦救會的工作。

在晉城，日軍飛機經常來轟炸。我們沒有任何防空措施和武器，祇能密切注意敵機，及時躲藏。可是，敵機速度快，常常躲不及。有一次，敵人飛機已經飛到頭頂上，炸彈丟在離我很近的一家飯館的門前，我沒有任何可以躲藏的地方，祇有趴在旁邊一家門口的門坎下面。真是僥倖，沒有受傷。敵機來轟炸，我們不能光是自己躲藏，還要照顧當地的羣衆。危急關頭，羣衆看到你穿著八路軍的軍裝，他就跟你跑。人多了目標大，你勸他們散開，他們還猶猶豫豫。有一次，我帶領羣衆躲到一條山溝裏面的窯洞中。這裏的地形是一大片平地，可平地上又有下陷的寬大的溝川，在溝川壁上挖有窯洞，窯洞本來很隱蔽的，從高空無法發現，可是有漢奸報信，敵人就飛到溝川上空扔炸彈，用機槍掃射。我正在勸說羣衆疏散，日本人的炸彈就丟下來了，當場就炸死一個老鄉。

在晉城，我負責組織成立了晉城縣婦女救國會，由任秀蘭任秘書

(當時在山西，閻錫山規定第一把手都叫秘書)。我們一同工作了一段時間，我就回地委了。在晉豫地委(地點在陽城)時，薛迅是組織部長，^[2]後來是副書記。李哲人是宣傳部長，^[3]還有溫建平^[4]，也負責過宣傳部。我在晉豫地委工作了一段時間。後來，因為工作需要，成立了中條山地委，李哲人任書記。一九三九年的春天，我調到中條山地委，擔任地委婦委副書記。在地委住了沒幾天，李哲人就指示我到第七專署犧盟中心會工作，擔任婦女部長。這是用來掩蔽我的真實身份的公開職務，我以這個身份被派到晉南婦女救國會籌委會等單位，指導和協助張彩組織晉南婦女救國會，並任四個救國會(工、農、青、婦各自成立一個救國會)的黨組副書記。

閻錫山政府的第七專署，情況很複雜，各種勢力都有。有閻錫山的地方勢力，有我們共產黨派出的幹部，也有南京蔣介石委派的人物。蔣介石派了一個大特務頭子李猶龍來，專門做閻錫山和八路軍的情報工作。我們經常要和這個李猶龍打交道，兜圈子。第七專署有犧盟中心會，主要工作都是黨內同志在做。王竟成負責犧盟會的工作，是秘書(她是很能幹的一個女同志，到北京以後在建築工程部任副部長)。還有一個同志叫李長庚，是犧盟中心會的組織部長，後來，他得了傷寒，沒有醫生治療，自己找了一些藥吃，本來恢復得快好了，沒想到病又復發，死去了。我是犧盟中心會的婦女部長，改名燕文華。我以這個公開身份，從事地委副婦委書記的工作。

犧盟中心會領導下面的四個救國會：工、青、農、婦女救國會。犧盟中心會的地址是在燕家山下，李猶龍的據點也在燕家山下的夏家溝。四個救國會的地址在山上一個大廟裏，那裏有兩個大院子。我做四個救國會的黨組副書記，黨組書記是工會的頭頭，姓朱。我們兩個

都直接與地委書記李哲人或青委書記路易（因為他是四個救國會的黨組書記，後改名為劉希文^[51]）聯繫。姓朱的後來叛變了，跑到李猶龍那裏去了。青年救國會的頭頭叫馬枚，後來在中國民航工作，名字也改了。婦女救國會的負責人叫張彩，解放後在遼寧工作。婦女救國會是我和張彩一起組建起來的。張彩一開始以為我到燕家山是要代替她的工作，後來，她看我一直是扶持她，出頭露面的工作都由她來做，都把她推到前面，她對我就瞭解了。以後我們合作得很好，關係也非常好，成為親密的戰友。

我們在犧盟會下屬的救國會工作，犧盟會是薄一波同志搞起來的。閻錫山雖然迫於形勢需要認可和支持民眾投身抗日鬥爭，但他心裏總是不放心，他自己又搞了一個同志會，要求在犧盟會工作的我們都得參加。我參加同志會是出於工作需要，是為了隱蔽共產黨員的身份，是經過地委批准的。同志會每次開會，閻錫山方面都派特派員來參加，檢查同志會的工作，看我們是不是執行閻錫山命令，看我們是不是經常開會。我們就成心跟特派員作對，他不來我們不開會，他一來我們就開會，提一些很奇怪的問題，弄得他沒辦法解答。青救會的馬枚等人更年輕、更調皮，專門跟他搗亂，提問題刁難他，弄得他非常無趣，灰溜溜地走掉了。

當時，我經常到地委去彙報工作，要走很長的山路。從燕家山到地委所在地，要翻山越嶺，走大山溝。而且，為了掩蔽，大多在天要快黑的時候走。大山裏經常有狼出沒，特別是在夜裏，在路上經常碰見。當地老百姓相信狼怕畫白圈，走在村子裏，家家戶戶的牆上都用白石灰水畫著大大小小的白圈。不知道狼看見這些白圈會怎麼樣，孤身一人走在深山路上，看到這些白圈；反而增加了幾分恐懼和荒涼感。我趕路的時候，手裏拿著木棍，人們都說狼怕打腿，說狼是鐵頭麻桿腿。其實，真要遇到狼羣，一

根本棍能管什麼用？就是給自己壯膽罷了。到地委彙報情況是工作需要，有狼也得去，害怕也得去，這樣一想，心裏就坦然多了。說來也怪，狼也遇到過，而且遇到過好幾次，有一隻的，也有三五成羣的。不知為什麼，牠們都祇是在遠處看我幾眼，並不像人們說的那樣可怕，沒有怎麼招惹我。這樣，碰到幾次狼以後，李哲人就說，以後不許你一個人來往。他有時要派人送我，我不要人送。因為送我的人，回去也是一個人趕路，一樣不安全。

我的皮膚非常不好，就怕蚊蟲叮咬。到了夏天和秋天，當地的蚊子非常厲害，一叮就起包。我一條腿，從膝蓋以下到腳脖子，全都是疙瘩，一抓就像豆腐一樣地爛了，一直搞到流血化膿。過河趟水更是受罪。沒有藥，我想起我父親給別人治療皮膚病的方法：剪下一縷頭髮，把芝麻香油燒熱，把頭髮放到油裏炸化了，再放進去蜂蠟，把紙剪成小方塊，向油裏沾一沾，放到小碟子裏，製成膏藥，貼到患處。我如法炮製，果然把自己的皮膚病治好了。

“夫妻雙雙把家還”

在燕家山工作期間，我做了許多發動羣衆抗日的動員工作，活動區域是在平陸、芮城、夏縣、翼城一帶。其間遇到不少艱難，最驚險的一次，那是在敵人的鼻子底下穿過，要從燕家山到芮城去。六七月間，我被派到芮城去，傳達地委的指示和檢查芮城縣的婦女工作。六月六日，國民黨軍隊與日本軍隊進行了一場惡戰，這就是著名的“六·六戰鬥”。國民黨軍隊被逼趕到黃河邊上，身後沒有退路，面前的敵人武器精良，戰鬥

素養強，又佔著制高點（在中條山上），所以仗打得非常慘烈。要麼跳黃河，要麼戰死。這裏的地形是一邊臨黃河，一邊靠中條山，黃河的這一段是從風陵渡往下，與山勢呈平行狀態，中間是一片狹長的平原地帶。在這場戰鬥中，國民黨軍隊在地形選擇上犯了大忌，退往中條山的道路被切斷了，部隊無法周旋，吃了大虧，傷亡慘重。一時間，日軍的氣焰囂張得很。

我從燕家山下來，到芮城去，必須經過這片狹長地帶，也就是戰場。沿著黃河岸邊走，黃水滔滔，濁浪翻卷，黃河裏漂著士兵的屍體，穿著國民黨軍裝，腦袋泡得像籬筐那麼大，泛著慘白的光，很可怕。河岸上屍臭撲鼻，血污和彈坑時有所見。山頭那邊可以看到日本人的崗哨，刺刀在日光下泛著慘烈的白光，太陽旗在風中飄動，炫耀著他們的“赫赫戰功”。

一邊是黃河天險，激流險灘，一邊是中條山，日本鬼子盤踞其上，虎視眈眈。時當亂世，匪盜叢生，趁火打劫，黃河邊上的土匪更兇，他們不但搶劫行人的財物，還殺人滅口。這些乘著民族危難而興風作浪的敗類們，給我們的工作帶來很多困難，但是一時間又沒有能力清除他們。地形險惡，日軍猖狂，再加上土匪作亂，這次趕路真是兇險萬分。

國民黨《掃蕩報》的一個記者，姓陳，與我同路，他要到芮城去採訪。我們出公差，都是當地村政府派老鄉，借他們的毛驥騎著走——在抗日政權所在地，當地民衆有義務為抗戰人員服務，祇要付報酬，就能解決一路上的衣食住行問題。其實，在華幹和太南遊擊隊裏，我長途跋涉慣了，步行趕路不成問題，但這位陳記者不習慣走長路，特別要騎毛驥。快天黑的時候，我們走到一個岔路口，前面有兩條路，一條路離黃河近一些，一條路離日軍近一些，該走哪一條路呢？黃河邊

土匪出沒，當地老鄉聞風色變；如果離日本人的崗哨太近，就會被敵人發現。怎麼辦？

我對陳記者說，咱們還是靠山邊走吧。靠河邊走，遇到劫路的土匪，咱們兩個身上都沒有多少錢，被他們扔到河裏，死得太冤枉了。咱們兩個抗日戰士，不明不白地被土匪殺了算怎麼一回事？死在日本侵略者手裏，咱們還是抗日烈士呢。我身上本來帶了一支小手槍，防身自衛，可對付土匪也抵不了什麼事，一開槍，還把日本人給驚動了。我說：“咱們靠著山邊走，從日本人眼皮底下闖過去，你聽我的吩咐好了。”我們決定在太陽落山之前闖過這個危險的關口，再找個老鄉家住下休息。

我們兩人本來都騎著毛驥，還跟著兩個老鄉。現在，為了從日本人崗哨附近走過去，我重新做了安排：我騎著一頭驢子，讓陳記者跟著，裝作趕驢的，就像是丈夫趕著毛驥送媳婦趕路，丈夫趕驢送媳婦是當地老鄉的風俗。我讓那兩個老鄉牽著一頭驢，離我們遠一些，等我們平安地通過了這一段路，老鄉再趕上來。

我們必須是硬挺著，硬裝著，不能讓敵人看出破綻來，可心裏卻緊張得不得了，萬一被敵人識破，那就是插翅難逃。我們一點兒都不敢麻痹大意，心都吊在嗓子眼裏。我不但自己要撐得住，還要給陳記者打氣兒，讓他保持鎮靜。就這樣，離日軍崗哨不遠不近，毛驥走得不慌不忙。總算是騙過了敵人，我們兩個人在日軍的眼皮子底下，演出了一場“夫妻雙雙把家還”。過了敵人的崗哨，走出一段路，我跳下毛驥，對陳記者說，你辛苦了，從來沒有步行過這麼長的路吧？現在你騎著驢子走，休息休息，我等老鄉趕上來再騎毛驥，我的兩條腿，可是爬山跳溝地走慣了的。陳記者騎上毛驥，長出了一口氣，說，真夠危險的！

夜幕降臨，走到前邊，又遇到了新情況。這裏的地形很特別。在平原上走著走著，突然會遇見一些凹陷下去的斷崖溝壑。這些溝壑，在遠處根本看不見，窄的有幾百米寬，寬的足有幾里地，陷進地下幾十米，溝裏還有窑洞，有人家。走到一處，溝壑在望，疲倦的陳記者提議，今天就在這溝裏住下別走了。我說，按計劃，今天一定要趕到前面的村子，明天才能到達目的地。陳記者又累又乏，雖然騎著毛驥，但他害怕走夜路，一再說要住在這裏。我呢，反復堅持說再往前走一段路。結果呢，還沒有走進溝裏，就聽到一片雜亂的腳步聲，好像很急迫的樣子。我們非常緊張，不知道前面是什麼人。他們從那邊上溝，我們從這邊下溝。下了溝，按照我的意見，我們沒有停留，又翻到平原上。這時，那些不知來歷的人羣已經跑遠了。夜色中，我們匆匆向前行走。走了好長一段路，才看到一片燈光，我們的心才開始安定下來。

這是一個村莊。我們走進去，老鄉趕著毛驥，跟在我們後面。一進村子，我們就上前去叫門，那戶人家的院門是斜著的，我至今還記得。我是一個女同志，叫了兩聲“老鄉”，門就開了。老鄉很緊張，讓我們快進屋，把趕著毛驥送我們的老鄉打發走了，連門都沒有讓他們進，以免人多暴露目標。老鄉說，就在剛才，一羣皇協軍在村子裏打死人了，情況很是危急，敵人是否走遠，還不能斷定。我聯想起先前在那道溝壑前聽到的匆忙的腳步聲，大概就是敵人在奔襲吧。這個老鄉很機敏，急忙把陳記者引到餵牛的棚屋裏，以便發生意外時可以迅速轉移，然後，把我帶進隱蔽的小窑洞裏——這一帶的窑洞，都是大窑洞中又掏出一個小窑洞，是儲藏東西用的。我進了小窑洞，窑洞裏儲藏了很多紅棗。我們一路奔波，早已饑腸轆轤，藏在窑洞裏，我一把一把地抓紅棗吃，那才叫又香又甜呢。老鄉給我們做了晚飯。夜裏，我和這一家的老太太睡在大窑洞裏的一鋪炕

上。奔波了一天，幾次遇到險情，心一直绷得緊緊的。直到睡在老鄉的土炕上，我緊張的神經才一下子鬆弛下來。

第二天，我們請村政府派了一輛牛車，吱吱扭扭地上路。陳記者和老鄉坐在牛車前面的車轆上，我坐在牛車中，仍然是一家人夫妻兩口走親戚的樣子。從從容容，不急不忙。最艱難的一段路，終於被我們甩在身後了。經過這次歷險，陳記者真正佩服我了，他誇獎我年紀輕輕，就這樣沉著勇敢，對付敵人有兩下子，對自己人又懂得關心。他對我說，他相信犧盟會裏真有人才，要把他妹妹送到我這兒來，讓我帶著她做抗日工作。可惜後來，我返回燕家山，陳記者留在芮城工作，以後再也沒有見到他了。當我寫這段回憶的時候，我還是很想念他的，不知他還健在否？

到延安去，到延安去

隨著局勢變化，國共合作的局面出現了危機。一時間，燕家山的情況也緊張起來。在山下面，蔣介石派來的李猶龍專門在第七專署搞策反。他以國民黨中央特派員的身份拉攏青年，有一次他召集會議，我們都去了。他就講，國民黨怎麼怎麼樣，共產黨怎麼怎麼樣。我是心中有數，不理睬他。可是，工救會的頭頭，那個姓朱的就被拉過去了。我馬上跟李哲人彙報此人叛變了，李哲人還不相信。他說此人剛剛向他彙報工作，沒有表現出異常，還說再過些天他還來彙報工作呢。可是幾天以後，此人就總是跟我講，他是東北的流亡青年，父親母親都留在東北，沒有經濟來源，生活非常困難。他現在給共產黨做工作，都

是供給制，手裏沒有錢，沒法子顧家，要是到西安去，投奔國民黨，一樣是抗日，可是那邊條件很優厚，也可以在經濟上照顧家人了。除此之外，他散佈一些抗戰必然失敗的論調。李哲人聽了我的彙報，起初還不相信，結果沒有幾天，此人就跑到李猶龍那邊去了。

緊接著就發生了晉西事變。閻錫山向山西新軍動手，由抗戰初期利用共產黨人轉變為排斥和殺害共產黨人。他尋找藉口，是要把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新軍“解決”掉，從犧盟會中清洗共產黨員和進步青年。山西的抗日統一戰線面臨著分裂的危機。我們這邊也受到波及。當時，地委要求我們全部轉移，每個部門祇留下一個人照應門面，讓閻錫山的人來了一看，我們還在照樣工作，以表明我們與晉西事變無關，與共產黨無關。

當時，我們都奉命撤退了，我把婦女救國會安排到夏縣的一個山溝裏，張彩在那裏負責。然後又回到燕家山，回來一看形勢不對了。我遠道而來，本來想在這裏住一夜歇歇腳，卻看到工會那個姓朱的頭頭公開叛變了，公開投靠了國民黨李猶龍。我們的身份隱藏不住了，情況很緊急，我不敢在燕家山住下。我向留守的張傑同志交待情況，讓她也迅速撤退，告訴她怎麼走，怎麼到夏縣山溝裏找自己人，然後，我就連夜離開。結果當天夜裏閻錫山就派人來了，把青年救國會的小薛抓走。農民救國會的兩個人也被逮捕，祇有馬枚跑掉了。

我從燕家山出來，連夜趕到地委。為了安全，李哲人也不在地委住了。搬到了垣曲縣八路軍的兵站，我就跑到兵站裏找李哲人。這時候，楊惠文（原來的公開身份是在垣曲縣犧盟會裏工作，實際擔任垣曲縣委宣傳部長）也從工作的地方逃跑出來，找到地委。李哲人安排我們兩人白天關在房子裏，晚上才出來散散步，活動一下腿腳。為什麼呢？因為李哲人還準備要我們做公開的羣衆工作，不能暴露黨內身

份。我們就像關禁閉一樣地關在兵站裏。當時，國民黨還供給八路軍餉，白天有人給送吃的，兵站伙食好，吃白麵饅頭，豬肉白菜粉條燉豆腐，炸油條，這在當時就是最高享受了。原先我在燕家山的時候，伙食很差，有時候沒有飯吃，有時候祇有小米沒有菜。燕家山的那口鍋也有問題，一邊燒飯一邊就漏水，燒飯經常半生不熟。現在住在兵站，可是解饑了。我們吃了飯沒有事做，就在屋子裏玩鬧，每天吃得肚子撐撐的，都消化不良了，還是忍不住要繼續吃，晚上就出來到野地裏蹣跚消食。

這樣過了一段時間，我忍耐不住了，找李哲人說，總得想個辦法讓我們工作呀，現在這樣子，每天不幹事，還吃這麼好，我受不了。李哲人起先說，你們到屯留的北方局黨校去學習吧，以後形勢好轉再回來工作。後來局勢進一步惡化，國民黨孫楚的軍隊盤踞在陽城的山上，無法通行，李哲人就說，到西安去，從那裏上延安吧。我一聽，高興得差點兒跳起來！

本來從太原撤退到臨汾的時候，我就有機會到延安去的，可是我二姐怕我一個人年紀小，照管不了自己，就把我帶回了河南。從華幹畢業以後，我跟著劉子超在太南遊擊隊打遊擊，我也曾提出到延安去，劉子超不願意讓我去，但又強不過我，就派了個交通員，帶著我到黃河邊上走了一圈。黃水滔滔，軍情緊急，從哪裏也過不了黃河，祇好又返回了。劉子超說：你是不到黃河不死心啊。我早就聽說，延安是革命的中心，是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所在地，是全國的革命青年都十分嚮往的地方。現在，我也終於要到延安去了，怎麼能不喜出望外呢？

這樣在垣曲待了三個月，組織就決定讓我和楊惠文到延安去。接受了指示，我們就從垣曲過黃河。我的黨組織關係寫在一個小紙條上，就別在

頭髮裏，當時年紀輕，頭髮厚，藏得住。我們從垣曲出發，過了黃河，到了西安，住在八路軍駐西安的辦事處裏面。

這是一九四〇年春。國民黨封鎖邊區，各地來的人員，還有投奔延安的學生，都在西安停下來。他們冒著生命的危險，滿懷報國激情，千里萬里而來，現在卻被人為地阻隔在西安。走不了，祇好停在西安等待機會。沒有想到，離延安祇有幾百里路了，卻是可望而不可及，苦熬苦等，一等就是幾個月。我和楊惠文等了幾天心裏就非常不耐煩。

聽說延安那裏氣候潮濕，我的疥瘡又復發了。辦事處沒有什麼藥，祇有幾支六零六，是治梅毒的，本來給辦事處一個女同志治病，剩下幾針沒有用完。辦事處的人建議我打六零六試一試，否則，我的皮膚病，到了延安會更加嚴重，那裏都是住窑洞，潮氣更大。我就同意了。結果，一打針打壞了，全身都起了反應。這時有機會可以走了，我卻因為打針打壞了，走不了。祇能眼看楊惠文他們離開西安，連可以深入交談的人都沒有了。

我等到五月份，我的皮膚病漸漸好了。幸好正趕上朱德總司令從山西抗日前方途經西安回延安，我們一些人就跟著朱總司令上延安了。當時八路軍最好的交通工具就是大卡車，朱德總司令坐的也是大卡車，他的車在前面，我們在後面，充作隨員。有關人員事先就告訴我們，一路上都不要下車，不要講話，遇到情況會有人出面處理。一路上提心吊膽，生怕發生什麼意外事件。路過黃陵縣，也不敢下車看看黃帝陵。好在是有驚無險，在卡車上顛簸幾天，終於到了延安。

註釋：

[1] 賴若愚（1910-1958），山西五臺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共。一九三七年後歷任中共山西晉城中心縣委書記、晉冀豫區黨校校長、晉中地委書記、太行區委書記等職。建國後歷任中共山西省委書記、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等職。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當選為中央委員。

[2] 薛迅（1910-1978），河南開封人。女，聶真夫人。一九三〇年加入中共，長期在白區從事秘密工作，歷任中共北平市委婦女部長、天津市委宣傳部長、中共冀魯豫省工委婦女部長和宣傳部長、太嶽區委組織部長、太嶽區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建國後歷任中共河北省委副書記、河南省政府前主席、石油工業部部長助理、北京師範大學黨委副書記、副校長等職。

[3] 李哲人（1910-1969），山西臨猗人，南開大學肄業。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晉南特委、晉豫特委宣傳部部長、中條山地委、太嶽四地委書記，太岳區委宣傳部部長。建國後曾任國務院外貿部副部長、國家經委副主任等職。

[4] 溫建平：後任北京語言文化學院黨委書記、院長。

[5] 劉希文（1915-2003），遼寧鐵嶺人。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共。一九三九—一九四五年在山西中共太嶽區抗日根據地工作，歷任中條山地委青委書記、太嶽區青委書記等職。建國後歷任國務院外貿部部長助理兼中國貿促會副主任，外貿部副部長兼中日長期貿易協定委員會主任等職。

第四章 在延安的學習生活

小初中生偏要學理論

這樣，我從前方經過長途跋涉，終於來到了革命聖地延安，一顆經常懸著的心，這次可放下了，終於回到家了。這裏就是革命的大後方，是黨中央所在地啊！

到了延安，我被安排住在中央組織部招待所，分配到中共中央黨校 45 班學習。這是黨校的一個高級班，班裏的學員都是從前方和重慶工作回來的，有一定的對敵鬥爭經驗，經受過戰爭以及與國民黨蔣介石鬥爭的知識份子。從無錫來的“才女”，後來與陸定一^[1]結婚的嚴慰冰也在這個班上。

在中央黨校學習，課程有馬列主義基礎、中國革命史等。黨校的學風是毛澤東倡導的，以自學為主，發了教材，主要是馬列著作和中共中央文件，自己讀書，然後集體討論。早晨個人活動鍛鍊，晚上到延河邊上散步，或者看延安文藝團體的演出，白天就抓緊一切時間看書或開會討論。人年紀小，比起別的同志來，經驗方面也差一點兒，就是愛提問題，愛爭論，讀不懂的東西，就追著別人請教，到集體討論的時候，嘰嘰喳喳的搶著發言，對別人講的，一時聽不懂，或者有不同看法，也不知道什麼沉默和退讓，總是一五一十地跟人家“討論”問題，甚至爭得面紅耳赤。別人也習慣了，遇到這種場合，會有意無意地讓著我，就像大哥哥大姐姐讓著家裏的小妹妹。其實呀，我就像在外面流浪了很久、吃了很多苦頭的小鳥飛回家了，能不儘情地撲騰嗎？

學習了兩年，就從中央黨校畢業了。有一天，武競天^[2]找我到楊家嶺談話，說要安排我到中央辦公廳秘書處工作。他說我第一是年輕，精力充沛，第二是經歷過地下工作和武裝鬥爭的考驗，第三是從小就讀書，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又經過中央黨校的理論學習，是進中央辦公廳的合適人選。中央辦公廳秘書處，那可是多少人都嚮往的地方，是直接為中央首長服務的，直接接觸中央的核心機密啊。可是，我一來沒有想那麼多，二來在中央黨校學習的兩年裏，我切切實實地感到自己思想文化上的差距——原先在敵後工作，比起那些農民來，講話也是一套一套的，再加上走得地方多，見多識廣，走到哪裏都是讓人佩服讓人稱讚的，到了延安，學習了兩年，開闊了眼界，增長了見識，這才知道革命的隊伍裏有那麼多水平高的同志，知道了革命理論的高深和廣博。如果說，當年參加革命的時候，我是黨叫幹啥就幹啥，現在就有一些個人的主意了。我喜歡上理論工作，想多學習一些革命理論，多讀一些馬列主義著作。因此，武競天找我談話，我就毫不隱瞞地講了我的想法。我要求繼續學習，這樣也就表明了我不願意到中央辦公廳秘書處工作的態度。



一九四三年，二十二歲，聶元梓在延安

那時候，我二姐聶元素和姐夫梁寒冰都在延安，在馬列學院。二姐看見我半通不明地啃理論，還要讀《資本論》，就嘲笑我說，你這麼個小初中生，還想學理論。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都是大部頭，你能學得懂嗎？她越這麼說，我就越是堅定學習的決心。我的那股犟脾氣又上來了。當時延安大學的副校長是趙毅敏^[3]，延安大學有一個高中班，我就上了延大高中班。這時候，杜鵬程（後來因為寫長篇小說《保衛延安》而著名）也在這個高中班學習，他整天抱起小說看。我呢，一邊學習，一邊自己學著寫點理論小文章。我還把寫的東西送給趙毅敏看，趙毅敏看了我的學習心得，鼓勵我說，行啊，寫得不錯，努力學習吧。

延大校址在楊家嶺旁邊，和中央黨校隔一條延河。天氣一暖和，我們就下延河游泳，有時候，一大早就下河了。那時候生活生氣勃勃，到晚上，我們吃過飯出來散步，也到青年文化溝去，看童大林主編的輕騎隊的壁報。這個刊物思想活躍，吸引了很多人前來觀看，丁玲^[4]的《三八節有感》和王實味^[5]的《野百合花》，都是在輕騎隊的牆報上發表出來的。這些文章觀點鮮明，鋒芒畢露，並非一般人能寫出來的，也引起了贊成者和反對者的爭論。我那時候年紀輕，生活接觸面比較窄，又是全身心地投入了理論學習，對於他們提出的問題，做不出評價，當然，我也沒有看出他們反動在什麼地方。直到後來，問題鬧大了，毛主席都表態了，輕騎隊的壁報也停刊了。

“搶救”和被“搶救”

在延安大學高中班學習不久，就趕上了延安整風運動。“延大”和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合在一起進行整風，為便於和領導一起組織活動，

都搬到橋兒溝。

魯藝的校長是周揚^[6]，他也是魯藝和延大整風運動的負責人。周揚很善於演講，在大會上做整風動員報告感情熱烈，很有煽動性，能把自己的情緒帶著跑，能造成一種壓迫人的聲勢。他從來不像有些人那樣板著面孔兇巴巴的。周揚說，開展整風運動，有問題的都要交待。他有幾句話，我現在還記得：“凡是有問題的，都要交待，現在交待，還可以趕上末班車，不然的話，就是另一種後果了！”

毛主席說是要整風，當時的中央文件和後來的歷史記述，都說這是一場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可是，整風整風，不知道怎麼一來，就突然變成“搶救”運動了。在魯藝和延大，周揚講完話以後，就開始搶救了。我先是派出搶救別人，後來又被別人搶救。派我去搶救誰呢？一個朝鮮人，一個是日本人，都是女同志。她們是東北過來的，據她們自己講，她們是自願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工作的，千里迢迢地投奔延安。特別是那個朝鮮姑娘，大個子，什麼都好，就是28歲了，還沒有談對象。有人無中生有地懷疑她是負有特殊使命的特務，潛入延安，又不敢結婚。那個日本姑娘，也被懷疑是日本特務。因此，她們兩個人都成為搶救運動^[7]的第一批受害者。

別人的事情，我搞不清楚，派我去搶救別人，我也不知道怎麼搶救法。沒有想到的是，從小就參加革命，自以為革命意志堅定不移的我也成了被搶救的對象，而且還是由康生^[8]點了名的。開始說我是河南人，是“紅旗黨”，是假黨員。所謂“紅旗黨”，這是康生信口雌黃製造的冤案，他說河南的地下黨都是受蔣介石控制的，是打著紅旗為蔣介石賣力，所以叫“紅旗黨”。這本來就是冤假錯案，何況，我還跟河南的地下黨不沾邊。我入黨是在太行山，是在朱瑞和劉子超

領導的華北抗日軍政幹部學校入的黨。讓我交待，我就這樣分辯。誰知道，洗刷了這個罪名，又被安上了新的罪名。康生說我和王實味有關係。我和王實味有什麼關係？一點兒關係都沒有！我當時不知道這話是康生講的，這件事還是我二姐和二姐夫後來告訴我的。

我不過從王實味的窑洞門前路過了幾次。我是去找馬列研究院的研究員楊紹萱，他是延安平劇院上演的《逼上梁山》的改編者之一，這部劇得到毛主席的高度稱讚。楊紹萱年齡比較大，很喜歡年輕人，常叫我到他那裏去玩。他就住在王實味的隔壁。我原來不認識王實味，有時候在窑洞外面碰上他，因為見面多了，也就是說一兩句話打個招呼，從來沒有正式打過交道。到後來，王實味因為寫《野百合花》挨批，還指責他是“托派”，延安的人們都知道，很少人再接觸他，怕受到牽連，他也更加孤僻和冷寂，遇到任何人都不加理睬。我雖然年齡小，對這些事情也都知道，我怎麼會跟他有什麼關係呢？

這樣，剛剛二十歲出頭的我，莫名其妙地就被追查了一陣，沒有查出什麼問題，卻把我的情緒給鬧壞了。平白無故說我是特務，我當然不高興。我從小在家裏邊備受寵愛，十六歲參加革命以後，一直在革命隊伍裏，思想單純得很，雖然戰鬥和生活中，吃了不少苦，但在人際關係上，卻是一直感受到革命隊伍內部的友愛團結和互相關心的。身邊的同志，都比我年紀大，凡事都願意讓著我，因此，我沒有什麼社會經驗，不知道社會上是什麼情況，不懂得什麼是壞人。現在一下子挨了整，自己還是不明白為什麼。

正在這個時候，搶救運動停止了。因為“搶救”我的時候，已經是運動後期，被搶救的人已經多得不得了。一開頭，我不是還參加了搶救別人嗎？也沒有講為什麼停止運動，就不了了之了。延大也和

魯藝分開了，又和延安行政學院合在一起，搬到了杜甫川東邊。

此事“不許議論”

很快，我又回到中央黨校六部。六部的負責人是侯維煜^[9]。我在中央黨校一直學習到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到一九四五年前後，延安的人就比較少了，都派到各地工作去了。日本投降以前，我二姐和二姐夫被派到晉察冀根據地去了。他們在延安的時候，住在棗園，我星期天經常到他們那裏去玩。棗園是不能隨便去的，毛澤東就住在那裏。我二姐和二姐夫都是搞情報工作的，屬於要害部門，要有特別通行證。但是我可以自由來往，這大概因為我也給中央領導人做過情報工作吧。

我經常到棗園去，對於毛澤東和江青的事情就聽到一些。主要是說，中央的高級領導人中間，很有一些人反對毛澤東跟江青結婚，他們對江青這樣一個從上海灘來的名聲不大好的電影演員，都很反感，聽說張聞天呀，徐海東呀，都公開表示過反對意見，可是毛澤東沒有接受。當時在前方的時候，黨內還有個通知，說對於毛澤東和江青結婚一事“不許議論”。這在今天聽起來是非常可笑的，可是，我們當年都是堅決執行的，誰也不許傳播有關消息。關於江青的日常生活方面，也有一些非議。不知道為什麼，江青喜歡使用十幾歲的小男孩當公務員，大的不過十四五歲，小的祇有七八歲。那時候延安收留的小孩參加八路軍的不少，人們稱他們為“小鬼”，江青物色“小鬼”，給她當公務員。聽說有一次，毛澤東要江青燒毀一批文件，結果江青連一些不需要銷毀的文件也一塊兒燒了，因為不得法，還把煙囪給堵了。她讓“小鬼”下到非常狹窄的煙

肉裏去掏，要是萬一掉下去卡在煙囪裏面出不來，就出大問題了。毛澤東發現了這件事，狠狠地批評了江青一頓，江青為此還與主席吵了架。這樣的女子，跟在最高領袖身邊，怎麼能讓人放心？

嫁了一個筆桿子

在中央黨校六部我認識了吳宏毅，並且和他戀愛了。一九四五年七月，日本投降之前，我們結婚了。吳宏毅當時是黨校的班黨支部副書記，兼作學習委員。他是學生出身，儀表堂堂，談吐不凡，講起馬列理論來滔滔不絕，他當年跟隨劉伯承當戰地記者，寫過不少有關太行山八路軍的戰鬥事蹟報導，很有名氣。延安當時是男多女少，比例嚴重失調，我的身邊也有一些追求者，但我卻選擇了吳宏毅。我的想法是不選擇一個槍桿子，就選擇一個筆桿子，就是說，要麼找一個部隊幹部，要麼就找一個文化人。和他結合，大概與我當時迷戀寫理論文章有關。事後想來，這種想法太幼稚了，當時卻是一個心眼這樣想了。

註釋：

[1]陸定一（1906～1996），主編過共青團的《中國青年》和紅軍的《紅星報》；在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當過總編輯。一九四五年就任中宣部長，長達二十二年。“文革”初期被錯定為“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成員，關押十三年。

[2]武競天（1908～1977），時在中共中央組織部工作。山西壽陽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共歷任抗大政治股長，中央組織部秘書處長，晉冀魯豫中央局秘書長等職。

建國後長期擔任鐵道部副部長。

[3]趙毅敏（1904年～2002年），河南滑縣人，可算是董元梓的同鄉。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共。一九三八年～一九四五年在延安先後任魯迅藝術學院副院長，中央宣傳部秘書長兼延安大學副校長。建國後歷任中南局常委，中央國際活動指導委員會副書記，中聯部副部長，中紀委副書記兼秘書長等職，是中共第八屆候補中央委員。

[4]丁玲（1904～1986），著名作家。抗日戰爭期間到延安，歷任邊區文藝協會副主任、《解放日報》文藝副刊主編等。在延安期間因寫作《三八節有感》等雜感受到批評，其後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獲一九五一年斯大林文學獎。建國後任中國作協黨組書記及常務副主席、《文藝報》主編等職，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七年先後被錯定為“反黨集團”和“右派反黨集團”主要成員，一九七九年平反。

[5]王實味（1906～1947），一九三七年十月抵延安，專門從事翻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原著的工作。一九四二年三月發表《政治家藝術家》、《野百合花》兩篇批評延安現狀的雜感，遭到錯誤批判，並定為“托派”而被捕，一九四六年重新審查結論是“反革命托派奸細份子”，一九四七年被殺。一九九〇年平反。

[6]周揚（1908～1989），原名周起應。文藝理論家、文學翻譯家，三十年代以後中國共產黨在文藝領域的主要負責人之一。三十年代為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領導者，抗戰期間到延安後任陝甘寧邊區教育廳長，魯迅藝術學院院長，延安大學校長等職。建國後任文化部副部長、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國文聯主席等，著有《周揚文集》五卷。

[7]搶救運動：即“搶救失足者運動”。在延安整風後期，中共領導人認為抗戰期間投奔延安的青年學生中混入“國民黨特務”，要進行“搶救”。在搶救運動中，中共河南、甘肅、四川等十省市地下黨組織都被誣為“紅旗黨”，大批青年學生則被打成“特務”，造成許多冤案。

[8]康生（1908～1975），在延安時期曾任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中央書記處書

記，延安整風期間借“搶救運動”之名製造過不少冤案。新中國成立後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八屆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等要職。“文化大革命”中，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顧問、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製造了大批冤案。一九八〇年被中共中央開除黨籍，撤銷悼詞。

侯維煜（1913~1979），山西交城人。一九三四年加入中共。歷任中共中央華北局秘書長，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副校長和黨委第二書記，中央直屬機關黨委第一書記。

第五章 在決戰東北的日子裏

騎著大洋馬上東北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了，堅持了八年抗戰的中國人民，終於贏得最後的勝利。捷報傳來，延安軍民欣喜若狂。抗戰勝利以後，延安有大批幹部都被派到東北去，七大的中央委員有八十多人，二十人先後到了東北，領導開闢東北根據地的鬥爭，跟國民黨搶地盤。就這樣，我和吳宏毅^[1]一塊兒被派到東北去。

在此之前，朱瑞也在延安，他是到延安開七大的。開完七大，他們要回部隊去，回南泥灣去。我們黨組成了第一支炮兵部隊，朱瑞是司令員，部隊駐地在南泥灣。那裏原先有一個炮兵學校，就是朱瑞當校長，邱創成當政委。朱瑞把炮兵部隊的營盤安在那裏。去東北之前，我們決定去看看朱瑞，也看看當時大生產運動搞得轟轟烈烈的南泥灣。我和吳宏毅，還有一位朋友同行。從延安到南泥灣，大約一百里路左右，駐延安的炮兵學校辦事處給我們備了馬匹，我們就興致勃勃地去了。我們還參觀了王震將軍領導三五九旅開荒搞生產的成果。回來的時候，朱瑞送給我一匹從日本人手裏繳獲的大洋馬。那時候沒有多少車輛，前面說過，朱德在延安和太行山前線之間往返，都祇能坐卡車，部隊的大炮很多都是從日軍手中繳獲的大洋馬拉著。我們夫妻兩個人上東北，有一匹馬，那是很難得了。

我們本來是第一批分配到東北去的，結果我得了盲腸炎，走不了。本來應該做手術，因為任務緊急，醫療條件又不完善，就沒有手術，

說是採取保守療法，其實也沒有吃什麼藥，硬挺著，沒有想到慢慢就好了。就這樣，我們跟著第二批去東北的隊伍出發了，帶隊的是劉漢生^[2]。日本人投降了，但還沒有完全繳械。我們和國民黨爭奪東北，他們有飛機，有火車，還有一些東北的偽軍搖身一變成了中央軍。土匪也有，大股小股的都有，就像《沙家浜》裏邊的胡傳魁那樣的，有幾條槍，都被國民黨收編了。咱們派的人，大多數是做地方工作的，要發動東北的人民羣衆覺悟起來，跟共產黨八路軍走。我們就靠兩條腿，都是一個心眼往東北趕，要搶在國民黨軍隊的前面。有的人結婚了，生了孩子，就弄個毛驢，一邊馱一個筐，這邊裝行李，那邊就把孩子擋進去。我們算幸運的，有朱瑞送的大洋馬，可以馱行李，也可以騎著走。

我們從延安出來，過了黃河，就到了山西北部。過大同、繁峙的時候，那裏的日軍還沒有投降。我們這支隊伍主要是做地方工作的幹部，不是作戰部隊，沒有作戰任務，祇好想方設法地繞開敵人的據點，避免不必要的損失。在繁峙境內，有日軍的一個大據點，正好扼守著交通要道，據點裏的情況不明。我們就找了當地的老鄉，在夜裏悄悄地從據點旁邊穿插過去。夜色朦朧，除了大風的呼嘯聲和輕輕的腳步聲外，沒有出現任何響動，我們一個跟著一個走。走到據點附近，還聽見據點裏傳出咿咿呀呀唱戲聲音，日本鬼子正在據點裏悠哉悠哉地看戲，我們的隊伍就神不知鬼不覺地過來了。我們跑起來就像一陣風，那時年輕，體力好，一跑就是十幾里路。鐵路兩邊都是開闊的田野，絕對不能停留，不能暴露目標，要一口氣奔跑過去。全靠兩條腿，跑到離敵人較遠的地方，才停下來休息，喘一口氣，繼續前進。

過了同蒲鐵路，就算到了安全地帶。我們在一個山村邊上的房子背後休息下來。時當拂曉，曙光昇起，清點隊伍的時候，才發現一對

夫婦帶的孩子丟失了，小孩子馱在毛驢背上的筐子裏，連人帶驢都找不到了。過敵人的封鎖線時，人們的精神是高度地緊張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不讓敵人發現上。小毛驢順著鐵路跑掉了，孩子的父親手中祇牽了一根空繩子，竟然就那樣走了很久都沒有發覺。領導先後派出兩批人，裝扮成幹活的老鄉的模樣，順著鐵路線去尋找，在野外沒有找到，就到附近的村子裏去問訊。幸運得很，這個小孩和馱他的驢子都在村子裏找到了。當地的農民很善良，他們外出幹活的時候發現了這個走失的驢子和馱著的孩子，就把他領回家中，對小孩子照顧得很好，驢子也給餵上了。

山西多山，過了同蒲路，我們的隊伍要翻越五臺山脈的一座山。因為情況緊急，隊部下達命令，要在當天夜晚行進。這時已是寒冬天氣，西北風呼呼地刮著，荒山野嶺，風勢更猛。夜色深沉，天上看不見星月，地上看不清路徑，我們一個跟著一個，盯著前面的模糊的身影趕路。人困馬乏，一邊走一邊打瞌睡，加上路難走，不時有人從馬背、驢背上掉下來，發出一聲聲驚呼，驚呼很快被周圍的人制止。一直走到天亮，才在一座小村莊裏停下來，有的人連背包都來不及打開，就倒在老鄉的土炕上睡著了。

山迢迢，水長長

我們橫穿山西北部，來到河北省北部的張家口。張家口是從河北平原通向內蒙古和東北省的交通要道，又是我軍在抗戰勝利以後佔領的第一座城市。從各地調集的開赴東北的部隊和工作幹部，都經由張家

口向東北走。各路人馬都在張家口匯集，這裏一時間擁擠不堪，大街和火車站都擠滿了我們的人，都想爭先趕到東北去。早一天到達，就能早一天開展工作，也可以縮短旅途勞頓。肖克將軍就在火車站作鐵路運輸的總指揮，負責安排哪個隊伍登哪一趟火車，什麼時候發車，到達什麼地方。

經過長途跋涉，我們在張家口停下來乘火車，先從張家口到承德去，再從那裏繼續往東北趕。我們把一路上帶的馬匹和驢子都交給指定部門，就上了火車。原先以為，從步行改成火車，可以放鬆一下子，可以消除多少天來匆忙趕路的疲勞。沒有想到，火車上的條件極差，車皮少，人員多，車廂裏塞滿了人，有的還是那種悶罐車，空氣不流通，氣味很難聞。我們上車也沒有帶東西吃，原先以為人一上車，火車就開走，既沒有敵人的封鎖線，也無需再勞碌自己的兩條腿，可以在自家的地盤上自由行動了。沒有想到，坐火車還不如步行。一是火車趴窩，誰也說不準火車什麼時候開，什麼時候停，人們都不敢下車，害怕掉隊。等到火車開動了，也是“老爺車”，慢慢吞吞，走走停停，一路上要修個不停，要加水，加潤滑劑。潤滑劑不夠，就收集人們帶的肥皂代替。二是沿途沒有賣食物的，這一帶都被日本人糟害苦了，現在又過大部隊，拿不出什麼糧食來，火車開了十幾個小時，停車的時候想買東西吃，可車站附近祇有賣豆腐的。豆腐營養價值雖高，可我們在火車上沒有辦法加工，連水也沒有，祇能忍著胃酸吃這寡味的白豆腐。

於是，我們不由地懷念起前一階段的長途跋涉來。雖然說是夜行堦宿，翻山越嶺，還要冒著危險穿越敵人的封鎖線，可是，一旦休息下來，睡在老鄉的炕頭，就能吃上熱乎乎的湯麵，有時候還能買到烤得焦香焦香的饅頭、花捲、燒餅。帶在路上吃，吃得滿嘴香噴噴

的。現在坐在這哐哐噹噹的火車上，不知道何時才到下一站，面對著一塊少鹽缺油的豆腐，人們直念叨，還不如在山裏多走幾天呢。

這樣的火車，把人們坐暈乎了，也不知道走了幾天幾夜，火車才開到承德。承德是有名的避暑山莊，我們當時可沒有那麼多的閑情逸致去逛風景名勝。那時候，承德是偽滿洲國的邊境，是最早淪陷的地區之一。日本人佔領和統治的時間長，老百姓受的苦難多。日本人搞的併村連坐，把老百姓整得又窮又苦又膽小。許多村莊空空蕩蕩的，聽不見狗吠鷄鳴，滿目斷壁殘垣，一片淒涼景象。老百姓都躲在家裏閉門不出，或者躲到山溝裏，見我們這些陌生人，嚇得急忙躲藏，生怕發生什麼意外。

我們的隊伍從承德開始，由火車轉為步行前進。我們的唯一的任務是迅速地趕到東北目的地，當然也順便地做些宣傳和安撫工作，宣傳共產黨的羣衆政策，講八路軍是為民族解放打仗的，講共產黨要讓全國人民都過上好日子。還有，就是“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那些內容，不拿一針一線，買賣公平，態度和藹，保護羣衆利益，這和長期統治這裏的日本人和偽軍盤剝百姓欺壓民衆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我們很快就贏得了羣衆的信任和擁護。當地窮苦人家的婦女，光著身子向我們要衣服穿。老百姓從低矮的土屋中，從偏僻的山溝裏走出來，排成隊迎接我們，和我們說話，幫我們帶路。住在老百姓家裏，一天三頓飯都是吃土豆，比天天吃白豆腐強一些，也強得有限。這裏實在是太窮了，沒有別的糧食。

我們走過凌源、朝陽，然後又走到遼寧省西部的新民，這是我們這次進軍東北的第一個目的地。在這裏，吃飯問題解決了，可是穿的問題又冒出來了。這裏是東北大平原，可是，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都收割過了，好景不再，平原上光禿禿的，無遮無攔。已經進入冬季，肆虐的寒風讓我們這些遠道而來的人們領略了東北冬天的厲害。我們雖然

有所準備，把在陝北穿的棉衣棉褲什麼的都穿在身邊，可是，在新民這裏，它們好像都變成了一張薄紙，根本無法禦寒。在我們的隊伍裏，有些人還帶著孩子，那些小孩就更可憐了，凍得呼哧呼哧的，今天感冒，明天發燒，把大人們急得不知道怎麼辦好。做母親的害怕他們凍出毛病來，急忙給孩子們做棉衣棉被。結果，有一對年輕夫婦，給孩子做了一床厚被子，行軍的時候，用被子把毛驥駒的筐筐蓋得嚴嚴實實，不讓冷風鑽進去，沒有想到捂得太緊，把孩子捂死了，大人也痛不欲生。

幾十萬大軍進東北，哪能準備得那麼充分？我們看到那些從山東來的部隊戰士，他們本來是在中原一帶作戰的，如今穿著單薄的黃軍裝，在凜冽的北風和紛紛的大雪裏行軍。年輕的戰士們祇有用快速跑步的方式，抵禦嚴寒，以免凍僵。這些戰士們吃苦耐勞的精神，讓我深深地感動。

黑土地上的新使命

過了新民縣，我們這支幹部隊就被分配到東北各地去工作了。我和吳宏毅雙雙來到遼寧西部的鄭家屯，那裏是中共西滿分局遼西省委所在地，當時的省委書記是陶鑄^[2]。吳宏毅在遼西省委的機關報《勝利日報》，接替許立羣^[3]社長的工作，我被分配在鄭家屯的第三區當區委書記。新的生活，新的戰鬥，在東北的黑土地上開始了。

那時候，國民黨軍隊乘我們立足未穩，從南向北推進，準備向鄭家屯發動進攻。同時鄭家屯一帶的土匪也很猖獗，給我們一個“下馬威”。我們在區裏發動羣衆，肅清土匪，安定地方，做了很多爭取民心的事

情。但是，國民黨軍隊來勢兇猛，人數衆多，在武器裝備上佔有很大優勢，離鄭家屯越來越近了。我們接到命令，要從鄭家屯撤退，讓出鐵路線和重要城市，往北邊走。這年的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發出《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重要指示，要求進入東北的我黨我軍“讓開大路，佔領兩廂”，撤出鐵路沿線的城市，把它們暫時讓給瘋狂來犯的國民黨軍；共產黨則到廣大農村去，到偏僻、艱苦的西滿北滿地區去，放手發動羣衆，進行土地改革，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擴大武裝力量，訓練部隊，最終用農村包圍城市的方式戰勝敵人。這樣，我們就從鄭家屯又向北撤退了。我所在的第三區區長姓嚴，他奉命留下來，在敵後開展遊擊戰。他是一個好同志，工作很紮實，和我配合得很默契；可是，他留在鄭家屯沒有多久，被敵人抓住，殺害了。

我們隨著中共西滿分局——西滿分局書記是李富春^[5]，西滿軍區司令是黃克誠^[6]——自南向北地穿過吉林省，撤退到黑龍江境內的齊齊哈爾，這已經快要到達中國的最北端了。當時，國民黨的軍隊是從南向北過來，我們是大踏步地向後撤退，在四平打了一場大戰，別的地方，也都有過大大小小的戰鬥。不過，敵人越是向北進犯，兵力就越是分散，最後就推不動了。

在齊齊哈爾，吳宏毅擔任《西滿日報》副社長，每天忙於編輯報紙，撰寫社論，我當第一區的區委副書記，區委書記是黃克誠的夫人唐棣華。還有一個副書記叫陳健，他建國以後在冶金部當過司長。齊齊哈爾在松花江和嫩江的交界處，位於黑龍江省西北部，是我軍剛剛從蘇聯人手中接管的城市，社會秩序急需整頓，工業生產急需恢復。我所在的城關北區，人員複雜，漢奸、土匪活動頻繁，人心比較混亂。我成

天在街道上跑，發動羣衆，肅清隱藏下來的漢奸、土匪，開羣衆大會，號召有問題的人自動向政府坦白。我說，自己向政府坦白了，把問題說清楚了，政府會從寬處理。都是從舊社會過來的人，身上有些污點是難免的，如果要是自己不交待，讓羣衆檢舉出來，那就是抗拒政府，就要加重處理。因為我們剛剛接管這裏，有的人相信我們；有的人仍然等著國民黨軍隊打過來，或者是等等看，看情況變化再說。形勢嚴峻，社會秩序複雜，常發生打暗槍的事。

吳部長的手術刀

到一九四六年夏天，大概六月份吧，我們的工作已經開展起來，齊齊哈爾各方面的情況都好轉了，正在這個時候，敵人打過來了^[7]。上級決定放棄齊齊哈爾，命令所有的女同志和家屬都先行撤退^[8]。當時我正趕上懷孕，挺著個大肚子，行動很困難，因此，我沒有撤，留在齊齊哈爾了。到了七月初，危險越來越近，不走不行了，可我卻走不動了。不光是因為挺著大肚子，還犯了盲腸炎，需要動手術。

國民黨正在進攻，人心惶惶。送到當地醫院，醫院說手術動不了，也沒有藥，祇能去哈爾濱的大醫院做手術（當時去哈爾濱是不可能的，都在撤退）。我沒辦法，讓吳宏毅去找黃克誠（西滿軍區司令）要消炎片。黃克誠說，你來得正好，軍區的衛生部吳部長剛從前線回來彙報工作，我讓他馬上去看看。吳部長剛剛從前方回來，穿著一套油脂麻花的軍裝。老百姓說，八路軍儘吃肉，吃肉都吃到衣服上了。他們不知道，我們就發這一身衣服，走到哪裏穿到哪裏，連換洗的都沒有，著了急，晚上睡覺也是它，能不渾身油乎乎的嗎？他就穿這一身衣服，醫院裏的醫生護

士都看不起他，這樣子還能當醫生？吳部長顧不上別的，就給我檢查身體，一查看，他說這是急性盲腸炎，必須馬上動手術。吳部長說，請你們醫院裏的人一起研究一下。醫院的醫生說，乾脆一次兒拉個大口子，邊切盲腸帶剖腹產，得了。吳部長不同意，他說，開一個小口子切盲腸，是小手術，容易做，要是做剖腹產，就成了大手術，弄複雜了，這裏條件不夠。當時根本沒有消炎的藥品，連消炎片都難找。

那時的條件的確很困難，王盛榮^[9]受傷了，也沒有藥治療。他受傷的時候我在場，當時我們在樓上開會，樓下的戰士擦槍，槍口朝上，不知道怎麼搞的，走了火，子彈飛出來，穿過樓板，打到王盛榮的腿上。起初，我們不知道子彈哪兒來的，以為是國民黨特務搞破壞，從外面打黑槍。王盛榮穿著從蘇聯穿回來的大皮靴，裏面是毛的，靴子裏的碎毛和子彈一起鑽進傷口，化膿了。他們找來幾片藥，給他吃，也給我吃。我說：“我不吃，都給你吧，我得的是盲腸炎，靠那幾片藥管什麼用？那麼嚴重的炎症，不開刀根本治不好。”

吳部長給我做手術，把醫院的醫生護士都鎮住了。這麼一個貌不驚人、衣著邋遢的八路軍，土裏土氣，哪裏像個醫生？他竟然敢給孕婦做這樣的手術，八路軍裏真是有人才。這件事在齊齊哈爾傳開了，八路軍和吳部長的聲望一下子大增。吳部長給我肚子是拉一個口子，縫了七針。因為他要把盲腸切除，得先把胎兒托起來，找到盲腸，才能做手術。結果，做完手術以後，我的肚子更疼了。一查原因，是刀口化膿了。如果是現在的條件，就不會這樣，那時候沒有條件啊。我說刀口裏面化膿了，化驗結果說沒有化膿，到了七天頭上一拆線，膿從縫線裏流出來。開刀以後，不敢翻身，害怕把傷口影響了，祇

好仰面躺著睡，一動都不敢動，後背疼得不得了。

當時，東北的日本人還沒有走完，還有一些日軍俘虜和日本僑民，組織上給找了兩個日本護士照顧我。那兩個護士對我真好，她們把我的後背抬起來，好讓我改變一下姿勢，休息休息，緩緩勁兒。她們就用兩條胳膊架著我，吃多少苦啊。我吃苦，這兩個日本護士也吃苦。因為刀口化膿了，還得做第二次手術。吳部長等我把孩子生下來，守在手術臺上休息了半個小時，又給我開刀做盲腸手術。這一次清洗得很徹底，洗了好幾次血膿，手術也好做了，因為肚子裏沒有胎兒礙事了。孩子生出來，是個女孩，起名玲子。那時候我沒有奶水，有奶也不敢給孩子吃呀，怕把我身體裏的病菌傳染給孩子。祇好是兩個日本護士帶著，到老百姓家裏，看誰家有奶孩子的婦女，就讓人家給餵幾口，那是名符其實地吃百家奶啊！後來才想辦法給她弄了牛奶吃。

第二次做手術，還是沒有藥品消炎，祇好在腹部插了兩根管子導膿。沒有消毒藥水，祇能是用鹽水洗傷口。聽說，劉伯承的眼睛做手術也是什麼藥品都沒有，連麻醉藥都沒有。這次手術以後，祇能側身睡覺，開刀的傷口一直流膿流血，三個月不能動彈，更不能下床，因為老是偏著睡，把挨著床的那一側身體和腿都壓爛了，又生了瘡。我的頭髮也再一次脫落，雖然沒有上一次嚴重，頭髮也是稀少得很，從頭髮的這一邊一下子就透過去看到另一邊了。

無論如何，我又一次活下來了。我的生命力真是頑強，我身邊那麼多同志，得了病或負了傷，本來不很嚴重，就因為缺醫少藥，得不到及時的治療而死去，我卻一次又一次地死裏逃生。而且，通過給我做手術，吳部長的醫術，八路軍聲譽，都提高了很多。遺憾的是，當時都叫“吳部長”；沒有記住他的名字，一直到現在，我想起來

就後悔。

國民黨軍隊並沒有打過來，否則，我剛剛做完手術，根本無法行動，打起仗來，還不知道情況會怎麼樣呢？我的好幾次危險，都是這樣，非常幸運。當年在武陟縣養病，正好是在敵人掃蕩的空隙裏，能夠有一段安定的時間恢復身體。這一次又是趕得好，正好吳部長來了，趕上給我做手術；正好敵人沒有進犯，虛驚一場，不用匆忙轉移。別人都說我的命大啊！

“年輕的老幹部”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我從齊齊哈爾調到了哈爾濱，在哈爾濱的一個區做區委宣傳部長，當時的市委書記是張平化。^[10]我年紀輕，熱情高，工作能力較強，受到重視，後來，從區裏調市裏，做市委機關黨委副書記，又到省委學習室和理論教育處任處長，後來又回天哈爾濱市，繼續做市委理論處長工作。

從這時起戰爭的硝煙離我們越來越遠，解放戰爭在全國各地打得轟轟烈烈，哈爾濱卻成為後方，生活開始穩定了。我一直在哈爾濱搞理論宣傳工作。新中國成立後，全國幹部開始評級別。原先是供給制，大家生活標準都差不多，後來搞津貼，我的津貼比較多，吃小竈，還可以拿不少津貼費。全國幹部第一次評級給我評了個十二級，當時我才二十九歲，也成了年輕的高級幹部。

我搞理論宣傳工作，新中國建立以後，我經常上北京開會。一九五〇年年初，我到中宣部開會，別人說，開會的人中間，我最年輕，又穿

得漂亮。哈爾濱長期受俄國人和日本人的影響，具有殖民地色彩，具有文化上的獨特性。比如說，那時候在哈爾濱坐出租車，道外區出租車有時可以講漢語，但是在道裏區和南崗區出租車，是不講漢語的，不說俄國話，就得說日本話，不說外國話，你要中途下車，他就不給你停車。還有，由於外國僑民尤其是“白俄”的影響，哈爾濱的衣著打扮很講究、很開放。中學生的校服都是毛料的，很挺括。其實哈爾濱市民當時的生活是很窮的，家裏窮，出門穿的要好，哪怕不吃不喝也要穿一身像樣的衣服。人們說，不怕家裏被賊偷，就怕上街摔跤（怕摔髒摔破衣服）。哈爾濱解放得早，搞公私合營的時候，我經常到下邊做羣衆工作，聯繫的工人多。我到一家服裝廠去，那裏的老闆因為要搞公私合營被嚇跑了，我做工人的工作，歡迎老闆回來，結果老闆還是不敢回來，我就叫工人自己組織起來，管理工廠。他們也給我做了幾件衣服，還不要我的錢，可我還是堅持付了錢，我是黨的幹部啊！到中宣部開會，我就穿他們給我做的衣服，會上有人奇怪地說，中宣部的理論工作會議，怎麼還有這麼年輕的城市姑娘參加呀？中宣部的許立羣認識我，向別人介紹我是“年輕的老幹部”。

悲歡哈爾濱

在哈爾濱，我的工作比較順利，五十年代初期，社會風氣和黨內生活都是積極向上的，大家都很努力。可是，我和吳宏毅的關係卻不斷惡化了，這影響了我的工作，也影響了我的進步。吳宏毅很聰明，很能幹，是有名的筆桿子，能寫一手漂亮的articles。就是有一條，男女作風有問題。開始幾年還挺好，我們生活工作都很默契，很穩定。到後幾年就

不行了，就出問題了。

一九五四年他到東北局去開會，聽東北局領導傳達中央對“高崗饒漱石事件”的處理，開會比較緊張，他當場發作心肌梗塞，被送到醫院緊急搶救。那時候對心臟病還沒有什麼好辦法，醫生對這病看得特別嚴重，組織上也擔心害怕，對他特別照顧。因為他生病，我經常請假照顧他，一請就是幾個月，我的工作自然受到影響。我還通過我大哥聶真，給吳宏毅聯繫到北京頤和園吳玉章^[11]的院子裏療養一段時間。當時，吳玉章是中國人民大學的校長，聶真是副校長。

吳宏毅生病以前，是哈爾濱市副市長，那時候，在男女關係上他就不檢點了。他養病期間，事情就更多了。那些亂七八糟的事情，我不願意多講，他對我傷害很深很深。我們兩人關係不好，我還是忍耐著，我想讓孩子們有一個爸爸，有一個完整的家庭。我自己處境如何是其次，祇要給我留一點兒面子就可以了。從那以後，我經常到北京來開會，到中央黨校或人民大學，學經濟學，學哲學，一走就是半年一年的，對於家庭危機，也是一種迴避。組織上也瞭解這些情況，理解我的苦衷，我本來工作很好，都是老同志了，所以我要求到北京開會學習，一般都能得到批准；可是，職務提拔什麼的，就沒有我的份了。因為我在北京的時間多，市委的工作自然就沒有辦法抓，難以作出成績。市委宣傳部長鄭依平和市委書記任仲夷，^[12]對我都很好，都理解我的苦衷。

吳宏毅鬧到最後，想隱瞞都隱瞞不住，影響越來越壞，領導不能不出面了。我不在家的時候，組織上就要他做檢查，不料他繼續與組織對抗，因此組織就採取了措施，把他隔離起來。在這期間，他還繼續犯錯誤，到後來，市委對他作出嚴厲處分，還上綱成為政治問題，“反黨”小集團，對他作了嚴厲的組織處理。到一九六八年，“文化大革命”風

暴處于高潮時期，吳宏毅在接受批鬥的時候，突發心肌梗塞，可嘆他這時候早已失去優厚的生活待遇和醫療條件，得不到及時治療，就此死去，成了一個時代的犧牲品。“文化大革命”以後，對吳宏毅的問題進行復查。他在生活方面的問題，證據太多了，翻不了案，政治問題得到平反。

吳宏毅的問題被揭露出來，我想繼續維持現狀也不行了，一九五九年秋冬之際，我跟吳宏毅正式離婚。離婚時，我們一句也沒有爭吵。當時，我們已經有三個孩子。我先把孩子送到北京，讓我母親照顧，又回到哈爾濱，辦理了工作調動。我二姐看我一個人帶三個孩子，還要工作，就幫我帶一個孩子，我最小的孩子從此就過繼給我二姐了。

註釋：

[1]吳宏毅一九五〇年十一月至一九五六年四月為中共哈爾濱市委委員，一九五六年四月至一九五八年七月為市委常委，一九五八年七月中共哈爾濱市“二大”之後又為市委委員，未能當選常委。另吳於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〇年九月為哈爾濱市副市長。見《中國共產黨黑龍江省哈爾濱市組織史資料1923～1987》、《黑龍江省哈爾濱市政軍統羣系統組織史資料1945～1987》（中共哈爾濱市委組織部等編輯發行1989）。

[2]劉漢生（1910～），曾任天津市委書記，遼北省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部長等。建國後，曾任地質部、電力工業部副部長等職。

[3]陶鑄（1908～1969），參加北伐戰爭和南昌起義，後轉戰南北，曾任中共遼寧、遼吉、遼北省委書記兼軍區政委等職。建國後，曾任廣東省省長，國務院副總理等。“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

[4]許立羣（1917～2000），江蘇南京人。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共。建國後歷任中宣部理論宣傳處處長、副部長。一九六四年九月以後主持中宣部常務工作。曾兼任中

央馬克思著作編譯局局長、《紅旗》雜誌副總編輯。文革中被關押八年半之久，後任社科院顧問兼哲學所所長、名譽所長。

[5]李富春（1900～1975），曾任中共中央西滿分局書記兼西滿軍區政委，中共中央東北局副書記，東北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職。建國後任重工業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等職。

[6]黃克誠（1902～1986），紅軍將領，大將。一九三五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西滿軍區司令員，西滿分局書記，中共天津市委書記等。建國後，曾任國防部副部長等職。

[7]一九四六年四月，中共從蘇軍中接收齊齊哈爾市，西滿分局任命劉錫五兼市委書記，王盛榮為副書記（～一九四八年四月）。見《中國共產黨黑龍江省組織史資料 1923～1987》（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

[8]一九四六年四月，駐哈爾濱市蘇軍撤退回國，東北局、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部及所屬機關遷駐哈爾濱，哈爾濱市委由東北局直接領導。為加強市委領導力量，東北局對市委領導人員進行了調整，市委書記前為鐘子雲，後為張平化。見《中國共產黨黑龍江省哈爾濱市組織史資料 1923～1987》（中共哈爾濱市委組織部等編輯發行。1989）。

[9]王盛榮（1907～），曾任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青年部部長，西北青年救國會組織部部長，中共鄂豫邊省副書記中共齊齊哈爾市委書記等職。

[10]張平化（1907～），曾任中共中央西滿分局常委，中共哈爾濱市委書記等職。建國後任武漢市委書記、山西省委書記，中共中央宣傳部長等職。

[11]吳玉章（1878～1966），早年參加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辛亥革命，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七年被派往蘇聯、法國和西歐工作，一九三八年回國後，歷任延安魯迅藝術學院院長、延安大學校長、中共四川省委書記等職。建國後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等職。

[12]一九五三年七月至一九五六年二月，任仲夷任中共哈爾濱市委第二書記，鄭依平任市委常委，宣傳部長。一九五六年二月，經中央批准，任命任仲夷為市委書記，六月，為市委第一書記（～一九六七年四月）。見《中國共產黨黑龍江省組織史資料1923～1987》（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1992）。據董元梓說，有關吳宏毅的問題，是任仲夷代表組織與她談話的。

任仲夷（1914～），河北威縣人。一九三六年加入中共。建國後歷任大連市委書記，市長，旅大市委常委、秘書長，松江省委常委、秘書長，哈爾濱市委第一書記、黑龍江省委書記處書記兼哈爾濱市第一書記。文革後歷任遼寧省委書記，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中共第十一屆、第十二屆中央委員。

肖克（1908～），紅軍將領，上將。歷任紅六軍團軍團長，紅二方面軍副總指揮，八路軍一二零師副師長，第四野戰軍參謀長兼華中軍區參謀長等。建國後，任國防部副部長等職。

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於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六月十一日在延安召開。

邱創成（1912～1982），紅軍將領，中將。曾任延安炮兵學校政委，東北民主聯軍炮兵司令部政委等職。

第六章 燕園^[1]風雨聲

陸平要我到北大

一九六〇年六月，我調到北京大學經濟系當副主任。我哥哥聶真在人民大學是分管幹部的副校長，當時人民大學經常有調幹生，就是從各單位選派一些年輕的有一定文化基礎的人員到學校學習，然後重新安排工作。陸平^[2]是北大的校長，經常跟他要幹部。從聶真那裏知道我要調到北京，陸平就要我到北大去工作。原先說是要我到哲學系去，後來經濟系需要人，我就到經濟系工作。我呢，在中央黨校學習過經濟學，在人民大學學習過哲學，對這兩個專業都有一些瞭解。因此，我到哪裏工作，就看工作需要。我祇是想，我在哈爾濱的工作，早期是好的，後來因為吳宏毅生活作風問題的影響，使我無法安下心來；為了迴避矛盾，我經常在北京學習，就不能把本職工作做得很踏實，很對不起黨。現在，沒有家庭問題影響我了，我要很好地為黨工作，把前些年耽誤了的，儘快補起來，祇要能把黨的工作做好，就是我最大的欣慰。

我的職務是經濟系副主任，陳岱孫^[3]是主任。陳岱孫是黨外人士，我們黨那時候對黨外民主人士是表面尊重，信任不足，不給人家實際工作做，我在系裏做的就多一些，一方面準備兼一些課，一方面做行政管理的工作。我自己雖然不是專門做學術研究的，可是，我對理論一直有興趣，多年做黨的理論宣傳工作，而且多次參加過理論學習，懂得理論的重要性，懂得充分地尊重專家學者。

到經濟系以後，我曾想到每一個教授家裏去走訪一遍，深入地瞭

解情況。系裏教師多，不可能每個家庭都走遍，不過我也去過不少人家。年輕的教師住集體宿舍，我就到宿舍去看他們。如今在經濟理論界特別有名的厲以寧^[4]，當年是被劃成右派的青年教師，我對他同樣也是很關心，一視同仁。那時，他住在海灘街上一個叫老虎洞衚衕的平房，到冬天，生個煤爐子，熱量不足，房間保暖不好，室內還是很冷。我和他坐在火爐子前面談過話。他們夫妻兩地分居，我曾以組織的名義出面，想幫助厲以寧把他遠在吉林工作的妻子調到北京來，使他們夫妻團聚，更好地做好教學工作。我在教授中間做思想工作，因為做得比較深入，得到了他們的理解和信任。總之，我是比較尊重和照顧老教授的。比如說，系主任陳岱孫年紀大一些，為了不讓他多跑路，系裏有一些會議，我們就到他家裏去開。有需要做的工作，需要解決的問題，我經常是先主動和他商量以後再去實行。我告訴陳岱孫，要他放手工作，不要有顧慮，希望他很好地發揮專長。我還深入學生中間，瞭解情況，學生上課，我也到課堂上聽課，隨時聽取學生的意見。這樣瞭解到的第一手情況，就比較紮實，比較可靠。

我還在全校的幹部和教師大會上做過報告。那時候從上到下都是政治學習多，又趕上六十年代初期的經濟困難和黨的各項政策的調整，在思想路線和政治宣傳方面，都有一些新的提法和做法，因此，人們頭腦裏的疑問比較多。學校黨委把學習中反映出來的問題，集中起來，讓我給大家講一次，以解除學習中的困惑。因為我以前學習過經濟理論，做過較長時期的黨的宣傳工作。在北大這樣一個專家教授濟濟一堂的地方，做這樣的報告，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從經濟學的角度，勇敢地提出了我的看法，從實際情況和問題出發，加以理論的說明，我所講的今天看來也未必全是正確的，可當時的反映都很好。那時候我也比較大

膽，我對人民公社就是持否定態度的。我認為人民公社搞早了，沒有經過試點就加以推廣是錯誤的，應該是先搞試點，取得經驗以後再去推廣。我對大躍進也是持否定意見的。我的報告觀點很明確，影響比較大，經濟系的教授都很稱讚我講得好。我的報告做得比較好，和田家英^[5]同志有關係。有些理論上的問題曾向他請教過^[6]，從他那裏受益不少。田家英當時就對左的一套有看法，而且他是主張包產到戶的。我的一些觀點，受到他的啟發。

做過這個報告以後，陸平對我就更重視了。陸平對我一直很好，當初是他把我調來的，對我很關照。還有，他和我大哥聶真確實比較熟悉。不過，以前他祇是以爲我是個“年輕的老革命”，是做實際工作的，沒有想到我還有點理論知識。

到哲學系解難題

一九六三年初春，我被調到哲學系，擔任系黨總支書記。

哲學系前總支書記是王慶淑。王慶淑是個女同志，人是好人，沒有什麼壞心眼，就是做事不踏實，工作不深入，再就是不善于處理不同意見，處事有偏袒。哲學系內部的



與哲學系教師合影

矛盾，由來已久，積重難返。時逢系總支要改選，在改選以前要總結一下工作，因為系總支內部矛盾很多，結果，工作總結一年也沒有做出來，總支也沒有改選，不了了之。

陸平呢，他也不下到基層去，哲學系在三十八樓，陸平住在燕南園，離哲學系不遠，去一趟很容易。要知道，哲學系是全校的重點，陸平本來應該親自做一些工作的。哲學系搞不好，他一年都沒有到哲學系去過，就是不斷地派學校的宣傳部長啊、組織部長啊到系裏去，老是派欽差大臣來。我當時在經濟系，不瞭解那裏的情況，祇知道黨委老是派人到哲學系去，工作還是總結不出來。你陸平校長為什麼不能親自去聽一聽情況呀？難道這不是你當校長、黨委書記的應該抓的根本性的工作嗎？可陸平就是沒有去。最後他祇是根據彙報，採取了折衷的辦法，把王慶淑調走，調我到哲學系去。經濟系不願意放我走，哲學系呢，聽說要調我去，也很歡迎。最後，我當然要執行校黨委決定，到了哲學系。

我調離經濟系的時候，系裏組織了一次游園活動，全系的老師和工作人員一塊兒到頤和園去玩，表示對我的歡送和惜別之情。還在同一個校園裏，祇是從這個系調到那個系，搞這麼大的歡送活動，在學校裏恐怕是很少見的。那天正好下著濛濛細雨，在飄灑的雨絲中，大家的興致都很高，從萬壽山到石舫那邊走了一大圈，我還和系裏的同志們照了很多相。



與經濟系教師合影

回到長廊前的廣場上，又在那裏擺桌子，開會歡送，氣氛很隆重。事先也沒有誰告訴我還要開歡送會，祇是說到頤和園去玩一玩。我當時很感動。

到了哲學系，我馬上就開始工作。我的方針是，對過去的爭論，一概不過問。過去的事情我不清楚，我也不想搞清楚，不管過去誰對誰錯，有多少是非，工作應該怎麼做就怎麼做，眼下的工作不能馬虎，不能帶著情緒去做。就這樣，哲學系的工作很平穩地開展起來了，關係也都協調得很好。我還像在經濟系一樣深入開展工作，對系裏的老教授如鄭昕（系主任）、馮友蘭、任繼愈等都很尊重，希望他們更好地發揮專業水平，同時，關心系裏老師們的切身利益，幫助他們解決具體問題。

離開經濟系的時候，我就被提拔為學校黨委委員了^[7]，經常參加學校的黨委會。到了哲學系，又被選舉為北京市黨代會的代表。這一段時間是我建國以後工作最順手、心情最舒暢的時光。我對北大的工作環境很滿意，對陸平也很感謝。當時，沒有陸平的信任，不可能在哲學系做總支書記。哲學系是全校的一個重點，也是北京市委大學工作部的一個重點，再一點，哲學系的工作系統比較複雜，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可以直接指導，中宣部、教育部也可以直接下指示，交任務，這種情況常會不經過學校一級，一下子就插到哲學系裏來。哲學系有一些人也是“通天”人物，他們和中宣部、教育部的領導都有交往。這樣，有時陸平知道，有時陸平也不是能及時知道，上面的指示就下到系裏了。所以，很多的頭緒，都落到系裏。情況如此複雜，陸平要想掌握住哲學系，當然要派他手下的得力幹部才行。

我和陸平的關係一向是很好的。是他把我調到北大的，而且一直

受到重視和提拔，從系裏的副主任提拔為系總支書記和學校黨委委員。顯而易見，我祇要繼續跟著他走，向他靠得緊一點兒，自然有很多優勢；我的資歷，我的經驗，我容易接近羣衆，以及我認真工作的態度和責任心，我對黨的事業的忠誠，都是非常有利的條件。受到重用，能夠發揮自己的才能，我當然很高興。當時，“華幹”的戰友，陳沂^[8]的夫人馬楠到北大八公寓來看我，我對她講，我對當下的各方面都很滿意，日子比在哈爾濱好得多。在學校，陸平很重用我，安排我在全校做報告，讓我做市黨代會的代表。按照當時人們的理解，黨代會代表比人代會代表更重要。我的住房，陸平也給我安排得很好，是新建的三居室。我身邊的兩個孩子，一個在101中學讀書，一個在北大附中讀書，這都是很好的學校。工作很順手、生活很順心，我還求什麼呢？

本來我到北大工作，就決心努力把工作做好，彌補在哈爾濱市委，因爲個人生活問題影響沒有做好工作的內疚，所以決心在北大做出成績。當時，我做好系裏的工作，還有精力，有時就思考學校的一些情況和問題。這時我在北大工作已經有三四年了，對全校的工作情況也有些瞭解和感受，如何把學校的工作能做得更好，看出了一些問題，想對陸平說說，但又覺得不好講，而且他也很忙，沒有機會。

對北大工作的看法和意見

在經濟系和哲學系兩個系工作一段時間之後，我對學校黨委的工作有了一些看法。本來想找陸平談一談，但我找不到適當機會。我的主要意見就是覺得他有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這兩條，我覺得不祇是北

大校黨委存在，因為哲學系和上層的聯繫多，對有關部門，我也有了一些瞭解，這些部門也都存在這些問題。我認為全黨都存在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北大有北大表現出來的形式和內容，各地有各地存在的形式和內容。我認為，如果不把這兩個東西整掉的話，我們黨會變質的。當時，黨內已經在大講路線鬥爭，大講反修防修，講警惕赫魯曉夫式的和平演變。這些提法，就和我在學校做具體工作的感受聯繫起來，我以為這就是黨內存在的主要危險，是產生修正主義的基本條件。

就拿陸平來說，我認為他的官僚主義就是不深入羣衆，不夠瞭解基層的具體情況，下達指示不能很好地針對實際解決問題。黨中央有什麼指示，中宣部有什麼指示，北京市委有什麼指示，他都是召集各個系的黨總支書記和系主任一起開個會，在會上講一講，就完事了。至于採取什麼具體措施，怎麼執行，怎麼落實，他就夠關心了，事後也很少聽彙報，不能深入研究，很少到實際工作中去解決問題。

再比如說，哲學系的問題，他祇是把王慶淑調走，把我調去，對改選黨總支爭論一年的問題，採取不了了之的態度。派我到哲學系去工作，當然是對我的信任和器重，可是，陸平在和我談話的時候，並沒有向我介紹哲學系的總結工作為什麼吵了一年還總結不出來，系裏到底存在什麼問題，應當怎樣正確對待這些爭論等等，他都沒有作出具體的指示，也沒有交代我應該注意些什麼，讓我的心裏沒有一點底，不知道該從何著手。

我認為他的宗派主義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黨內，一個方面是黨外。在黨內，是核心裏面有核心，圈子裏面有圈子。在北大，黨委會是領導核心，在黨委會中，常委會又是一個核心，是核心中的

核心。常委會應該是領導黨委會的，這是正常的組織關係；可是，在常委會裏，還有一個小核心。陸平自己是從鐵道部調來的，組成小核心的這些人就是他從鐵道部帶來的，他們是陸平的親信。這樣，在黨委核心裏還有宗派核心，圈裏面有圈。這使工作產生矛盾，人們心情不舒暢。中央組織部派戈華到學校去做黨委副書記、副校長，是準備將來接陸平的班^[9]。可是，有一些事情，陸平不和戈華商量，結果呢，有的事情戈華還不知道，就已經在下面貫徹執行開了。戈華作為副書記副校長，時間一長，當然就有想法了……這種情況對學校工作是不利的。陸平對黨外人士也有宗派主義，例如，擔任副校長的周培源本來是黨外人士，後來入了黨，而且成為學校黨委常委，可是，他在常委會上發言得不到尊重和信任，沒有實權，使他感到陸平還把他當黨外人士看。常委會內部就有這麼多問題。陸平對各系的黨外人士和教授也是尊重和信任不足，一般情況，系主任都是黨外人士，各系實權在黨總支書記手中，黨外人士的作用不能很好發揮，在全校似乎形成一種風氣。

我覺得，要改變北大存在的那些問題，才能把北大辦得更好，但這不是撤換一個校長或黨委書記就能解決的。我認為這在我們黨內和政府機關中也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現象，需要一個革命性的改變。當時，我就是這樣的想法。因為有過哈爾濱那一段，受吳宏毅影響工作做不出成績的一段經歷，在北大，我就特別珍惜這樣的工作機會和工作環境。我真是希望陸平能有所改變，能把工作做得更好。

有時我想找陸平說一說，總是看到他很忙，一直沒有適當機會。我對於他的意見，都是從學校的工作出發，沒有什麼個人恩怨。我有些想法和意見，不是要反對陸平，是想把學校的工作做得更好。前面說過了，陸平對我其實是很好的，在工作和生活上都給予了很多幫助。

“文革”結束以後，有一些所謂的紀實文學作品，說陸平在學校重用的是“五朵金花”（五個能幹的女幹部），而沒有提拔我，所以我對陸平心懷怨恨，並說這是我帶頭寫大字報反陸平的淵源。這完全是無稽之談。我對學校工作意見與我個人的處境沒有什麼關係；相反地，如果從個人利益出發，我祇要緊跟陸平就是了。祇要緊跟陸平，肯定繼續受提拔受重用，而且，他對聶真已經表示過這個意思。

陷入社教運動的漩渦

一九六四年七月，中宣部副部長張磐石到北大來了。他帶著一個工作組，到北大來蹲點。^[10]為什麼來蹲點，我不清楚，上級到下級單位調查瞭解工作情況，是常有的事。他們一個系一個系地找總支書記談話，說是“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當時也找我，動員我給陸平和北大校黨委的工作提意見。

我當時心裏很矛盾。我對學校和陸平的工作確實有些看法和意見，而且我認為這些意見對搞好學校工作還很重要。對陸平的意見，要不要對工作組講呢？工作組的人到家裏來找我，動員我反映學校的問題。看他們態度很誠懇，我就想，把我對學校和陸平的意見講出來吧，這是黨中央派來的人嘛。我對陸平工作有意見，完全是以搞好學校工作為出發點，並沒有什麼個人恩怨或是反對陸平的意思。我對陸平的意見，應該對他本人講，可是，我沒有合適的機會。前面說過，我感覺陸平的官僚主義很嚴重，能够直接給他提意見的場合很難碰到。現在是中宣部副部長帶工作組來徵求對陸平的意見，顯然，他們是來幫

助校黨委和陸平克服缺點的，也是從爲了更好地搞好學校工作的目的出發的。他們當然比我的水平高、能力強，如果把我對陸平的意見講了，他們找陸平談一談，也許他就能聽進去改進工作了。這樣，我就把我對陸平的意見講出來了。除了上面提到的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兩條，我也講了一些“左”的意見：我感覺當時北大資產階級氣味比較濃厚，不講階級鬥爭，因此應該加強無產階級思想教育。我舉的例子就是，中文系講《紅樓夢》，不是批判地講，而是順著作品講，結果講完課，學生們學林黛玉，學賈寶玉，對這些封建時代的人物很欣賞。再一點是講陸平用的幹部多是從學校裏出來的，從學校到學校，沒有實際革命工作的鍛鍊，應該調進一些從實際工作中鍛鍊出來的幹部，改變學校這種學校門到學校門的幹部構成情況。當時這麼一講，張磬石就覺得我講得很好。的確，對於北大，我是一個外來人，剛剛在這裏工作了幾年，很容易用我以前做羣衆工作和機關工作的經驗同北大的現狀對比，容易體會出差距所在。張磬石在他們工作組的會議上稱讚我，稱讚我的話他並沒有當面對我講，都是工作組的人後來一點一點透露出來的。

張磬石把他到北大在教學科研、政治思想工作等方面瞭解的情況寫成報告，經中宣部部長會議彙報給中央書記處，聽說在報告中他還引用了我的談話，作爲重要論據。說實在的，無論當時，還是後來，我對陸平的意見，就是上面兩條：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並沒有給他上升到什麼“資產階級”、“走資派”、“修正主義”的高度。據我所知，北大的教師和幹部給陸平和校黨委提意見，也僅僅是就事論事，都是講工作中具體的人和事，沒有上綱上線。但是，張磬石把問題看得非常嚴重。在他看來，陸平和北大校黨委已經演變了，已經

是姓“資”不姓“無”了。在張磐石和工作隊的引導下，我們逐漸接受了一些論點，開始用“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理論來認識北大問題了。

中宣部的這份報告引起了中央書記處對北大工作的重視。這樣，經過總書記鄧小平的批准，就在北大搞社教運動的試點，組織工作隊進駐北大，工作隊成員都是由各省市市委的宣傳部部長、教育廳廳長、重點大學的校長、黨委書記組成的，這是一支空前的高等級高水準的工作隊。這是為了從北大取得社教運動經驗，然後向全國各高校推廣。一九六四年十一月，這樣一支龐大的工作隊開進北大，真是轟轟烈烈，來勢兇猛。^[11]

工作隊進學校以後，在各系都派了人，大規模地發動黨內羣衆，給陸平和校黨委提意見。哲學系是一個重點，張磐石親自抓。哲學系成為社教運動的重點，不是因為我在哲學系工作，也不是因為我向張磐石反映了些意見，而是牽涉到前一任黨總支書記王慶淑在任時系裏的矛盾分歧長期未能解決。在社教運動中，哲學系有擁護陸平和校黨委的，也有對陸平等持批評態度的，仍然是以過去遺留下來的問題和分歧為重點。前任黨總支書記是深受陸平信任的，在我接替她的職務以後，陸平還因人設事，專門為她設立了一個文藝教研室，任命她當了空頭教研室主任，和各個系同一級別（這是王慶淑親自對我講的，後來，據《北京大學紀事》，宣佈的是校黨委宣傳部副部長）。但是，這位黨總支書記在工作上有缺點，團結羣衆欠佳，使哲學系形成了擁護她和反對她的兩派，而她又受到陸平的大力支持。因此，對這位系黨總支書記有意見的人，自然而然地會對支持她的陸平有意見有看法，而且這種矛盾由來已久，積怨很深。加之又經工作隊的進一步動員，對陸平和校黨委工作的意見就更加激烈了。

工作隊把黨員教師和幹部找來開會。一開會，兩派意見就都提出來了。翻出了前一任黨總支改選問題的舊賬，自然就涉及到陸平的用人原則問題。批評陸平的人言辭很激烈，把氣氛搞得很緊張。張磐石把陸平找來參加會議，要他來聽取羣衆意見。陸平一聽就受不了了，頭上直冒汗，手直哆嗦。陸平很難受，我心裏也覺得不舒服。北大社教運動，先從哲學系入手，本想善意地請陸平聽取意見，希望他改進工作，希望和風細雨式的批評，希望批評者和被批評者都能心情愉快地改進工作。開會以前，也沒有指出要對陸平怎麼樣怎麼樣，就是讓他去聽會，聽聽哲學系兩派的分歧意見。事情搞起來了，搞成運動了，和我原先想像的不一樣，火藥味很濃，好像是鬥陸平一樣。後來，哲學系開會沒有再請陸平參加。

這樣，我的心情就陷入了矛盾狀態。一方面覺得對陸平及校系工作提的批評意見是對的，主要認為是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會上說了一些具體例子，更證明我的看法是對的，另一方面，我總覺得我的原意對陸平不是這麼搞法，心情是又愉快又不愉快，處於一種不明確的矛盾狀態，因為搞社教運動是黨中央書記處決定的。

後來，會議接連開了幾天，我前面一直沒有表態，參加會議的人，都不知道我的傾向到底是什麼。但我感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張磐石叫我主持會議，我不能不服從，但我不能表態，否則就介入哲學系的兩派之爭了。我也不應該急于表態：我在哲學系負責黨的工作，要是我先開了口，定了調子，那別的同志，持不同意見的同志，就不好說話了。會議開到最後，我不得不表態的時候，才表明了自己對於陸平的批評態度。但是，我並沒有把我的看法全都在會上講出來。一些涉及到北大校黨委內部矛盾的情況，我不會在普通黨員面前講，以免把

問題擴散，使局面更加複雜。我祇是在跟張磬石和工作隊成員小範圍談話的時候，才暢所欲言，講出對於陸平和校黨委工作的看法。

在工作隊的領導和動員下全校運動轟轟烈烈地展開了，各系的積極份子向校系的領導工作展開了揭發批判，據說校工作隊黨委也與校黨委聯合開會，動員校黨委成員揭發批判陸平，有的常委對陸平批評意見上綱上線，揭發了許多問題，會議開得相當激烈。

後來傳達了《二十三條》^[12]精神和聽了彭真^[13]對二十三條的講話錄音，對社教運動應注意的政策，以及聽說有黨中央領導人講了，“陸平是好同志犯了錯誤”，使人感到好像運動搞錯了一樣，好像出了什麼問題。聽說在校黨委常委會上給陸平提意見的常委也反悔了，被動員起來向校系領導提意見的積極份子思想開始有點緊張。

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北京市委召開第一次國際飯店會議。各系主要領導幹部參加了會議，萬里作了報告。會議精神主要強調了批評要從團結願望出發，對犯錯誤的幹部要說服教育，不要無情打擊，殘酷鬥爭。雖沒有對工作隊提出尖銳批評，但會議精神和氣氛大有扭轉和停止運動的狀態，積極份子的心情有點緊張。

會議開過之後，學習二十三條，領會精神，運動基本上已停止，有不再繼續下去的感覺。

一九六五年春夏之交，情況出現了急劇變化，彭真知道了這些事情，六月下旬（時間記得不是很確切了），彭真在人民大會堂小禮堂向北大工作隊及北大黨員幹部作報告，講了八個問題，主要精神是（內容已記不太清楚了），北大運動搞得很亂，亂而後治，對張磬石的錯誤開始領導也有責任，但二十三條後不負責^[14]。張磬石把北大總是看得過于嚴重，是爛掉的單位。要把北大的主要問題，即大是大非問題解決好。

個問題時，我記得十分清楚的一句話，彭真說：“有的人說，不應該批判社教運動的積極份子，打擊都打擊得，為什麼批不得？”

此外，彭真還講社教運動要落實到教學上，把校系領導班子要健全起來，重在表現不看出身等等。

這個會開過後，被動員起來給校系領導工作提意見的人，感到殺氣騰騰。回想起四月二十八日，工作隊員以放暑假的名義離開北大時，找他們動員起來提意見的積極份子談話，也找了我，說：我們要走了，要整你們了，你們要有思想準備。當時還不太理解，這時真的驗證了。

積極份子們還問：工作隊為什麼要走呢？鄧小平總書記對運動的三點指示，不是剛講過嗎？他們說：彭真講話了，彭真要我們走。

國際飯店裏的“整風學習”

幾天以後，在國際飯店開北大黨員幹部會議，名義叫“總結前一階段的學校工作”。實際上，這個會議就是要整社教運動的積極份子，整我們這些給校黨委、給陸平工作提意見的人。當時的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鄧拓還說，“要刺刀見紅”，可見當時的空氣多麼緊張了。

會議期間，把我和大家隔離開了，住在一個單獨的房間。別的系也是這樣，曾經給陸平提過意見的人，都在持不同意見的人陪他們住着。我是一個人住在樓道一頭角落上的房間裏。有兩個工作人員住在我隔壁的一個辦公室，我要去找別人，或者別人來找我，都必須經過他們的門口，都要受到監視。結果，我也不找人，也沒有人來找我。我給陸平提意見，就是代表我自己，就是我自己的獨立思考，我沒有

和別人串連過，沒有和別人商量過，現在也沒有必要找別人。其他向校系領導工作提意見的人，由反對向校系領導提意見的人來陪住。吃過晚飯，到大街上走一走，背後還有人跟著，連最起碼的自由都沒有了。走在外邊，看到別的同志身後也跟著人，就知道他也被監視了，和我的處境一樣。你說是同聲相應也好，同病相憐也好，這樣一弄，反把我們這些被整的人給逼到一起了。

第一次國際飯店會議萬里講話的精神，我是擁護的，可是在這次（第二次）國際飯店會議就完全背離從團結的願望出發，而是殘酷打擊對工作提意見的人，聽說要把幾個主要提意見的人打成反黨小集團，以我為首。主持會議的是接任張磬石當北大工作隊隊長的許立羣。會議安排在國際飯店，因為國際飯店離北京市委很近，便於他們掌握會議情況。彭真在小樓裏指揮，市委書記劉仁等人都到會了。結果呢，會議開得時間越長，就越是形成了不同意見，今天這邊發表一通，明天那邊發表一通，兩邊各有各的道理，誰也不認為自己有錯。講的內容有實際事例，又有理論觀點，比如張恩慈、郭羅基、孔繁、孫蓬一等人。他們的發言是無懈可擊的。由於對提意見的人採取這種鬥爭的態度，使原來持中立態度的人，如趙正義等人也站在了向陸平等校系領導提意見人的一邊了。說來說去，暑假都過去了，連招生工作都受到了影響，北大那一年招生人數都減少了。

到了十月份，經過考慮，我就給毛主席、劉主席寫了一封信，是讓田家英轉的。我信上說，北大進行社教運動^[15]是中央的決定，羣衆提意見是經過工作隊動員的；羣衆提意見，或對或錯，都是難免的，都不應該受到追究，不應該挨整。這些都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小幹部，不要再整了。來學校工作隊的成員都是大學校長、省委宣傳部長、省教育廳長，

他們在北大搞社教，說來就來，說走就走，他們都沒有事，抓住我們這些小蘿蔔頭不放幹什麼？我寫這封信和田家英商量過，得到他的贊同。可是，信交上去以後，沒有任何反響。

那時候我真是傻。我給毛主席劉主席寫信，又怕中央把信轉到北京市委，再被彭真他們說成我越級上告，給我增加罪名，我就把這封信抄寫了一份，親自送到北京市委的收發室，要求交給彭真、劉仁，以免留下什麼把柄。其實，大人物要整小人物，還講什麼把柄不把柄，我後來的遭遇更深刻地體現了這一點。不過，當時的我就是這樣單純。我的這兩封信送上去以後，沒有任何回音。這真讓我失望。

國際飯店會議不是正確的解決北大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和分歧的意見，而是整提意見的人，因此，從那以後，學校的矛盾就加深了，也公開化了，我和陸平的關係也轉變了。擁護陸平的和反對陸平的分成兩派，對立很嚴重，誰也壓不服誰。陸平他們有北京市委支持，另一邊呢，覺得自己有充足的理由。

兩邊正鬥爭得不可開交，國際飯店會議就停下來了，當時是一九六六年，這也許與上邊黨的形勢有關。校黨委決定北大的幹部、教師和學生也組成工作隊，到農村去參加社教運動。社教工作隊的負責人都是沒有給陸平提意見的人，我們這些批評陸平的人放到社教工作隊，都是準備放下去就不收回來的，就是說是學校不要我們了。放下去，到農村就永不調回來了。據說“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有不去參加農村四清的人，四處活動，紛紛要求調離北大工作，如張恩慈到中央理論小組了，楊克明到中國科學院去了。我被分配到懷柔縣去搞“四清”^[16]。我到懷柔，和領導我的四清小組見了面，談了工作，本來是說回學校準備帶上衣被就下去，沒有料想到，從懷柔回北京的路上，在火車上感冒

了，因為治病休息，就沒有及時回到懷柔，沒想到不久就傳達黨中央的“五一六通知”，接著就發生了寫“大字報”事件。這是後話。

註釋：

[1]燕園，現北京大學所在地。建國前曾為燕京大學校址。

[2]陸平（1914～2002），曾用名盧荻。吉林長春人。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共。一九三七年北京大學畢業。一九三八年後歷任晉察分局青委書記，冀察軍區政治部主任，華北野戰軍三縱政治部主任等職。建國後歷任團中央常委，鐵道部政治部主任，哈爾濱鐵路局黨委書記兼局長，鐵道部副部長。一九五七年十月國務院任命其為北京大學副校長，其後北京市委討論決定其任校黨委第一書記。一九六〇年三月國務院會議決定接受馬寅初校長辭職，同時任命陸平為校長。“文革”結束後，任國務院七機部副部長，全國政協副秘書長。

[3]陳岱孫（1900～），著名經濟學家、教授。先後任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西南聯大商學系主任、北京大學經濟系主任等，著有《從古典經濟學派到馬克思——若干主要學說發展論略》、《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和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現代化》等。

[4]厲以寧（1930～），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教授，以首倡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而著稱，著有《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經濟改革的思路》等。

[5]田家英（1922～1966），原名曾正昌。一九四八年起任毛澤東秘書十八年，是《毛澤東選集》（第1-4卷）編委會成員和《毛澤東詩詞37首》的主要編輯者。曾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等職。

[6]據聶元梓說，田家英與其二姐聶元素比較熟，聶元梓是由其二姐帶至田家英處的。

[7]據《北京大學紀事》，聶元梓於一九六三年二月三日在北大第五次黨代會上當選為北大第五屆黨委委員。見《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上冊（北京：北京大

學出版社，1998），頁5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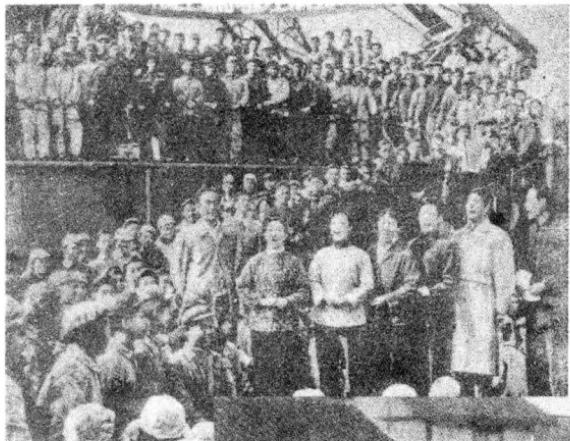
[8]陳沂（1912~2002），貴州遵義人。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共。一九三七年參加八路軍。建國後曾任總政治部文化部部長，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將軍銜。一九五七年反右被劃為右派下放北大荒勞動。“文革”結束後任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等職。

[9]據《北京大學紀事》，一九六三年三月，戈華到北大任校黨委副書記、副校長，後明確為校黨委第一副書記。

[10]據《北京大學紀事》，一九六四年七月二日，以張磬石為組長的中宣部調查組十人進入北大進行調查研究。張磬石（1905~2000），山西壽陽人。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共。建國後歷任華北局宣傳部部長、副書記，中宣部副部長。文革中受到衝擊。“文革”結束後任林業部黨組成員、副部長（正部級待遇）。

[11]北大社教的試點工作由五人小組及其領導下的工作隊領導。五人小組的成員是：張磬石、劉仰嶠（高教部副部長）、徐子榮（公安部副部長，後由侯西斌處長參加）、黃達（中宣部教育處副處長）、宋碩（中共北京市委大學部副部長）。張磬石任社教工作隊隊長。工作隊成員包括從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宣傳、文教部門及高等學校抽調的幹部共二百五十餘人。一九六五年三月，五人小組擴大為八人小組，增加校黨委書記陸平和副書記戈華、彭珮雲。四月，中宣部部長陸定一代表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宣佈：撤銷張磬石北大工作隊隊長職務，由中宣部副部長許立羣任北大工作隊隊長，八人小組改為九人小組，增加常溪萍為小組成員（常原為工作隊黨委副書記），許立羣為九人小組組長。北大社教運動試點工作持續到一九六五年七月，其大致過程可參見《北京大學紀事》一書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五年部分。

[12]《二十三條》是一九六五年一月毛澤東主持製定的中共中央文件，因該文列了二十三個條目而得名，全稱《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在社教運動中，毛澤東與劉少奇等在矛盾分析、鬥爭對象等方面發生分歧，先後發出指導運動進行的兩個“十條”，最終由毛澤東親自出面，製定“二十三條”，為運動定下



左圖：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上海的電影工作者下廠慰問演出



中圖：上海郊區農村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召開的說理鬥爭大會的一個場面

右圖：一九六四年一月，上海市郊的泗聯公社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召開的說理鬥爭大會



調子。《二十三條》第一次提出了“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概念，它也是毛澤東劉少奇二人矛盾激化、毛澤東決心打倒劉少奇的關節點。

[13]彭真（1902~1997），原名傳懋。建國後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第一書記，北京市市長等職務。“文化大革命”初期被作為“彭羅陸楊反黨集團”成員遭到錯誤批判迫害，平反後在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被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一九八〇年被選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等。

六〇年代，中國社會科學院還沒有從中國科學院分出來，在中科院下面設立有哲學社會科學部。

[14]彭真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等要職，因為違背毛澤東的旨意，抵制對於吳晗等人的大批判而獲咎，被定為“彭（彭真）羅（羅瑞卿）陸（陸定一）楊（楊尚昆）反黨集團”的首要成員，於一九六六年五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遭到批判和清洗。

[15]“社教運動”，全稱“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四清”運動。中共中央一九六三年起首先在部分農村和少數城市基層開展，以便取得經驗以後，推向全國。這是一次清政治、清組織、清經濟、清思想的政治運動。成為後來的“文化大革命”的先聲。

[16]關於北京大學四清運動的過程，請參看王學珍等編《北京大學紀事》一書中的相關記載。

《北京大學紀事》下卷，第631~632頁。

第七章 小家庭驟起大波瀾

與老紅軍吳溉之結婚

一九六五年的深秋，我和老紅軍幹部吳溉之結了婚。^[1]

我和吳溉之是通過唐天際認識的。^[2]抗日戰爭初期，我在太行山工作的時候，就認識唐天際，他是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戰士，擔任過晉豫邊區的司令員。他的愛人耿希賢，是我在華北抗日軍政幹部學校的同學，年齡比我大一些，我們關係很好。到北京工作以後，孩子們都大了，我又是單身，所以經常到一些老同志、老熟人家裏去看望他們。一九六五年春夏，我到唐天際夫婦家裏去玩，認識了吳溉之。吳溉之也是一位老紅軍，革命經歷非常豐富，他一九二四年入黨，黃埔軍校第四期畢業，參加過北伐戰爭、上海工人武裝起義、南昌起義以及平江起義，擔任過平江游擊總隊黨代表、縣蘇維埃主席等職務。我認識他的時候，他是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委。他的妻子去世了，當時也是單身。

吳溉之認識我以後，就一直保持了聯繫，我們來往得比較多。當時，吳溉之已經六十七歲了，他是一八九八年出生，比我大二十多歲。我所以和他結婚，是因為他是參加過長征的老幹部，人很老實，和他在一起，我覺得能有一些依靠。更重要的是，給孩子們找一個父親，給我在政治上找一個可以指點指點的人。我對吳溉之很尊重，沒有想到，和他結婚以後，我卻被捲入另一樁麻煩裏面。

這個女人不尋常

當時，中央組織部的部長安子文，^[3]海軍司令員蕭勁光，^[4]經常到吳溉之家裏去，有時候在一起聊天，有時候幾個人打打麻將。那時候打麻將，也不贏錢，就是爭個勝負。

安子文來打麻將，經常帶個女的，叫鄧覺先，她妹妹叫鄧覺慧，也是常來常往。鄧覺慧三十多歲，已經結婚，有一個孩子。吳溉之喪偶以後，兩姐妹常到吳溉之家裏玩，鄧覺慧曾經表示願意與吳溉之結婚，吳溉之沒有同意。我和吳溉之結婚以後，和鄧覺先來往也熟了，我們談起她妹妹曾要求與吳溉之結婚的事，我問她，鄧覺慧不是已經結婚，並且生了孩子嗎，為什麼還要和吳溉之結婚呢？鄧覺先說，她可以離婚嘛。我說，那孩子怎麼辦？鄧覺先說，都管著唄。當時我對鄧覺慧很不理解，她自己的丈夫很年輕，夫妻兩人又沒有什麼不合的大事，為什麼要離婚呢？而且，她向吳溉之要求結婚的時候，並沒有離婚。吳溉之拒絕鄧覺慧以後，鄧覺慧到吳溉之那裏就去的少了，鄧覺先還是經常去。那時候，我不太會打麻將，主要是他們幾個玩，有時候三缺一，我也就湊個數，實際上，我是不喜歡打麻將的。那時候我還年輕，有時間總想學習學習，另外，我還要到北大去上班，每天風塵僕僕，經常不在家。但是，不管我在家還是不在家，安子文都經常帶鄧覺先來打牌。鄧覺先的丈夫叫張仲瀚，^[5]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擔任領導工作，後來我們也認識了，人也很好。

交往多了以後，我發現安子文和鄧覺先的關係很曖昧，而且在人前也不避諱。比如說，安子文身為中央組織部領導，人却經常在鄧覺先

家裏，中央組織部派人找安子文，要是到吳溉之家裏找不著，就到鄧覺先家裏找，一找準能找到。安子文要出差，都是從鄧覺先那裏走，他出差回來，也先到鄧覺先那裏去。安子文出差在外，他什麼時候回來，鄧覺先都知道。要瞭解安子文的事，或者想知道點什麼消息，就找鄧覺先，問鄧覺先，準能知道。有時候，鄧覺先居然代替安子文處理工作，安子文分管黨的組織工作，管幹部，是黨的要害部門，有時一些老同志找他談工作，因為安子文不好找，就先找鄧覺先，然後才能見到安子文。安子文的有關意見，有時也是通過鄧覺先傳達。這完全不符合黨的工作原則呀！

其他的人我不多說，吳溉之自己，愛人去世以後，有一段時間一個人生活，孤單得很，他想把在外地上學的孫子調到北京，調到身邊來，但戶口等問題不好解決，要安子文幫忙。他和安子文那麼熟悉，三天兩頭就湊在一起，兩個人的辦公室也挨得近，可是吳溉之自己不對安子文講，却先和鄧覺先講，鄧覺先再和安子文說，才給他辦了這件事情。

這樣的情況一再地發生，我就覺得不對勁了。吳溉之這個人不關心這些事情，即使當著他的面發生什麼，他也不放在心裏。或許是他和安子文相識多年，對他的事見怪不怪，我卻覺得不可思議。你安子文是黨的中央組織部領導，有什麼事情應該是交給中央組織部的人去做，為什麼一而再、再而三地讓鄧覺先去做？鄧家姐妹也不是黨員，這麼重要的黨的幹部工作，怎麼可以讓這些人來插手？鄧覺先年齡不算小，自稱五十歲了，經常打扮得很漂亮，抹著紅嘴唇，穿的也很時髦，這在當時都是讓人反感的。黨的工作怎麼能讓這樣的人來做？

我和他們漸漸熟悉以後，安子文和鄧覺先的曖昧關係就不在乎我了。我眼中的怪事就更多了。有一天，幾個人約好上鄧覺先家裏打牌，吳溉

之一時去不了，要四點鐘才能到，吳溉之就讓我先去。安子文和他的夫人劉某某，鄧覺先，加上我，正好一桌。我們四個人就坐一輛車子去了，我坐在前面，他們坐在後面，三個人在車上嘀咕家裏的什麼事情，開始我沒有太注意他們說什麼，後來就聽到劉某某發脾氣了，她說：“這個家我管不了，你讓鄧覺先管吧！”沒有想到安子文竟然回答說，鄧覺先你就管吧。看來，安子文和鄧覺先的關係，劉某某是完全明白的。

還有一次，鄧覺先對我講，我還沒有和吳溉之結婚之前，她和鄧覺慧經常到吳溉之家裏來。我和吳溉之戀愛、結婚之後，有時也難免會問他，以前有沒有接觸過別的女人，和什麼樣的女人來往，一家人嘛，總要談談家常。吳溉之說，她們姐妹二人過去經常來，一來，一定在這裏吃中午飯。有一天吃過中午飯，要睡午覺，鄧覺先就跟吳溉之說，是讓她跟吳溉之睡，還是讓她妹妹跟他睡？吳溉之說，我一個都不要，讓她們倆到另一個房間去睡。這是開玩笑還是的確不正常？至于實際情況，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管，那都是我們兩人認識以前的事情，我不操那份心。我也問過吳溉之，你為什麼不和鄧覺慧結婚呢？吳溉之說，第一她不是黨員，我有些文件必須保管好，第二她太年輕，第三她已經結婚了，還有孩子。所以他不同意。

鄧覺先還跟我講，她現在住的院子（在中央組織部斜對面），既寬敞又漂亮，是安子文給她安排的。從前的房子，則是另一位領導給她找的。這位領導後來下去了，他下去以前，常找她去跳舞，那人是個舞迷，跳到深夜都不回家。鄧覺先說，“那時跳舞跳得很厲害，找我的人比現在更多。我住的那條衚衕，來我家的小車都得排長隊。”據說，鄧覺先搬家的一個原因是，那個院子衚衕小，有時候她家客人太多，車子都擋不下，一直要停到大街上，還要民警來安排指揮。

隨著瞭解加深，我對鄧覺先產生了懷疑。她自己在測繪局工作，管管資料，上下班都很自由，生活條件很優越。她有什麼必要這麼繁忙地在這些黨政要員的圈子裏活動，與這麼多黨的高級幹部周旋？而且，她和安子文的關係搞到這種地步，幾近於公開？

這段時間，有一位給首長開車的司機（名字我記不清了），也和我講了很多關於鄧覺先的事。他說，他經常開車拉著她跑來跑去，她與什麼人交往，和什麼人有密切關係，和什麼人好，都瞞不過我們司機。再說，中央幹部的司機們也相互認識，直接間接地就知道了很多事情。這位司機對我說，這兩個女人可壞了，特別是那個姐姐，淨挑撥老幹部鬧離婚，某某就受過她的挑撥。還有，前幾年，一位領導常常和鄧覺先跳舞，從來不帶自己的夫人，那房子也是那位領導給她找的。這位領導下去了，她又抓住安子文了。這些事情我弄不清楚，也不敢跟別人說，我就跟吳溉之說，要他提醒一下安子文。吳溉之說，現在說這些已經晚了，說了也不管用了。我就說，你和安子文這麼熟，你為什麼不早提醒他？吳溉之說，都是好朋友，這些事情，開始是不好意思說，等到後來，木已成舟，就是說也沒有用了。

這時已是一九六六年春天。不久中央召開會議，揭發批判彭真。這件事情，在正式向下面傳達以前，我也是先從鄧覺先那裏聽說的。她還能說出中央會議上的具體情況，誰誰怎麼發言了等等。她說，對於彭真等人的揭發材料，都是安子文直接掌握的。鄧覺先顯然是從安子文那裏得到了資訊，這就更增加了我的憂慮：黨的機密都讓鄧覺先這樣身份的人得到了，這怎麼得了？

還有一次，也是三四月間，有一天，鄧覺先打電話來，邀我和吳溉之到她那裏去打牌，她說已經約好了安子文。我們正要出門，吳溉之的

單位打電話來，說中監委要開會。於是，我們就打電話給鄧覺先，說去不到了。可隨後又接到通知，說會議改期了。我和吳溉之就坐車到鄧覺先家裏去，沒有再通知他們。因為是老熟人，到了鄧家，直接就進去了。我們在客廳裏等候，就看見安子文、張仲瀚和鄧覺先三個人在裏面的房間裏，對什麼東西又捂又蓋的，神情很是緊張，還有些鬼鬼祟祟的。他們是不是在一起掩藏什麼東西？這就更加重了我的懷疑。

我心裏的疑團越來越重，但是，到底是怎麼回事，我還是弄不明白。

幫忙幫忙，越幫越忙

我自己百思不得其解，就想找人幫我分析一下情況。沒有想到，幫忙幫忙，越幫越忙。

有一天，我去找楊惠文，想聽聽她對這件事情的意見，她丈夫白介夫（當時擔任中國科學院化學研究所的副所長）也在場。^[6]

這麼重大的事情，為什麼我會找楊惠文商量呢？我和楊惠文在一九三七年就認識了。是華北抗日軍政幹部學校第二期的同學，此後，在工作中經常在一起，二三十年的戰鬥友誼，相知甚深。一九六〇年；我調到北大，她也調到中科院，就住在中關村，離北大近得很，還被派到北大來搞社教運動。我調到北大以後，常常到她家去，隔不了兩三天就去一次，幾乎是天天都見面。她比我年齡大，拿我當小妹妹，我也愛聽她的話，我們是無話不說的好朋友，親密得很。因為很信任她，就想讓她幫我參謀參謀，結果，白介夫也進屋來聽，一聽就不走了，事情的前前後後他都聽到了。楊惠文和白介夫都說，這姐妹倆準有問題，肯定是特

務，你要趕快揭發她們。楊惠文還說，叫你不要跟吳溉之結婚，你不聽，你跟他結婚，結出問題來了吧？你趕緊離婚吧，不然，連你也捲進去了。楊惠文的話我總是言聽計從，她說什麼，我就聽什麼。我說行，就照你說的辦，該揭發揭發，該離婚離婚，不能把自己也陷進去啊。

雖然對楊惠文夫婦講了這些話，我心裏還是有矛盾。是不是安子文上當受騙了？我曾經跟吳溉之講，要他勸一勸安子文，跟鄧覺先不要太密切。我當時覺得安子文可能是這樣一種情況：從本質上講，一個參加革命多年的老黨員，又處在相當高的地位，安子文是決不會跟著她跑，決不會參加她的那一夥特務活動的；假如鄧覺先是一個壞人的話，安子文就是受她欺騙。當時，我正被陸平趕到鄉下去搞社教，陸平是不準備把我們這些人再收回北大了。我和吳溉之商量，想調離北大，換一個工作單位，想叫安子文幫忙，要是揭發安子文，我還能再見他嗎？再一個，我要是揭發了安子文，我和吳溉之的關係還怎麼維持？離婚不離婚？這也是切身利害啊。吳溉之是個老好人，他並不看重安子文這件事，認為是一般的男女關係。我要是揭發了安子文，我們的婚姻關係肯定會破裂。我已經是離過一次婚的人，不到萬般無奈，我決不願意再離一次婚。

我回到家裏，還在想這個事，還沒有理出個頭緒來。正當我猶豫不定的時候，白介夫就和他們中科院的保衛部門的負責人講了這件事，他叫保衛部門的負責人去給公安部



我的好友楊惠文（白介夫人）攝於一九四〇年

長謝富治彙報。他事先沒跟我打招呼就自作主張要參與這件事了。

這件事情正沒有頭緒，新的情況又出現了。有個我過去認識的老同志叫郝德青的，^[7]他曾經在外交部工作，派駐國外，回國後在國務院外辦工作。他的女兒在清華大學上學，他去看他女兒，從清華繞道到北大來看我。我和他很熟悉，他和我姐姐、姐夫也很熟，都是朋友，因此，我就把安子文的事情說給他聽，想聽一聽他的意見。他一聽就說，鄧家姐妹準有問題，準是特務。張仲瀚是知名人士，如果從個人的角度講，他的工作和生活都被照顧得很好，完全沒有必要通過自己的老婆做這種事，來謀取什麼利益。那時候，人們的階級鬥爭的弦真是繩得緊！我就告訴他說，白介夫和楊惠文已經叫中科院保衛部門報告謝富治了。郝德青說，不行不行，不能對謝富治講，你應該去找康生。他說，你應該跟白介夫和楊惠文講，不要去找謝富治，因為事情涉及到安子文，謝富治未必能有這麼大的權限。他們兩個人都是中央級的部長，一個是中共中央的組織部長，一個是國家的公安部長，謝富治怎麼好過問這樣的事？這種事情，祇有康生才能管得了。郝德青和我一樣，與康生沒有任何特殊關係，他就是從黨內工作來考慮，畢竟康生是主管黨內的情報工作嘛。

我聽了他的話，真去對白介夫和楊惠文講了，不要他們去找謝富治，我自己直接去找康生。白介夫說，他已經跟保衛部門的負責人講過這件事了，至于保衛部門的負責人是否已經跟謝富治講過，白介夫也不清楚。反正，我聽了郝德青的意見，想正式跟康生彙報。怎麼彙報？本來我還犯愁，說是康生不好找，我和他沒有什麼聯繫。郝德青說，康生的妻子曹軼歐^[8]現在不是就在你們學校蹲點嘛，你給她講一下，轉告康生就可以了。

付出沉重代價的“檢舉”

這樣，反復思考之後，我還是拿定了主意：革命為重，個人為輕，黨的利益高于一切；其次，我已經跟楊惠文和白介夫講過這件事，白介夫又告訴了保衛部門，謝富治^[9]是否知道這件事我不清楚，可是這事情已經開了頭，我也不好退却。因此，我還是找了曹軼歐。我對她說，有一件事情要對康生彙報。曹軼歐問我，是什麼事。我簡單地說了一下情況，她說，你給康生寫個字條吧，我給你轉交。我心裏慌亂得很，我想，這麼多亂七八糟的事，當面講都未必能說得清，寫報告怎麼寫得清楚？我就寫了個紙條，說有關安子文和鄧覺先的重要情況，需要向康生彙報。

曹軼歐把我寫的紙條交上去，康生約我去面談。是曹軼歐傳的話。下班的時候，我坐著她的車子，和她一道去見康生。康生當時住在釣魚臺。他們都是晚上辦公，我和康生談到半夜，在他那裏吃過夜宵，喝了一杯牛奶，就出來了。我從來沒有在康生那裏吃過飯，就是這一次吃夜宵。我跟康生彙報了情況，康生告訴我，有什麼重要情況，可以隨時向他彙報。他說，你要繼續保持跟吳溉之的關係，不要鬧崩，要注意他們有什麼活動，你還照常到鄧覺先那裏去，該吃飯就吃飯，該打牌就打牌，留心他們的動靜，發現可疑情況就直接報告我，寫個條子給曹軼歐就行。

康生還要求我就安子文和鄧覺先的問題，寫一份正式的書面報告。正所謂“口說無憑”，要調查和處理這件事，要有文字報告為憑證。從康生那裏回到學校，我就琢磨著怎麼寫這個報告。正巧，這時郝德青又來了，我自己起草了一個材料，郝德青幫我修改了一遍，定了稿，就交給曹軼歐，轉交給康生了。

我和康生談話，時間是在“五一六通知”傳達以前。後來，關

於鄧覺先這件事，我給康生還寫過兩個條子。一個條子就是在六月初寫的，主要內容是說，毛主席肯定我們的大字報並向全國公佈以後，鄧覺先給我和吳溉之打過一個電話，向我們表示祝賀，稱讚了我一通，說大字報怎麼怎麼好。另一件事是她到吳溉之這裏來，這一次沒有打牌了，就是在一起說說話，聊聊天。我以為這是她的最新動向，我的警惕性很高，害怕其中有什麼陰謀詭計，所以就向康生報告了。兩張條子都是經過曹軼歐傳送的。

到了九月份，康生找我去，他說，現在查清楚了，鄧覺先是英國特務，她還有電台。更多的情況，康生不講，我不瞭解，也不能問。康生通知我，要我和吳溉之分開，中央要審查吳溉之。我替吳溉之分辯，說吳溉之對鄧家姐妹是有警惕性的，她們來玩來打牌，吳溉之總是先把文件鎖起來。如果要審查吳溉之（我不能說不要審查他，這是黨的決定啊！），最好不要隔離，吳溉之年紀大了，一旦隔離起來，恐怕身體承受不了。我和吳溉之分開，不是感情上的原因，不是家庭內部出問題，而是這種特殊年代出現的特殊情況所造成的。因此，我對吳溉之心裏既負疚又無奈。我向康生表態說，既然組織上要我跟吳溉之離婚，我就執行吧。

就這樣，我和吳溉之離婚了。我這一生，命運多蹇，連婚姻都這麼不順利。我並不是“女強人”，也並非不重感情，兩次結婚，都是希望能夠有所依靠，得到丈夫各方面的支持和幫助，過正常的家庭生活，但兩次婚姻都以失敗告終。這對於一個女性來講，已經是非常痛苦和不幸了；可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反對和怨恨我的人，又抓住我離婚之事大做文章，進行惡毒的人身攻擊，真是令人心寒。

當時我還沒有意識到，我付出了多麼沉重的代價。

後來，還發生了一件與吳溉之有關的事情，就是關於抄吳溉之的家。

在一篇關於我的文章中，有人曾經寫道，我為了換取自己的政治資本，帶領紅衛兵小將去抄吳溉之的家。實際情況是這樣的：這不是我的主動行為，而是被迫的。“文革”期間，吳溉之也被打倒了，北大的紅衛兵們要去抄他的家，要我領路。北大學生，後來擔任北大“井岡山”兵團頭頭的牛輝林對我說：紅衛兵這回抄家抄到你的頭上了，你什麼態度？我說，抄就抄吧，反正沒有反動材料。牛輝林說，那你必須帶路，否則你就是不想讓紅衛兵起來革命。牛輝林當時可能不知道，我已經與吳溉之離婚。在當時的環境下，我怎麼能夠拒絕這羣學生的強硬要求呢？無可奈何地，我和紅衛兵們一起坐著汽車，我讓同在北大哲學系的陳葆華陪著我，把他們帶到了南長街，告訴了他們門牌號數。他們衝進去亂抄亂翻，我連汽車都沒有下去——我心中那個亂啊！怎麼說，這裏也是我曾經和吳溉之生活過的地方啊。可是，回來以後，牛輝林却反諱我，並且到處宣揚是我指揮紅衛兵抄吳溉之家。

在這裏還要說一說，牛輝林帶人抄吳溉之家時，任何東西沒有抄出來，却把他的兩個孩子也帶去了，這是極其惡劣的行為。孩子是無辜的。她（他）們就奮力抗爭，終於逃脫了，但却摔壞了臂膀和腿。這事是文革後，我出獄才聽到的。這更加使我感到有愧，對不起吳溉之和他的孩子們。

我對吳溉之沒有任何怨恨，當時離開他是形勢所迫，是不得已而為之的。在吳溉之受衝擊的那段時間裏，我沒有對紅衛兵說過吳溉之一句壞話。吳溉之被單位審查批判，一位帥大姐找我談話，說吳溉之的問題，我祇是聽，對她也沒有說過吳溉之任何壞話。關於安子文，關於安子文與鄧覺先的關係，以及他們與吳溉之的關係和來往，對不

相干的人，我一句都沒有談過，因為這些不屬於單位和羣衆應該過問的問題。我認為吳溉之本人是沒有問題的，因此，我沒有說他的任何情況。至於單位和羣衆認為他有什麼問題，應該在單位揭發，我不能阻攔，但也不願意聽些什麼，根本不介入。我覺得應該保護吳溉之，但是，這話祇能向領導談。

事隔十多年，我被捕入獄，關在北京市公安局七處接受審問，當時專門來了一批人，問我揭發安子文和鄧覺先是什麼事情，我就把我瞭解的情況講了一遍。來人沒有反駁我的話，他們走後，也沒有下文。過些日子，又來了一撥人，把上述問題又問一遍，我就再講一遍，他們也沒有提出任何反駁。我知道，審問我的錄音都會拿給安子文聽，拿給鄧覺先聽，他們自然能够指出，我說的話是不是造謠、誣衊，可是，他們都沒有說我講的是假話。因為我沒有說錯嘛。那一段時間，我非常注意看報紙，看有沒有給鄧覺先平反的報導，但始終都沒有。我從報紙上看到了有關張仲瀚的消息，說他在文革中受到冤屈，為他平反，說他是國民黨軍的起義軍官，為我黨做過不少工作，他搞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有功勞；可是沒有一句話涉及鄧覺先。我想，如果張仲瀚在文革中受到那麼大衝擊，那鄧覺先肯定也在劫難逃，一定吃過不少苦頭，可是為什麼就不提她，即使是講張仲瀚的時候，也應該提一筆呀。審案人員就這件事情審問我的時候，他們祇聽我說，不反駁，也不肯定，到判刑的時候，我的罪狀裏也沒有與鄧覺先相關的內容。

這件事，對我來說，至今仍是個謎團。事到如今，我也說不清楚，我檢舉鄧覺先這件事情，到底是做對了，還是做錯了？鄧覺先和安子文的關係很曖昧，並且對安子文的工作產生不好的影響，這是可以證實的，並非我在憑空捏造。我認為，揭發安子文違背組織原則的事沒有錯，鄧

覺先到底是什麼人我不清楚，我祇能把我看到的疑點說出來，結論要由黨組織來決定。現在看來，安子文和鄧覺先的事情，僅僅是生活作風問題，以及有些事情處理不當，違背組織原則；不太可能有什麼政治背景，鄧覺先也不可能像康生說的那樣是什麼英國特務。

把這種事情上升到階級鬥爭的高度，推測鄧覺先搞特務活動，確實是一種杯弓蛇影的思維方式，應該反思。其實不止是我一個人，當時楊惠文、白介夫和郝德青也都以為鄧覺先是“特務”。在“文革”前夕，階級鬥爭的火藥味越來越濃，在這種氛圍裏，生活問題與政治問題搞混了，過分單純的頭腦把事情想得過分複雜了。雖然出發點是保衛黨的純潔性，但造成的後果却是嚴重的，不但當事人受到過于嚴厲的懲罰，也給我的個人生活帶來新的波折。這是一個沉痛的教訓。至於康生把這件事情無限擴大，整人，那是我當時始料不及的。如果當時我便認識到這一點，我還會不會有揭發此事的動議呢？很難說。因為當時，我們做基層工作的人，不瞭解上層的情況，而對於下邊，即便是生活作風問題，要求也是很嚴格的。吳宏毅不就是因此獲咎嗎？

註釋：

[1] 吳溉之（1898～1968），湖南平江人。早年就讀於平江培元學校。一九二四年春任平江縣工會秘書，不久兼任縣農協工作。七月由團員轉為中共黨員。一九二五年入黃埔軍校第四期。大革命失敗後隨軍參加南昌暴動。以後歷任平江游擊總隊黨代表兼平江縣蘇維埃政府赤衛委員會主席，紅五軍三縱隊縱隊長，紅三軍團政治部主任等職。參加長征。後任軍委政治部組織部部長，八路軍總政治部組織部部長兼軍法處處長，軍委總政治部直屬工作部部長、勸奸部部長，東北民主聯軍後勤部政委，東北軍政大學、華中軍政大學副政委等職。建國後歷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

黨組書記，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務委員。一九六八年七月二日在京病逝。

[2]唐天際（1904～1989），湖南安仁人。一九二五年入黃埔軍校學習。一九二六年由團轉黨。曾參加北伐戰爭、南昌暴動和湘南暴動。參加了長征。建國後歷任第二十一兵團政委，防空軍政委，總財務部、總後勤部副部長等職。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將軍銜。

[3]安子文（1909～1980），陝西綏德人。一九二七年由團轉黨。歷任北方局交通科科長，順直省委秘書長。後被捕入獄。一九三六年出獄後任北平市委組織部部長，中共太嶽區委書記，中央黨校二部副主任、教育長等職。一九四五年起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建國後歷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部長。文革中受到衝擊。“文革”結束後任中央黨校副校長、黨委副書記。是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一九七九年在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上增補為中央委員。

[4]蕭勁光（1903～1989），湖南長沙人。一九二一年赴蘇聯學習。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共，一九二四年回國後任國民革命軍第二軍第六師黨代表。參加北伐戰爭，一九二七年再次赴蘇聯學習，回國後到中央蘇區工作。參加了長征。到達陝北後歷任軍委幹部團上幹隊隊長，紅三軍團參謀長，八路軍後方留守處主任，留守兵團司令員，東北民主聯軍副司令員兼參謀長，四野副司令員兼十二兵團司令員、政委等職。建國後長期擔任海軍司令員，國防部副部長。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大將軍銜。“文革”結束後曾任五屆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是中共第八屆至第十一屆中央委員。

[5]張仲瀚（1915～1980），河北滄縣人。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共。歷任河北民軍司令員，冀中軍區津南抗日自衛軍司令，八路軍一二〇師三五九旅團長等職。一九四四年冬奉命隨三五九旅南下，後歷任支隊長，軍分區司令員，一野一兵團旅長、師長。建國後，歷任第九軍政委，第三兵團政治部主任，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二政委，新疆軍區副政委，農墾部副部長。“文革”結束後回京任炮兵顧問。因其長期在新疆陶峙岳部工作，被聶元梓等人誤認為是統戰對象。

[6]白介夫見本書第二章註釋[9]。

[7]郝德青（1906～1993），山西平遙人。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共。一九三七年後歷任中共山西介休縣委書記，決死二縱隊兼晉西北軍區第八軍分區政治部主任，晉綏分區秘書長等職。建國後歷任中國駐匈牙利、朝鮮大使，一九六五年調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後歷任中國駐挪威、荷蘭、伊朗大使，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會長。

[8]曹軼歐（1903～1989），山東濟南人。女，康生妻子。一九三六年加入中共。建國後曾任山東省人民政府委員，康生辦公室主任。文革中曾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組辦事組負責人。一九六九年中共“九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一九七三年、一九七七年在中共“十大”、“十一大”上繼續當為中央委員。一九八一年二月，北京市人大常委會會議罷免其第五屆全國人大代表資格。同年三月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撤銷其人大常委會委員職務。

[9]謝富治（1909～1972），紅軍將領，上將。建國後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雲南軍區、昆明軍區、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司令兼政治委員，公安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等職。參與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活動。一九八〇年十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決定開除其黨籍。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確認謝富治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主犯。

第八章 一夜之間名滿天下

與康生、曹軼歐的糾葛

我被派到懷柔去搞農村的社教運動，還沒有動身，因為生了病，祇能在家裏養病。也許是命運的捉弄，我成了轟動一時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毛澤東語）的領銜簽名者，後來又被說成是接受了康生、曹軼歐的指示“奉命造反”。

講到這裏，需要回溯一下我同康生、曹軼歐的歷史糾葛。

我對康生的印象並不好。最早知道他，是我到延安以後。我在延安沒有直接和他接觸，也沒有談過話，祇是有時在棗園遠遠地看到他牽了一條大狼狗在路上走。這在當時條件艱苦、作風樸素的延安，是非常特殊的現象。而且聽別人說，康生的大狼狗是可以和他在一張床上睡覺的。這就更奇怪了。

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風，康生說河南的地下黨是“紅旗黨”，他點到我也是“紅旗黨”的成員，要對我進行“搶救”。他還說我和王實味關係密切，要我交代與王實味的關係。幸虧當時已經是“搶救”運動的末期，對我“搶救”了沒有幾天，運動就結束了，不了了之。後來聽我姐姐聶元素說，康生這個人很愛整人。因為他搞情報，經常懷疑這個人有問題，那個人是特務。康生在北京中央黨校就是亂整人，有一個哲學家孫定國^[1]，就是被康生整死的，在中央黨校的水塘裏自殺了。我在中央黨校學習的時候，曾到孫定國家裏面談過，他很豁達很開朗，大家對他反映都比較好，可惜被康生整死了。

五十年代中期，康生和曹軼歐到哈爾濱去了一次，是由哈爾濱市委和黑龍江省委接待的。當時，吳宏毅寫了一個電影劇本，關於怎麼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這是在毛澤東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問題》發表以後，吳宏毅受到啓發寫出來的。這個劇本講，面對一些問題，面對一些人和事，不要動不動就說成是敵我矛盾，要善于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就是遇到羣衆遊行示威，也不要如臨大敵，要正確對待和處理。當時的長春電影製片廠已經開拍了，吳宏毅怕劇本裏面有什麼問題，說把劇本送給康生看一看，把把關，看是否有什么不妥。這樣我就到南崗國際飯店找了曹軼歐，說了這些情況。曹軼歐說，那就把劇本拿來看看吧。過了幾天，意見就反饋回來了，康生有一個批語，說這個劇本不能用，內容有問題，沒有體現出黨解決矛盾，而是由一個老工人出面解決了問題。其實，這個老工人也是受黨領導的嘛。因為康生的意見，這個劇本就停拍了。吳宏毅因此對康生很有意見，他說你光說怎麼怎麼不行，你倒是提出一些修改意見呀。一句話就槍斃了別人的辛勤勞動，太不把別人看在眼裏了！

這就是我和康生、曹軼歐直接打的第二次交道。第一次見面是我姐姐聶元素五十年代初在天津工作時，帶我到康生、曹軼歐家中，談天津理論教育工作情況和請高級黨校教員去天津講課的問題。聶元素要我陪她一起去，但是沒有見到康生，中午和曹軼歐一起吃了便飯，我們臨走時，康生



聶元梓與二姐聶元素在一起

回來了，我沒有見到康生，聶元素去康生的房間談了話。

一九六六年初，曹軼歐帶著工作組的張恩慈等人到北大來蹲點。在我的記憶中，曹軼歐到北大來，時間比較早，大約是在當年的四月份左右。確切時間，當時我就不清楚，也不知道他們來的目的。那時他們住在專家招待所（後來，曹和張二人才住到西頤賓館），我住在八公寓，聽說曹軼歐帶著幾個人到學校來了。張恩慈本來是哲學系的教師，剛調出去不久，現在回到北大，熟人們問他有關情況，他就講是跟著曹軼歐到北大的。

曹軼歐到北大來，到處找人談話。有一天，曹軼歐派人通知我，要我到專家招待所去見她。曹軼歐告訴我，不要到下面搞“四清”去，北大的問題還應該繼續解決。我說，現在讓我去參加“四清”，我就執行黨委決定，下鄉去就是了。曹軼歐說，那你在國際飯店被鬥了一通，也就不了了之了？我說，這些事情我也管不了，要看以後黨委怎麼個說法。我經過前一陣的事情，有些心灰意冷，張磬石他們進學校，也是動員我對學校和陸平的工作提意見，說是為了改進學校的工作。他們說得都很好聽，都很誠懇：“為了改進北大的工作，不論有什麼意見都可以提，本著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精神，揭露校黨委的矛盾。”我滿腔熱情地向他們、向黨中央派來的工作組、向中宣部副部長這樣的大人物談了我對學校黨委和陸平工作上的看法，以為他們是上級領導，會協調好有關方面的矛盾，幫助陸平改進工作，結果却是發動了一場殘酷鬥爭。矛盾激化，學校內部形成很尖銳的對立。我無端地惹了這麼多的是非，受到這麼大的挫折。這是我參加革命工作三十年來，第一次捲入黨內鬥爭，就吃這麼大的苦頭，遭這麼大的罪，我還能打得起精神來嗎？

中央書記處、中宣部和北京市委都在北大表演過了——我是指陸定一指示張磐石在北大搞社教運動，整陸平（據說毛主席曾說過，“北大社教運動是姓陸的整姓陸的”）。在北大開展社教運動，是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批准的，後來，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開會，討論北大的社教運動，做了三條指示，精神是繼續進行社教運動，祇是要“三結合”，不要一進校就說是爛掉的單位等等。北大校刊刊登過這三條指示。彭真要煞住社教運動的車，調轉了方向，頂住了鄧小平指示和中央宣傳部，決定召開國際飯店會議，整社教運動的積極份子。這麼多大人物都關注著北大，你康生再插手，未必就有多大的能耐。說起來，康生不過是中央書記處的書記而已，比起鄧小平、彭真來，職務都要低。我自己呢，在北大眼看著是難以呆下去了，陸平要把我發落到鄉下，我又想著調動工作，離開北大這塊是非之地，一走了之。因此，我也不想多講什麼。我對曹軼歐說，北大的事情，誰也搞不了，上邊的人發指示，翻過來翻過去，還不是我們這些小幹部們倒楣？我也不想再說什麼了，北大的事情太複雜，這不是一時半會兒能够解決的。學校安排我下鄉搞四清，我過幾天就要到懷柔去了。我這樣消極，曹軼歐對我也沒有辦法。過了兩天，我就到懷柔去接關係看地方了。

晴天霹靂般的“五·一六通知”

幾天過後，我正在家裏休息，準備病好了就到懷柔去搞社教，中共中央下達了關於正式開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2]”。學校黨委五月十九日晚傳達文件，我是北大校黨委委員，先一步聽到了文件內

容。

《通知》的批判矛頭首先指向彭真。當時，彭真在黨內的地位非常重要，除了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這七個中央政治局常委，就數彭真了。他是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排名于鄧小平之後，受命協助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的日常工作，同時兼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和北京市市長，還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的副委員長，以及負責指導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組長，真可以說是身負重任，以至在一段時間裏，大家都認為彭真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了。

“五一六通知”如晴天霹靂，一下子把我給聽懵了。按照我對《通知》精神的理解，不僅在北京市，在中央和中央機關，各省、市、自治區，都有這樣一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並且已經混進黨和政府、軍隊和文化界、新聞界、教育界等等，“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黨當時正處于多麼危險的狀態，黨內的敵人猖狂到了何等地步！

我是既震驚，又激動。我參加革命近三十年了，雖然說，在延安整風和搶救運動中，接受過黨內鬥爭的洗禮。但是，當年在延安，一來是我始終處於運動的邊緣，二來年齡又小，對那一場鬥爭沒有接受深刻的教訓。對於黨內鬥爭，我是談不上什麼經驗的。投身革命以後，我經受過長期的戰火硝煙的生死考驗，但在黨內，我一直堅決執行上級指示，兢兢業業地為革命工作。無論如何我都沒有想到，黨內會出這樣大的事情！

中央文件要求揪出混進黨和政府、軍隊以及文藝戰線、教育戰線、新聞出版部門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要號召和發動每一個黨員起來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保衛無產階級專政，要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

黑幫黑線開火，這又是非常激動人心的！在戰爭年代，我雖然年紀小，但是革命意志很堅決，跟著黨，跟著毛主席，無論條件多麼艱苦，情況多麼危險，都毫不動搖，現在，黨中央毛主席又發出了戰鬥號令，我同樣要積極響應，積極參加！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一定要堅決緊跟，積極參加，把黨內的敵人統統揪出來，統統打倒，以便讓我們出生入死地打下的紅色江山永遠不改變顏色！

我想，中央文件這次號召批判和清洗“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這不是和前些時候北大搞社教運動的目標相一致嗎？矛頭不也是對準走資派的嗎？而且，“五一六通知”是毛主席黨中央的聲音，比北京市委當然要站得高看得遠了。何況，彭真在這次會議上是受批判的，那他對北大的態度，他所支持的陸平，肯定也是錯誤的了。《通知》批判彭真“打擊無產階級左派，包庇資產階級右派”，他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是包庇了鄧拓、吳晗，在此前的社教運動中就是包庇陸平，打擊給陸平提意見的同志。這是順理成章的，合乎邏輯的。至于北大和陸平，在傳達中央的這一重要文件以後，並沒有聯繫北大工作中的問題再做出什麼具體而深入的行動，去批判彭真、批判“三家村”，這又可以成為他們緊密追隨彭真等人的確鑿證明。

我以為，黨中央毛主席發出“五一六通知”，就是號召我們每一個共產黨員和革命者起來保衛黨，保衛無產階級專政。我到北大工作以來，一直是非常注意黨中央的文件精神和毛主席的指示的。因此，聽到這次中央會議的有關文件，我有好幾個晚上都沒有睡好，翻來覆去地思考北大情況，思考北大與北京市委、與彭真的關係問題，思考我在北大的親身感受與黨內鬥爭的關係問題。

我想，我要聽毛主席的話，跟黨中央走，要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彭真的垮台讓我看到了希望：北大的問題有希望得到澄清，在社教運動中給校黨委和陸平提意見的積極份子所受到的批判和冤屈也有希望得到解決。我那時候就想，北大前一段的問題太複雜，上面插手的人太多，祇有中央最高領導人出面，才能解決得了。我想，那就再給毛主席、劉主席寫個報告，彙報一下北大的情況吧。這是符合當前的文件精神的嘛。我當時對於什麼是走資派，什麼是修正主義，並沒有搞清楚一一說實在的，不要說我，全黨全國，誰把這個問題搞清楚了？就是毛主席黨中央也沒有對什麼是“走資派”、什麼是“修正主義”下幾條定義。我就是憑著感覺，以為黨內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等工作上存在的問題，以及照陸平這樣發展下去要會變修，變成走資派，全黨全國就會變色。現在，中央下了決心，要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要反修防修，並且這次是由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我當然要積極響應了。

西頤賓館裏的面談

這樣，我找了哲學系的黨總支副書記趙正義，讓他找了哲學系的老師宋一秀、楊克明、高雲鵬，後來還有夏劍矛，討論寫報告的事。自從國際飯店會議以後，給陸平提過意見的人，都鬧得元氣大傷，一些人要調走，我都是不加阻攔，給他們開綠燈。何止他們，我自己都想調走，想讓安子文給我換一個單位。楊克明動作快，這時已經調動到中國科學院去了，不過還住在北大的二十二樓。張恩慈也是鬧著調走

了，現在又跟著曹軼歐回北大了。

我找了趙正義和楊克明商量，本來是要找他們也寫一份報告給毛主席、劉主席，反映北大的情況。寫信的人多了，反映情況的人多了，毛主席他們總該聽一聽吧。楊克明說，寫什麼報告，就寫一張大字報吧，我也表示贊成。因為在這以前，在國際飯店受批判時，我已經給毛主席、劉主席寫過報告，反映北大的情況，還是請田家英同志親自轉交的，結果是沒有任何回音。我給北京市委和彭真寫的信，也石沉大海。寫大字報，不僅能讓校內羣衆知道，也準能反映到上級領導那裏去，這可能比給黨中央毛主席劉主席寫信還要管用。

我們要寫大字報，因為是黨員，又是給自己的黨委書記兼校長陸平寫大字報，從組織觀念上說，我們就想到要請示有關領導。該請示誰呢？請示北大黨委，陸平就是黨委書記，我們絕對不能去找他，找他，他也不會同意。請示北京市委，彭真已經倒臺了，肯定不能請示，該請示誰，我們也不清楚。楊克明說，那就找一下張恩慈，通過他問問曹軼歐吧。你給張恩慈打個電話不就可以了嗎？

於是，我給張恩慈打了電話，說明我們想給陸平寫張大字報，不知道行不行，想請示一下曹軼歐。這樣，記不清第二天還是第三天，曹軼歐就通過張恩慈通知說，要接見我和楊克明，就在現在四通橋西北角，原先的友誼商場的二樓。當時那裏是西頤賓館的客房，曹軼歐就在這座樓上辦公。她到北大搞調查研究，這裏離北大也近一些。她在北大的專家招待所和西頤賓館兩處都曾有辦公室。

我和楊克明按時到達西頤賓館，曹軼歐把我們叫到正好是一個拐角的房間去，這是一個會客室。曹軼歐的秘書和張恩慈在場（據張恩慈講曹軼歐沒有秘書）。在公安局七處監獄聽陳預審員說，那人是曹的秘

書）。曹軼歐問我們找她有什麼事情，我們就彙報說，聽了“五一六通知”，領會其精神，我們想給陸平寫一張大字報，貼在北大校園裏面。這樣做，不知道行不行，想請示一下領導。曹軼歐說，根據“五一六通知”精神，貼一張大字報，怎麼不行呢？她並沒有問大字報的內容，因為她在北大蹲點已經有些日子，北大的情況，她已經掌握了。調查小組裏的張恩慈，本來就是北大哲學系的人，自然會向她提供基本情況。所以，曹軼歐也沒有問我們要寫什麼內容，就說，“五一六通知”是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就是要發動羣衆，大字報可以寫。又說了些你們應該好好學習“五一六”通知的話。我們是從組織原則上請示她，可以不可以寫大字報，不涉及具體內容。大字報寫什麼，事先沒有想好，也沒有對曹軼歐講要寫什麼內容，反正是對著校黨委和陸平工作問題的，具體內容呢，是在得到同意以後，我們幾個人共同來討論的。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問世

這樣，我和趙正義、宋一秀、高雲鵬等人說明，已經請示了曹軼歐，同意我們給陸平寫大字報。他們聽了都很高興，從組織原則上說，大家都放心了。這樣，我們開始在楊克明家裏討論起草大字報。為什麼選在楊克明家裏呢？因為楊克明已經調離北大了，在楊克明這裏做什麼，北大黨委管不著。這期間，在下面參加“四清”工作組的夏劍豸回來了，也參加了大字報的寫作，但沒有多談什麼。大字報的第一稿是宋一秀寫的，然後幾個人一起討論，宋一秀改了第二稿。這已經是五

月二十四日晚上，幾個人一看，還是不行，楊克明就說，“還是我來執筆吧。晚上就不再討論了。我開個夜車，明天早上，我上班時把修改稿留在家裏，你們來取就行了。”楊克明很有把握，成竹在胸。五月二十五日一早，宋一秀從楊克明家取了大字報的底稿，和高雲鵬一起，在二十四樓教師宿舍，開始用毛筆抄寫，我看了一下，前半部分可以，後邊加了一段話，加了三個口號，就這樣定了稿。宋一秀抄寫大字報的時候，我又到住在二十四樓同一座樓下的李醒塵那裏，對他講了大字報的內容，問他願意不願意參加在大字報上簽名。李醒塵很高興，到樓上看了大字報的內容，一口答應了。



一九六六年六月在北京大學羣眾自由集會上

抄完大字報，我就帶頭簽了名。宋一秀、夏劍豸、趙正義、高雲鵬、李醒塵等人都簽了名。楊克明是別人代簽的，是宋一秀還是高雲鵬代的，我記不清了。這是吃中午飯以前的事情，午休以後，我們就把大字報貼

出去，貼在大飯廳的東山牆上。正好學生睡午覺起來到教室或圖書館去，都從那裏經過，一下子就在全校引起了軒然大波。

我們七人大字報的全文如下：

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3]

現在全國人民正在以對黨對毛主席無限熱愛、對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無限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為徹底打垮反動黑幫的進攻，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而鬥爭，可是北大按兵不動，冷冷清清，死氣沉沉，廣大師生的強烈革命要求被壓制下來，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原因在哪裏？這裏有鬼。請看最近的事實吧！

事情發生在五月八日發表了高炬的文章，全國掀起了聲討“三家村”的鬥爭高潮之後，五月十四日陸平（北京大學校長、黨委書記）急急忙忙的傳達了宋碩（北京市委大學部副部長）在市委大學部緊急會議上的“指示”，宋碩說：現在運動“急切需要加強領導，要求學校黨組織加強領導，堅守崗位”，“羣衆起來了要引導到正確的道路上去”，“這場意識形態的鬥爭，是一場嚴肅的階級鬥爭，必須從理論上徹底駁倒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堅持講道理，方法上怎樣便於駁倒就怎樣做，要領導好學習文件，開小組討論會，寫小字報，寫批判文章，總之，這場嚴肅的鬥爭，要做的很細緻，很深入，徹底打垮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從理論上駁倒他們，絕不是開大會所能解決的”，“如果羣衆激憤要求開大會，不要壓制，要引導開小組會，學習文件，寫小字報。”

陸平和彭珮雲（北京市委大學部幹部、北京大學黨委副書記）完

“從理論上駁倒他們，絕不是開大會能解決的”。“北大不宜貼大字報”，“要引導開小組會，寫小字報”。你們為什麼這樣害怕大字報？害怕開聲討大會？反擊向黨向社會主義向毛澤東思想猖狂進攻的黑幫，這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革命人民必須充分發動起來，轟轟烈烈，義憤聲討，開大會，出大字報就是最好的一種羣衆戰鬥形式。你們“引導”羣衆不開大會，不出大字報，製造種種清規戒律，這不是壓制羣衆革命，不准羣衆革命，反對羣衆革命嗎？我們絕對不答應！

你們大喊，要“加強領導，堅守崗位”，這就暴露了你們的馬腳。在革命羣衆轟轟烈烈起來響應中央和毛主席的號召，堅決反擊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的時候，你們大喊：“加強領導，堅守崗位”。你們堅守的是什麼“崗位”，為誰堅守“崗位”，你們是些什麼人，搞的什麼鬼，不是很清楚嗎？直到今天你們還要負隅頑抗，你們還想“堅守崗位”來破壞文化革命。告訴你們，螳臂擋不住車輪，蚍蜉撼不了大樹。這是白日做夢！

一切革命的知識份子，是戰鬥的時候了！讓我們團結起來，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團結在黨中央毛主席的周圍，打破修正主義的種種控制和一切陰謀詭計，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魯曉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份子，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

保衛黨中央！

保衛毛澤東思想！

保衛無產階級專政！

哲學系 許元梓 宋一秀 夏劍矛 楊克明

趙正義 高雲鵬 李醒塵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關於大字報的辯白

我再強調一下，這張大字報的具體內容，就是我們幾個參加寫作和簽名的人知道，我們事先沒有對任何人講過。曹軼歐不知道，康生也不知道。我們向曹軼歐請示，因為我們當時以為她是“五一六通知”裏宣佈重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組派來的，祇是從組織原則出發，請示大字報能不能寫，能不能在校園裏貼，沒有講具體內容。寫什麼，怎麼寫，我們都是一邊起草一邊商量著寫的，而不是帶著寫好的底稿去見曹軼歐，更不是受到康生、曹軼歐的指使和授意才寫這張大字報的。

祇要尊重歷史，從當時的實際情況出發，就可以斷定，我們的大字報所遵循的，完全是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的基本精神，是對於中央文件的一次“活學活用”：《通知》批判彭真阻礙對於吳晗和“三家村”的清算；我們的大字報批判的是宋碩、陸平、彭珮雲在北大校內阻礙對於“三家村”的真正揭露和批判。《通知》列舉了彭真關於進行文化批判的種種言論，指責彭真混淆了文化革命的性質，縮小了這場鬥爭的意義和規模；我們的大字報批判了宋碩、陸平、彭珮雲關於進行文化批判的有關指示，同樣是指責他們把文化革命運動引導到他們指定的軌道上去。

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開始，黨內高層就在進行著激烈的鬥爭，為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而激烈交鋒。因為這場鬥爭是從針對北京市的有關領導發動的：受到批判的吳晗是北京市副市長，鄧拓是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三家村”的另一位成員廖沫沙是北京市委統戰部長，而站在第一線力圖引導和控制這場大批判風暴的彭真，既是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是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的組長，同時又是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前

面說過，《通知》對彭真的批判和清算令人震驚，它批判的就是彭真所要求的“純理論”“純學術”批判和“堅持講道理”“加強領導”等防止大批判運動失控的提法和做法；而且，《通知》對於當前運動的定性，完全是以毛澤東的口徑為依據，就是要發動羣衆，搞大民主大字報大批判，向所謂的大大小小的走資派開火，進行一次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我們的大字報，完全是在毛澤東所主持製定的“五一六通知”的精神範圍之內，並沒有什麼自己的發明。屬於我們自己的內容，就是結合了北大的實際，對陸平、彭珮雲和他們的上級宋碩關於如何領導運動、控制局面的言論進行了“揭露”和“批駁”。今天回想起來，這張大字報當然是不可取的，它正中了毛澤東進一步從基層推動文化大革命進程的下懷，對文化大革命的發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尤其是給陸平、彭珮雲和宋碩造成了很大傷害，我願意表達我的深刻反省和歉意。但是，這張大字報的方向問題，不能完全由我們幾個人來承擔，它是遵照黨中央“五一六通知”的精神寫出來的。

這張大字報，也不是針對彭真的。儘管說，彭真對於北大的社教運動做過指示，使我們受到壓制和批判，但是，我們對彭真並沒有個人恩怨。“五一六通知”對於彭真問題的闡述，觸目驚心，但我們領會到，中央文件是要掀起文化大革命的羣衆運動，而不是繼續清算彭真。彭真已經是“死老虎”了。要向彭真和北京市委發難，我們何必要從宋碩入手？宋碩當時是北京市委大學部的副部長，並不是市委的要害人物，更不是攻擊彭真的關鍵所在。我們完全是就事論事，就北大的文化革命運動形勢而牽涉到宋碩的有關言論。至于陸平，他是這張大字報的鋒芒所向，我認為，他對文化革命的壓制和他對社教運動的壓制有必然聯繫；要想把

他的問題揭示出來，當然是從當下的學校情況入手比較方便，而且，我們還有“五一六通知”這樣的中央文件作為指導思想和理論依據，所以，就很有“理直氣壯”之感了。

其實，大字報問世不久，就產生了種種流言和對我的非難。後來大字報受到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肯定，有人就指責我發起寫這張大字報是“進行政治投機”。這是無稽之談。我提議寫它的時候，許多事情都是無法預料的，誰能料想得到，它會直接送到毛主席那裏，得到毛主席那麼高的評價，會把它提拔到那樣的政治高度，被稱讚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和“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北京公社宣言”？前面所講的，關於我對陸平的看法，和我在社教運動中的經歷，使得我當時要批陸平等，是合乎邏輯的，是順理成章的。儘管說，這件事造成嚴重後果，對此我非常痛悔，但是，它與“投機”無關。我是在當時極左思潮的驅使下，自以為是保衛黨不變修，保衛無產階級專政不變色，是絕對真誠的。

還應當補充的是，為什麼要趕在五月二十五日中午把大字報貼出去，這是因為，當天下午校黨委原定召開全校大會批判“三家村”，我們覺得，這是他們為掩蓋前一階段的“假批判，真包庇”，試圖掩人耳目，以爭取化被動為主動，因此，為了不讓他們的“陰謀”得以實現，我們就必須搶在他們前面，及時揭露。這是當時的想法，並且付諸實施了，其中也沒有什麼陰謀詭計。

一石激起千層浪

我們的大字報貼出去，一石激起千層浪，在北大引起了軒然大波。

事情非常巧合，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運動前期大鳴大放的時候，譚天榮的大字報也是貼在這裏。看著我們的大字報，有人說，譚天榮又出現了；有人說，這是反革命大字報，是反黨；當然也有人贊成我們的大字報，這自然地形成了辯論的場面。學生們本來下午要去上課的，這樣一來，教室也不去了，就在大飯廳外面，三個一羣，五個一夥地，而且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人越來越多。高雲鵬還受到他人的圍攻和推打。

在貼這張大字報以前，我在哲學系的一部分教師、幹部和學生當中也講了，根據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可以對校、系工作和陸平校長等領導寫大字報。當時系裏也有不少人寫了大字報，和我們這張大字報幾乎同時露面，都貼在大飯廳外面的牆上，幾面牆都貼滿了，非常有聲勢。這些大字報，都是給校黨委提意見，講工作上的問題，沒有什麼惡言惡語，沒有人身攻擊。

整個下午，大字報前面都是人聲鼎沸，羣情激奮。晚飯後，我們哲學系召集全體師生開大會，號召大家給校黨委提意見，同時表示對我們的大字報有什麼看法，也可以提出來。這時候，學校裏有一些對大字報持反對意見的人，到哲學系的會場上來，要找我辯論，哲學系的人則反對他們干擾我們開會，為此引起爭執。那時候爭得很激烈，却祇是從對中央精神的理解和對學校黨委的評價不同而已。

晚上，楊克明回到學校，看到大字報貼出後的混亂情況，又害怕又著急，他的態度改變了。他責問我們，是誰把他的名字簽在大字報上了？我們說，你走以前不是交代了，要我們替你簽名嗎？楊克明是看到全校師生圍繞著我們的大字報辯論得很激烈，羣衆的情緒都沸騰起來了，有些害怕。他指責說，“光是同意我們寫這張大字報，她知道不知道這會造

成什麼樣的後果？”他是想指責曹軼歐，又不敢明說。楊克明的話，並非沒有道理，上一次社教工作隊在北大，就是動員我們這些普通幹部和教師給陸平和校黨委提意見，把人都發動起來了，結果呢，工作隊說撤就撤，留下我們這些積極響應工作隊號召的人挨整。

楊克明要我立刻把張恩慈找來。當時我就打電話給張恩慈，說我們的大字報貼出來了，學校裏亂了，羣衆對大字報有爭論，面對這個局面，應當怎麼對待？中央文革小組會有什麼態度，中央會有什麼態度，請他幫助我們請示請示。張恩慈在電話上沒有直接回答我的問題，他說不要著急，請示以後再說。大約一個小時以後，張恩慈來到北大二十二樓楊克明家裏，我們都在這裏守候。張恩慈見到我們，沒有多講什麼，他祇說領導要我們把大字報抄一份給他，送給中央文革和黨中央看看。張恩慈來了以後，楊克明又對他發火了，他說，你們現在怎麼都不吭聲？你們知道不知道這樣做的後果會怎麼樣？張恩慈說，我把大字報帶回去，先給中央文革的領導看一看，你們等著我的電話吧。當天晚上，我們等了很久，張恩慈的電話一直沒有來。但是我考慮到，第一，大字報內容是根據中央精神寫的，是響應黨的號召的；第二，從組織原則上說，我們請示了上級領導。我們完全是出于保衛黨中央、保衛毛澤東思想、保衛無產階級專政，要不使黨和國家改變顏色的公心，所以絕對不會有錯，因此，我很鎮靜。其他參加寫大字報的幾位同志也是如此，我們認為自己的大字報沒有什麼錯，主要是對大字報引發的這種混亂局面覺得需要及時解決。越是沒有回音，大家就越是緊張。

大字報貼出來以後，圍繞對學校工作和陸平等人的評價問題，校內很快就形成了反對陸平和擁護陸平的兩種意見。當時對大字報的爭論，主要還是認為給黨委領導貼大字報就是反黨，不是右派就是反革命。這種

觀念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是很普遍的。“五一六通知”的精神還沒有在羣衆當中普遍傳達，祇是在一部分黨員幹部和教師中傳達了；而且，即使聽到了中央最新文件的人，在領會《通知》上也有個接受和思考過程。因此，對大字報的爭論，雙方都是理直氣壯，互不相讓。陸平他們也不敢怠慢，連夜召開會議，商量對策。我們的大字報是五月二十五日午後貼出來的，當天晚上，陸平就召開黨委常委會討論怎麼辦，並組織了反擊的大字報，同樣貼在校園內和大飯廳牆上。

驚動了最高領導層

五月二十五日晚上，陸平他們正在開會，華北局第一書記、新上任的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峰^[6]來了。這時候已經是半夜了。李雪峰是和華北局的另一位書記池必卿^[4]一塊兒來的。李雪峰來後，就召開全校羣衆大會，地點是在辦公樓禮堂。校內各單位都有有線廣播，組織收聽。大會剛剛開始，我正在聽李雪峰講話，池必卿把我叫出來了，由副校長戈華陪同，把我叫到樓上，對我說，“你是一個老同志，你寫這張大字報，怎麼都不請示領導呢？”他顯然憋著一肚子氣，在儘量地控制著。

“我們請示了。”我說。

“你向誰請示了？”池必卿問。

“我請示中央文革的曹軼歐了。”我就把我和楊克明向曹軼歐請示的情況對池必卿講了。這樣，池必卿就不說話了。因為這時候，“五一六通知”剛剛通過，剛剛成立的中央文革就是專門領導文化大革命

的，我不請示他們還能請示誰？我就是想請示北京市委，北京市委也是舊的剛垮台，新的找不著人呀！李雪峰剛剛到北京市委任職，我也確實不知道他在哪裏呀。

那天晚上，李雪峰的講話我沒有聽全，他的意思就是不應該寫這張大字報，但口氣並不是很堅決。大會剛要結束，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張彥也到北大來了。張彥說他是總理派來的，他傳達總理的意見說，貼大字報可以，但是不要貼在外邊，應該開闢一個室內的場地，用來貼大字報。因為剛剛過完“五·一”勞動節，一些外賓還沒有離開北京，讓他們看到大字報，影響不好。

第二天，陸平組織各個系開會，誰表示贊同這張大字報了，都要檢討。學校同時開闢了一個飯廳，專門貼大字報，要求不許把大字報貼到屋外牆上。同時，北大的副校長黃一然，把我找到未名湖附近的臨湖軒一間辦公室去，要求我做檢討，並且要求我把七人大字報撕下來。我說，我貼大字報是經過認真思考，是響應中央的號召，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的，既然貼了我就不能撕下來。我貼大字報是提意見，沒有錯，我不能做檢討。你要是說貼的地方不對，以後寫大字報我可以貼到屋裏去。

後來，我們又新寫了一張大字報，貼到了三十八樓下坡、靠燕南園的那個飯廳裏。這一張大字報，是回答別人的批評，進一步闡述我們的觀點。很快地，那個飯廳裏就貼滿了大字報。陸平組織了學生，反駁我們的七人大字報。也有人支持我們，大字報太多了，飯廳太小，很快就貼不下了。結果，又把大字報貼到外面了。這種形勢持續了四五天。

“紅色電波傳喜訊”

六月一日晚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了我們的七人大字報。用當時的語言說，就是“紅色電波傳喜訊”，毛主席黨中央支持了我們的革命行動。當然，對此事的重新評價和思考，則是後來的事情了。^[5]

當時，我不在學校。我母親患病，住在協和醫院，我們兄弟姐妹幾個人輪流到醫院去看護她，這天輪到我在醫院陪床，到傍晚的時候，我哥哥去接替我。我從醫院出來，走在王府井大街上，忽然，街頭的大喇叭響了，在“嘟嘟”地報過晚上八時以後，一個宏亮的男聲響了起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現在是各地人民廣播電台聯播節目時間。……下面廣播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個同志寫的一張大字報《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播音員慷慨激昂的聲調，更顯示出我們大字報的嚴正氣勢，我不由地駐足傾聽——“現在全國人民正以對黨對毛主席無限熱愛、對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無限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為徹底打垮反動黑幫的進攻，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而鬥爭，可是北大按兵不動，冷冷清清，死氣沉沉，廣大師生的強烈革命要求被壓制下來，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原因在哪裏？這裏有鬼。請看最近的事實吧……”

這可真是大大地出乎我的意料！讓我任意地發揮想象，也不過是這張大字報能够被中央領導認可，對北大校內工作上存在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等問題能有一個認真清理，來一個革命化的變革；根本沒有想到中央會作出這樣驚人的決定，把它向全國廣播，並且成為第二天全國各大報紙的重大新聞，進而傳到世界各地。而且，更令我震驚的事情

還在後面呢！正像那句歇後語所說，“老鼠拉木鍬——大頭在後頭”。我們的大字報列舉了陸平所傳達的北京市委大學部副部長宋碩對當前運動的指示，和陸平、彭珮雲在北大關於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有關言論，對這些言論進行了反駁。不過，我們的大字報並沒有對他們進行什麼定性，沒有給他們扣什麼大得嚇人的帽子。我們沒有這種水平，也沒有這種想法，僅僅是以普通幹部和教師的身份公開出面批評學校領導，就已經是非常不容易了，哪裏會想到其他。

但是，緊跟著廣播的《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那就大不一樣了。其火力之猛烈，上綱上綫之高，當時的確是震聾發聵——“為陸平、彭珮雲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學，是‘三家村’黑幫的一個重要據點，是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頑固堡壘……陸平以北京大學‘黨委書記’的身份，以‘組織’的名義，對起來革命的學生和幹部，進行威嚇，說什麼不聽從他們這一小撮人的指揮就是違犯

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 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這個人太笨，不能幹事！」鮑叔牙的冷言冷語，說得晏子氣得咬牙切齒，半晌說不出話來。晏子說：「我聽說，『良藥苦口，忠言逆耳。』我這句話，就是忠言，你應該聽進去才對。」鮑叔牙說：「我聽了這句忠言，倒真有點悔悟。」鮑叔牙說：「我聽了這句忠言，倒真有點悔悟。」

當時報紙對此事的士筈短報道

紀律，就是反黨。這是‘三家村’黑幫反黨份子們慣用的伎倆。請問陸平，你們所說的黨是什麼黨？你們的組織是什麼組織？你們的紀律是什麼紀律？事實使我們不能不作出這樣的回答，你們的‘黨’不是真共產黨，而是假共產黨，是修正主義的‘黨’。你們的‘組織’就是反黨集團。你們的紀律就是對無產階級革命派實行殘酷無情的打擊……”

時至今日，看得很清楚，這篇評論員文章，是利用了我們的大字報，借題發揮，變本加厲，為即將到來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吹起了動員號。它毫不含糊地指斥陸平是“假共產黨”，是“修正主義的黨”，是“反黨集團”，並且把北大黨委誣陷為“三家村”的一個分店，誣陷宋碩、陸平、彭珮雲是“‘三家村’黑幫份子”，並且號召人們去摧毀仍然存在的其他“三家村”、“四家村”，把“將帥”和“車馬”一起揪出來，從而掀起了反對各級黨委的狂潮。這樣的文章，在國家廣播電台上向全國全世界公開宣佈，刊登在黨中央的機關報上，自然是代表黨中央的聲音，進一步動員民衆投身于“文化大革命”。

白天裏總是熙熙攘攘的王府井大街上，這時人已經不多了，但一簇簇的人們，都和我一樣停下腳步，認真地聽著電台廣播。我們的大字報得到黨中央的支持了！幾天來這張大字報引發的是是非非帶給我心頭造成的壓力，一掃而光。而且，黨中央對大字報評價那樣高，毫不含糊地為我們撐腰，支持我們對陸平等人的批判，我聽了自然非常興奮。但是，為什麼黨中央給予我們大字報那麼高的評價，我還沒有十分理解。正是華燈齊放的時候，我的眼前一片光明！

就這樣，我心情激動地趕回學校，宋一秀他們正在到處找我，我們都激動萬分。學校的大喇叭在反復地播送著我們的大字報和《人民

《日報》評論員文章。這下子，學校的問題可以得到解決了，我們的毛主席下決心解決黨內的問題了。

從這一刻開始，北大的校園沸騰起來了。當初支持我們批判陸平和校黨委的，自然是興高采烈，加大了火力繼續向北京大學的“三家村”分店和陸平等猛烈開火；曾經處於觀望態度的人，也無法保持沉默，紛紛貼出響應中央號召、批判學校領導和各系領導的大字報；那些曾經表態擁護陸平的師生，也不得不掉轉矛頭，反戈一擊。我們幾個帶頭寫大字報的人，一下子變成了知名人物，成了方方面面關注的重點。北京各大高校紛紛來人到北大“取經”，學習北大批判校黨委的“經驗”。一時間，校園裏到處都是揭發批判北大校黨委和陸平的大字報大標語，到處都是本校和外校師生活躍的身影。而且，不僅是本市的各高校，北京各工廠的羣衆，甚至一些外地的高校學生和工廠的工人，也趕到北大來看大字報，學習北大開展運動的經驗。一時間，學校裏熙熙攘攘，人來車往，十分熱鬧，每天來學校看大字報的人都有成千上萬，而且都表示要向我們學習、取經。那時候，我哪裏想得到，這是一場民族大動亂的開端呢！

附一：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原載《人民日報》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

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

人民日報評論員

聶元梓等同志的大字報，揭穿了“三家村”黑幫份子的一個大陰謀！
“三家村”黑店的掌櫃鄧拓被揭露出來了，但是這個反黨集團並不甘

心自己的失敗。他們仍然負隅頑抗，用“三家村”反黨集團份子宋碩的話來說，叫作“加強領導，堅守崗位”。

他們“堅守”的是什麼“崗位”？他們“堅守”的是他們多年來一直盤踞的反動堡壘。他們加強的是什麼“領導”？就是指揮他們的夥計作垂死掙扎、力圖保持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陣地。宋碩的“加強領導，堅守崗位”，這是一個信號。它反映了在這場摧枯拉朽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一切牛鬼蛇神們的動態。他們是一步不讓的，寸土必爭的，不鬥不倒的。

“三家村”黑幫是詭計多端的。在前一個時候，他們採取“犧牲車馬，保存主帥”的戰術。現在主帥垮台了，他們就採取能保存多少車馬就保存多少車馬的手法。他們妄圖保存實力，待機而動。

爲陸平、彭珮雲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學，是“三家村”黑幫的一個重要據點，是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頑固堡壘。已經到了五月十四日，陸平還傳達北京市委大學部副部長宋碩的所謂緊急指示，並手忙腳亂地進行部署，欺騙、蒙蔽和壓制廣大青年學生和革命幹部、革命教師，不許他們響應毛主席和黨中央的號召起來革命。彭珮雲是一個神秘人物，上竄下跳，拉線搭橋。在這個事件中，她轉入地下活動，來往于北京大學歷史系住地十三陵和宋碩、陸平之間，出謀劃策，秘密指揮。

這一切，都說明“三家村”黑店的分號，“三家村”黑幫的“車馬”們，還是有指揮、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頑抗。

陸平以北京大學“黨委書記”的身份，以“組織”的名義，對起來革命的學生和幹部，進行威嚇，說什麼不聽從他們這一撮人的指揮就是違犯紀律，就是反黨。這是“三家村”黑幫反黨份子們慣用的伎倆。請問陸平，你們所說的黨是什麼黨？你們的組織是什麼組織？你們的紀

律是什麼紀律？事實使我們不能不做出這樣的回答，你們的“黨”不是真共產黨，而是假共產黨，是修正主義的“黨”。你們的組織就是反黨集團。你們的紀律就是對無產階級革命派實行殘酷無情的打擊。

陸平們這一套是騙不了人的。

對於無產階級革命派來說，我們遵守的是中國共產黨的紀律，我們無條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5]毛澤東思想，是我們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學說，關於在意識形態領域中興無滅資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是我們必須遵循的。凡是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指示的，不論他們打著什麼旗號，不管他們有多高的職位，多老的資格，他們實際上是代表被打倒了的剝削階級的利益，全國人民都會起來反對他們，把他們打倒，把他們的黑幫、黑組織、黑紀律徹底摧毀。

人類歷史上空前未有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洶涌澎湃，妄圖阻擋這個潮流的小醜們，他們是難逃滅頂之災的。工農兵和無產階級的文化戰士，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領導下，以排山倒海之勢正在一個一個地奪取反革命的文化陣地，摧毀反革命的文化堡壘。那些什麼“三家村”、“四家村”，不過是紙老虎，他們的“將帥”保不住，他們的“車馬”也同樣是保不住的。

北京大學的無產階級革命派，一定能够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一定能够更加有力地團結羣衆進行戰鬥。一時還看不清楚的人們，一定會迅速地提高自己的覺悟，參加到戰鬥的行列中來。北京大學廣大師生的反對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革命鬥爭，一定能够勝利。一個欣欣向榮的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新北大，一定會很快地出現在人民的首都。

附二：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於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過的《通知》，後被簡稱為“五一六通知”，全文如下：

通 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中央各部委，國家機關各部門和各人民團體黨組、黨委，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

中央決定撤銷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轉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所謂“五人小組”的彙報提綱是根本錯誤的，是違反中央和毛澤東同志提出的社會主義文化革命路線的，是違反一九六二年黨的八屆十中全會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和階級鬥爭問題的指導方針的。這個提綱對毛澤東同志親自領導和發動的這場文化大革命，對毛澤東同志在一九六五年九月至十月間中央工作會議上（即在一次由各中央局負責同志參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關於批判吳晗的指示，陽奉陰違，竭力抗拒。

所謂“五人小組”的彙報提綱，實際上祇是彭真同志一個人的彙報提綱，是彭真同志背著“五人小組”成員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見製造出來的。對待這樣一個關係到社會主義革命全局的重大問題的文件，彭真同志根本沒有在“五人小組”內討論過、商量過，沒有向任何地方黨委徵求過意見，沒有說明要作為中央正式文件提請中央審查，更沒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澤東同志的同意，採取了極不正當的手段，武斷專橫，濫用職權，盜用中央的名義，匆匆忙忙發到全黨。

這個提綱的主要錯誤如下：

(一) 這個提綱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用資產階級世界觀來看待當前學術批判的形勢和性質，根本顛倒了敵我關係。我國正面臨著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高潮。這個高潮有力地衝擊著資產階級和封建殘餘還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陣地和文化陣地。這個提綱，不是鼓舞全黨放手發動廣大的工農兵羣衆和無產階級的文化戰士繼續衝鋒前進，而是力圖把這個運動拉向右轉。這個提綱用混亂的、自相矛盾的、虛偽的詞句，模糊了當前文化思想戰線上的尖銳的階級鬥爭，特別是模糊了這場大鬥爭的目的是對吳晗及其他一大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機關，各省、市、自治區，都有這樣一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批判。這個提綱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吳晗《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問題，掩蓋這場鬥爭的嚴重的政治性質。

(二) 這個提綱違背了一切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論點。當報刊上剛剛涉及吳晗《海瑞罷官》的政治問題的時候，提綱的作者們竟然提出“在報刊上的討論不要局限於政治問題，要把涉及到各種學術理論的問題，充分地展開討論”。他們又在各種場合宣稱，對吳晗的批判，不准談要害問題，不涉及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對右傾機會主義份子的罷官問題，不准談吳晗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問題。毛澤東同志經常告訴我們，同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上的鬥爭，是長期的階級鬥爭，不是匆忙做一個政治結論就可以解決。彭真同志有意造謠，對許多人說，主席認為對吳晗的批判可以在兩個月後做政治結論。又說，兩個月後再談政治問題。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文化領

域的政治鬥爭，納入資產階級經常宣揚的所謂“純學術”討論。很明顯，這是反對突出無產階級的政治，而要突出資產階級的政治。

(三) 提綱特別強調所謂“放”，但是卻用偷天換日的手法，根本歪曲了毛澤東同志一九五七年在黨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所講的放的方針，抹煞放的階級內容。毛澤東同志正是在講這個問題的時候指出，“我們同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還要進行長期的鬥爭。不瞭解這種情況，放棄思想鬥爭，那就是錯誤的。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該進行批判，決不能讓它們自由泛濫。”又說，“放，就是放手讓大家講意見，使人們敢於批評，敢於爭論”。這個提綱卻把“放”同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反動立場的揭露對立起來。它的所謂“放”，是資產階級的自由化，祇許資產階級放，不許無產階級放，不許無產階級反擊資產階級，是包庇吳晗這一類的反動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這個提綱的所謂“放”，是反毛澤東思想的，是適應資產階級需要的。

(四) 在我們開始反擊資產階級猖狂進攻的同時，提綱的作者們卻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這個口號是資產階級的口號。他們用這個口號保護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毛澤東思想，根本否認真理的階級性。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同資產階級以及一切剝削階級的謬論的鬥爭，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根本談不上什麼平等。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在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無產階級繼續清除資產階級鑽在共產黨內打著紅旗反紅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這些基本問題上，難道能夠允許有什麼平等嗎？幾十年以來的老的社會民主黨和十幾年以來的現代修正主義，從來就不允許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有什麼平等。他們根本否認幾千年的人類歷史是階

級鬥爭史，根本否認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根本否認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革命和對資產階級的專政。相反，他們是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同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一道，堅持資產階級壓迫、剝削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和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他們是一羣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份子，他們同我們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絲毫談不到什麼平等。因此，我們對他們的鬥爭也祇能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我們對他們的關係絕對不是什麼平等的關係，而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關係，即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獨裁或專政的關係，而不能是什麼別的關係，例如所謂平等關係、被剝削階級同剝削階級的和平共處關係、仁義道德關係等等。

(五) 提綱說，“不僅要在政治上壓倒對方，而且要在學術和業務的水準上真正大大地超過和壓倒對方”。這種對學術不分階級界限地思想，也是錯誤的。無產階級在學術上所掌握的真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毛澤東思想的真理，早已大大地超過了和壓倒了資產階級。提綱的提法，表現了作者吹捧和抬高資產階級的所謂“學術權威”。仇視和壓制我們在學術界的一批代表無產階級的、戰鬥的新生力量。

(六) 毛主席經常說，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講道理，講道理就是立，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是在破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鬥爭中建立和不斷發展起來的。但這個提綱卻強調“沒有立，就不可能達到真正、徹底的破”。這實際上是對資產階級的思想不准破，對無產階級的思想不准立，是同毛主席的思想針鋒相對的，是同我們在文化戰線上進行大破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革命鬥爭背道而馳的，是不准無產階級革命。

(七) 提綱提出“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又說“警惕左派學術工作者走上資產階級專政、學閥的道路”。究竟什麼是“學閥”？誰是“學閥”？難道無產階級不要專政，不要壓倒資產階級？難道無產階級的學術不要壓倒和消滅資產階級的學術？難道無產階級學術壓倒和消滅資產階級學術，就是“學閥”？提綱反對的鋒芒是指無產階級左派，顯然是要給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戴上“學閥”這頂帽子，倒過來支持真正的資產階級的學閥，維持他們在學術界的搖搖欲墜的壟斷地位。其實，那些支持資產階級學閥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鑽進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鑽進黨內保護資產階級學閥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才是不讀書、不看報、不接觸羣衆、什麼學問也沒有、專靠“武斷和以勢壓人”、竊取黨的名義的大黨閥。

(八) 提綱的作者們別有用心，故意把水攪渾，混淆階級陣線，轉移鬥爭目標，提出要對“堅定的左派”進行“整風”。他們這樣急急忙忙拋出這個提綱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整無產階級左派。他們專門收集左派的材料，尋找各種藉口打擊左派，還想借“整風”的名義進一步打擊左派，妄圖瓦解左派的隊伍。他們公然抗拒毛主席明確提出要保護左派，支持左派，強調建立和擴大左派隊伍的方針。另一方面，他們卻把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修正主義者、叛徒封成“堅定的左派”，加以包庇。他們用這種手法，企圖長資產階級右派的志氣，滅無產階級左派的威風。他們對無產階級充滿了恨，對資產階級充滿了愛。這就是提綱作者們的資產階級的博愛觀。

(九) 正當無產階級在思想戰線上對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發動一場新的激烈鬥爭剛剛開始，而且許多方面、許多地方還沒有開始參加鬥爭，或者雖然已經開始了鬥爭，但是絕大多數黨委對於這場偉大鬥爭的領導

還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的時候，提綱卻反復強調鬥爭中要所謂“有領導”、要“謹慎”、要“慎重”、要“經過有關領導機構批准”，這些都是要給無產階級左派劃許多框框，提出許多清規戒律，束縛無產階級左派的手腳，要給無產階級的文化革命設置重重障礙。一句話，迫不及待地要剎車，來一個反攻倒算。提綱的作者們對於無產階級左派反擊資產階級反動“權威”的文章，已經發表的，他們極端懷恨，還沒有發表的，他們加以扣壓。他們對於一切牛鬼蛇神卻放手讓其出籠，多年來塞滿了我們的報紙、廣播、刊物、書籍、教科書、講演、文藝作品、電影、戲劇、曲藝、美術、音樂、舞蹈等等，從不提倡要受無產階級的領導，從來也不要批准。這一對比，就可以看出，提綱的作者們究竟處在一種什麼地位了。

(十) 當前的鬥爭，是執行還是抗拒毛澤東同志的文化革命的路線的問題。但提綱卻說，“我們要通過這場鬥爭，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開闢解決這個問題（指‘徹底清理學術領域內的資產階級思想’）的道路”。毛澤東同志的《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看了‘逼上梁山’以後寫給延安評劇院的信》、《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等著作，早已在文化思想戰線上給我們無產階級開闢了道路，提綱卻認為毛澤東思想還沒有給我們開闢道路，而要重新開闢道路。提綱是企圖打著“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這個旗幟作爲幌子，開闢一條同毛澤東思想相反的道路，即現在修正主義的道路，也就是資產階級復辟的道路。

總之，這個提綱是反對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反對以毛澤東同志爲首的黨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線，打擊無產階級左派，包庇資產階級右派，爲資產階級復辟作輿論準備。這個提綱是資產階級思想在黨

內的反映，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同這條修正主義路線作鬥爭，絕對不是一件小事，而是關係我們黨和國家的前途，關係到我們黨和國家將來的面貌，也是關係世界革命的一件頭等大事。

各級黨委要立即停止執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全黨必須遵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尤其不能信用這些人去做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而過去和現在卻有很多人是在做這種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份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成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在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這個通知，可以連同中央今年二月十二日發出的錯誤文件，發到縣委、文化機關黨委和軍隊團級黨委，請他們展開討論，究竟哪一個文件是錯誤的，哪一個文件是正確的，他們自己的認識如何，有哪些成績，有哪些錯誤。

中央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註釋：

[1] 孫定國（1910～1964），一九四八年到馬列學校學習，後留校工作，任中央高級黨校哲學教研室副主任，校黨委委員。

[2] 一九六七年五月《通知》公開發表時，標題改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內文也作了小量的技術性改動。

[3] 宋碩（1923～1969），浙江杭縣人。一九四五年加入中共。同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化學工程系。建國後，歷任中共北京市委學委組織部部長，北京市高等學校黨委副書記，北京市委大學科學工作部副部長兼北京工業大學黨委書記。文革前，北京大學黨委受北京市委（具體通過大學科學工作部）和高等教育部黨組（後為黨委）雙重領導，以北京市委為主。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北京市委大學科學工作部部長吳子牧調離，實際工作由宋碩主持。

陸平，詳見本書第六章註釋[1]。

彭珮雲（1929～），湖南瀏陽人。女。丈夫王漢斌時任中共北京市委副秘書長。彭一九四六年加入中共。建國後歷任清華大學黨總支書記，北京市委組織部幹事，高校工作委員會常委、辦公室主任，大學科學工作部大學組組長。一九六四年九月兼任北大黨委副書記。文革結束後歷任國務院教育部副部長、黨組成員，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黨組書記，國務委員兼國家計生委主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婦聯主席。中共第十四屆、第十五屆中央委員。

[4] 池必卿（1918～），山西平定人。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共。建國後歷任山西省委宣傳部部長，太原市委第一書記，山西省委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華北局書記處書記等職。文革後曾任中共內蒙古區委第二書記，貴州省委第一書記。中共第十一屆、第十二屆中央委員。

[5] 毛澤東於六月一日在登載了聶元梓等七人大字報的《紅旗》雜誌、《光明日報》總編室五月二十七日編印的《文化革命簡報》第十三期上批示：

“康生、伯達同志：

此文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請酌辦。

毛澤東

六月一日

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62。

毛澤東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在此處加註（《紅旗》雜誌重新發表該文時加上了這段話）：“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當堅決抵制，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廣大革命師生及革命幹部對於錯誤的領導，就廣泛地進行過抵制——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註”。

[6]李雪峰（1907～），建國後曾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兼中央書記處第三辦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工業交通部部長，華北局第一書記、北京軍區第一政委，一九六六年六月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一九六八年任河北省革命委員會主任，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書記處書記等。

[7]赫魯曉夫（1894～1971），舊俄時代烏克蘭人。一九一八年加入布爾什維克黨，斯大林去世後曾任蘇聯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在蘇共黨內發動了“非斯大林化”運動。在六〇～七〇年代，中共曾指責赫魯曉夫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叛徒，蘇聯修正主義頭子。

[8]“彭羅陸楊反黨集團”：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當時都在黨內軍內任要職，於一九六六年五月被錯誤批判和撤銷職務。

劉仰嶠（1911～1980），建國後，曾任中共中央交通工作部副部長，高等教育部副部長，教育部副部長等職。

羅瑞卿（1906～1978），建國後任北京市副市長兼公安局長，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長，公安軍司令員兼政委，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軍委秘書長，中國人民解放軍

總參謀長等職。

楊尚昆（1907～1998），建國後歷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央副秘書長，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等。

第九章 從工作組到“校文革”

工作組進校和“六一八事件”

我們的大字報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出，在全國各大報紙刊登以後，由改組後的新北京市委派出的以張承先為組長的工作組馬上就進校了。^[1]有人說，我曾經被任命為張承先工作組的辦公室主任，但是，我自己並不知曉此事，沒有人通知過我就任，我也沒有參與過工作組的工作，更不知道我這“辦公室主任”的“辦公室”在哪裏。^[2]

這時候，陸平的日子就很難過了。他自己受到批判，他住的院子也不安寧，有學生往裏扔磚頭，還有人扒牆頭監視他，等等。工作組先是叫陸平勞動。這也是當時的一種習慣做法，下臺了，犯錯誤了，不能什麼事情都不做，那就先參加體力勞動，聽候上級的處理。陸平就在校園裏拔草，結果呢，他一出來，外地和外單位到北大來看大字報的許多羣衆特別是一些好奇的青年學生，就去圍觀，還有人辱罵他，這樣造成的影響很不好。看到這種情況，我當時覺得，雖然陸平犯了錯誤，但是在公開場合出現這種現象也是不應當的。我就給工作組提意見，不要讓陸平在校園裏勞動，以避免被人圍攻。後來工作組就把陸平關起來，不讓他露面了。

與此同時，各個系裏也鬧起來了。在批判校黨委的同時，各個系的學生和老師，追著系裏的系主任或者是黨總支書記，向他們發難，要他們回答問題，搞得他們很狼狽。我曾在二院外邊的樹林下面，看到一些系的學生追著他們的黨總支書記進行批鬥，羣起而攻之，要他們交代問題。我曾阻止過這種行爲，可是誰能聽進去呢？

工作組組長張承先是個老同志。當時，我們就覺得他們取代彭真、劉仁，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本來學生們是很擁護他的，因為他是被新北京市委派來領導運動的，可是，他有些方面做得不好。張承先住在臨湖軒，從臨湖軒到校辦公樓開會，不過一百多米，他都要坐汽車去，官氣十足，比陸平的派頭還大得多。這是一點。另外，工作組接管了學校的大權以後，他們也需要控制學校的局面，把學校的批判鬥爭控制在他們設想的範圍內，要求學生聽從他們的安排和指揮，這樣，學校師生就感到又是受到新的限制以至壓制了。這樣就給學生的印象很不好，覺得又來了一個官老爺，還是限制我們搞“文化大革命”。既然陸平因為阻礙運動被趕下臺了，學生們對張承先的舉動由懷疑到反對，也是順理成章的了。

隨後，就發生了“六一八事件”^[3]，就是校園裏一批學生衝破工作組劃定的界限，自發地起來批鬥所謂“牛鬼蛇神”，於六月十八日出現了亂批亂鬥的混亂局面。然後，工作組出面，把“六一八事件”定為“反革命事件”，對參加當天批鬥活動的學生和職工進行清查和批判。^[4]工作組不知道怎麼會懷疑到我頭上，以為我是“六一八事件”的後臺，是幕後指揮者。我告訴工作組，這一天發生的事情，我是不知道的，因為我不在現場。那一天我是在系辦公室，沒有到外面來。好在工作組追查這一事件的時候，的確沒有發現我與此事有什麼聯繫，這才作罷。

這一段時間，我沒有什麼行動，我處在這個位置上，被毛主席肯定了，和以前的處境不一樣了；不過，我感到非常困惑，我不知道運動應該怎麼進行下去。所以，當時我不願意在學校裏出頭露面，天天藏在哲學系辦公室，否則見到羣衆要我出面講話，我也不知道怎麼講才符合黨中央的指示精神。參加“六一八事件”的學生和職工們的自發行動肯定

是偏激、過火的，但是，爲此把他們打成“反革命”，準備進行嚴厲的處理，那也是以錯對錯，即使真是有壞人混進去，也應該分別處理。當時我的態度是，對工作組這麼處理很有意見，學生們有什麼錯誤，就說什麼錯誤，不應該定成什麼“反革命事件”，這帽子對於學生來說是太重了，尤其是他們還懷疑到我頭上來。因此，我是反對工作組的。但是，工作組失勢以後，我也保護過工作組。當時各學校都在批判工作組，北大學生要繼續批鬥張承先，不讓工作組走，我阻止過；張承先和工作組離開北大，是我安排的。那時候學生們是不肯放張承先走的，要讓他在學校裏接受批鬥，要和他算“六一八事件”的賬。而且，揪鬥工作組是當時非常普遍的現象，清華大學揪住王光美不放，就是因爲王光美曾經在清華工作組充當過重要角色。當時給工作組定的罪名是“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鎮壓革命羣衆”，“實行白色恐怖”等等。

我負責北大校文革籌委會的工作以後，在對待工作組的態度上，我講過這樣的話：張承先和工作組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給學生亂戴帽子，壓制學生，犯了方向性、路線性的錯誤；但不是敵我矛盾，不

能像對待敵人那樣對待工作組，我們和工作組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這本來是毛澤東對工作組的定性批評。我採用這個提法，我請示過康生，康生也肯定說工作組是人民內部矛盾。因此，我們沒有揪住工作組不放，我讓張承先離開學校，不讓學生繼續批鬥下去。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在北京市革委會成立大會上
的講話

工作組撤離以後，北大沒有像別的學校那樣激烈，揪住工作組不放，我們也沒有到北京市委去揪他。

而且，和別的學校不一樣，工作組走的時候，我要求把工作組裏的海軍同志留下來（進駐北大的工作組副組長有海軍航空兵政委彭林、北京軍區政治部鄭希文等，工作組成員中也有一批部隊幹部）。^[5]為什麼要留下軍隊的同志？那時候，學校沒有了黨的領導，也沒有行政領導，校黨委垮了，工作組走了，學校總要有人管啊。誰都不管，運動怎麼搞？學校的正常秩序，學校的工作，學校的治安，都要維持，都要有人領導，一天也不能失去控制。我們和部隊的關係特別好，直到成立校文革，我都堅持要有海軍的同志參加。海軍的同志為北大做了許多好事，給了我們很多幫助。海軍的同志是到很晚的時候才離開北大的。

江青在北大的拙劣表演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我對江青是尊重的，因為她是毛主席的夫人。後來產生了懷疑。這懷疑首先還不是政治上的，而是人品上的。

為什麼會對江青產生懷疑呢？一九六六年的七月下旬，江青、陳伯達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幾次來北大^[6]，看大字報，召開座談會，並且於七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連續兩天晚上召開全校萬人“辯論”大會，辯論工作組執行的是什麼路線，應該不應該撤離。江青和陳伯達都在辯論會上講話。陳伯達一口福建方言，他說話人們都聽不懂，他請王力給他當翻譯^[7]，講了撤工作組的問題，講了為“六一八事件”翻案的問題。江青也在大會上講話，她的講話讓我有些反感。

這麼嚴肅的大會，全北大上萬人參加，江青又是那樣的身份，毛主席的夫人，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文化革命運動怎麼搞，朝哪裏發展，你倒是講出些水平來啊！沒有想到，她在會上婆婆媽媽，講了很多她的家務事，講她的兒媳婦張少華（韶華）怎麼怎麼不好^[8]，還講到她的親家、張少華的母親怎麼怎麼不好——這樣大規模的羣衆大會上，講這些家庭瑣事幹什麼！我本來對江青的印象就不夠好。當年在前方，聽說毛主席在延安和一個電影演員結婚，大家心裏就嘀咕的，黨組織專門發了通知，不許議論這件事，這才把大家的嘴給堵上了。在延安，我又聽說江青對警衛員，對照顧她的“小鬼”都那麼不好，颐指氣使，隨意斥責，對她就更沒有好感了。在北大聽她胡扯亂七八糟的家務事，我就想，有多少重要的事情你不講，關於運動怎麼發展，你也不講，你到北大是幹什麼來了？！這樣，首先是從情緒上，我對江青就有點看法。

本來，在我們的大字報出來以後，張少華和她的妹妹來看過我，她們都是北大的學生，我們談過話。我也看了她們帶來的毛主席和她們姐妹倆合影的許多照片。張少華是毛主席的兒媳婦，她們姐妹倆還是北大學生，在感情上我對她們是比較親近的。江青再怎麼講，我對她們的看法也沒有什麼改變。可是，江青在會上講她們的壞話，對於年輕幼稚的學生是很有影響力的，學生們以為張少華姐妹倆真是壞人，要揪她們倆。大會還沒有結束，學生們就開始要揪張少華和她的妹妹了。江青當時是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她點名批判，誰當得起？張少華姐妹兩個，就從北大跑掉了。跑就跑吧。我沒有叫學生去抓她們，沒有必要去抓她們。江青說她們是壞人，再怎麼壞，也就是兩個學生，還能壞到哪裏去？江青怎麼說，那是她的事，再怎麼鬧，是她們的家務事，沒什麼意思。

後來，大約是在當年的秋冬，她們在逃亡中寫了一個條子給我，是叫她們的同學轉交給我的，內容是說想回學校，是否可以；同時說她們跑到外邊，處境艱難，希望能夠得到幫助。當時我不同意她們回學校——北大的中央幹部子弟那麼多，運動開始以後，他們的父母被批鬥，他們自己在羣衆中就受到歧視，陸續地成為學校的糾紛人物。當時在校的那些高級幹部子弟，我都想讓他們離開，免得出什麼問題，她們現在回來幹什麼？生活困難，我可以積極想辦法。可是，我無法同她們取得聯繫。給她們送條子的兩個學生，急匆匆地把那個條子塞給我就走開了。條子上說，她們躲在一個什麼地方，回信可以塞到那個地方的門下面。這樣做是不安全的，我怕被別人撿走了。可是，送信的人已經走掉，沒有辦法找她們聯繫了。

但我還是想幫助她們。找不到她們，無法直接資助她們，我就把這件事和謝富治講了，要求謝富治想辦法幫助她們解決生活問題。謝富治是公安部長，他要是想找到張少華姐妹，應該是很容易的。可是，謝富治不理睬這個事，他說他管不了，讓我找周總理，當時我想可能他怕江青。我說，我要見總理，得有機會，有場合，不能及時地解決她們的困難。謝富治就說，那你給總理寫個信吧，我轉交給他。我當即就給周總理寫了個便條裝在信封裏，請謝富治轉交。我推測，這樣的事情，無論怎麼說，謝富治不會從中作梗，張少華畢竟是毛主席的兒媳婦，彙報一下她們的近況，轉達她們要求幫助的請求，這樣的資訊應該能够傳到周總理那裏。後來聽說周總理也給他們解決了生活的問題。

可是，文革結束以後，張少華在報刊上公開發表文字，一方面說周恩來總理曾經在危難中幫助了她們姐妹，一方面却說是我讓學生去抓他們姐妹倆，這絕對是錯誤的。我為什麼要抓她們呢？從我的心情上講，我

是想幫助她們的，祇是我當時沒有那麼大能力，否則我為什麼要對謝富治講，還給周總理寫報告？張少華指責我，我可以理解，她不知道內情，不知道我給總理寫過報告。這裏面可能有誤傳，但也可能是有人成心敗壞我。

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9]，毛主席指示要北大的革命師生列席會議。于是，我和楊克明、張恩慈列席了這次會議。會議期間，毛主席接見了我們三人，康生、曹軼歐參加了接見。毛主席問我是哪裏人，問了我的經歷什麼的，他表揚我們的大字報寫得很好。毛主席還指示說，北大應該成立領導學校文化大革命的組織，要我負責成立北大文化革命委員會籌委會的工作。

八月五日，在十一中全會上，毛主席突然拿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說是“大字報”，其實是印成文件的形式，發給與會者。這篇文章在一個新的高度上，評價了我們的大字報，稱之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並且將其作為向劉少奇開火的一顆炮彈：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呵！請同志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五十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

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繫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

毛澤東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毛澤東主席公開講明了黨內有兩個司令部，而且要帶頭炮打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到底劉少奇都搞了些什麼，我也不清楚，光知道毛主席要打倒劉少奇，那我們就得打倒劉少奇了。我不知道劉少奇到底有什麼問題，應不應該打倒，可是毛主席這張大字報一公佈，我們的大字報也就成為打倒劉少奇的炮彈了。後來給劉少奇扣的那幾頂帽子，“叛徒、工賊、內奸”，我是感到非常困惑的：要說相信吧，這麼嚴重的問題，隱瞞了這麼多年，到底是什麼人給他作掩護？他在毛主席身邊工作了那麼長時間，毛主席過去就一點兒都不知道？要說不相信，這都是毛主席親自給他定的案，毛主席是不會看錯人的。想來想去，還是要相信毛主席的話。毛主席給他做了結論嘛。不過，對於劉少奇，我一直沒有多講過什麼，就是按照黨中央的口徑，重複中央文件和報紙上的提法，沒有做過任何超出中央文件的批判。即使是江青對我示意和當面講了劉少奇、王光美的許多壞話（見下文），我都沒有向任何人透露江青的話，更沒有拿江青的話去揭發批判劉少奇；即使是在中共九大會議上，那麼多人發言揭發批判劉少奇，我也沒有



上圖：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
江青和劉少奇在天安門城樓上

右圖：一九六七年四月九日，
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
被抓到清華大學，遭到造反派
的批判鬥爭和人身侮辱



把江青說給我的關於劉少奇的那麼多壞話透露過一句。

我贊成打倒劉少奇是出于對毛主席的信任。一九六七年七月間，北京高校的造反派在中南海外面安營紮寨，組成“揪鬥劉少奇火線指揮部”，要把劉少奇揪出中南海，到造反派中間接受批鬥。北大組織學生參加了“揪劉火線”，我還親自到中南海外面去看望了參加“揪劉火線”的學生，以表示鼓勵。

不理睬江青，聽王任重的

在十一中全會上，在毛主席接見我們三人之後，江青在一次小組會上說，她要請我到她家裏去吃飯。我不知道她的用意是什麼，但我也不能拒絕。當時，我還以為是她和毛主席一起請我去呢。會議結束以後，我就跟她一起坐上她的車子走。沒有想到，她是把我接到了釣魚臺，而不是中南海。那時候她住在釣魚臺，中央文革的成員當時都住在那裏。

吃飯的時候，江青對我說，現在階級鬥爭很複雜很尖銳；過去，毛主席的指示誰也不聽，劉少奇把階級鬥爭都搞到她家裏來了。還說劉少奇怎麼派人安竊聽器，怎麼派服務員監視她和毛主席的行動，她和主席在家裏都不能隨便談話，怕被竊聽。她要在報紙上發表文章也發表不了，她要寫東西，要改編劇本，搞樣板戲等等，也處處受到限制。她還說劉少奇和王光美夫婦二人生活多麼奢侈浪費，房子要住最好的，而且要比她和毛主席的房子都多；出國訪問的時候那麼鋪張，穿得那麼漂亮，衣服換了又換。她自己呢，生活儉樸，衣服也很少，身上一點兒錢都不裝。江青攻擊劉少奇和王光美的話，讓我大吃一驚，因為那是在八月初，

三號或四號，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還沒有拿出來。江青對我講這些話，顯然是有用意的。她說，我們寫的那張大字報，是她自己親自送給毛主席看的。當時毛主席不在北京，住在杭州，她自己去送大字報，非常危險，還有人跟蹤，是劉少奇派的人。她說，你很快就會知道關於劉少奇的一些問題，暗示會議上會有什麼事情發生。最後她還對我說，以後我有什麼事情，可以直接給她打電話，或者讓李訥轉告她，她隨時可以接見我，等等。

江青這樣講，意圖是很明顯的。她告訴我大字報是她親自送的，為此，我應該對她感激。而且，她還特意表示對我的關照和信任，要把我拉到她這一條線上。她請我吃飯是在八月三日或四日，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到八月五日才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公佈，江青提前向我透露有關情況。很明顯地，她是在向我套近乎，是“恩寵有加”，是表明她把我當作了她的嫡系和心腹，才對我透露最高機密。可是，我對她講的這些事情都沒有明確說什麼，也沒有對她表示感謝，更沒有“受寵若驚”。我祇是說，首長和我談話談得時間很長了，應該休息了。于是，我就告辭了。

關於江青請我吃飯，和我談話的事，回校後，我祇對孫蓬一講過^[10]，沒有對其他任何人說起過。因為我並不認為她請我吃飯是一種光榮，她講劉少奇、王光美的那些壞話，我也不認為都是確實的。就是在批判劉少奇的高潮中，我也沒有向別人透露過江青說他們的那些壞話。因為我對上層的情況一點也不清楚，我不敢隨便說些什麼。

八屆十一中全會即將結束的時候，王任重把我和彭小蒙（北京大學附中的紅衛兵負責人）接到釣魚臺他住的地方。^[11]當時，王任重從武漢調到北京來工作，是中央文革小組的副組長，住在釣魚臺，佔了一座樓。

他叫他的秘書長呂乃和專為我安排一個房間，要我在這裏休息幾天，並且說抽時間他和我研究一下北大的運動怎麼搞法。他還讓我以後在這裏多住住，休息休息，有時間就過來。我和彭小蒙分別住在王任重樓下的房間裏，不住在一起，彭小蒙什麼時候走的，我不清楚，王任重都和她談了些什麼，我也沒有參加。王任重給我講了那一番話，我聽了很高興。

在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我就想，北大工作組走了，運動怎麼搞？雖然領導沒有讓我來負什麼責任，但北大校文革開始正在籌備之中，我是負責人。“文化大革命”這麼大的運動，我自己也要遇到許多新問題，該向誰請示呢？正好，王任重也要抓住我，他找我，也是想通過我關注北大的運動。王任重說，“中央文革”關於大專院校的運動由他來負責，北大運動中一些大的事情，他來找我。

這正合我的心願。因為那時候王任重正是非常受毛主席器重的，毛主席很欣賞他，毛主席說，在各省的省委書記裏頭，王任重是既年輕又能幹的。我願意找這樣的人談學校的問題，願意向他請示。因為我對江青的印象不佳，一直沒有多少好感。江青在黨內一件實事都沒有做過，既沒有做過基層工作，又沒有做過領導工作。她在上海的時候是個電影演員，後來跟毛主席結婚，雖然長了一些政治上的見識，可是，她沒有從事過實際工作，祇是以毛主席夫人的身份，生活得非常優越，我信不過她。我對於江青的認識，有一個過程，對於她的陰險和無賴，是後來認識到的。“文革”初期，她一下子當上了中央文革小組的副組長，在理智上，我以為她在毛主席身邊多年，可能把過去的毛病都改正了，所以毛主席才叫她出來工作；但是，在感情上，我對她還是有距離的。另一個原因是，我認為我在基層工作，水平不高，工作上難免會經常發生缺點

錯誤，怕江青會隨時反映給毛主席，所以感到不如與王任重談工作比較隨便一點兒。因此，江青和王任重都表示對我的重視，我寧願找王任重而不找江青。

後來，王任重具體指示我在北大成立校文化革命委員會。在此之前，毛主席就讓我負責組織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但是沒有細談。因此，北大校文革成立過程中的每一步^[12]，我都請示過王任重。比如，籌備校文革的人選時，打算讓鄧樸方當校文革委員會副主任的事，就是和王任重共同商量的。我在全校的羣衆大會上就此事做過動員，並且親自和鄧樸方談過這件事，後來，因為羣衆不同意，沒有能够把鄧樸方選上來。有的事情，我直接找王任重，有的事情，我是通過他的秘書長呂乃和找他。後來，王任重乾脆把劉道玉派到北大來，名義叫工作組組長。校文革要採取巴黎公社式的羣衆選舉，就是王任重指示，劉道玉具體幫助我執行的。那已經是八月下旬九月初了，毛主席接見了全國紅衛兵，大中學生開始全國大串連的時候^[13]；但北大已在進行巴黎公社式的選舉，不讓學生出去串連。王任重為此還進行過多次指示，我們也請示過陶鑄。到後來，校文革選舉剛剛結束，學生們就迫不及待地都跑出去搞串連了。

我對王任重很信任，因此，不僅是關於北大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問題，我經常請示他，就是別的事情，我也想聽一聽他的意見。

一九六六年九月，康生找我到釣魚臺去，在他那裏跟我講了調查安子文和鄧覺先事情的結果，從康生那裏出來，已經是深夜了。我心裏覺得不踏實，就去找王任重，想跟他談談這件事。當時，康生和王任重都住在釣魚臺。呂乃和告訴我說，王任重不在家。我說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對王任重講。呂乃和說，那你就等一會兒吧。他給我安排了一間房，我就在房子裏等。等到半夜，打電話給呂乃和，說王任重還沒有回來，我

就在那裏睡了。不知道為什麼，那一次呂乃和對我特別冷淡，態度和以前完全不一樣。一直等到第二天早晨，我問呂乃和，王任重回來沒有，他說不知道，他還沒有上樓去看。他對我的態度這麼不好，我就沒有必要再在這裏等了。我在那裏吃過早飯，就回北大了。過去我到王任重那裏，如果沒有吃過飯，就在他那裏吃飯，這次也是如此。我對呂乃和講，等王任重回來，給我打個電話，我再來找他彙報工作。

從那以後，我就沒再見過王任重，後來才知道，王任重出事了。呂乃和對我態度改變，就是因為王任重出事。我和王任重在工作中，沒有發生過不愉快的事，他沒有理由冷淡我。過去，每個星期都聯繫好幾次，現在却失去了聯繫，我一再打電話找他，總是說不在。王任重出問題，是後來才知道的。王任重被拋出來之後，北大的一些羣衆組織提出來，“炮轟王任重，火燒龐元梓”，想借機會把我搞垮，這是我與王任重關係的餘波。

我不理睬江青，遇到事情向王任重請示，江青當然不滿意。王任重倒臺以後，江青也想借這個問題整我，說我和王任重有密切的關係，和王任重打得火熱，要我揭發交待問題。我就是不揭發交待，我說，我沒有什麼可以揭發王任重的。後來，江青一定要我們寫揭發材料，不寫就過不了關。我就和孫蓬一商量，應該寫些什麼，不寫些什麼。最後，我們避重就輕，講了些最簡單的事情，比如說我們要找王任重請示工作，找也找不到。找到他了，他說話也是說了不算數，比如關於學生串連的事情，他指示不讓學生外出，後來又改口說可以分期分批地去等等。我們始終沒有講過王任重的什麼實質性問題。

“大民主”選出的校文革主任

七月二十八日，北京大學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員會籌備委員會”，我被選舉為籌備委員會主任。籌備成立校文革，王任重指示，要採取自下而上的、巴黎公社式的民主選舉方法，要從基層，從羣衆中間選出校文革。八月三十日，北京大學文化革命代表大會召開，最重要的任務就是選舉校文化革命委員會常委和正副主任，王任重參加了大會的開幕式。到九月十一日，北大召開的校文化革命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校文化革命委員會，我被選舉為校文革的主任，領導全校的文化大革命。

北大經過“巴黎公社式”的羣衆選舉，我被推選為校文革主任。可是，專職領導北京大學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我，卻不知道如何領導這“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史無前例，無章可循啊。我自己呢，自從那張大字報在全國公開發表以後，就陷入了一種非常被動的境地。大字報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在《人民日報》和全國的報紙上刊登，得到那麼高的評價，我心裏的高興，是真的。可是，外校來的學生，部隊來的同志，到北大來，都要求見我，使我非常為難。我有什麼了不起，我做了什麼大事啦？運動是毛主席黨中央領導的，我們就是跟著走了一步嘛。我出來見人家，我說什麼，怎麼說？直到我當了北大校文革籌委會的負責人，我都是心中沒底。對於運動的下一步，應該怎麼發展，應該怎麼搞，我也是搞不清楚，“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那怎麼行？

對於文革怎麼搞，一開始我是有自己想法的，但完全不合時宜。直到現在，我也是這麼看，平時羣衆和領導隔得那麼遠，羣衆有什麼

意見，領導根本不聞不問，羣衆想批評領導也够不著，想提意見也到不了領導耳朵裏，有的領導就是高高在上，瞎指揮，工作搞不好，還批評下級，批評羣衆。所以，運動一開始，各個單位、各個部門的羣衆給領導貼大字報，其中確實有不少很有水平的意見，很有份量的批評，各級領導真是應該好好地聽一聽羣衆的呼聲，認真地接受羣衆的批評，改進各單位的工作，解決存在的問題，改進幹部身上的缺點錯誤。

但是，運動到這裏並沒有剎車，沒有告一段落，而是繼續“揭老底”，“揪黑手”，到後來就亂了套，變成互相攻擊了；烏七八糟的東西都出來了。彼此之間有意見，有矛盾，就我貼你的大字報，你貼我的大字報，互相攻擊，還有閹派性，從互相貼大字報發展到互相動手，搞武鬥。這叫什麼事啊！

說實在的，我這個校文革主任，對於“文化大革命”究竟應該怎麼進行，是一點兒都不知道，對當前發生的一些事情也很不理解。就是看中央的指示，毛主席的指示，和自己的一些經驗處理問題。

比如，當時在各個學校和社會上，都興起過“破四舊”的浪潮^[14]，到處亂砸亂破壞。北師大的學生從北京跑到山東曲阜去



一九六六年九月中旬，安徽省合肥市的造反派和紅衛兵將萬福庵內的佛像砸毀後，搬到馬路上焚燒

砸孔廟，還上了報紙。我呢，認準了一條，國家的文物和財產，誰也不能破壞。我向全校師生羣衆講話，號召大家保護文物和國家財產。北大的師生素質高，辨別力強，熱愛北大，運動初期，在保護學校的文物檔案上意見比較一致，不但自己不去破壞，還積極地制止外來的紅衛兵亂砸亂衝。因此，北大的文物，像華表啊，石碑啊，圖書資料（主要是圖書館的全體人員保護的），還有學校的檔案（主要是校文革組織組派人保護的），我們都堅決進行保護^[15]。不但是學校裏的學生不能亂動，外邊來的紅衛兵到北大來破“四舊”，也被我們阻止了。當然，我一個人哪有那麼大的力量，我是動員起北大的幹部、教師和學生來，一起進行保護。校文革的第一副主任孫蓬一就曾經出面帶領學生保護北大西門的石獅子不被砸爛。有一次，中學的紅衛兵到北大來，要砸這砸那，我就在高音喇叭裏大聲疾呼，要大家都去勸阻外來的中學生，都去保護學校的文物，馬上就有很多人應聲而出。在“文革”中，北大文物是保護得最好的。有個“文革”中間畢業的學生就曾經對我說過，北大的圖書館在運動中沒有受到損失，一應資料俱全，他畢業離校



在曲阜大鬧“孔家店”的造反派，除當地的學生和貧下中農等外，還有來自北京等省市的一萬多名大專院校師生和紅衛兵

辦手續的時候，因為丟失了從圖書館借的書籍，還賠了錢呢。

還有一件事情。“文革”中那麼混亂，中宣部把它的全國司局級以上有問題的幹部檔案，足有一兩百人的檔案，都轉移到了北大，交給我們負責保護，我們都保護住了，一點兒也沒有受到破壞，沒有洩露出去。這批幹部檔案主要是“除隱患戰鬥隊”趙建文保管的。這都是事實啊。

那時候，別的學校的學生已經都出去串連了，我們整天宣傳不要去串連，或者到車站去動員學生回來，在學校裏進行民主選舉。當時王任重對串連的態度是分期分批，這一批出去回來了，下一批再走。實際情況是，串連一開始，學生們就在學校呆不住了，都要出去串連。我也沒有辦法，就再次向王任重講，要他拿主意。王任重笑我，你也太沉不住氣了，那你請示陶鑄吧^[16]。我就給陶鑄寫了一個報告，請示他，學生都要離校大串連，應該怎麼辦？陶鑄的態度不是很明確，他不能表態反對大串連——大串連是毛主席和林彪號召和同意的，毛主席不是一次又一次地在天安門上接見全國各地來北京串連的紅衛兵嗎？但是陶鑄也不能表態同意學生出去——要是一表態，學校還不呼拉一下子走空了？學校的文化大革命還怎麼搞下去？

我還給陳毅副總理寫過一封信^[17]，我想請他來北大做一個形勢報告，講一講國內外形勢。我想，他要是能來北大做報告，我在學校就有話講了，就好把學生留在校園裏了——陳毅副總理要到北大來做重要報告，同學們都不要離開學校，都要參加聽報告。陳毅開始同意了，是口頭講的，隨後我就正式給他打了一個報告，安排有關事宜。後來他寫了一封信來，用毛筆寫的，說是他最近工作很忙，不能到北大來做報告，過一段時間再說。哪裏知道，很快地，文革的火就燒到陳毅身上了，說陳

毅同志也有問題了。我這才明白，他為什麼沒有來北大。陳毅給我的信，就一直在我家裏放著，後來，遲羣、謝靜宜抄家把這封信抄走了。^[18]

毛主席說，北大是“池深王八多”

“文革”中的怪事多，其中之一就是，在攻擊詆毀他人的語言上有許多“發明創造”。

北大那時候出了一幅對聯：“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這是講北大的“牛鬼蛇神”多。過去總是說北京大學是全國數一數二的名牌大學，有很多國內外知名的專家教授，現在是把褒貶都顛倒過來了。這對聯不知道怎麼傳到毛主席耳朵裏去了，毛主席說，要改一個字，“池深王八多”。毛主席的話，是他女兒李訥當面告訴我的^[19]。池淺也好，池深也好，這都是針對著教授們講的。

毛主席這樣講了，我怎麼辦？出來進去的，碰到這些教授，我該說什麼？原先我在經濟系，一個教授一個教授地到家裏去看望，現在我見了他們怎麼辦？特別是有一位經濟系的教授，一向響應黨的號召，他也跟著年輕的紅衛兵起來“鬧革命”。他老是追著我屁股後面，追到我家裏去，問我這問我那的，要我告訴他該怎麼“革命”。我跟他說，你別找我，你走吧。他不理解我，他覺得我過去對他那麼尊重，老上他家裏去，關心他，連他姑娘鬧離婚的事情都對我講。這樣的家庭糾紛他都對我講，讓我幫他出主意，現在我怎麼就不願意理睬他呢？其實，我能對他說什麼？我說你別跟著學生們亂鬥？我不能說。我不能對任何人或者有關運動的事情隨便表態。我也不能表態說誰誰誰是或者不是牛鬼蛇神，或者誰誰誰是或者不是反動學術權威，你應該去鬥爭他或者保護

他？我也不能說。在校園裏，見了以前認識的老教授，我都是一句話不說，我不知道該說什麼。要是別的學校的人，你說他是反動學術權威，我可能會相信，北大的這些教授，大部分我都是有些瞭解的，有的人我都到他們家裏去過，談過話，對他們很瞭解，我怎麼能說他們是反動的？真是不好辦。我就是沒有學會周總理的那種本領，前頭派人去抓你，然後把你請到家裏，給你談心。我要是會這個就好了。包括陸平在內，我要是在鬥爭大會結束以後，再找他談一談，要他忍耐住羣衆的批鬥，以後等待平反，就好了。我沒有這種靈活性，沒有這個水平啊。由於沒有這樣的水平和覺悟，在當時條件下也可以爭取做到的事，就沒有去做，事後想起來，十分內疚。

我也沒有辦法放陸平出來。把陸平關起來是工作組搞的，工作組撤離學校，各項工作都向我們交接，祇有關押陸平的事沒有交待。看管陸平的學生們沒有人領導了，就找我，我說管不了。多次找我，我堅決拒絕了。因為陸平是黨中央管轄的幹部，給他政治上定性為“黑幫”、“反黨份子”等，這是黨中央決定的，他到底政治上有什麼問題，我也不清楚。我們祇對他在學校領導工作有意見。工作組把陸平關起來，也是請示了上級的，工作組走了，我既不能接管，也不好放他啊。但學生們不理解，一定要我接管，有時走在校內路上，碰到我，不管我聽不聽，都囁嚅地給我說一些，什麼陸平和他愛人怎麼通話啦，他愛人給他送煙，怎麼往煙盒裏夾紙條啦。我聽著也不吭聲，夾紙條就夾吧，人家夫妻倆見不上面，寫個紙條子還不行？陸平被關起來，他的家也從原先住的地方搬出來了，謝甲林陪我還到他新搬的家去，看了他的愛人和孩子，詢問有什麼困難沒有，表明我的態度。這些事情應該怎麼辦，我不能多說什麼，多做什麼。

可是，在更多的場合，那時候的我變成另外一個人了。那些老教授，本來都很熟悉，過去對他們很關心，現在見了面，都不知道該說什麼，關心的話不能說，“原則”的話，批判反動學術權威的話說不出口，祇好繃著臉，一言不發。就是有一個機會，我馬上抓住了。毛主席說，要保護好幾個重點的學術權威，包括翦伯贊，周培源^[20]，等等。這下好了，我們和謝甲林就派了保衛人員，派了學生，輪流在翦伯贊家裏值班。翦伯贊在校外住，要是不派人看著，讓別人揪走了，我們也不知道。校文革保衛組謝甲林就派人保護他，還規定誰也不准亂鬥，誰要鬥爭他，必須經過校文革批准。周培源也是這樣。再就是給他們提供生活上的方便，他們幾個人看病要車，隨時要，隨時派。翦伯贊夫人當時特別感動，說感激毛主席，是毛主席照顧他們，現在不批鬥翦伯贊了，生活也自由了，要車也很方便。這都是我和校文革保衛組謝甲林親自安排的，車隊也是我親自打電話安排的，要保證他們幾個老教授用車。正在這幾個教授的生活剛剛得到改善的時候，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來了^[21]，接管了校文革，他們又開始接受外邊來人批鬥翦伯贊，結果，翦伯贊老兩口一塊兒自殺了。

校文革這一段，我們沒有指示任何人去批鬥任何一個幹部、教授、教員及學生，沒有逼死人。但是，由於黨中央發表“五一六通知”，特別是毛澤東主席將我們的校內大字報公佈于世，親自發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羣衆運動，在這種形勢下，校文革無法控制羣衆的狂熱情緒，當時任何一個單位的領導也無法控制局面。在失控的情況下，發生羣衆亂批亂鬥，以至自殺事件，作為下層領導單位是無法承擔責任的。這是令人深感痛惜的事。尤其是在北大發生“六一八事件”後，工作組把它定為反革命事件，江青來北大為它平反，稱“六一八事件”

是革命事件，這就更加助長了羣衆的狂熱情緒。北大英語系俞大綱教授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被批鬥後服毒自殺，搶救無效死亡。中文系黨總支書記程賢策遭學生批鬥，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服毒自殺，這些事件令人痛心。

不過，這些情況與工、軍宣隊進校以後繼續發生自殺事件的情況根本不同。一九六八年八月工、軍宣隊進校以後，他們是在北京市革委會及中央文革的直接領導下，是在對校內形勢完全可以控制的情況下，而且是在他們親自組織批鬥的情況下，造成了多起自殺事件，翦伯贊夫婦就是在這時自殺的。我去參加“九大”前，周總理和江青找我去談話，孫蓬一等同志跟我講，你去見總理，你可別光說你自己的事情，你要說說北大的情況，已經逼死了二十四個人了。我跟總理講北大當時的情況，總理說別著急，很快會派人去的。可是，還是遲羣、謝靜宜在北大，還是他們在領導學校的工、軍宣隊啊！

註釋：

[1]張承先（1915～），山東高苑人。清華大學肄業。一九三六年加入中共。建國後歷任中共平原省委宣傳部部長，華北行政委員會文委副主任，華北局宣傳部副部長，中共河北省委書記處書記等職。文革結束後歷任國家科委副主任，教育部副部長，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等職。

[2]據《北京大學紀事》，工作組辦公室主任為李芳林（中央監委研究室主任），副主任任小風、劉寄久、張恩慈。

[3]“六·一八”事件：張承先帶領新北京市委派出的工作組進駐北大不久，就與部分師生形成意見分歧。據《北京大學紀事》，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一些人在三八樓等處設了‘鬥鬼台’，四處抓幹部、教師來批鬥、遊街、罰跪、掛黑牌、戴

高帽、用墨汁塗面、拳打腳踢，甚至發生嚴重侮辱女幹部、女教師的流氓行為，指導工作組組長張承先等趕到現場制止，才逐漸結束。”事後，工作組把此事定為“反革命事件”，並將處理此事的情況寫成《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報送中共中央和北京市委。六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將此《簡報》批轉全國。中共中央批語說：“現將《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發給你們。中央認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鬥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果發生這種現象，都可參照北大的辦法處理。”當派工作組被作為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而否定之後，“六·一八”事件又被說成是鎮壓學生運動的“反革命事件”。

[4]六月十九日，工作組向中共中央和北京市委呈送了有關“六一八事件”經過的《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六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將北大工作組“六一八事件”的《簡報》批轉全國。由劉少奇擬定的中央批語說：“現將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發給你們。中央認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鬥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果發生這種現象，都可參照北大的辦法處理”。

[5]北大工作組副組長是：彭林（海軍航空兵政委）、楊以希（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武振聲（國務院文教辦公室秘書長）、鄭希文（北京軍區政治部幹部）、張德華（團中央候補書記）。

[6]陳伯達（1905～1989），原名陳建相，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毛澤東的秘書、中共第七屆中央候補委員等要職。建國後任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和中共中央主辦的《紅旗》雜誌總編輯等。文化大革命初期擔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簡稱中央文革）組長，中共第九屆中央政治局常委，陳伯達于林彪事件發生後被逮捕，一九八〇年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確認為林彪反革命集團主要成員，判刑十八年。

中央文革小組：根據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一九六六年五月，為取代彭真等組成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成立了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陳伯達任組



上圖左：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北京市當局接受紅衛兵的要求，宣佈取締馬麗亞方濟格修女會

上圖右：被上海“文攻武衛”（後改為“上海民兵”）揪鬥的一個所謂罪犯

右圖：西藏拉薩也出現了遊街和批鬥

下圖：全國性的批鬥狂潮殃及無數無辜羣眾，圖為黑龍江哈爾濱市羣眾鬥爭的現場



長。江青、王任重等任副組長，組員則有王力、關鋒、戚本禹、張春橋、姚文元等。康生、陶鑄任顧問。

[7]王力(1922~1996)，江蘇淮安人，一九三九年加入共產黨，曾在東北軍中從事兵運工作，歷任《大眾日報》記者，中共山東分局渤海區委宣傳部副部長等職。建國後曾任中共中央聯絡部副部長等職。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一九六七年八月被中共中央隔離審查，免去所擔任的黨內外職務。一九八〇年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確認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同案犯。

[8]張少華：即韶華，毛澤東之子毛岸青的妻子。時為北京大學中文系學生。她的妹妹張少林其時也在北大讀書。

[9]中共中央十一中全會，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在北京召開，由毛澤東主持，為全面發動文化大革命再一次進行黨內動員。全會上，主張派工作組領導運動的劉少奇等受到嚴厲指責，毛澤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一文矛頭直指劉少奇。全會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因決定共有十六條，簡稱為“十六條”)，並且調整了中央領導層，林彪取代原先的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五個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格局，成為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陳伯達、康生等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劉少奇等受到貶斥。

[10]孫蓬一：北京大學哲學系幹部，任校文革第一副主任。

[11]王任重(1917~1992)，河北景縣人。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共。建國後歷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武漢市委第一書記、代市長，中共湖北省委第一書記，武漢軍區第一政委，中南局第二書記、第一書記等職。一九六六年五月被提名為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文革結束後歷任中共陝西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共宣傳部部長，中央書記處書記，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第七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一九五八年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補選為中央候補委員，一九七八年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增補為中央委員，中共第二屆、第十三屆中

央委員。

[12]北大“校文革”，“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的簡稱，建立於文化大革命初期，取代學校黨委。

[13]串連：文化大革命初期，為了推廣發動和進行文化大革命的經驗，中共中央決定，北京的大中學生到全國各地去“煽風點火”，外地的大中學生到北京來“取經”，他們免費乘坐火牛、汽車等交通工具，並受到安排接待。史稱“紅衛兵大串連”。毛澤東多次在天安門上接見全國各地來北京串連的紅衛兵。

[14]“破四舊”：《十六條》規定，文化大革命要掃除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建立無產階級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破四舊、立四新”隨即成為文化大革命初期流行的口號。

[15]據知情者說，聶元梓有明確指示，要好好保管這批檔案。還有，北大的處長以上幹部，都是解放前參加革命的，他們的檔案也都在校文革。校文革和聶元樣要是想整人，把檔案翻一翻，從他們的歷史上挑點毛病出來，那是易如翻掌。只要向全校公佈檔案，拋出一些材料，不用校文革動手，學生們就不會放過那些歷史上有“污點”的人。但是，北大的檔案始終沒有洩漏，更沒有公開，聶有指示，誰也不准動它。可是，工宣隊進校以後，是工宣隊把北大的幹部檔案拋出來了。

[16]陶鑄：陶鑄在八屆一中全會上被選舉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黨內排序於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之後，但很快就被作為“黨內最大的保皇派”而“打倒”。

[17]陳毅（1901～1972），共產黨軍事將領，元帥。建國後，任華東軍區、第三野戰軍司令員，上海市市長，中央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等職。

[18]遲羣（1932～），文革初期任中國人民解放軍8342部隊宣傳科長，一九六八年隨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清華大學，先後擔任清華大學革委會主任、中共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和北京大學黨委書記等職務。一九八三年被以積極參加反革命集團

罪、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判處十八年徒刑。

謝靜宜(1939～)，一九六四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後入伍，“文革”期間為中國人民解放軍8341部隊(中央警衛團)幹部，一九六八年隨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清華大學，歷任清華大學革委會副主任、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共青團北京市委書記、中共北京市委書記等職務。一九七六年十月後被免去黨內外職務。

[19]李訥(1940～)毛澤東和江青之女，一九六五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任《解放軍報》編輯，文化革命初期擔任過毛澤東的聯絡員，七〇年代中期曾任北京市平谷縣委書記、北京市委書記等。

[20]翦伯贊(1898～1968)，著名歷史學家。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長期從事統一戰線和理論宣傳工作，建國後任北京大學教授、副校長，著有《歷史哲學教程》、《中國史綱》、《中國史論集》等。

周培源(1902～1993)，理論物理學家。一九二四年畢業于清華學校，美國芝加哥大學和加州理工學院學士、博士，曾在物理學大師海森伯、愛因斯坦等指導下從事研究工作，建國後歷任清華大學教務長，北京大學教授、副校長、校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等職，第五、第六屆全國政協主席。

[21]首都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簡稱“工、軍宣隊”。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為了制止武鬥，消除派性，恢復學校正常秩序，毛澤東派出首都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入清華大學，遭到蒯大富為首的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的武力抵抗。工、軍宣隊發生傷亡。七月二十八日凌晨，毛澤東緊急召見聶元梓、蒯大富、譚厚蘭、王大賓、韓愛晶等首都高校學生領袖，進行嚴厲批評。隨後，工、農宣隊陸續開進全國各大學、中學，並在實際上接管了各院校的權力。

第十章 上海串連真相

毛主席要我去上海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上午，毛主席的女兒李訥到“校文革”來找我，我正好不在。辦公室人員告訴我，李訥在樊競茹（李訥的歷史系同學）陪同下來找我，沒有找到，約好當天下午二時再來。我和孫蓬一等商量了一下，在北大五院“校文革”組織組的一個帶套間的辦公室和李訥談話。那裏談話比較方便。

下午，李訥準時來了，我們在校文革辦公室談了幾句話，我就領她到五院組織組去了。因為上午李訥來過，沒有找到我，許多人都知道李訥下午還要來，大家都希望能一起見見李訥，聽聽她帶來什麼好消息。李訥來先同大家（孫蓬一、姜同光、李清昆、李玉英、陳葆華、傅治文等人）在組織組的外間屋一塊兒談，隨後李訥同他們告辭。我提出可否大家一塊兒談，李訥說要同我單獨談。我陪她到裏間辦公室，李訥對我說：“主席批評了我。主席問我最近到北大來了沒有？我說去了。主席就問我見到聶元梓了沒有？我說沒有。主席批評我說，你去北大為什麼不去看看她呢？今天，主席特意讓我來看看你，問問你最近在幹些什麼，想些什麼。”

我請李訥代我向毛主席表示感謝，並請她轉達我對毛主席的請示。我彙報了學校運動的情況，請示應該如何處理當前運動中存在的問題，運動下一步應該做些什麼。我說，我正在抓設在陝西漢中的北大分校建設，別的工作我就不知道該做什麼了。我還請示了當時那些遭到羣衆衝擊、在集中管理勞動的校系幹部、教員和陸平等人的怎麼辦？此外，

我還對李訥說，全校學生和有些教員、幹部都出去串連了，學校事情不多，我也想去外地看看，到上海串連去。我說這些事的時候，李訥沒有表示什麼，她說回去向主席彙報。

說實在的，陸平等人的處理問題一直是我的一個大難題。陸平是工作組關起來的，他們撤走的時候，也沒有移交給校文革。看管陸平的學生，一定要讓“校文革”接收陸平，我始終不接收。我不知道把陸平接收過來以後，怎麼處理他。因此，看管陸平的學生，一直是工作組當時安排的那些人。為什麼不接收？我認為把陸平關起來就是錯誤的，關他幹什麼？如果是因為有很多學生要批鬥他，怕出問題，保護性關押還可以，可是，現在已經超出這個範圍了。工作組已經走了，陸平是不是還要關下去？但是，直接下令把陸平等人釋放出來，也不合時宜。當時運動搞得轟轟烈烈，人們恨不得越激烈越好，越激烈就越是能表現出投身于“文化大革命”的積極性。形勢越來越左，我不能頂著大趨勢把陸平等人放出來啊。我正在束手無策的時候，李訥代表毛主席來瞭解情況，我剛好可以請示一下，要是毛主席對這件事有個明確態度，是關還是放，我就有了行動的依據了。

正當我和李訥談話的時候，發生了砸校刊事件。李訥到窗前觀看了情況，表示很氣憤。她對我說，你太軟弱了，這是反革命行動（當晚，李訥派“中央文革”辦事組人員調查現場，指示我們要抓人）。孫蓬一、姜同光、李清昆、李玉英等人原來都在外間辦公室等著，想聽聽李訥對我說了些什麼新情況、新指示，因為校刊被砸，李訥說要去看看現場，談話也就結束了。孫蓬一、姜同光等人問我她談了些什麼，我說是毛主席讓她來的，我彙報了學校的情況，請示了對一些問題的處理辦法。我沒有詳細對他們說什麼，因為李訥對學校的運動也

確實沒有傳達毛主席的什麼具體指示。

李訥第二次到校文革辦公室找我，是十一月十三日下午快下班的時候。李仲欽告訴我李訥來了，我迎接了她，辦公室其他人也看到了。李訥說，快下班了，我陪你回家去談談，也看看你的家。當時，我住在北大三公寓。到家以後，李訥對我說：你昨天談學校的情況和問題，我都向主席彙報了。主席說，學校的事情不多，聶元梓想出去走一走，好嘛，可以出去。上海和外地的運動比北京開展得晚，現在一些地方羣衆運動發動得不夠好，領導不夠得力。主席同意你去上海串連，還希望你多走幾個地方。李訥還說：你出去串連不能同一般學生、教員一樣，到處跑跑看看，你要宣傳主席的思想和路線。你可以帶幾個人同去。我問，主席對學校運動和我請示的那些問題有什麼指示？李訥說，沒有。主席就是說，讓你串連去。她還說，現在主要是發動羣衆，全國的運動搞不起來，光你北大搞也不行。

她的話當時是怎麼具體說的，我已經記不很清楚了。大意是：北大運動不好再進一步做些什麼，北大的運動要等一等，現在主要是推動全國運動的發展。李訥說這些話，沒有說明是主席的意思，還是她自己的意思，但她使我領會，那不是她個人的意見，而是主席的精神。

李訥講了以上的話，又說，主席還叫我問問你，關於你和王任重的關係問題，要不要他為你說幾句話，保你一下。我說我同王任重的關係沒有什麼問題，他對我的指示都是關於北大運動和成立“校文革”的，沒有什麼錯誤。謝謝主席！現在不需要主席為我說什麼，等將來我若有重大錯誤的時候，再請主席保我吧。李訥笑了：你真爽快！臨走時，李訥對我說：到上海要帶誰去，你們自己考慮吧，希望你們作出成績。

李訥走後，我很高興：這是毛主席給予我的重要任務，也是對我的

信任。為什麼對我請示的問題和北大運動，毛主席沒有指示，相反地，對我順便提到的一個問題，他特意讓李訥立即轉告我，要我到上海去串連呢？對於毛主席特派李訥來找我談話的目的和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精神，我進一步思考領會之後，決定立即執行。

當天晚上，我先對孫蓬一等人談了李訥和我談話的精神（既然李訥是找我密談的，我不能全部按照原話傳達給校文革的副主任和常委），說了毛主席認為上海和外地運動發動得不够好，同意我去上海串連，還希望我多走幾個地方，以及北大運動要等一等全國形勢的發展。我們第二天上午召開了校文革常委會，討論怎樣執行，誰同我去上海串連，誰留校主持工作。如果不是李訥轉告毛主席的指示（並且是常委親自看到李訥兩次來找我），“校文革”常委也不會同意我這個第一把手到上海去，更不會讓孫蓬一第一副主任也同我一塊兒去。沒有上述理由，姜同光也不會接受我把學校的工作交給他主持。我們決定讓孫蓬一、李醒塵、傅治文、陳葆華等五人同我一塊去，我們特意讓李醒塵參加，這也是為了體現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因為他是七人大字報作者之一。

當時，我和校文革常委們在思想裏都認為，這是執行毛主席親自交給的發動羣衆的任務，把上海的運動搞好，目的是反修防修。當時大家都清楚毛主席的大字報內容，毛主席自己還在天安門接見了全國的紅衛兵和羣衆。祇要說是哪裏的羣衆運動發動得不好，自然就想到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中說的，五十多天來，不執行中央指示，推行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壓制羣衆起來革命，以及顛倒黑白，混淆是非，把羣衆打成反革命等等。我根本沒有想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思想和目的，一心想的是很好地完成黨、毛主席交給的任務，把上海

的羣衆發動起來，參加“文化大革命”。當時，對北大同事和我個人來說，對執行毛主席交給的任務，還有感激的思想和積極熱情完成任務的心情，這是毛主席和黨中央給予我們的極高“榮譽”。這是當時發自內心的感情，即使現在回憶起來，也還是很清晰的。

江青的“緊急指示”

十一月十四日下午，王力、關鋒找我們五六個人（孫蓬一、夏劍矛、李清昆、楊文嫻、李玉英等，有的人記不清楚了），到政協禮堂小會議室談話，讓我們給張恩慈寫材料。他們要整張恩慈，但是先授意下面寫揭發材料。我說我要到上海串連，而且是李訥來校轉告我，是毛主席同意並指示的。我也把李訥來校找我的情況，說給了王力和關鋒，還說孫蓬一等五人同我一塊去，李清昆協助姜同光在校主持工作，材料我不能親自寫了。我們當即商定李清昆、楊文嫻負責寫。我還問道我走後，材料寫成怎麼交給他們。王力說，由校文革送到“中央文革”辦事組即可。這件事，是李清昆負責辦的。

十四日晚上，我在校內開會，討論王力、關鋒讓寫材料的內容，以及我和孫蓬一等人準備去上海串連的事宜。會後，九點多鐘，“中央文革”辦事組的王廣宇給我家裏打電話說，江青同志很關心你，愛護你，為了你的安全，叫你帶上你認為自己最重要的材料，今晚住到另一個地方去。王廣宇說，我們的車子不好直接到北大去接你，你讓學校的車送你到釣魚臺門口，我去接你。我問為什麼，王廣宇說，不知道。我說，是不是發生了什麼情況呢？王廣宇說，不知道，首長沒有說。當時我就很奇怪，怎麼談一次話，搞得這麼神秘？為什麼說爲了我的安全，難道出了什麼

情况？

我到底是去還是不去？想了半天想不明白，我就說我不去，什麼情況也不瞭解，我沒有必要去。王廣宇說，接你是首長交給我的任務。我堅持不去，因為王廣宇沒有說接我出來住的原因。在電話上爭執了很久，王廣宇最後帶強制性地說，我們都要執行首長的指示。我被迫答應了，但說今晚不行，我必須告訴校文革常委，工作也需要安排，否則他們找不到我，還以為我突然失蹤了。王廣宇同意了，改為第二天下午接我。

後來，他又告訴我不要叫學校的車子送我到釣魚臺門口，讓我到一個大家都熟悉的地方去，他再接我走，叫我說一個地方。我說，要到什麼地方，讓學校的車送去好了。王廣宇說，學校的車不能送我去。他讓我指定一個彼此都認識的人，到那個人家裏去接頭。我想，黨中央領導同志也有一些辦公、休息的地方，對外是不公開的，所以，不便于直接出入。這樣，我就同意了他的安排。我提出到中宣部工作人員阮銘家裏，他家住在中宣部後院。王廣宇說，那你就按約定時間在阮銘家裏等候，我們的汽車到了，不進他家，就按幾聲喇叭，你聽到汽車喇叭響就出來。經他這麼一安排，簡直像演電影，在國統區搞地下工作一樣了。

第二天，我先到了阮銘家。當時，阮銘和夫人阮若英在家。陸善功也在那裏。我對阮銘講，李訥到北大來轉告我，毛主席指示我去上海串連，我還動員阮銘和我們一起到上海去。拉阮銘去，是想著人多勢衆，而且我很看重阮銘的才幹。我再三勸說，阮銘才說他當下去不了，隨後再去上海吧。他還說，就是要到上海去，也不能和你們一起去。我和阮銘講這番話，陸善功和阮若英都在場聽到了。這時，王廣宇到了，阮銘和陸善功他們送我到院子裏，我就出來上了車。在車上，我又對王廣宇

講述了毛主席要我到上海去串連的事。

王光宇把我帶到花園村附近的一個“中央文革”招待所——當時“中央文革”搞了很多記者搞動態，這個招待所就是這些記者住的。王廣宇究竟要把我接到什麼地方去，我在車上問了幾次，他都沒有告訴我。到了記者站，還不知道是什麼地方呢；後來，還是問食堂的廚師，才知道這是“中央文革”記者站的招待所。

王廣宇把我送到招待所樓下的一間房子裏，他問我，你都帶些什麼材料來了？是不是所有的材料都帶來了？我感到他關心的不是別的，而是我有沒有把材料全都帶來。我告訴他，所有的材料都在這裏了。我把材料遞給他，他就把這些材料都包起來，用事先準備好的封條封起來，要帶走，說是放在“中央文革”辦公室，替我保存起來，我什麼時候要用，就隨時找他好了。聽他這麼一說，我覺得兇多吉少，這不是變相地沒收了我的有關材料嗎？

但我毫無辦法，祇能把材料交給他。他又安排我住到樓上的一個房間。這棟樓空空蕩蕩，樓上每一個房間都擺著幾張床鋪，可就是沒有人住。他告訴我，吃飯在樓對面的食堂，自己買飯票，不要隨便出去，即使是在院子裏，也不要隨便走動，也不要給外面的人打電話，連家裏的電話也不要打。當時我就明白了：這不是什麼高級賓館，住宿條件不算好，連被褥都是裏子面子一樣白的粗布，而且是自己到大食堂去買飯。我明白了，我是被軟禁了，這是讓我受審查。

冷冷清清地住了兩天，偌大一棟樓唯獨住我一個人，也沒有任何人理睬我，這時，江青找我的意圖全都明白了，什麼爲了我的安全啊，愛護我啊，都是騙人的。我心裏猜測，江青懷疑我和王任重的關係，她要我把所有的材料都帶過去，是要通過文字查我和王任重的關係。當

時正是王任重出事之後。

關於這些材料，過了兩年，江青還有一段繼續騙人的話。一九六八年三月八日凌晨，江青、陳伯達同我談話時，江青說，你那包材料都叫王、關、戚搞走了，你不要再跟我們要了。兩年過去了，她還談及此事，實際上材料還在“中央文革”，還在她的手裏。

我住在“中央文革”招待所，行動受到限制，無所事事，心中充滿了焦慮。學校的運動和到上海串連的事情，都令我牽掛。我很想知道，讓我住進這個招待所到底為什麼。因此，我就給王廣宇打電話，說我請他把李訥找來玩兒，我希望從李訥口中打聽些有關情況。李訥來了招待所，我就問她，毛主席和江青對北大有什麼說法，有什麼意見？李訥說，他們從來不在我面前談論這些問題。李訥祇問了我們到上海去串連準備好了沒有，我沒有多談，祇告訴她，有誰同我一道去上海。從李訥那裏沒有探明虛實，我就再給王廣宇打電話，堅決要求離開。王廣宇說要請示首長，他們經過請示，他們同意我離開，同意我離開那個招待所。

總之，在為去上海串連做準備期間，我先後對校文革全體成員傳達李訥帶來的毛主席指示，並安排執行，此外還對“中央文革”王力、關鋒，王廣宇以及校內外有關的人如李清昆、楊文嫻、夏劍矛、李玉英、傅治文、陳葆華、阮銘、阮若英、陸善功等近二十人，講過此事。這是無法抹滅和改變的客觀事實，在我被拘捕後的預審中，陳預審員說李訥否定了是她轉告我毛主席的指示。但是他始終沒有拿出李訥否認的文字材料。這決不是李訥的一句話就能全然否定的，也不是王力的一句話（說我去上海串連是江青指示的證明）就可以全然否定的。

在離開花園村招待所之前，十六日晚上，王力來花園村招待所看過

我一次。他來是為我住進花園村招待所一事做個了結，因為那麼急的要我必須離開家，住到另一個地方來，我已來住了幾天，沒有任何人來見我說明來意，我還住在這裏幹什麼。我要走了，自然應該派人來照個面。而不是像他後來所言，他來是按江青授意，指派我到上海去的（陳預審員講這是王力揭發）。他明明已經知道我要到上海去，而且即將成行——我在政協禮堂對他講過了。他何必再這麼講呢。王力來了，只對我說，你們是羣衆團體，你們到上海不要打“中央文革”的旗號，你到上海串連主要是你們自己的行動，有急事可以打電話給“中央文革”；有事情可以找上海記者站的記者甄文君，他也可以幫助你們提供點運動的情況。因為你們是羣衆組織出去串連，就是找甄文君，也要注意方式。王力這些指示，我離開花園村以後，對北大的校文革成員和一些比較熟悉的人，都講了。但我認為江青對我進行審查的事情，我沒有講。情況很複雜，我沒有辦法說，也說不清楚。

《王力反思錄》（下）摘要

現在歷史學家、紀實文學家說聶元梓和張春橋早有勾結，有計劃、有組織地用聶元梓轟上海市，一切都是預謀的、有計劃的，這不符合事實。他們沒有那麼高的預見。

聶元梓的事是我經手辦的，我比較清楚。那時我兼“中央文革”辦公室主任。十一月中旬，有一天，江青突然到我那裏，說得到可靠的情報，有人要綁架聶元梓，而且時間就在今天夜裏。她說她報告了主席，主席意思要立刻找到聶元梓，讓“中央文革”小組把她保護起來。江青給我這個任務，我馬上請王廣宇，要他立即找到聶元梓。

他說找不到，我叫他開個車到處找，一定要找到。王廣宇很晚才找到聶元梓，安排她住在快報組（花園村）。下半夜我和徐學增到花園村找到聶元梓，傳達江青意見，叫她住著休息幾天，不必出面，有事可打電話。她有時也出去，晚上回來住。這期間正好發生安亭事件，陶鑄受到毛主席批評。毛主席對“文化大革命”的想法，是想把北京的羣衆組織、學生、工人、機關幹部的造反派連在一起，通過聶元梓等人到上海串聯，把北京同上海連成一片。江青找我，說主席的設想，組織個班子去上海，最早她想到李訥（蕭力）要去，聶元梓去，阮銘也要去，搞個比較大的班子。聶元梓住在“中央文革”，叫她負責籌備這個班子。李訥找過我，我介紹她見過聶元梓，陳伯達找到阮銘。這個北京和上海聯繫的組織，沒牽涉到張春橋。江青說李訥去不去毛主席正在考慮，因為她正在搞農村“文革”的指示。後來江青又轉達毛主席指示，李訥不去，阮銘也不去，班子不要那麼大。聶元梓也不要代表北京的紅衛兵組織，祇代表她自己和北大的羣衆組織，用北大羣衆組織的名義到上海。她不能打“中央文革”的旗號，完全作為北大聶元梓領導的羣衆組織的身份到上海去做些觀察、聯絡工作，沒有說她的任務是把上海市委打倒。我跟聶元梓說時再三叮囑這幾條，說是毛主席、“中央文革”的決定。她在上海的生活安排可由上海記者站照顧。現在歷史學家、紀實文學家說聶元梓和張春橋在上海秘密見面，搞什麼陰謀，聶元梓在上海的行動是張春橋策劃的，他倆怎麼說，作者都聽見了。這個我不知道。我祇知道張春橋對聶元梓非常反感，張春橋打電話給我，問怎麼回事？聶元梓為什麼打著“中央文革”旗號？為什麼有事不同我商量？我講了毛主席指示的幾條，我說沒交代她有事去問張春橋，是因為張春橋要回來了。也沒有必要，

因為她祇是代表北大羣衆組織去進行串聯。沒有叫她打著“中央文革”旗號。

《王力反思錄》中講到的主要情況是符合事實的。有些具體情況可能因為時間過久，記不清楚了，所以和我說的情況不完全一致。這是可以理解的。比如：他說我是十一月十四日下半夜（即十五日凌晨）被接到花園村“中央文革”記者站的，而且說“我和徐學增到花園村找到聶元梓。傳達江青意見，叫她住著休息幾天……”如果王力和徐學增下半夜向我這麼講，我就不會懷疑是江青審查我了。還有其他的一些細節，王力和我回憶的都有出入。比如說我寫過一張對上海市委的大字報。“聶元梓自稱這是第二張馬列主義大字報”我沒有寫過這張大字報，也沒有說過這是“第二張馬列主義大字報”。這張大字報是北大學生們寫的，當江青等人到北大開會時，他們叫我在主席臺上轉交給江青的。還有其他一些細節也有出入。因為這些出入都不是大的原則問題，不再一一列舉了。總之，《王力反思錄》所講的證明我住花園村記者站和上海串連都是毛澤東主席的指示。

上海紀行

我和孫蓬一等人於十一月十九日到達上海，十二月十六日回到北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本來還要從上海到廣州等地去串連，因為學校的事情走不開，我就從上海直接回北京了。

我在上海參加了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一些活動，反對上海市長曹荻

秋。^[1]毛主席沒有具體指示要我去反對曹荻秋；可是，我到上海的時候，上海的羣衆正在炮打曹荻秋，說他是走資派，這一點毛主席是清楚的。到上海市“一月奪權”的時候，毛主席不是也批准了張春橋、王洪文等人打倒曹荻秋的行動嗎？我要是不贊成造反派反對曹荻秋，那就不合乎情理了。毛主席要我到上海幹什麼來了？因此，我到了上海，就表態支持革命羣衆炮打陳丕顯^[2]、曹荻秋。我參加了在上海文化廣場舉行的批判曹荻秋的大會，並且提倡要羣衆向黨中央請求改組上海市委——以彭真為首的北京市委不是因為對抗“文化大革命”運動被黨中央改組了嗎？我們到上海，沒有想到要奪上海市委的權。那時候奪權運動還沒有開始呢。我們也沒有“奪權”這樣的思想，沒有這樣的“鬥爭水平”。所謂奪權，是在一九六七年一月由上海王洪文等人首先發起的，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我們怎麼會想到要奪權呢？要奪權，我們為什麼不在北京奪權？而且，為什麼從上海回北京後，也沒有到北京市委、教育部等去奪權，為什麼後來不但遠遠地落在上海造反派後面，還對北京市的奪權



上海市工藝美術學校的造反派“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和上海戲劇學院的造反派組織“狂妄大隊”聯合批鬥學校領導和教師，將他們打倒在地，還踏上一只腳



左圖：紅衛兵文藝宣傳隊在上海海外灘宣傳

下圖：“文革”中流行的由紅衛兵組成的“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在演出



採取消極態度呢？（當時，北大沒有參加北京市奪權委員會。）這從邏輯上也說不通。相反地，我們根本沒有奪權的野心，在羣衆大會上也祇是提出要求黨中央改組上海市委。熟悉當年歷史的人都知道，改組和奪權根本是兩回事，改組是由黨中央決定的，由新任命的幹部接替舊的領導班子，彭真為首的北京市委就是被黨中央毛主席改組的嘛。當然，因為我在文革初期的特殊身份，我這麼一講，批判曹荻秋，對於上海的羣衆，影響就很大。我說曹荻秋是走資派，這自然會給他造成很大壓力。

但是，歷史地看問題，我在上海的所作所為，沒有多少我自己的“獨創”，這都是當時的大趨勢，向當權派開火，炮打司令部，各級司令部都要用炮轟一轟，這是符合當時的“十六條”的。而且，北京到外地串連的師生，在各省市都是這麼做的。

我在上海期間，先後見到了張春橋和王洪文。我找張春橋談話的目的有兩個：第一，我們是應毛主席發動羣衆參加“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指示來上海的，應該向上海市委打招呼。張春橋既是上海市委的，又是中央文革小組的副組長，所以應該首先對他而不是別人說明來意。第二，瞭解上海發動羣衆的情況和意見。

我同張春橋談話開始就說明了來意，是毛主席讓我們來串連的。我們不知道應該怎樣具體宣傳毛澤東的思想和路線。張說，你們是從北京來的，是從毛主席身邊來的，來了就好。張說他不在上海，去處理安亭事件了，他首先談了事件處理的情況，表揚工人怎樣聽黨的話，接受勸阻，不上北京請願了，決定回上海鬧“革命”。然後他說，上海工人運動發動得好，學生較差。你們來了，要看看上海運動的特點（街頭辯論）。我告訴他，我們來後參加了羣衆大會。張說，你

們也要到下邊羣衆中去看看，向工人學習。我說，我們提出了打倒曹荻秋的口號，是否可以？張表示可以。張又說，曹發動羣衆不力，還說曹有什麼事都與陳丕顯商量，最後決定問題還是陳。我說，陳不是很早就參加長征的紅小鬼嗎？張說，有的幹部不也是過去為黨做過許多工作，現在“修”了嗎？後來，張問我住在什麼地方，聽說魏文伯讓你住在某某飯店？張的意思是我不要在那裏住。我說，我準備住在接待站安排的地方。張表示要給我找地方住，我拒絕了。

我和張春橋的全部談話內容就是這些，沒有不可告人的。而且張春橋儼然以黨中央領導人的身份對待我，我與他又是第一次談話（也是僅有一次），也感到拘束。談話約一個多小時。甄文君後來否認參加談話，是有思想顧慮的（法庭沒有給我看甄文君否認的證詞）。他知道張春橋說了陳丕顯的壞話，我沒有完全聽進去，所以，後來他又叫傅治文、陳葆華轉告我和孫蓬一，“曹荻秋是前臺，陳丕顯是後臺，要揭發陳丕顯的問題”。如果他沒有參加談話，不知道張的態度，他是不敢這麼做的。

我所以找張春橋談話，因為他既是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又是上海市委的負責人之一，我們到上海執行毛主席交的任務，自然應找他談話。同時，我是校文革主任，孫蓬一是副主任，我們不是羣衆造反組織的頭頭，我是從組織關係的原則出發找張的。當時，不接受“中央文革”的領導，接受哪裏的領導？

張春橋要我到工人中間去學習，因此，我後來找了當時擔任“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負責人的王洪文和潘國平，跟他們談過聯合起來批判曹荻秋，造上海市委的反。對王洪文，我就見過一次面，印象雖然不太好，但也沒有留下什麼更多的印象。我們曾經到上海的



上圖：上海“工總司”攻佔柴油機廠“聯司”據點時的情景



上圖：上海造反派成立的“文攻武衛指揮部”可以隨意抓人

工廠參觀和串連過，支持他們反對曹荻秋等。這些就是我在上海活動的全部經過。

向常溪萍同志深刻致歉

我到上海串連，最令我痛悔的就是參加了對常溪萍的批鬥，^[3]給常溪萍同志造成了嚴重的身心傷害。儘管常溪萍被迫害致死已30餘年，但是，我願意在這裏真誠地表達我對他的深刻歉意，願意作出認真懺悔。

中宣部副部長張磬石帶領工作隊到北大來，是秉承黨中央的旨意來的。其實，這和當年的反右一樣，也是高層領導出面，動員大家給上級黨委提意見。建國以後的每次運動，似乎都是這樣開始的。我自己呢，因為參加革命早，思想單純，對於黨內鬥爭和社會生活的複雜性領悟較少，許多時候都是用理想主義的眼光看待生活，看待黨的事業。這從前面所講，我在安子文問題上主動採取的向黨組織彙報的做法，就可以看出來，我是一貫如此。

回想起來，一九五七年反右鬥爭的時候，我是兩頭不沾邊，——我當時是在哈爾濱市委工作，人却在中國人民大學進修；既沒有參加哈爾濱市的幫助黨整風，給各級領導和黨委提意見，又沒有參加人民大學的大鳴大放。否則，以我這種直率的性格，準會把平日裏積累起來的對上級機關和領導的各種看法和意見一下子倒出來，那還不是劃右派一劃一個準，我準是個大右派。記得當時，是人民大學的肖前教授輔導我學哲學，他給我上輔導課，關於反右派的事情，他是反對劃右派的，更多的事他一句話都沒有說。我還問他，這是怎麼回事，他也沒有做任何解釋。

這樣，我對反右派鬥爭就沒有多少親身經歷，沒有能夠從中汲取什麼教訓。這一次，張磐石帶領工作隊到北大來，動員我給陸平和北大校黨委提意見，我就上當了，被利用了。我相信了他的話，講了真話，可是我給陸平提的都是具體工作中的意見，張磐石就上升到階級鬥爭高度，把北大當作是“爛掉了”的單位，把北大校園裏所謂的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看得非常嚴重。常溪萍對他的批評就是，第一，張磐石搞家長制，沒有民主作風；第二，張磐石太左了，把北大問題看得嚴重得很。常溪萍的批評，應該說是切合實際的。祇是當時我們並不知道常溪萍的這些正確認識。他們在工作隊領導內部爭論，我們在下邊的小幹部並不知情。

常溪萍是上海市委教育衛生工作部部長，華東師大黨委書記兼校長。他曾經擔任過北京大學社教工作隊的黨委副書記、副隊長。常溪萍一進校，本來是與張磐石的立場相一致的，他同樣出面動員過給陸平和校黨委提意見。後來常溪萍改變了立場，我們就認為他是“叛徒”，“出賣”了工作隊和北大的社教運動。因此，“文革”初期，在批判陸平和北大校黨委的同時，人們自然地會想到當年的常溪萍，認為他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黑幹將”，是社教運動的“叛徒”。

在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有一天，在北京大學開全校大會，參加中央全會的各大區和省市領導人，華東局的陳丕顯，西南局的李井泉，等等，都到北大來，“學習”開展“文化大革命”的“經驗”。事先，北大有人給常溪萍寫了一份大字報，這我是不知情的，我沒有參與，也不清楚參與者是誰。在召開全校大會的時候，在會場上，他們把大字報交給我，要求我把大字報轉交給江青。當時我也不可能仔細看這張大字報的內容，在會場上，我就把這張大字報轉交給江青。江青又把大字報交給陳丕顯，

要他帶回上海貼出來。後來許多人認為這張大字報是我寫的，有人說我自己講這張大字報是我寫的，這不是事實。但是在思想上，我當時確實是反對常溪萍的。我反對陸平，批判陸平，自然也是反常溪萍的。我到上海串連的時候，就住在華東師大。我們和華東師大的學生聯合開會，批鬥常溪萍，我在批鬥大會上發了言。師大的學生說他是走資派，我主要講他在北大社教運動的情況，說他是北大社教運動的“叛徒”（這和歷史上所謂向國民黨當局叛變投降是兩回事，因此，說我們誣衊常溪萍是“叛徒”的罪名是不能成立的）。我的發言，以及對常溪萍的態度，都是非常錯誤的，給常溪萍造成了很大的傷害。但是，常溪萍死于一九六七年，是被張春橋迫害而死，這個責任不應由我承擔。

後來聽到別人說，常溪萍在工作隊撤離北大的時候，曾經提出，不要因為社教運動的轉折而批判前一階段給陸平和校黨委提意見的積極份子。常溪萍批評張磐石的兩條意見都是對的，他要求保護社教運動的積極份子的意見也是正確的。所以才有彭真的話，“有人講不要批給陸平提意見的積極份子，說是批不得；打擊都打擊得，為什麼批不得？”想到這一點，我內心的負疚感就更沉重了。由於我的幼稚，我的錯誤，給常溪萍同志造成的傷害，讓我抱憾終身。我願意在這裏再次對常溪萍表示我的歉意。

江青的指責

我回北京以後，見到了王力。這是從上海回來兩三天的事。因為我到上海以前，王力跟我見過面，現在從上海回來了，也應該向王力

彙報彙報。當時王力是中央文革小組的，我就找了他，向他彙報了上海串連的情況。他沒有具體說什麼，祇說你們到上海還是進行了許多宣傳活動的，等等。彙報完畢，我就回學校了。

同樣，我也向李訥彙報了上海之行，她批評我們說，你們到上海去宣傳毛澤東思想，推動上海的“文化大革命”，為什麼不成立“毛澤東思想宣傳團”，而是叫“毛澤東思想捍衛團”？——當時，北京西城區有一個具有“保守”傾向的羣衆組織叫作“毛澤東思想捍衛團”，李訥批評我們，就是覺得我們也叫“捍衛團”，容易與保守派混淆起來。

這段時間，我還見過江青一次，並且受到她的嚴厲指責。這是在中央文革接見北京高校紅衛兵的頭頭的時候，開會以前，她先找了我，把我找到另一個房子裏。江青批評我說，你們到上海去串連，為什麼說是中央文革指使的？我說，我們沒有說過這樣的話——既然是毛主席派我們到上海，我們有什麼必要打中央文革的旗號呢？

不過，上海有些不知內情卻又非常“有判斷力”的人，的確以為我們是中央文革小組派遣的，陳丕顯就這樣看。那時候，上海的運動還沒有波及到陳丕顯。我在上海見到了他，我和孫蓬一找陳丕顯談過一次話，陳丕顯就問，你們是中央文革派來的吧？我堅決否認，我們是羣衆嘛，沒有什麼人派我們來，我們自己要來——我們心裏是理直氣壯，是毛主席派我們到上海；但是，李訥既然沒有說明，我們也不能公開張揚自己是毛主席派來的。陳丕顯看得很明白，他說，你是接受了指示來的。不過，他不知道我是聽了毛主席的指示才到上海的，他也不會這樣想，他以為我是接受了中央文革的指示，到上海造反來的。這大約也是後來指責我到上海煽風點火的原因之一。

註釋：

[1]曹荻秋（1909～1979），時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上海市市長。四川資陽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共。一九三二年被捕入獄。一九三七年出獄後即投身抗日救亡工作，歷任中共皖北特委書記，鹽阜行署主任；華東野戰軍十二縱隊政委，華東支前司令部副司令員等職。建國後曾任中共重慶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中共四川省委第三書記等職。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在上海逝世。

[2]陳丕顯（1916～1995），時任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福建上杭人。一九三一年由團轉黨，建國後歷任中共上海市委第四書記、第二書記、書記處書記，上海警備區政委等職。“文革”結束後歷任中共雲南省委書記，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武漢軍區政委，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政法委書記，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職。是中共第八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十一屆、第十二屆中央委員，中顧委常委。

常溪萍（1917～1968），山東萊陽人。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共。建國後曾任中共中央山東分局副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一九五六年六月，上海市委成立教育衛生工作部並於次年三月將高等教育科學工作部與其合併，常溪萍於一九五七年三月至一九六五年八月任該部副部長，一九六五年八月任部長。期間兼任華東師範大學黨委書記。一九六四年底參加北大社教工作隊，任工作隊黨委副書記。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七日，常給中央總書記鄧小平等寫信，反映對工作隊長張磬石的意見，並建議中央派人檢查張在北大的工作。三月二十日，中辦人員約常談話並寫了談話紀要，上報中央領導。三月三十日，鄧小平、彭真對常溪萍與中辦人員的談話紀要作出批示，鄧批評張磬石對“二十三條”是患得患失的，抵觸的。……再這樣頂牛下去，北大工作要受損失。四月底，常被增補為北大社教工作隊九人領導小組成員。

第十一章 奪權與分裂

軍訓和題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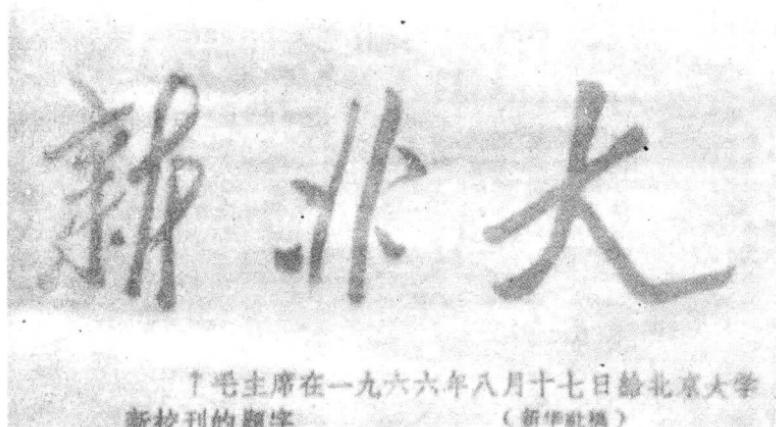
“文化大革命”運動進行到一九六六年的十二月份，中央發出通知，決定停止全國大串連，要求大中專院校的師生一律回本校，復課鬧革命。為此要加強組織紀律性，並且決定要派解放軍到學校，幫助搞軍訓。

從上海串連回來以後，就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我參加了一個中央文革召開的大專院校紅衛兵頭頭的會議，貫徹上述通知精神。我在這個會議上第一個表態響應中央號召，要求派解放軍到北大來搞軍訓。到北大來的是63軍，受到我們的熱烈歡迎^[1]。我自己當年就是從太南游擊隊裏走出來的，曾經是一名軍人啊。這時候，各校的師生都在外面跑野了，要想馬上收回來，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北大回來的學生最多最齊，回校率超過了百分之九十。別的學校都沒有回來多少。當時就有人講，到底是北大，搞得好，把學生都叫回來了。

一九六七年二月，63軍在學校幫助成立了新北大公社^[2]。新北大公社不是我聶元梓要拉一派勢力而成立的。在這以前，北京大學的學生組成了幾個小的紅衛兵組織，63軍在軍訓期間，進行了思想政治工作，在學生自願的原則下，把這幾個小組織聯合起來，成立了一個統一的羣衆組織，取名為“新北大公社”，主要是學生羣衆組織，也有教員和幹部參加。新北大公社的成立，還報了中央文革批准。不過我並沒有參加這個組織。

在陸平等人倒臺以後，北大把自己稱作“新北大”，就像彭真倒臺以

後李雪峰等人主持的北京市委稱作“新市委”一樣。毛主席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七日還給北大校刊題過詞。當時在校刊工作過的人對我說，你見到毛主席的時候，請他給咱們的校刊題個字。我請毛主席題字，毛主席很爽快地答應了。主席第一次題的字送來了，他還嫌沒寫好，又派人送來第二次題字。毛主席還寫了一封短信給我，大意是：“聶元梓同志：上次送來校刊的題字寫的不夠好，現再送來一個，如不好，仍可再寫。”這在當時都向全校公佈了。毛主席的手蹟很快就被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給要去了（我們的七人大字報底稿，也被博物館要走了）。真可惜，我當時沒有複印一份，留個底稿，現在全憑個人回憶，難以準確了。“新北大公社”的命名就是根據毛主席的題詞定的。



毛主席親筆題詞

祇聯合，不奪權

一過新年，形勢大變，在張春橋、姚文元的參與下，上海的造反派第一個起來，奪了市委和市政府的大權，並且受到黨中央毛主席的高度評價，從此，奪權之風吹向全國，這就是所謂的“一月風暴”。奪權的勢頭越來越大，“文化大革命”形成了新的高潮，原來設想的復課鬧革命也衝掉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奪權的時候，在北大搞軍訓的63軍部隊和學生一塊兒出去奪。中央號召革命造反派向走資派奪權，號召軍隊要支持地方上的左派奪權。我們也不知道怎麼奪，學生們到處跑著奪權，瞎跑了幾天，有跑到中央組織部的，有跑到華北局的，我也跟著上華北局去了。跑去以後，覺得不對勁，這是去幹什麼？學生還能取代華北局？可是不行動也不行，要響應黨中央毛主席的奪權號召啊。

我先冷靜下來，想一想，我理解黨中央的精神是說大聯合然後才能大奪權。毛主席號召，讓革命造反派聯合起來奪權是最高等指示。中央的文件和報紙上也是提倡，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我必須響應和緊跟啊。我就到地院去找王大賓，正好蒯大富也在那裏，還有其他學校和單位的人也在這裏，大家就商量如何聯合起來奪權。當時，上海奪權以後成立的機構，開始不叫“上海市革命委員會”，而是叫作“上海人民公社”，後來才又改名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我和王大賓、蒯大富商量，成立一個“北京公社”（全名為“北京革命造反公社”），為奪權做準備。說著說著，他們就都跑了，他們都不理睬我，就剩下我自己了。在地質學院落空

了，我就到清華大學去找蒯大富，蒯大富正在主持開會，在蒯大富那裏參加會議，計劃聯合的有工廠、機關、學校。我來了，大家都歡迎，願意和北大一起聯合奪權，但是會正在開，蒯大富又跑了。他不辭而別，把我們甩在清華大學，自己跑到市委那裏奪權去了。當時的奪權，好像是誰跑得快，誰先到，先把公章搶到手，權就是誰的了，所以蒯大富他們自己跑掉，就不會告訴我們了。

當時，人們以為奪權就是奪大印奪公章，把一個機關的印章拿到手裏，這就是奪權了。但拿到手以後怎麼辦？事先沒有想，祇是覺得被奪權的單位領導人就是走資派，反正不能叫壞人掌權。可是好人是誰？叫誰來掌權？事先一點兒想法也沒有，更沒有一個計劃。就是領著學生瞎跑，還要跑得越快越好，哪個學校的學生先跑到那個單位了，先入為主，就算是人家頭兒了。但是，就算這個學校是頭兒，也不一定就能掌權。幾個年輕學生，他們掌握得了這麼重要的權力嗎？

蒯大富跑掉了，這樣一來，我們也不好在清華呆著了。我們已經聯絡起來的一批工廠、機關、學校的羣衆組織，就決定在廣播事業局大樓裏設一個點，一個聯絡站。廣播事業局大樓在復興門外大街上，地點適中，便于全市四面八方的人們來往聯絡。當下就成立了一個大聯合的組織，叫什麼名字我記不住了，方方面面都有。我說，毛主席號召我們是聯合起來奪權，我們先聯合起來吧，至于怎麼奪權，我們都要聽毛主席黨中央的指示。中央一聲號令，我們馬上就去奪權（這是我當時的一個明確的想法，奪權要聽中央的。我們到高教部去奪權，就是聽了周總理的話去的）。我說，大家先登記一下，各組織要參加大聯合的都把單位、電話、聯繫人登記下來，都回去等著，祇要中央有了指示，我們就立刻通知你們，立刻就叫你們來，就去奪權。各

個造反派組織都是敲鑼打鼓地來，來了就算參加大聯合了，登記完畢，又喜氣洋洋地回去了。從門面上看，我們有多少多少組織，有多少多少人，搞得聲勢很大，實際上都是空的，沒有什麼具體行動，所以也就沒犯什麼大錯誤。

雖然說，“文革”發動起來不過半年時間，但我對於當下的奪權運動，已經有了自己的看法，已經從最初的堅信不移步步緊跟，向著獨立思考、冷靜分析轉變了。我畢竟比那些單純的大中學生、來自社會基層的工人農民們多一些工作經歷，對於黨政機關和各部門的情況瞭解多一些，對於政策性的問題也思索得多一些。我想，黨中央規定的“十六條”裏明明白白地講，黨的各級幹部分為四種情況，好的、比較好的、犯了嚴重錯誤的以及少量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後來又把這最後一類稱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並且明確指出，“在一般情況下，前兩種人（好的，比較好的）是大多數”。現在號召奪權，也是號召向不肯改悔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但是，“走資派”是相當模糊的概念，它的劃分依據是什麼？具體而言，應該向哪些人奪權？當然應該是向走資派奪權，總不能把所有的老幹部都打倒，把所有的權力都奪過來吧？老幹部不等於走資派，何況，即使是走資派，也還有可以改悔的，不能夠一概都打倒。我自己也是個“年輕的老幹部”，對於幹部隊伍，自認為是比較瞭解的。這樣，在如何奪權的問題上，我就有自己的考慮，這也影響到北大的學生，對奪權運動參加得比較少。

但是，在全國上下轟轟烈烈的奪權風暴中，我的這些想法是不可能公開地講出來的；不執行毛主席聯合起來奪權的號召，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就把毛主席號召羣衆聯合起來奪權的指示，特意在執行

上分為兩個階段，第一步是要做好羣衆組織的大聯合，把聯合奪權的口號喊得很響亮，行動却停止在聯合上。表面上搞得轟轟烈烈，但是，怎麼樣奪權，向誰奪權，我都堅持一定要聽黨中央毛主席的，等待中央有了明確指示再去奪權。

這時候，北京的幾個大學造反派頭頭非常活躍。蒯大富、韓愛晶都到市裏去奪權，譚厚蘭和王大賓也都有各自的一個攤子。蒯大富跑到市委奪了權，成立了“北京市奪權委員會”，派人到廣播事業局叫我去市委，都是造反派，我也不好拒絕，就到市委去了。蒯大富說，我們要奪權，你參加我們的奪權委員會吧。我說行啊，我回學校去，跟我們的學生說一說，你等我的回話吧。結果，我回去以後，却沒有給他們下文了。

在那種形勢下，奪權的行動，口頭上我不能說不參加，但是我心裏明白，我絕對不參加。我到了市委，看到那裏的情況，更覺得不能參加。

參加奪權的組織和人很多，亂七八糟的，把市委的辦公室搞得一塌糊塗。這些人也能掌權呀？還有，奪權的人們把新北京市委的負責人吳德、丁國鈺、劉建勳等人都關起來了。我想，你們把他們關起來做什麼？你們不是揹上包袱了嗎？關起來容易，你們怎麼放呀？（被工作組關起來的陸平等人，我們北大校文革都不知道應該怎麼辦，還覺得是個沉重包袱呢！）你們要是把舊北京市委的彭真、劉仁關起來，還說得過去，毛主席給他們定了案了。吳德、丁國鈺、劉建勳都是彭真和舊北京市委倒臺後新調來的，剛剛在北京工作了幾個月，犯錯誤也來不及犯大錯誤，他們能有什麼大問題？既不是走資派，也不是叛徒、反革命，要是說，他們原先所在的單位，出面揪鬥他們，如河南之于劉建勳，吉林之于吳德，那還說得過去，北京的造反派能抓住他們什麼問題？難道說，所有的

老幹部，統統都爛掉了，一個都不能要了？我在現場看了一下，見了那種亂鬨鬨的局面，更使我堅定決心了。我不能跟你們一起奪權。你們掌不了權啊。奪了權讓誰來掌權？就交給那些學生呀？難道學生就能掌權？難道我就能掌權？北大的事情已經把我搞得焦頭爛額，我管得了那麼多呀？

高教部奪權起風波

後來，周總理有一個指示，他說，奪權要在本系統奪權。周總理還說，別的學校都到高教部去了，你們北大的學生也應該去啊。北大學生就跑到高教部去奪權。在校外，北大祇是實實在在地參加了這一次奪權。北大到高教部奪權，搞軍訓的63軍部隊帶著學生去參加了，但我並沒有跟學生一起去。

到了高教部，學生們到處找公章。北大剛剛畢業留校的趙建文說，拿上大印了，就算奪了權。但下一步怎麼辦，心中一點兒底都沒有。到了高教部才知道，北師大呀，地質學院呀，許多高校的學生都跑去了，都跑到高教部奪權，都是要在教育系統奪權。趕來奪權的人一多，自然就亂了。人多嘴雜，意見沒有辦法統一。王力、關鋒、戚本禹和受他們影響的學生組織，支持高教部的幹部盧正義出來掌權，北大學生認為盧正義^[3]歷史上有問題，是叛徒，反對他上臺。兩邊為此爭執不下。還有《紅旗》雜誌社的林傑、學部的造反派吳傳啓等都支持盧正義。北師大的羣衆組織“井岡山”和它的頭頭譚厚蘭，跟著中央文革的指揮棒，都支持盧正義掌權。

因此，圍繞高教部由誰來掌權的問題，參加高教部奪權的各高校學生發生了爭執。我們是堅決反對分裂羣衆的，祇要把盧正義的問題查清楚，羣衆的意見，誰是誰非，馬上就明白了，意見也就統一了。可是，不等我們把問題查到底，中央文革的人就出面干預，把局面搞得更亂，更不可收拾了。

陳伯達以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中央領導人的身份，強迫北大學生撤離高教部。陳伯達給我打電話，叫我把北大的學生叫回學校，並且要向譚厚蘭道歉。王力、關鋒、戚本禹（後文簡稱王、關、戚）也紛紛出面了。王力和關鋒也給我打電話施加壓力。他們說，本來是找孫蓬一的，沒有找到，那就跟你說吧——聽說你們北大學生要兵分三路，一路衝中央文革，一路衝北京軍區，一路衝《紅旗》雜誌社（當時中央文革決定，要是衝這三個地方，就以反革命論罪）。你們為什麼要衝？好，你們來吧，我們不怕，我們等著你們呢！我聽了電話，感到莫名其妙，北大學生哪裏會有這種事情？這純粹是造謠！可是，他們代表中央文革，他們講了話，我就得有所反應啊。在這些干擾下，我們被迫放棄對盧正義問題的追查，轉而在北大進行內部檢查，看是否有與這些“衝擊事件”有關的人和事。

與此同時，戚本禹就拉住北師大的譚厚蘭，開始拉派了。《紅旗》雜誌的林傑是文革初期非常活躍的“左派”筆桿子，和譚厚蘭關係很好；林傑又和戚本禹關係很好，他們都是《紅旗》雜誌社的。這樣，戚本禹就鼓動譚厚蘭出頭反對北大，北大的學生當然不幹，就和譚厚蘭發生矛盾，互相爭執。譚厚蘭的後臺是戚本禹。戚本禹造謠說，北大的軍訓部隊和學生一起到高教部衝譚厚蘭那一派，解放軍摟抱女學生，污辱了女學生，你聶元梓在學校遙控指揮，你必須到高教部給譚厚蘭道歉。

我把中央文革的指責對 63 軍說了，63 軍對這事很重視，他們在高教部也聽說了，弄得非常緊張，有部隊官兵摟抱女學生，這還了得？63 軍連夜在內部追查，一個戰士一個戰士都問過了，在高教部有什麼舉動，結果沒有查出上述行為來。63 軍馬上給中央文革寫了報告，澄清這件事。

可是陳伯達和戚本禹還不放過我，硬逼著我到高教部去給譚厚蘭道歉。道歉就道歉吧，我算是能夠忍耐的。他們還讓我把到高教部奪權的北大學生叫走，叫走就叫走，外面的局面難以應付，我們正想回學校去呢。我到了高教部，找不到譚厚蘭，她躲著不見我。我就是要向她道歉，她也得露面呀。我等了好久，沒有找到譚厚蘭，那就算了，我也不能沒完沒了地等下去。我和 63 軍的同志一塊兒把北大的學生叫回學校。在學校，還在學生中間查了一番，看是否有人混水摸魚有流氓行為，結果也沒有查出來。根本就沒有這回事嘛。

這件事使我對王力、關鋒、戚本禹，還有陳伯達，有了一些認識。怎麼作為中央文革的領導人還說謊話呢？憑空捏造，誣陷學生和解放軍，這算什麼行為？

從此以後，北京的造反派就分裂了。地質學院王大賓領導的“東方紅”有些人就開始搞活動，反對北大，和北師大的譚厚蘭一塊兒搞。這時候，地質學院、北農大、北師大這幾個學校都有一些學生反北大，這個局面是被王力、關鋒、戚本禹挑動學生搞分裂造成的。

從“一·一五”搶劫檔案事件看謝富治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凌晨一時十五分，中央統戰系統“紅色聯絡站”二百餘人，把全國政協自建國以來的全部機密檔案（包括人事檔案）洗劫一空，開創了北京市打、砸、搶的先例。二時二十分，“紅色聯絡站”原班人馬又跑到統戰部，將統戰部一九四九以來的全部機密檔案一百多櫃以及大批資料、文件搶劫一空。“紅色聯絡站”的這一行動，得到了學部吳傳啓支持。搶走的文件分送到許多地方，如學部、民族歌舞團、近代史所。在搶劫、運輸過程中，散落的文件有好幾百件。當天，民族學院紅衛兵總部（民院抗大）和統戰部的部分羣衆把支持“紅色聯絡站”的幹部洪濤、劉郢扭送到公安部，通過張經武向周總理彙報了這件事。周總理指示：由三方面（中央並公安部為一方，搶檔案的為一方，民族學院紅衛兵總部為一方）協商追回檔案。下午，國務院內務辦公室副主任嚴佑民，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副局長曹幼明親臨現場。嚴佑民說：“我們來是總理指示的，總理很關心，怕國家機密被弄走。”並指出：“這個事件本身是完全錯誤的”，“是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搶檔案事件”，“這是嚴重的政治事件”。但是，事隔一天，到一月十六日，劉郢、洪濤被公安部釋放了。

一月十七日，公安部辦公廳秘書處印發了三千份《公安部某負責人就一月十五日“紅色聯絡站”接管中央統戰部檔案問題的講話》，全文如下：

一、《徹底摧毀中央統戰部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紅色聯絡站》的革命左派同志，為了保護國家檔案，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晨，接管

了中央統戰部一批檔案，並封存，這完全是革命行動，大方向是正確的。

二、中央統戰部革命造反團的一小撮人，盜用公安部的名義，非法綁架、鬥爭、拘留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洪濤、中央統戰部《東方紅公社》劉郢、林祉成等革命同志。這是犯法行為、是直接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行為。

中央民族學院文革臨時籌委會材料組，又於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十時印發傳單，佯稱“中央民族學院革命造反派紅衛兵總部……於一月十五日……把現行反革命份子洪濤等人扭送公安部。公安部已簽字拘留。”特鄭重聲明：洪濤、劉郢等同志是革命左派，大方向是正確的。說“公安部已簽字拘留”了他們，這是徹頭徹尾的造謠。

三、公安部接待站的個別人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晚十一時五十三分，趁接待站來訪人員較多，秩序混亂之際，不分是非逮捕了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韋清風同志，是完全錯誤的，是違法亂紀的。

事後，經我部調查瞭解，韋清風同志是革命左派，並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上午宣佈釋放，公開道歉予以平反。對上述所犯錯誤的有關人員，我們已責令其作公開檢討，並予處理。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辦公廳秘書處印

一九六七年元月十七日

學部和民族學院的一派召開大會，歡迎“英雄”回來。會議的組織者將民族學院紅衛兵總部的頭頭鄭仲賓抓到會場，並以“迫害革命左派洪濤”名義，扭送到公安部關押十五天。

“一·一五”事件是一個“大是大非”問題。每一個人，每一個組織都要在這一事件面前表態。我和北大的大多數羣衆認為這是一起嚴重的政治事件。民委統戰系統為此也分成兩大派。對謝富治這樣處理，我非常不理解。



聶元梓與鄭仲賓

對待“二月逆流”問題，北京市分成兩大派

一九六七年一月北京農大東方紅曾經發動過一次“炮打譚震林”。後來戚本禹講，“反譚震林是不對的，譚震林是紅小鬼”。農大東方紅的同志承認了反譚是不對的，向譚震林同志請罪。一條向譚震林請罪的標語就貼在北大海灘校門口的圍牆外。

事情剛過了一個月，風雲突變。大約是三月八日，由師大“井岡山”、學部聯隊、新人大公社、石油學院的“北京公社”、鋼鐵學院的“九一九”、民族學院“東方紅”，提出“打倒譚震林！”、“堅決反擊二月資本主義復辟逆流！”。這些單位沒有一個是農口單位。農大“東方紅”的領導也不知所措。他們的動態員到“新北大公社”動態組瞭解情況。“新北大公社”動態組也派人去瞭解情況，當時得到的情況是：“中央開了會，譚震

了中央統戰部一批檔案，並封存，這完全是革命行動，大方向是正確的。

二、中央統戰部革命造反團的一小撮人，盜用公安部的名義，非法綁架、鬥爭、拘留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洪濤、中央統戰部《東方紅公社》劉郢、林社成等革命同志。這是犯法行為、是直接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行為。

中央民族學院文革臨時籌委會材料組，又於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十時印發傳單，佯稱“中央民族學院革命造反派紅衛兵總部……於一月十五日……把現行反革命份子洪濤等人扭送公安部。公安部已簽字拘留。”特鄭重聲明：洪濤、劉郢等同志是革命左派，大方向是正確的。說“公安部已簽字拘留”了他們，這是徹頭徹尾的造謠。

三、公安部接待站的個別人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晚十一時五十三分，趁接待站來訪人員較多，秩序混亂之際，不分是非逮捕了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韋清風同志，是完全錯誤的，是違法亂紀的。

事後，經我部調查瞭解，韋清風同志是革命左派，並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上午宣佈釋放，公開道歉予以平反。對上述所犯錯誤的有關人員，我們已責令其作公開檢討，並予處理。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辦公廳秘書處印
一九六七年元月十七日

學部和民族學院的一派召開大會，歡迎“英雄”回來。會議的組織者將民族學院紅衛兵總部的頭頭鄭仲賓抓到會場，並以“迫害革命左派洪濤”名義，扭送到公安部關押十五天。

“一·一五”事件是一個“大是大非”問題。每一個人，每一個組織都要在這一事件面前表態。我和北大的大多數羣衆認為這是一起嚴重的政治事件。民委統戰系統為此也分成兩大派。對謝富治這樣處理，我非常不理解。



聶元梓與鄭仲賓

對待“二月逆流”問題，北京市分成兩大派

一九六七年一月北京農大東方紅曾經發動過一次“炮打譚震林”。後來戚本禹講，“反譚震林是不對的，譚震林是紅小鬼”。農大東方紅的同志承認了反譚是不對的，向譚震林同志請罪。一條向譚震林請罪的標語就貼在北大海灘校門口的圍牆外。

事情剛過了一個月，風雲突變。大約是三月八日，由師大“井岡山”、學部聯隊、新人大公社、石油學院的“北京公社”、鋼鐵學院的“九一九”、民族學院“東方紅”，提出“打倒譚震林！”、“堅決反擊二月資本主義復辟逆流！”。這些單位沒有一個是農口單位。農大“東方紅”的領導也不知所措。他們的動態員到“新北大公社”動態組瞭解情況。“新北大公社”動態組也派人去瞭解情況，當時得到的情況是：“中央開了會，譚震

林說了話”，就這麼幾個字。我們還瞭解到，那些組織下一步還要打倒李富春、李先念、陳毅、余秋里，最後反總理。我們能根據這一點情況，跟著他們走嗎？所以，新北大公社總部三天沒有表態。公社內地球物理系戰鬥團早就表態了：“打倒譚震林！”他們還到公社總部來指責校文革和公社總部為什麼還不表態。“新北大公社”面臨內外的壓力。後來戚本禹提出，收回他一月份說的“譚震林是紅小鬼”的講話，新北大公社總部才正式表態。先是提出“炮轟譚震林！”，再升調為“打倒譚震林！”。

約在三月十二日，在礦業學院紅代會辦公處，我主持紅代會核心組擴大會議，研究反擊“二月逆流”問題。核心組成員都參加了會議，譚厚蘭遲到。紅代會作戰部長講情況，農大代表講情況，說的事都是一月份以前的事。許多單位要師大介紹情況，師大代表拒絕。農大代表快講完了，譚厚蘭才來到會場。代表都非常希望她講話，問她有什麼新情況，突然提出打倒譚震林。她說：“我沒有什麼可講的，我也沒有什麼材料，我們就是要反他！”得不到新材料，可是她又很堅決地反譚震林。各大學又怕落後，很想知道有什麼根據。我說：“大家看看怎麼辦？”韓愛晶提出紅代會組織全市大游行，時間就是明天。各校沒有反對就通過了，由我向‘中央文革’請示。我到套間去打電話，一會兒回來，說：“可以。”有人問，是否中央批准了？我說：“沒有，我把紅代會的決定反映給辦事組的工作人員，講了明天的行動和口號。辦事組的人沒有表示什麼意見，這就是同意了我們的行動。”

以後情況就明顯了。地派有幾個學校按照中央文革的部署開始攻擊幾位副總理和老師，揪副總理的後臺。

地派高喊“打倒譚震林”，天派對譚震林提“打倒”，對其他副

總理是“炮轟”，即認為是人民內部矛盾，反對揪後臺，反對炮打周總理。從此北京羣衆組織對“二月逆流”問題分成兩大派。

事實證明，所謂“二月逆流”是老帥們和幾位副總理對江青、陳伯達、康生等中央文革的人的罪行的聲討和抵制。下面廣大羣衆也是以實際行動對“四人幫”的倒行逆施進行了抵制。現在有的人說，不管是“炮轟”還是“打倒”，都是迫害老幹部，其實是並不一樣，是有原則區別的。

“四·一事件”及“炮打謝富治”

一九六六年末，北師大譚厚蘭，採取了兩個出人意料的行動：一是在北京造“工業學大慶”展覽的反，說展覽突出了劉少奇的資產階級路線。二是在山東曲阜砸孔廟，造孔夫子的反。她開創了造各式展覽的反之先河。當時在北京民族宮有民族事務展覽。民族學院和民委系統的兩派都在爭奪對展覽的批判權，一些高校也介入其中。雙方矛盾愈演愈烈，以至發生了民族宮“四·八事件”。事後，兩派都發表聲明指責對方。聲明的簽字單位各有幾十個，這件事等於向社會公開表明存在兩大派。

一九六七年民族宮“四·八事件”北大去了五十來人，事件中挨了打。事件過後，地派仍然不依不饒。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一日，地質學院東方紅帶領六個院校，開了六輛廣播車，以民族宮事件為由，來北大興師問罪。其口號遠遠超出了事件本身：“新北大公社是老保組織”、“新北大公社是二月逆流派”、“聶元梓從市革委會滾出去”、“聶元梓從紅代會滾出去”、“北大校文革壓制真正的造反派”。北大的學生被他們驚動，都

湧出來，把校門關起來，跟他們辯論。事態繼續發展就會形成武鬥。他們畢竟是外面來的，比北大學生人數少，真的動了手，他們準會吃虧，但會引來更大的麻煩。我心裏明白，不能讓學生打學生，不能在北大發生這樣的武鬥。我在廣播臺，通過播音員告訴北大學生，不要動手；告訴外校學生，你們來北大鬧事是不對的。我歡迎外校的學生給我、給校文革提意見，但是不能用這種方式。我要北大的學生打開校門，讓他們出去。

晚上，我召集了校文革及其他有關的人，有孫蓬一、李清昆、姜同光等（記不清還有誰了）開了五六個人的小會，讓他們對當前運動中發生的一些問題，有一個清醒的認識。我講了文革形勢和王力、關鋒、戚本禹、謝富治的問題。受會上氣氛的感染，散會後，孫蓬一回到學校，自己召開了全校大會。一股腦地把我向他們講的問題全端出來了。他的講話富有煽動力，會場上羣情激動。看到事態有點失控，李清昆著急，跑到三公寓來找我說：“孫蓬一把你剛才講的話向全校羣衆講了，這事可怎麼辦？”要我馬上去阻止孫蓬一。我到了大會的會場，孫蓬一仍然在慷慨激昂地講話，並且激起一陣陣掌聲，講得羣情激憤。

孫蓬一大會上講話，我心裏急得不得了，我又不能當眾制止他講下去。我就給他遞條子，要他別講下去了，連遞了三次紙條，他都沒有理睬。結果呢，孫蓬一的講話把學生們的情緒煽動起來，學生們當天晚上就上街了，貼了很多反對謝富治的標語，還有一批學生到公安部去，要揪謝富治。我沒有辦法控制局面，祇好再派學生出去，把那些反謝富治的標語覆蓋起來。這樣，一批學生在前面張貼反謝富治的標語，另一批學生就在後面把他們剛剛貼出的標語覆蓋了。同時我派一些人到公安部門口去，把揪謝富治的學生都攔截回來，儘量縮小影響。後來，在中央文革召開的羣衆組織的會議上，我為這件事情受到批評，又做了檢討。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上午（實際在午飯後），謝富治在人民大會堂召集一些高校開會，說是要解決北大和地質的矛盾。我、孫蓬一、動態組長胡宗式三人參加了會議。會議一開始，謝富治說：“你們北大和地質學院‘東方紅’的話我不聽，聽聽其他學校的意見。”這句話貌似公允，實際上一屁股就坐到地質的一邊。因為來北大鬧事的是六個院校，地質學院“東方紅”不說話還有五家。這樣會場上一邊倒地批判北大，我實在忍不住了，說：“謝副總理，我講兩句。”他大手一揮，“你不要講，我不聽。”這樣在整個解決兩校矛盾的會議上，我們不能發一言。我們走出會場後，地質學院的二十多名學生還追上來，攔住我們，對我們謾罵。下午我在小範圍講了，謝富治是和王、關、戚一夥的。

有一段時間，江青等人都以為是我的助手孫蓬一在鬧事，因為孫蓬一在公開場合最活躍。其實，我和孫蓬一在反對王力、關鋒、戚本禹的大方向上是一致的，祇是方式方法不同罷了。孫蓬一這麼一講，過早地暴露了我們的意圖，讓王力、關鋒、戚本禹等把我們看作是眼中釘，用各種手段壓制我們，把我們搞得非常被動。不過，他的講話也有積極意義，就是公開亮出了反對王力、關鋒、戚本禹的旗幟，這樣，全北京市以至外地反對王力、關鋒、戚本禹的羣衆組織，都來和我們聯繫，互通情況，共同戰鬥了。

天派、地派的分裂

首都高校紅衛兵在文革初期先後組建了三個紅衛兵司令部，一司以師大為主，二司以北航為主，三司以清華、地質為主。北大沒有參

加任何一個司令部。

中學也有多個組織。大中學校開始並沒有明顯分成兩派。兩派分裂是從高教部奪權開始的。兩派的根本分歧是對王、關、戚的態度，對總理的態度。我們北大是反王、關、戚的，是堅決保總理的。參加天派的單位並不是都明確這一點的。另一派則是緊跟王、關、戚的，反北大的。這種認識不是現在總結的，是當時就有的。一九六七年六月底（或七月初），北大學生劉志菊到北京機械學院“東方紅”（地派），見到了許維綱，許維綱談了對北京文化革命形勢的分析。他的主要觀點是：當前北京文化革命主要是總理派和文革小組派之間的矛盾。這一次你們北大站錯了隊，你們站在了總理的一邊。他還說：地派的後臺姓林。劉志菊問他：是林傑嗎？許答：比林傑大得多的“林”。兩派這樣的本質分歧，不是所有單位、所有羣衆都明瞭的。但是，主要組織領導人是清楚的。

參加兩派的單位，實際上不止是高校，也涉及到中學、政府機關、工廠、企事業單位、研究院所等。往往是一個單位中的一派參加了地派，另一派則參加了天派。兩派的名稱起初是叫師大派、北大派（奪權時），參加單位比較少。隨著時間的推移，參加的單位多了，名稱轉成“炮轟派”“打倒派”（反擊“二月逆流”時），以後變成了“天派”、“地派”。中學分成了“四、三”、“四、四”派，中學紅代會負責人李冬民支持北大。

北京市兩派不是我聶元梓製造的，而是中央文革製造的。為什麼這樣說呢？看一看反擊“二月逆流”的事就清楚了。所謂“二月逆流”，簡單地說，就是中央開會時幾位副總理、幾位老帥對當時文化革命不滿，對中央文革不滿，在會上提意見，發了脾氣。這件事被看作劉少奇勢力的反撲，被毛澤東主席定為“資本主義復辟逆流”。反擊“二月逆流”的第一個目標是譚震林。首先提出“打倒譚震林”、“堅決

爲他就是一個學生，很年輕，也沒有更多的經驗。蒯大富反過江青，所以江青就不喜歡他，又沒有辦法把他弄掉，就把他塞到“天派”裏頭。還有韓愛晶，根本不是我拉他，是江青他們劃拉人馬，把他和北大劃拉到一邊來。學生組織之間有不同意見是正常的，江青就利用學生的幼稚和單純搞陰謀詭計。彭總（彭德懷）就是他們授意，讓地質學院的紅衛兵從四川抓回來的，就關在北航韓愛晶那裏。本來彭總是地院的王大賓從四川三線那裏弄來的，交到韓愛晶那裏看起來。他們爲什麼不把彭總交到北大？他們不敢交，他們知道北大的觀點，知道北大是不怎麼聽中央文革話的，知道北大成了反對王力、關鋒、戚本禹的據點了。

正式場合提出天派地派說法是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中央文革召開北京各校羣衆組織會議上，宣佈王力、關鋒問題時，江青講天派是北航、北大、清華等校，地派是地質、師大等校，天派要從天上落下來，地派要從地下鑽出來，意思是你們要聯合，從此才正式叫起天派和地派。

還有，我從來不接受所謂“天派”、“地派”的劃分，也不接受“五大領袖”的提法。所謂“天派”、“地派”是很模糊的。其實，北大、清華和北航，從來沒有形成真正的派系，我和蒯大富、韓愛晶等都沒有在一起串聯或者開過任何“天派”的會議，相反地，我們在很多事情上都是有分歧，各有各的觀點，意見和行動都是不完全一致的。“五大領袖”的帽子，當時我就不同意，我不是“領袖”，我不是拉羣衆搞派性，我就是根據黨中央《五·一六通知》，根據毛主席反修防修的指示，參加“文化大革命”，談何“領袖”？

“對派性也要做階級分析”

明明是江青、康生、陳伯達指使王力、關鋒、戚本禹等人在羣衆組織中大搞派性活動，製造分裂，但是，他們又借著批派性整我們。我們不是搞個人主義，小團體主義，拉幫結派。我們與王力、關鋒、戚本禹及其後臺，還有謝富治的鬥爭是政治原則的鬥爭，不能把我們的鬥爭混同為小山頭、小團體主義的鬥爭。所以，我認為對派性也要進行階級分析。我忍無可忍，就回敬他們一下子。一九六八年的春天，大約二三月間，在北大，我找了魏杞文談我的觀點，又找趙建文幾個人，佈置寫了一個報告：“對派性也要進行階級分析”，是寫給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領導人。報告由魏杞文起草，經我修改以後用兩個不存在的戰鬥隊的名義發出去的。

為什麼寫這個報告？就是因為江青他們在羣衆中製造分裂，煽動派性，挑動羣衆組織互相鬥爭；但是，他們卻又以批判派性的藉口整我們。在他們控制的輿論中，把我們和王關戚的鬥爭，反對他們打倒所有的老幹部以便安排他們的勢力掌權，並且挑動武鬥，也說成了一種派性。我的意思就是要分辨這種情況，我們和“地派”的鬥爭，也是和中央文革某些人的鬥爭。我們不是反對“地派”中的學生羣衆。“地派”的有些人則是受中央文革指使的，他們搞派性，是在替中央文革排除異己。因此，北京的高等院校裏，表面上看是兩派在鬧，實際上是有中央文革在操縱，我們是在與中央文革那幫人做鬥爭。總之，這個報告是針對中央文革分裂羣衆而寫的。這報告沒有用個人的名義，用的是兩個並不存在的戰鬥隊的名義（是我們編的一個叫“獨立寒

秋”，另一個叫“傲霜雪”），這是爲了自我保護，要是我自己出面，那被江青他們追究起來，又成爲我的一條罪狀了。我就假裝是學生們交給我的，要是追查起來，就說那兩個戰鬥隊已經解散，那些學生也找不著了。北大上萬名學生，我到哪裏去找？

這篇報告是請中央文革辦公室轉送的。毛主席看了這篇報告，非常欣賞，做了批示。毛主席的批示，江青扣下來，沒有對我講。她祇是對我說，“你們戰鬥隊的那個報告，毛主席批了。”從她的口氣聽出來，毛主席對這個報告是很欣賞的。後來，在《人民日報》發表過一個短評，標題用的就是《對派性要進行階級分析》，內容是講派性也是階級性，講“派別是階級的一翼”；這句話是毛主席講的，是毛主席對“對派性也要做階級分析”這篇報告的批示。但是，毛主席的批示全文還有什麼別的內容，江青就沒有對我透露了。

這份報告送上去，批回來，我這時還不知道。北京衛戍區的幹部哈斯爲這件事情到學校裏來，我正好在外邊開會。哈斯找到一個學生，也姓聶，名字記不清了（這份報告是經這位姓聶的學生的手印刷的）。和哈斯一接觸，聶很緊張，不知道是吉是兇，他給我打了一個電話，說“不好了，家裏出了事了”。我問他，“出什麼事了？”他說，“衛戍區來了人，叫哈斯，他們逼我把報告的底稿找出來，交給他。我說這底稿一時半會兒找不見，他們就讓我下午一定找好了給他。還問報告都交給誰了，要名單。”這個學生不知道問題何在，以爲要倒楣，就跑掉了。他跑到頤和園躲了起來，不敢回學校去。

這件事有誤會。哈斯是衛戍區派去的，那時候軍人本來就威風，哈斯又說得很嚴肅，好像是有什麼嚴重問題，就把姓聶的學生給嚇壞了。我心裏有底，我自己的動機我自己清楚，這個報告我清楚是怎麼一

回事。可是，這報告打上去以後發生什麼情況，我就知道了。這個報告本來是送給毛主席及中央首長的，怎麼會是衛戍區來人追這件事呢？我也怕出了什麼問題。我就告訴這個姓聶的學生說，“你不要怕，不要躲，不會有什麼事的，有事也找不到你頭上。你就告訴他們說，報告交到上邊了。底稿不要交，就說找不著。”

接著，我也想摸一摸中央文革的情況，看看對這個報告有什麼反映，我就給中央文革寫了一個報告，說是有緊急的事情，要求江青接見。江青接見我，我就講了這件事情：本來是給主席寫了一個報告，現在衛戍區派人來查，把學生給嚇跑了，我也不清楚這是怎麼回事。結果，江青告訴我，是謝富治派衛戍區的人去要報告的，謝富治聽說毛主席很欣賞這個報告，他想看看這份報告，江青也想看看這份報告，所以派衛戍區去要。我就說，你江青、謝富治要看這個報告，打個電話給我就行了，派了衛戍區的人去直接找學生，哈斯又那麼威風，學生以為出了什麼問題，還不嚇壞了？

註釋：

[1]據《北京大學紀事》，陸軍第63軍和軍委裝甲兵一千多人組成的軍訓團於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進入北大組織師生進行軍政訓練，二月十八日，軍訓團撤離北大。

[2]據《北京大學紀事》，“新北大公社”於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五日召開成立大會，公社總部主要成員先後有：夏劍豸、盧平、劉沖、孫月才、李長嘯等。

[3]盧正義，原高教部政教司副司長。文革中為高教部《延安公社》負責人。

[4]洪濤，原學部民族研究所幹部。文革中為民族所文革組長，“學部聯隊”負責人。劉鄧，原中央統戰部宗教處副處長，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副局長。文革中為中央統戰部“東方紅”負責人。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日因所謂“參與‘五一六’”

“反革命陰謀活動”被監護審查，一九七五年五月解除監護，定為“五·一六”反革命份子，開除黨籍。一九八〇年經中央統戰部復查，恢復十一級的行政級別，補發工資並恢復黨的組織生活。

第十二章 “除隱患”始末

“隱患”何在？

經過高教部奪權的活動，以及上海“一月風暴”之後到處奪權的風潮，使我有了一個明確的認識和看法：“文化大革命”叫王力、關鋒、戚本禹他們搞壞了，羣衆組織被他們分裂了。中央說要搞大聯合，你們怎麼從中挑撥是非，造謠說謊，製造矛盾，分裂羣衆？就是從這時候起，我對王力、關鋒、戚本禹他們的看法變了，他們是陰謀家野心家，他們是在破壞“文化大革命”，是在干擾毛主席的戰略部署，是繼續進行“文化大革命”的隱患。他們的目的就是由他們自己的勢力奪權掌權，甚至叫叛徒掌權。

從此，我就開始注意他們的言行。一九六七年春天，在籌備成立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和北京市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之時，我和有關方面接觸多了，關於王力、關鋒、戚本禹，積累的材料多了。王力、關鋒、戚本禹一夥在北京市是拚命地奪權，學部的周景芳、林傑的妻子王乃英、關鋒的妻子周英等等，都進入了北京市革委會的預選名單。我以為當時受命主持北京市革委會籌備工作的謝富治是上當受騙了，認為王、關、戚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隱患。我認為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不應該這麼亂，怎麼這一幫人這麼弄？我認為他們就是繼續進行“文化大革命”的隱患，所以，要把他們搞清楚，要抓他們的後臺。我自己不便直接出面，就讓孫蓬一找幾個可靠的人，選擇了趙建文等，在北大成立了“除隱患戰鬥隊”，專門搞王力、關鋒、戚本禹的材料，追查他們的後臺。

秋”，另一個叫“傲霜雪”），這是爲了自我保護，要是我自己出面，那被江青他們追究起來，又成爲我的一條罪狀了。我就假裝是學生們交給我的，要是追查起來，就說那兩個戰鬥隊已經解散，那些學生也找不著了。北大上萬名學生，我到哪裏去找？

這篇報告是請中央文革辦公室轉送的。毛主席看了這篇報告，非常欣賞，做了批示。毛主席的批示，江青扣下來，沒有對我講。她祇是對我說，“你們戰鬥隊的那個報告，毛主席批了。”從她的口氣聽出來，毛主席對這個報告是很欣賞的。後來，在《人民日報》發表過一個短評，標題用的就是《對派性要進行階級分析》，內容是講派性也是階級性，講“派別是階級的一翼”，這句話是毛主席講的，是毛主席對“對派性也要做階級分析”這篇報告的批示。但是，毛主席的批示全文還有什麼別的內容，江青就沒有對我透露了。

這份報告送上去，批回來，我這時還不知道。北京衛戍區的幹部哈斯爲這件事情到學校裏來，我正好在外邊開會。哈斯找到一個學生，也姓聶，名字記不清了（這份報告是經這位姓聶的學生的手印刷的）。和哈斯一接觸，聶很緊張，不知道是吉是兇，他給我打了一個電話，說“不好了，家裏出了事了”。我問他，“出什麼事了？”他說，“衛戍區來了人，叫哈斯，他們逼我把報告的底稿找出來，交給他。我說這底稿一時半會兒找不見，他們就讓我下午一定找好了給他。還問報告都交給誰了，要名單。”這個學生不知道問題何在，以爲要倒楣，就跑掉了。他跑到頤和園躲了起來，不敢回學校去。

這件事有誤會。哈斯是衛戍區派去的，那時候軍人本來就威風，哈斯又說得很嚴肅，好像是有什麼嚴重問題，就把姓聶的學生給嚇壞了。我心裏有底，我自己的動機我自己清楚，這個報告我清楚是怎麼一

我們還是沒有政治經驗，在力量對比非常懸殊的情況下，就開始和王力、關鋒、戚本禹鬥上了，還要追他們的後臺。一追才發現，他們的後臺就是“中央文革”，就是康生、江青、陳伯達，謝富治是他們的幫兇。

為什麼火力集中在吳傳啓身上

一九六七年上半年我們提出打倒潘梓年、吳傳啓^[1]，這二人都是學部聯隊的人。打潘梓年是因為他是“大漢奸”潘漢年的弟弟，好作目標，當時潘漢年的問題沒有平反。吳傳啓是主攻方向。

吳傳啓是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的，曾和關鋒等人一起以撒仁興為筆名發表過許多文章，解放前吳傳啓是武漢的國大代表、國民黨員，什麼時候加入共產黨我們不清楚。“文革”初期，他首先在學部造反，稱為左派。由於關鋒在學部工作過，因而和吳傳啓等人關係密切。關鋒、戚本禹把學部和師大作為自己的嫡系部隊。譚厚蘭是師大畢業生，分配到《紅旗》雜誌社，後來又回到師大培訓，因而在師大參加“文化大革命”，也是由於這層關係，譚厚蘭和林傑等人非常密切（林傑曾說：政治鬥爭要結成死黨^[2]）。林傑當時在《紅旗》雜誌社工作^[3]。在一九六七年初，有幾支隊伍是引人注意的：一是吳傳啓控制的“學部紅衛兵聯隊”，二是學部民族研究所洪濤所控制的民委統戰系統的“紅色聯絡站”，三是盧正義所控制的教育部“延安公社”^[4]，四是譚厚蘭控制的師大井岡山。他們步調一致，到許多單位伸手奪權。吳傳啓成為北京日報的顧問，他的部下涂武生進入北京日報工作。在市革委會大量使用學部

的人，周景芳還當上了市革委會的秘書長。這幾個組織以“批陶聯絡站”名義進駐中宣部，和對立派發生衝突時，王力、關鋒明確表態支持他們。在高教部奪權時，他們又在一起。和北大發生衝突時，又得到林傑、王力、關鋒的大力支持。所以我們認為吳傳啓不是一個單單的個人，而是一派勢力的代表。因而一打吳傳啓就會引起大的震動。

由於吳傳啓和關鋒、王力的特殊關係是一個敏感的問題，一提打吳傳啓，就會有人說你“反中央文革”。為了組織的安全，我製定了“死打叛徒不上揪”的策略，不提揪吳傳啓的後臺；不許各戰鬥隊寫王、關、戚的大字報和大標語；不許整他們的材料。“除隱患”戰鬥隊整材料時也要有所節制。

中央文革步步緊逼

反吳傳啓行動開始後，江青、陳伯達等人都找我談過話，要壓我放棄與他們對抗的立場，放棄攻打吳傳啓。都被我硬頂住了。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午，我突然接到電話，要在兩點之前到達釣魚臺。陳伯達、關鋒、戚本禹找我談話。陳伯達說：“我們是受江青委託和你談話的。江青同志本來是要來的，她身體不好，還有別的事情，不能來了。你是有水平的。你是市革委會副主任，又是紅代會的，北大文化革命委員會主任。以後有許多事情需要你和我們共同來做。我們非常希望和你合作，你要和我們站在一起。你寫的大字報和你在北大校文革的行動，為‘文化大革命’立下了汗馬功勞，希望以後好好地合作。你不要反對吳傳啓了，更不要把我們和他聯繫起來。陶鑄反關鋒就是從

反吳傳啓開始的。”

我說：“就是吳傳啓在搞兩大派，到處伸手，製造分裂。清華、北航直到五月中旬才開串聯會搞吳傳啓。”關鋒插話：“真的那麼晚嗎？”接著又說：“吳傳啓已經不在了。你知道嗎？兩大派你要負責。”

關鋒說：“北京分出兩大派，你要負責，聽說你還要揪出一個大後臺，要叫大家嚇一跳。”（我解釋：這都是謠言。）關鋒說：“你態度不好。”我就沒有再解釋下去。

在談到譚震林問題時，關鋒說：“你們要揪出反譚震林的後臺，如果是那樣，我們就奉陪。你們還要保余秋里，提醒你們，不要再犯錯誤，再犯大錯誤就可能爬不起來了。”（我說：這些情況是別人謠報的，不是真的。像二月四日關鋒同志批評我們“三路進軍”一樣，根本沒有那回事。）關鋒矢口否認說：“我沒有打過那次電話，根本沒有。”

戚本禹：“你也有問題，但我們計較了嗎？你還說什麼六月要血洗北京城。”

我立刻急了，指著陳伯達的鼻子說：“你們聽了滿耳的謠言，根本違背事實真相，今天你們說的這些，我要追查，看是誰給我造謠。”沒有等我說完，關鋒、戚本禹就走開了，留下陳伯達。我也起身走了。陳伯達在後面追上來，喊“不要生氣呀，我們要合作哦！”

一九六七年六月一日，王力、關鋒、戚本禹接見中宣部工作人員講話時，戚本禹說：“北京市現在搞兩大派。（王力插話：“互相搞一些不知是哪裏來的東西，根據那些東西來確定方針政策。”）（關鋒插話：“靠謠言確定自己的行動，就會迷失方向。”）北京市現在兩派鬥爭明顯不是掌握大方向的鬥爭，不是搞大是大非。最近有兩個動態值得注意，就是階級

敵人企圖從兩個方面來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來轉移大方向，一種是從極左方面，一種是從極右方面。極左方面不是把矛頭對準劉、鄧、陶這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是企圖用各種流言蜚語打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煽動一些人攻擊總理，攻擊文化革命小組成員。右的方面就是製造混亂，說中央文革分兩派，支持一派，打擊一派。過去說文化革命小組分兩派還可以，因為有陶鑄、王任重。現在的成員都是一起戰鬥過來的，團結是堅強的、堅固的。”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陳伯達、江青、康生等接見外事口紅衛兵時，陳伯達說：“最近街上有這樣一些標語，反對謝富治的標語：‘打倒謝富治！’，‘謝富治算老幾！’現在謝富治是北京市的首長，我投他一票，你們也有一份。這種標語是亂來，屬於‘聯動’一類。寫這種標語的人算老大嗎？老子天下第一。自己來當革委會主任。革委會主任不是自封的，是大家推選的。”

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陳伯達在紅代會核心組講話：“怎麼又打起來了？你們是當無產階級革命派還是當流浪兒？我反對你們最近的行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你們資產階級的靈魂。……你們儘是鼓掌我已經不喜歡了，不聽，也不執行，老子天下第一，什麼人的話也不聽了，中央命令也不聽。我批評謝富治同志，他太軟弱了，對你們太寬容了。有人貼大標語‘謝富治算老幾？’什麼算老幾，這是什麼意思？我是擁護謝富治的，我投他的票。對你們要採取無產階級的強硬政策，你們這樣鬧不行。我什麼都沒有，我是小小老百姓、無產階級。有的同志說我，你最近批評的人太多了，我說，我還是要批評。（謝富治：“你敢字當頭。你們公開批評北京日報，這是對的嗎？某些大學去某些單位打、砸，這是對的嗎？我反對。”）

陳伯達還說：“有些人翻臉不認人。根據他個人的利益，小團體的利益，這些都是資產階級醜惡的東西。你們受壓迫的時候我們的話是香的，現在不行了，你們站起來了，不僅要奪學校的權，也要奪市革委會的權，還要奪工廠、機關的權。現在最危險的是奪無產階級的權。你們可能走到反面了。……你們沒有講接班條件，就想打倒謝富治，你們來當主任嗎？主任不是自封的，是羣衆選的。謝富治如果交班，就是犯罪，不能交班。你們現在的思想是資產階級的思想，你們兩派，這一派對付別的一派，就是劉鄧路線對付羣衆的辦法。我們天天為你們著急，替你們憂慮，不是為個人，而是為國家的前途。你們登了臺，這樣搞下去，可能搞修正主義。（謝富治：這句話很重要。）你們自以為是英雄。是無產階級英雄，還是資產階級小丑？（謝富治：不要走得太遠了，你們兩派，不論哪一派，都不要走得太遠了。）我得罪你們這些委員老爺了。……中學生你們也不要去插手，中學生的兩派，也是你們大學生在裏面插手，工廠的分裂也是你們大學生插手，好像北洋軍閥似的，各佔地盤。（謝富治：這句話很重要。）……地質與新北大吵架，別再打了。北大是老大哥，別逞英雄，不要把地質打倒，地質也不要打倒北大。北大有缺點作自我批評，地質也是如此。我前天在小禮堂的講話，就是批評北大的。北大是一個有名望的學校，又是出第一張大字報的，它成材不成材，是不是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還是走到別的路線，有這種可能呀！這裏要引起北大同學的警惕。……

“前兩個月我就批評了孫蓬一。地質去攻擊新北大是錯誤的，孫蓬一就發火了，作了個報告，說我們上上下下萬眾一心。這是沒有階級分析的，不科學的，你們北大就沒有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有一個會，我是批評新北大孫蓬一的，‘不是我們垮，就是他們垮，垮了再幹’。孫蓬一有火

藥味，要有點老大哥的氣派嘛，不然你們的名譽就損害了。吳傳啓算什麼東西？你們說過就算了，提不到日程上。他這個人排不到我們社會的位置。吳傳啓我不認識他，謝富治同志也不認識他。有一種言論說北京日報、光明日報、新華社、紅旗雜誌都是吳傳啓所操縱的。真是活見鬼！有人扭住周景芳，他在學部工作。（謝富治：他是個好人，是造反的。）我剛剛認識他。他是戚本禹同志派去幫助謝富治工作的，是戚本禹推薦的。關鋒同志開始還不願意呢，要把他調到紅旗，我也同意了。這是一個老實人，別冤枉好人。吳傳啓不可能操縱我們的報紙，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人。你們硬把他抬上來，這不是見鬼嗎？這不是上壞人的當嗎？凡是搞壟斷的，搞特權的，都是替自己造成垮台的條件。你們用吳傳啓這個名字做內戰的口實，一定要垮台。吳傳啓是一個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人，你們為什麼要抬高他？我們兩個人一關謠，你們就垮台了。我們兩個人都不認識他。你們一定要用這個口號，會自己垮台的。不相信，將來會相信的。北大拿這個藉口，少數人搞分裂，一兩個人，兩三個人，想用這個來搞內戰，這一兩個人就要垮台。他認為打中了，就可以把北京市委的權奪過來了。這是想入非非，胡思亂想。這種人一定要垮台。回去跟孫蓬一說一下，我不怕他進攻我。昨天我公開批評了聶元梓同志，我是不願意點出名字的，對於聶元梓同志還是要保護的。你們不要利用我的話去攻擊聶元梓。……北大的同學回去告訴聶元梓同志，叫她不要生氣，我這樣正是為了她好。”

這樣，中央文革對我就很不滿意了。江青到處散佈說，聶元梓驕傲了，什麼人的話都不聽啦，聶元梓反謝富治是想當市革委會主任啦。到一九六七年九月初，王力、關鋒先被抓起來，後來又把戚本禹也抓了。一九六七年九月初，中央文革召開了一個北京大專院校紅衛兵頭

頭會議^[3]，在會上先宣佈把王力、關鋒抓起來了，然後就批我，說我想當市革委會主任，說我有野心，誰的話也不聽啦。主席臺上的康生、江青、陳伯達都講了，江青還說“過去我和聶元梓不認識，我們沒有來往關係”，表示與我劃清界限。

輪到周總理講話，總理說，聶元梓反謝富治，祇能暴露她自己。孫蓬一下來就跟我說，總理的話講得好。總理並沒有給我扣帽子定罪狀，就說這樣一句模棱兩可的話，怎麼解釋都行。他祇認為我是反謝富治，我就是反謝富治的。我在會上一個字都沒有講。我不能檢討，我講什麼？我做的沒有錯。

北大的方針

其實，從運動一開始，我和當時的大形勢就有一些分歧了。我不同意對老幹部採取那樣殘酷的批鬥方式。我不同意掛大牌子，彎腰，坐“噴氣式”，不同意被批鬥的人不准反駁，不准發言，不論批鬥對與否都得強迫人家承認的種種做法。這就和造反派的風格不一樣。我們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十萬人大會鬥陸平，明確規定，提出“五不”：不准掛牌子，不准“坐飛機”，不准罰站，不准戴高帽，不准不讓被批評的人反駁。我們讓陸平坐著接受批判，還允許他說話，允許他分辯。這樣的鬥爭方式，是請示了王任重同意的。王任重不主張在工人體育場開大會，他主張在北大，我和校文革害怕外邊去的人太多，北大的會場容不下，怕出事。我們主張在體育場，相信我們能夠控制局面。每批判完一個問題，就問陸平，是不是這樣？他在當時的環境下，迫於形勢，有許多問題就認可了。當然，這樣批鬥陸平也是極其錯誤的，但採取這種方式，就

是為了反對當時流行的掛牌子、“噴氣式”、不允許被鬥人申辯的做法。結果，這引起江青和中央文革的不滿。會前，江青親自跟我講，你們這個會是要登報的。結果會開完了，也沒有登報。她不滿意，說我太“溫”了，太“溫良恭儉讓”。中央文革就沒有讓新華社報道這個會。

有一次在北大俄文樓開會，校文革各系的頭頭和新北大公社的各戰鬥隊隊長都參加了，我作講話。我把“文化大革命”裏面牽涉到中央文革的事情進行了比較清楚的分析，並針對康生在外交部的一次講話，正式提出與中央文革對立的政治口號。我說，中央文革提中央文革的政治口號，北大提北大的政治口號。我們的口號是反左不反右。為了怕他們抓辯子，我還補充說，我們是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當前的任務是反左。因為我看到，所有的老幹部被打倒了，連農村的生產隊長都打倒了，都成了走資派了，這還不是左嗎？這時候，除隱患戰鬥隊已經進行了一些工作，掌握了一些材料，事情看的較清楚了。

新北大公社通過學部的人參加審問吳傳啓一夥的王恩宇，王恩宇交代說：戚本禹說了，對聶元梓，即使是批不倒，也要把她批臭！這是多麼明顯的證據。所以，一九六七年九月，揪出王力、關鋒的時候，陳伯達還專門對我講，“過去我對你說了一些錯誤的話，我向你道歉。以前王力、關鋒他們說了些什麼，做了些什麼，我們也不是都很清楚的。”他怕我對他有什麼別的看法，或者揪住他過去對我說王力、關鋒、戚本禹的許多好話用來壓我的事不放，所以一再向我表示道歉。

後來江青、陳伯達就鼓動我“反大個兒的”，鼓動我反對周總理，我不吭聲，不理睬他們。我裝作沒有聽懂，裝糊塗。到這個時候，中央裏的“大個兒的”還能有誰？除了總理還有誰？我又一次沒有聽他們的。

這樣，江青、謝富治等人就把北大看作是眼中釘，把我看作是他們的眼中釘，因為我老是不聽他們的話，還要跟他們頂牛。一開始，那張大字報被利用，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於是，北大成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據點。但是，隨著文革的發展，江青幾次在羣衆中講，“北大太‘溫’了，運動搞得太‘一潭死水’了。”江青老想找北大的後臺，看後面是不是有老幹部在支持。其實，我不敢找啊。就是有戰爭年代接觸和熟悉的老關係，老上級，我也不敢找。我和江青他們的觀點有了分歧，我怎麼敢把其他人再牽扯進來呢？後來，北大就逐漸成了反對（王、關、戚）的一個據點，所有反對王、關、戚觀點的，都聚集到北大來了。王、關、戚被抓後，我們改為“反對沒有王、關、戚的王、關、戚勢力”，當時不敢也不能直接提反對中央文革。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接見天派的會議上，江青說：“北大傳出，說現在又立第三功了。聶元梓真不知害臊。”我哪裏敢這樣說。我知道鬥爭還沒有結束，我還得夾著尾巴做人呀。雖然九月一日，中央文革宣佈王力、關鋒倒臺的消息，我當然非常興奮，但是我必須在學校佈置下去，通知新北大公社總部“所有戰鬥隊不准歡呼”，不許貼大標語、大字報，不許上街遊行。哪裏還敢說立什麼功呢。

你們是“二月逆流”

（以下是瞭解內情的“除隱患戰鬥隊”兩名骨幹的敘述，直到本章結尾。）

江青批評北大太“溫”了，新北大公社被扣上了“二月逆流派”

和“支持全國的保守派”的帽子。老聶、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保在
哪裏？我們保周恩來，反對打倒譚震林等幾位副總理，中央文革和
我們的對立面就曾經指責我們是“二月逆流”。

新北大公社是在一九六七年初成立的，是軍訓的產物，在軍訓團的
指導下，按照學校的行政系統，就是以系為單位，先在各個系裏搞聯合，
然後再組成全校性的組織，就是新北大公社。新北大公社成立不久，正
忙於校內的事情，社會上就突然地掀起了規模浩大的所謂“反擊二月逆
流”的風潮。我們響應不力，一下子就使我們非常被動。

反“二月逆流”^[6]，他們是通過學部吳傳啓、北師大譚厚蘭等人搶
先在社會上發難的，搶頭功。我們一點兒不知道內情，什麼“大鬧京西
賓館”，“大鬧懷仁堂”，這些事情我們當時都不知道。沒有人向我們透露
情況，聶元梓也不知道內情，我們怎麼能作出迅速的反應？我們首先要
摸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啊。社會上反“二月逆流”已經反得轟轟烈烈，我
們還沒有什麼動作，連新北大公社內部也有一些羣衆覺得我們太遲鈍，給
我們施加很大的壓力，要我們表態。我們發現，就在一月份，江青他們
還是保譚震林的；陳毅在外文印刷廠作檢查，陳伯達還高呼口號，“向陳
毅同志學習”，“向陳毅同志致敬”，怎麼剛剛過了一個月，這些副總理就
都變成“壞人”了？對於“反‘二月逆流’”首當其衝要打倒譚震林的原
因，我們一無所知，祇能根據我們掌握的運動動態去分析去推測。我們
開了一次公社大會，要搞動態的一位同志介紹我們所要瞭解的有關情況，
結果，公社的羣衆都從中得出了我們是“保譚”的看法。

因此，批判譚震林的時候，我們表態都是表了兩次的，社會上的口
號都提得很高，是“打倒譚震林”；北大呢，第一次，我們的口號是“炮
轟譚震林”，這顯然是調子太低，太保守，祇好再次作出表態，認同“打

倒譚震林”的提法。

但是，對於反“二月逆流”，我們是有自己的判斷的，我們覺得，他們就是要通過打倒幾位副總理，最終搞到周總理頭上。把陳毅、李富春、譚震林等都搞掉了，周恩來不就成“光桿司令”了？而且，當時已經出現了反周總理的苗頭，所以，公社專門發表了一個堅決保衛周總理的聲明，對反總理的苗頭進行堅決反擊。

因此，我們雖然迫於形勢，發表過“堅決保衛中央文革”的聲明，喊過“反擊二月逆流”的口號，但是，我們也確實發表過保衛周總理的聲明。我們的許多行動都足以證明，我們對於“反二月逆流”的抵制。

第一，在“打倒”和“炮打”幾位副總理的喧囂聲中，我們從來沒有專門組織人去搞幾個副總理的材料。

第二，我們在國務院系統各部委的兩派鬥爭中，支持的都是保護在任的幾位副總理的羣衆組織，都是擁護周恩來總理的；和我們相互支持的都是哪些組織呢？在農業部是保譚震林的，在國家計委是保余秋里的，在財貿部是保李先念的，在外交部是保陳毅的，在民委、統戰系統是保李富春的。農業部的江一真和左葉，和我們立場一致，關係很好，都是保譚震林的，他們幾次到北大來，和我們商量過，要從反譚震林的那一派裏“抓叛徒”，以便瓦解反譚派（他們到北大來的事情，後來被對立面當作新北大公社“勾結譚震林”的罪名。一直到一九七一年，還有人貼我的大字報，說我“勾結譚震林”）。一九六七年四月份，石油學院反余秋里的一派送給我們一份反余秋里的材料，我馬上就到石油學院去，找到石油學院學生、保余派的學生組織頭頭，逐條印證、批駁反余的材料，澄清事實真相，最終證明這份材料完全是無稽之談。

第三，當時，洪濤、劉鄧貼出要與李富春進行辯論的大字報（標語？）^[7]，我們就抓住機會堅決進行回擊，發表聲明指出這是“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貼出“洪濤、劉鄧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罪該萬死”的標語（李富春當時是政治局常委），明確表明我們的態度，打擊他們的囂張氣焰。

“〇〇七密令”案件：保周還是反周？

“文革”當中，始終有一股反對周恩來總理的思潮，在這股思潮的背後，就是中央文革和江青做後臺。我們呢，就是認準了，國務院不能動，周總理不能反，我們是要堅決地擁護周恩來，保衛周恩來。

我們不但有思想，還有大量行動。我們的除隱患戰鬥隊專門組織了人員，調查搜集了與關鋒有密切關係的吳傳啓一夥的材料，並且多次地向周恩來總理上報有關情況，聶元梓就當面向周恩來遞交過這些材料。我們自己也幾次通過周恩來的（前）衛士長，向周總理轉送過我們收集來的情況。

這其中，“〇〇七密令”案件是最重要的事件。我們本來是堅決地保周的，但是，在《北京大學紀事》中卻這樣記載：“聶元梓、孫蓬一從（一九六七年）三月份開始到四月搞‘〇〇七密令’的調查，他們兩次派到湖南搜集湘江風雷的人於一九六六年底捏造的一份誣陷周總理的材料即所謂〇〇七密令，並將搜集到的一份‘密令’上交戚本禹。”這顯然是把此事當作老聶、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反對周恩來的“罪狀”了。明明是我們追查出反對周恩來的有關線索，並且予以反擊，這個“紀事”卻

說是我們和戚本禹有什麼隱秘的聯繫！

（聶元梓：我們本來是與王、關、戚一直有矛盾，而且在進行鬥爭，怎麼會跟他們勾結起來反周總理呢？天安門出現反周總理的大標語，都是我打電話讓“新北大公社”的學生去覆蓋的。我們擁護周總理的態度從來沒有動搖過！）

“〇〇七密令”事件的發生地，是在湖南省會長沙。“文革”初期，湖南省的羣衆組織分成兩派，一派是湖南省高校紅衛兵司令部，是以高等院校學生為主的，支持省軍區，被認為是“保守派”，一派是湘江風雷，以工人居多，是造反派組織，人員成份比較複雜。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以中央文革名義發表批示說，湘江風雷的頭頭有問題，說湘江風雷是反動組織。省軍區根據這個指示，就抓了湘江風雷的頭頭，並且進行審訊，查出了一件“湘江風雷”的頭頭參與陷害周恩來總理的“〇〇七密令”事件。

所謂“〇〇七密令”，是誣陷周總理要搞政變的一份手令。事情的起因是，長沙鋁廠的工人葛某某捏造說，一九六六年冬，他在湖南省委門前看到開出來一輛摩托車，從車上掉下來一份文件，被他撿到了，上面寫著：擬於元月一日起事……手諭。葛某某說，他用當年中央幾位領導人給雷鋒日記的題詞對照，從字體上辨認，這和周總理給雷鋒題詞的字蹟很接近。葛某某把這一情況報告給湘江風雷，並且說，這密令本來被他藏在支蚊帳的竹竿裏，結果被人偷走了。湘江風雷就馬上派人坐飛機飛到北京來，要求向中央文革彙報重要情況。陳伯達派人聽取了有關彙報。後來，湘江風雷的一個頭頭到北京來，住在洪濤處，寫了一份關於“密令”的誣告周總理的材料，戚本禹派人取走了這份材料。

很顯然，這是一起陷害周總理的陰謀事件，所謂“手諭”，根

本就不存在。編造的謊言是很容易戳穿的。奇怪的是，湖南省公檢法的人追蹤有關線索，追到北京，其中就追到洪濤等人。他們到公安部去，要求調查洪濤等人，公安部卻說洪濤是左派，不許調查，把他們擋了回去。

正巧，湖南省公檢法的人員在北京調查期間，看到了新北大校刊刊登的四月中旬孫蓬一關於揭露潘（潘祚年）吳（吳傳啓）洪（洪濤）劉（劉郢）問題的講話，他們從中瞭解了新北大公社對於洪濤等人進行揭發批判的態度，就主動地來與我們聯繫，希望我們能夠幫助追查和澄清所謂“〇〇七密令”的真相。我們的態度非常明確，很快就搞了一份調查材料，就是關於“〇〇七密令”的第一號報告，由聶元梓在一次外事活動中，在首都機場迎接外賓的時候直接交給鄧穎超。時間是一九六七年五六月間。為了搶時間上報，調查報告中的部分證詞我們都沒有來得及拍照，祇是抄寫一份留底，就把原件在第二天交給鄧穎超了。

我們調查關於“〇〇七密令”事件時，就發現戚本禹和林傑插手了。上送周總理的第一份報告，我們沒有敢把戚本禹寫進去，因為怕惹出麻煩。一九六七年秋冬之際，王力和關鋒已經被打倒了，林傑也完蛋了，有同志提議就“〇〇七密令”事件再寫一個報告，把有關林傑和戚本禹的材料寫進去。第一號報告和第二號報告的區別就在於此。當然，執筆的同志仍然採取了防範策略，寫了戚本禹插手，派人去取陷害周總理的材料的這一段以後，在後面加了一個括弧，括弧裏說“我們不相信這一點”，給自己留了一條後路。以免萬一被戚本禹知道，加害於我們（當時戚本禹還是中央文革成員）。

（聶：他們整理的有關材料，我幾次親手交給周總理和鄧穎超。在機場接外賓的時候，在人民大會堂參加宴會的時候，我都向周恩來總

理遞交過這些材料。)

我們還到香河（一說是薊縣）去，當時周總理的前衛士長住在香河，我們委託這位前衛士長向周恩來總理轉交我們收集到的有關材料，要周總理知曉那些人對他的誣陷。我們還通過與我們關係密切的高等軍事學院（國防大學的前身）的同志，向周總理轉交過有關的調查材料。我們調查得來的關於王力、關鋒、戚本禹等人的材料，我們也向周總理送交過。

還有，我們參與揪叛徒，也是需要澄清的一件事。現在祇說，北大揪叛徒是因為康生寫了條子，是受康生指示；其實呢，康生的條子我不知道，我們確實有周總理的批示，周總理同意我們就有關叛徒線索進行調查活動。

事情的原由是這樣的：六七年初，社會上揪叛徒成風，所謂“六十人”叛徒案，就是那時候鬧出來的。在當時的環境下，北大也不能置身事外，有一次中央領導開會接見的時候，孫蓬一就給總理寫了一個條子，說我們有一些關於叛徒的線索，是否可以進行調查？周總理批示說（那是當時交孫蓬一批示的條子），可以調查。人數少一點，材料不要公佈。我們得到了周總理的支持。就“除隱患”來說，我們用周總理的這一批示當“通行證”，用來調查過吳傳啓的歷史。

我們中間的一位同志（姓名記不清了），受命到武漢去調查吳傳啓的情況——吳傳啓是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的造反派，追隨王力、關鋒、戚本禹，引起我們的懷疑，吳的歷史也確實是有疑點的——當時所有的檔案都被軍管，控制很嚴。調查人就拿出周總理的批示影印件，他們也不相信，要求讓等一天再來。顯然地，他們是要去核實這個影印件的真偽。到第二天他再去，他們就給他大開綠燈，把有關的資料全部提

供出來，還讓他拍了照片。

我們還帶著周總理的批示去找過沈醉^[8]，調查吳傳啓是不是國民黨特務。別人去找沈醉調查情況，都對沈醉很不客氣，毆打他，我們就是同他交談，問他是否知道吳傳啓的歷史。沈醉說，指認吳傳啓是特務，證據不足，要想查明此事，你們要到秦城監獄去找某某某。沈醉還說：“特務活動，週邊人員很多，真正參加進來，要嚴格審核，要單獨編號，並不那麼容易。特務不是那麼好當的。”

北大的姿態

從根本上說，北大的姿態，一直是受指責的：校文革成立以後，很快就被批判為“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到了一九六七年春天，就說北大是“二月逆流派”；還有一個罪名，是在全國各地都支持了老保組織；最嚴厲的則是說北大和聶元梓分裂中央文革，干擾了毛主席的戰略部署。

當時有幾件重大事件，北大或者是沒有參加，或者是隨大流，走過場，很少有什麼由北大主動發起的事情。一九六七年七月，在中南海門前組織“揪劉火線”，我們不是發起單位，“揪劉火線”搞了幾十萬人，聲勢很大，我們是一直等到第三天才到場參加的，當時的形勢下，你不參加怎麼行？火燒英國駐京代辦處，是積極反“二月逆流”的北京外國語學院某組織幹的，該組織本來就與我們是對立的，我們沒有去人；中央文革策劃門王光美，門彭德懷，也都不找北大。北大在他們眼中是異己啊。

我們對王力、關鋒、戚本禹產生懷疑，是從高教部奪權開始；我



左圖：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北京兩所高等院校的紅衛兵主持了約十萬人參加的批鬥彭德懷（前左一）大會、張聞天陪鬥。會後彭德懷被打癱在地



右圖：彭德懷被批鬥時的情景

們對謝富治產生懷疑，則是從“一·一五”搶檔案事件開始的。到高教部奪權，我們動作快，把所有辦公室的印章都抄了，還抄了7、8個司局長的家。奪印，抄家，這些都是錯誤的，雖然當時那是通行的做法。奪權容易掌權難。高教部應該由什麼人掌權？結果就在盧正義的問題上，與王力、關鋒、戚本禹、張春橋、陳伯達等產生了衝突。中央文革的大部分人都出面壓我們了。王、關、戚策動全面奪權是有準備的，一九九六年底，他們就派人到國務院各部委搞材料，看大字報，進行串連，要對國務院系統下手了。因此，高教部奪權，王、關、戚是有備而來，要扶植盧正義上臺，我們則是倉促應戰，被迫退卻。不過，以高教部奪權為轉捩點，我們就和中央文革、和王、關、戚等人開始鬥爭，組織和開始了“除隱患”戰鬥隊的活動。

“一·一五”搶檔案是另一件大事。民族研究所造反派洪濤等人，到中央統戰部搶檔案，用卡車拉走，結果在路上就把一些檔案從車上掉下來，散了一路。公安部門接收了紅衛兵扭送來的洪濤、劉鄧之後，謝富治下令把他們放了，還有個“四點講話”，說洪濤、劉鄧是造反派，為他們張目。洪濤等人受到縱容和鼓勵，一個月內，在統戰部和民委系統搶檔案搶了二十多次。他們搶了西藏駐京辦事處的檔案，有的都流失到海外去了。謝富治這樣做，把他自己暴露出來。這也是個很有野心、唯恐天下不亂的人啊。

這就是北大校文革、聶元梓和新北大公社的方針。除了帶頭寫過“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聶元梓和校文革很快就轉到了“保守”的方面來了，並且很快把矛頭指向炙手可熱的王力、關鋒一夥。

全國都搞奪權的時候，我們到高教部去，與王、關、戚等人發生直接的衝突；反“二月逆流”的時候，我們開始調查整理王、關、戚的材

料。我們“除隱患”戰鬥隊先後整理過四十五份材料，其中祇有一份是講到高幹子弟問題的，其餘都是關於王、關、戚及吳傳啓、林傑的。

一九六七年五月，新北大公社以批判潘梓年為名，向關鋒一夥發動了攻擊，五月底或六月初，“除隱患”戰鬥隊公佈了關於吳傳啓的第一批材料。吳與關鋒有特殊關係，北大準備在批吳的名義下大幹一場。也許，這威脅到了中央文革。因此，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陳伯達有個“六·五”講話，以居高臨下的姿態，氣勢洶洶，對北大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進行了非常嚴厲的指責，他警告說，你們搞潘（潘梓年）、吳（吳傳啓）就是要搞王力、關鋒，方向是錯的！這樣，新北大公社在泰山壓頂般的壓力下，陷入了特殊的困難時期，形勢非常嚴峻。許多羣衆不明真相，新北大井岡山兵團正式成立，還導致新北大公社內部發生分裂。“除隱患”準備的許多材料，再也無法公佈。

還有，在軍隊問題上，無論是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三軍造反派”與北京市地方上的造反組織聯手，兩派發生大規模武力衝突時，還是一九六七年八月，王力、關鋒跳得最高，在全國到處“揪軍內一小撮”的時候，我們都始終沒有向軍隊發難，沒有參加任何反軍亂軍的行動，沒有提過任何對軍隊不利的口號。

在對待軍隊的問題上，新北大公社是非常謹慎、保守的。我們沒有插手過軍隊內部的事情。我們沒有組織人調查軍隊的情況（我見過有的羣衆組織油印的調查軍隊情況的提綱，簡直就像是搞軍事情報），我們也沒有主動向軍隊發難。相反，我們和有些地方的軍隊有著良好的關係。如一九六七年夏季，當湖南省軍區、廣州軍區都受到衝擊時，我們不僅與他們關係很好，還專門到京西賓館拜訪過廣州軍區副司令員

詹才芳。

我們違心地參加的針對軍隊的活動，就是“七。二〇事件”後北京在天安門開群眾大會^[9]，歡迎謝富治、王力回來“打倒陳再道”的遊行（這是市革委會通知各單位必須參加的活動）。從根本上說，一方面，新北大公社就是軍訓的產物，我們從根子上就是擁軍的；一方面，我們對於謝富治、王力都是非常反感，是與他們進行鬥爭的。但是，“武漢事件”，謝富治和王力他們成了“英雄”，在回到北京時受到隆重歡迎，北京市舉行大會和遊行，支持謝、王，攻擊武漢軍區和陳再道。雖然我們是冒雨參加了全市的遊行，但是心中非常痛苦。我們“歡迎”和“支持”“擁護”的，是我們正在與之進行艱苦鬥爭的對頭啊。

回到學校以後的第二天，又接到中央文革的電話（從口氣上可能是陳伯達的這個電話是直接通知新北大公社的，北大校文革不知道），“今天向西邊去，懂了嗎？”要我們向西山去遊行（那裏的部隊單位多）。公社總部感到很為難，既沒有辦法抵制，又不知該怎麼動員疲憊不堪的羣衆再去遊行。我們祇好把中央文革的電話在大喇叭裏進行了廣播，組織羣衆到西山方向去遊行。走到一個部隊的大院，我們喊了口號，要求進去，懷疑陳再道躲藏在裏面，在門口發生爭執，他們保證說陳再道不在這裏。這樣，我們的隊伍就離開了。事情沒有鬧大。我們並不想真正衝進去，我們也不想把事情鬧大，如果真想衝進去，幾百人、上千人的隊伍，不是幾個執勤的軍人就能阻擋得住的，那正是全國衝擊軍隊成風的時候啊。

與軍隊有關的，還有一件事。當時有傳言說，38軍是支持我們的對立面北大“井岡山”的，而且傳得很邪乎。即使是這樣，我們仍然是很理智的，沒有頭腦發熱，沒有作出有損於人民軍隊的行動。我們通過高等軍事學院的人——38軍軍長在高等軍事學院學習時，他們曾經是該軍

長的老師——介紹去找38軍說明情況。我和新北大公社的頭頭盧平等一道去保定，到38軍的軍部去。到了保定一下火車，我們就被包圍了。當地的武鬥人員用槍指著我們，問我們是“天派”還是“地派”的。我說我們是“天派”，是聶元梓一派的，來保定找38軍的。結果他們就讓我們通過了。到38軍，我們和軍裏的領導談得很好，他們說，我們對北京的事情從來都不參與。這樣，澄清了38軍的態度，消除了誤會，阻止了北大校內武鬥的升級，也維護了38軍的聲譽。毛主席知道我們找38軍談話的事，在“七·二八”召見會上還稱讚我們做的對。

“除隱患”為什麼解散

我們“除隱患”戰鬥隊，對於校內的人，雖然毛主席曾說北大是“池深王八多”，我們一個都沒有去搞，就是從王力、關鋒、戚本禹一直追到康生，到康生為止，我們不敢往下搞了。

王、關、戚的問題，被我們發現，是從高教部奪權和對盧正義的評價發端；康生問題，也是從盧正義那裏引發出來的。當時，我們對盧正義是堅決反對的（盧正義在江蘇省反省院坐牢的時候，的確是寫過反共自首書的），對不遺餘力地支持盧正義的王、關、戚產生懷疑，就想進一步地調查瞭解王、關、戚的情況。當時，中科院學部的造反派頭頭王恩宇被對立的一派抓起來了，我們通過聯繫，就去提審王恩宇，當時去了十幾個人。王恩宇就講了大量戚本禹的材料，講戚本禹保盧正義的問題。我們問，戚本禹上面還有人支持嗎？王恩宇點頭，並且暗示，這個人就是康生。但是，當時就很難繼續追查下去。

我們不敢搞得動作太大，搞王、關、戚已經是冒著很大風險了。

審過王恩宇，回來向老聶彙報，講了戚本禹的大量問題，聶元梓說，看來戚本禹應該跟他們（王力、關鋒）是一夥的。再講到康生的問題，問老聶說關於康生的情況要不要向上報，聶元梓拿不定主意，就說問一問高等軍事學院的人——高軍院的幾個人，在文革初期跟我們關係很密切，同時，他們有自己的資訊渠道，聯繫很廣，我們有些事情拿不準，就向他們徵求意見。我們把關於康生的事向他們講了，問他們應該怎麼處理。他們就要求先聽一聽審問王恩宇的錄音。他們來了兩個人，穿著便衣，到了北大十三公寓，來聽錄音。結果呢，聽到關於康生的部分，錄音沒有了。他們問怎麼沒有繼續錄，我說，我敢繼續往下問嗎？你們說應該怎麼辦？他們告訴我，有些事情是要看火候的，要在適當的時機往報，你往前趕了一點兒，就是反動，你稍微等一等，再報上去，就是功臣。

這樣，我們就接受了他們的意見，到此為止，見好就收了。“除隱患”也不能繼續存在了，因為已經涉及到了康生，你不解散，人家就認為你不祇是在搞康生了。其實我們都明白，戚本禹的後臺就是那一夥。追究王、關、戚，已經給我們造成非常被動的局面，若是再惹著康生等，那恐怕祇會是自討苦吃。不久，戚本禹也垮台了，“除隱患”的一個同志，用“迎春到”的名義，寫了一張大字報，公佈了戚本禹的一些罪行。這可以說是“除隱患”的尾聲了。

註釋：

[1]潘梓年，時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下屬某研究所的黨委書記，較早參與造反的老幹部。

[2]譚厚蘭（1940～1982），時為北京師範大學學生，該校造反派組織“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井岡山戰鬥團”總負責人，後來擔任過北師大革委會主任、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核心組副組長、北京市革委會常委等職。王大賓、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和聶元梓一道被稱作北京高校紅衛兵的“五大領袖”。在“文革”後期及“文革”結束後分別受到隔離審查和法律追究。

[3]林傑，時為《紅旗》雜誌社編輯，“文化大革命”發動階段和運動初期的活躍人物。與王力、關鋒等一道於一九六九年八月被清算。

[4]盧正義，時為高等教育部政教司副司長，率先出面“造反”，發起組織高教部造反組織“延安公社”。

[5]根據筆者見到的一份題為《中央首長在市革委會擴大會議上的講話》的油印傳單所載，這次會議是在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於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參加接見的有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謝富治、張春橋、戚本禹、姚文元、楊成武、吳德、周景芳、丁國鈺等。會議精神，是在剛剛揪出王力、關鋒等以後，對造反派“火燒英國代辦處”、“揪軍內一小撮”和“開展第三次全國串連”等行動進行批評，號召造反派進行自我批評。江青首先講話，關於聶元梓的段落如下：

“現在我講一下聶元梓同志的問題。上一次開會我批評了她的缺點和錯誤，我沒有說要打倒她。她錯的我們就批評，正確的我們堅決支持。聶元梓在文化革命開始立了兩大功。第一，她是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作者之一。第二，她揭發了安子文叛黨集團。但是聶元梓揹上這兩個包袱，壓得你喘不過氣來。聶元梓對不對？（贊答：對。）本來聶元梓羞羞答答的不想承認錯誤。你們也不給她一個機會。‘紅旗飄’（北大反聶元梓的一個造反派組織）上次發言的人並不高明，到處受命搶、抄，要讓我去搶、抄，我就不去。我希望聶元梓把包袱丟掉。我們記你們的功，但你們自己不要記功。我自己講我自己是個共產黨員，做點好事是應該的，要不斷為人民立新功。聶元梓就是吃老本，叫人家揪住，甚至連組織都要垮臺。聶元梓的助手孫蓬一不好，孫蓬一出許多

壞點子。我們對其他學校的一些小領袖（戚本禹插話 他們自己叫頭頭）有錯誤也要與人為善，善意地、個別地、小範圍地說，不行就要大範圍了，懲前毖後，治病救人。聶元梓應該丟掉包袱輕裝上陣，蒯大富也是這麼一個問題，我是不願意人家打倒你們的，什麼譚厚蘭、王大賓、韓愛晶也是一樣。但有一點你們要記住，絕不允許把功勞揹起來。要天天記住為人民立新功。我講的不一定對，不對的，打倒、炮轟都可以，但我是滿懷熱情的。《北京大學紀事》在九月一日的條目下寫道：“江青在北京市委擴大會上說‘‘北大’紅旗飄裏準有壞人。牛輝林到處搶抄，羣眾是好的。’錄在這裏，以便參考。）

[6]“二月逆流”：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和十六日，在周恩來主持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與中央文革成員參加的中央碰頭會上，李富春、葉劍英、李先念、譚震林、陳毅、聶榮臻、徐向前等人憤怒斥責“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對在場的陳伯達、康生、張春橋等嚴詞質問，體現了中共黨內反對“文革”的積極力量的呼聲，隨即被毛澤東予以否定，被誣為“二月逆流”，參與者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和批鬥，首當其衝被打倒的則是擔任國務院副總理的譚震林。

[7]洪濤、劉鄧，時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下屬民族研究所的造反派頭頭。

[8]沈醉，國民黨軍統局少將，建國後被關押判刑，於一九六〇年被特赦。

[9]“七·二〇事件”：一九七六年夏季，湖北武



聶元梓與王大賓

漢兩派羣眾組織“工人總部”和“百萬雄師”嚴重對立，武漢軍區支持“百萬雄師”並壓制“工人總部”。七月十九日，中央代表謝富治、王力在武漢宣佈“百萬雄師”是保守派組織，不能依靠，激起“百萬雄師”和部分駐軍的憤怒，“百萬雄師”及部分部隊官兵于當日上街遊行，聲討王力。七月二十日，他們衝到謝富治、王力的住地，要求接見，被拒絕。憤怒的羣眾把王力揪到武漢軍區大院，進行質問和批鬥，並舉行數十萬人參加的遊行示威。二十二日下午，中央文革小組在西郊機場組織了示威性大會，歡迎謝富治、王力返京。二十五日，天安門廣場舉行百萬人大會，林彪、江青都親臨大會。王力被捧為“英雄”。大會聲討“百萬雄師”和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七·二〇事件”被定性為“叛變行為”，“反革命事件”。隨之在全國展開“打倒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逆風。

王大賓(1946～)，時為北京地質學院採礦工程系學生，該院造反派組織“東方紅公社”負責人，後來擔任過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核心組副組長、北京地質學院革命委員會主任、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常委等職。一九七八年被捕，一九八三年釋放。

蒯大富(1945～)，時為清華大學化學系學生，該校造反派組織“井岡山兵團”總負責人，後來擔任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核心組副組長、北京市革委會常委等職。一九八三年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十七年，剝奪政治權利四年。

韓愛晶(1946～)，時為北京航空學院學生，北航造反派組織“紅旗戰鬥隊”負責人，曾任首都大學紅代會核心小組副組長，北京市革委會常委，北京航空學院革委會主任等，一九七九年被逮捕，一九八三年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

聶元梓•著

文革「五大領袖」——

聶元梓

回憶錄

ISBN 988-97608-6-X



八周文化

HK\$125/NT\$500

文革
「五大領袖」——